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HUAXIA MAGAZINE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 广东省优秀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華夏

双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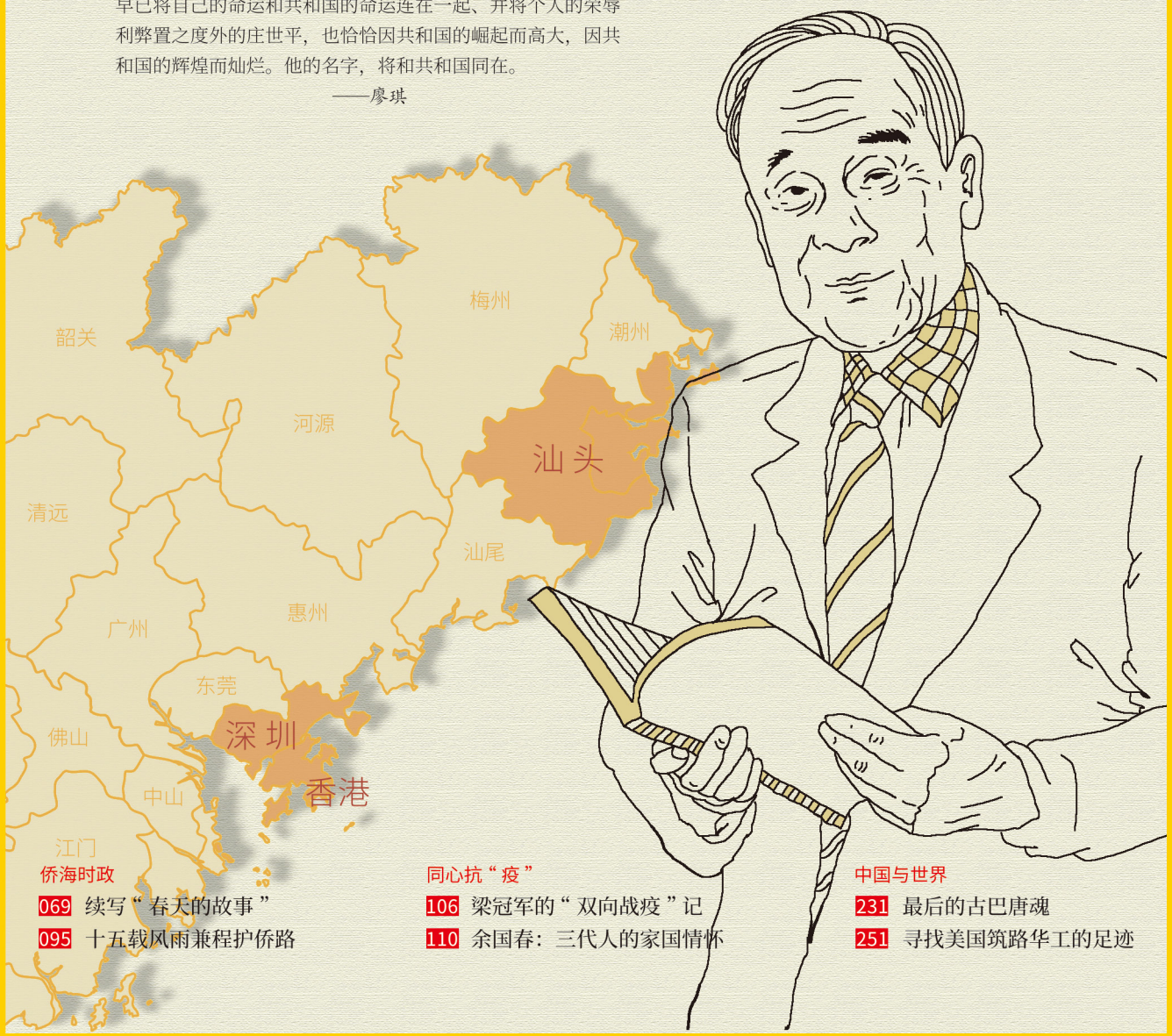
ISSN 1003-7373
2020年 12月 总220期
定价：¥30 HK$40 NT$128 $20

华夏头条

庄世平与改革开放

早已将自己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并将个人的荣辱利弊置之度外的庄世平，也恰恰因共和国的崛起而高大，因共和国的辉煌而灿烂。他的名字，将和共和国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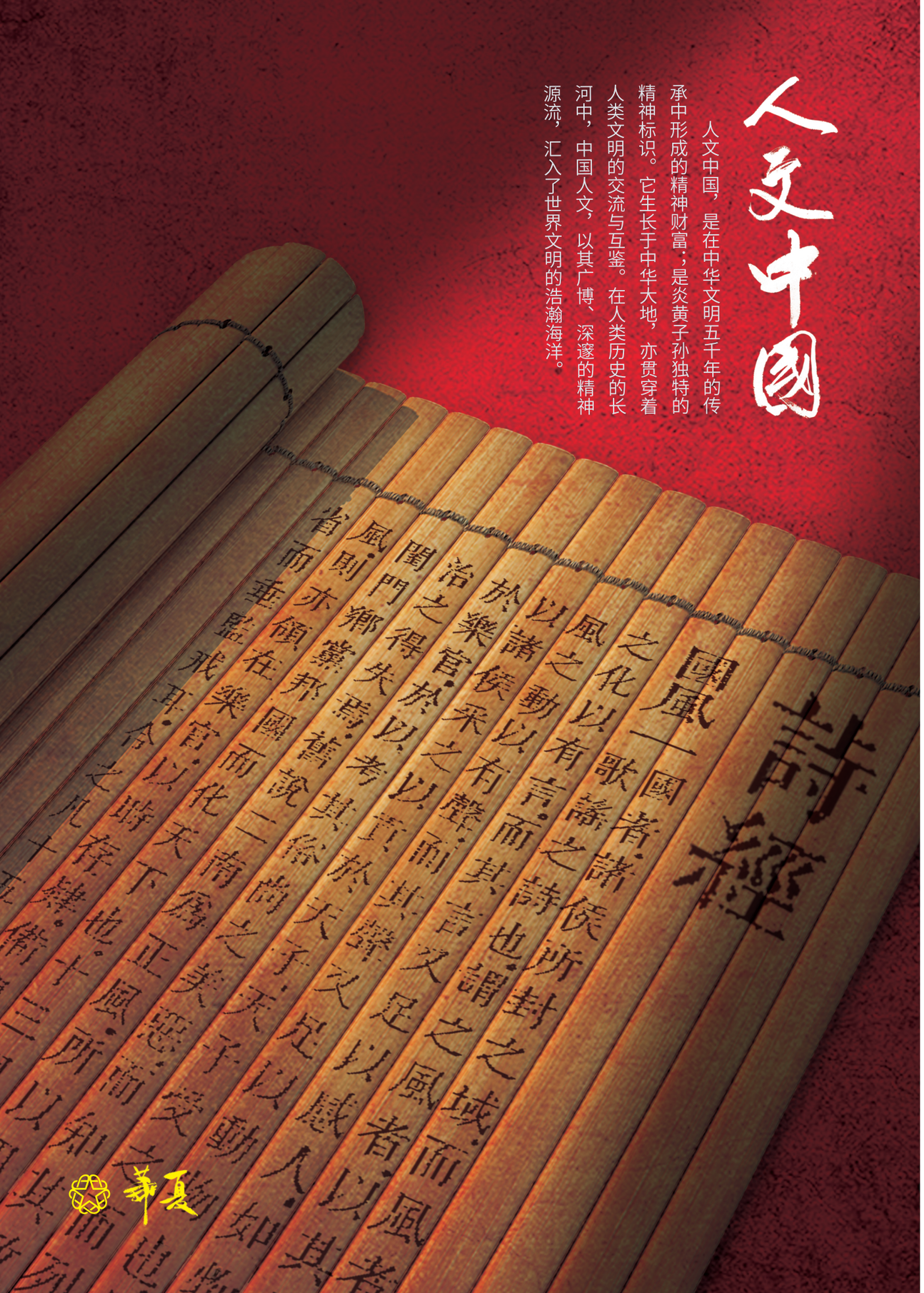
——廖琪



侨海时政
069 续写“春天的故事”
095 十五载风雨兼程护侨路

同心抗“疫”
106 梁冠军的“双向战疫”记
110 余国春：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中国与世界
231 最后的古巴唐魂
251 寻找美国筑路华工的足迹



侨风扑面故人来

文 刘迪生（《华夏》杂志总编辑，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故事里有生活的风景，也有生命的温度。就像我手里的这本沉甸甸的带有生命的温度的书——萧萧的纪录片采访随笔《镜中故人》，字里行间散发着大地的气息。

萧萧随笔《镜中故人》是电视纪录片《炎黄子孙》的衍生品，全书共 19 篇，每一篇由纪录片和采访手记两部分构成，记录了 20 位华侨华人在异乡行走、生活、拼搏的传奇经历，讲述充溢着萧萧富有诗意的、有温度的人文主义关怀。萧萧的镜头和笔下的人物、事件——抛却采访对象的移民身份不论，看上去是那样平凡、真切，好似过于家常，却给我带来一种久违的温暖。可以说，这本随笔是一部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底色的海外华侨心灵史。

萧萧纪录片中的人物世界有：在新西兰种菜、开飞机、赛马的百岁老人陈松兴，历尽坎坷的“薯片大王”黄玮璋，新西兰女权主义倡导者、新西兰太平绅士和英女王服务勋章获得者冼锦燕，修学和社会活动两不误、心比天高的广府女子胡颖华，少年得志却急流勇退的“深圳歌王”刘鸿等。随着萧萧书中的镜头和讲述，读者宛如走在一条悠长幽深的历史小巷，真切感受到海外华侨脚下的艰难阻折，头顶的星光闪耀、璀璨斑斓。这是一种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对海外华侨奋斗史的史诗性再现，萧萧通过个性化呈现杰出海外华侨丰富多彩的人生，抵达对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生和岁月的深层透视和思考。

华侨华人，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的群体，他们中有着众多非凡的故事。萧萧的影像创作和文字记述，好比涓涓细流，将那些闪耀着阳光的光泽、生命的光泽的河流柔和地带到读者的心中。20 张面孔，20 种人生，有如 20 首别出心裁的诗歌。书中的华侨历经风雨人生，有很多直击人心的对于命运的顿悟。陈松兴虽然客居他乡大半辈子，但骨子里仍然流淌着中国血液，他的意识深处深深烙印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观念。如今，这位心念家乡和故国的老人已经离世，萧萧说，老人的离去也成为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新西兰以乒乓球运动为生的姊妹花李春丽和李璀丽，多次代表新西兰国家队参加比赛，荣获了多项荣誉。在聚光灯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和磨砺。“无论在中国还是新西兰，乒乓球场上的李春丽都英姿飒爽，认真迎接每一场的比赛。但在国际大赛中，中国队与新西兰队的对垒，仍然让身为前国家队员的她在面对中国队的年轻选手时心里充满了矛盾。”萧萧撰写的纪录片解说词是朴素的、真切的、诚恳的。李春丽坦言：“无论怎么样都是希望中国队赢。当我遇到中国队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矛盾。又想自己打得很好，又希望自己成为最优秀最好的选手，可是又希望中国队会获胜。”这种两难的心态是华侨的特殊身份和对祖（籍）国的热爱带给她们的情感纠结。但海外生存的现实推动着她们充满热情又备受压力地向前奔跑着——这样的奔跑，这样的两难，这样漫长又孤独的人生，注定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这样的对生活最素朴的信仰，这样的岁月，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精神质地，共同演绎着时代风云变幻中海外华侨的心灵史，演绎着一部人在他乡的炎黄子孙们的生命史书。他们身上彰显出不同的人格魅力，为海外华侨书写了一个闪耀的、大写的“人”字。萧萧的随笔更像浅吟低唱，袅袅萦绕的是生活的烟火味。感谢萧萧，让我们在纸上与这些故人一一相见，在海外华侨的故事里遇见久别重逢的自己。

华夏
HUAXIA MAGAZINE
2020年12月　双月刊　总第220期

目录 CONTENTS



P004 华夏头条

庄世平与改革开放

文/廖琪

侨歌晓唱

001 侨风扑面故人来/刘迪生

时代风流

056 陈峰：微藻界的“Steven Chen”/钟敏仪
060 钟南山产学研团队：“中国制造”的防疫科技/赵阳欢
064 田野里的拳拳爱国心/赵阳欢

侨海时政

069 续写“春天的故事”/子言
073 凝聚侨界力量，助力广东发展大局/谭铮
079 广东侨联的时代担当/乔萱
085 海外华裔青少年“云上”品读中国/祝顺祥
089 文化交流基地里的中国故事/祝顺祥
095 十五载风雨兼程护侨路/何尚
099 广东侨联纪事/林辅毫

同心抗“疫”

104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温暖前行/钟敏仪
106 梁冠军的“双向战疫”记/钟敏仪
110 余国春：三代人的家国情怀/钟敏仪
115 林辉勇：为战疫一线医护人员送“平安”/钟敏仪
119 李君豪：与时间赛跑的战“疫”/钟敏仪
123 张钦伟：聚起“满天星”的抗疫力量/子言
127 张福歌：一个赤子的担当/子言
131 从非典到新冠，何磅礴的抗疫故事/赵阳欢
134 天下潮人齐心抗疫/赵阳欢
137 乡情联四海，大爱跨五洲——客联两会助力抗疫纪实/何尚
142 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全球联动助力战“疫”/彭晓玲
145 援疆归来，奔赴抗疫一线/陈华
147 博内尔岛上奏响了中国精神的“最强音”/恩乔
149 “这是华人的荣耀”/杨银竹
154 中山三院抗疫实录/周晋安　甄晓洲　叶张翔
158 抗疫赞歌/王冰锋　黄志平

人文中国

160 《红楼梦》里风景多/阎晶明
166 先生吴冠中/钟蜀珩
193 钟国康/贾平凹
196 我与侨领古润金的文化情缘/丘树宏
199 知来处，明去处——真维斯的激荡30年/赵阳欢
204 都市侨乡：侨乡研究新命题/张应龙
213 故人入我梦/陈锡忠
216 邱镇城：让潮汕菜香飘四海/赵阳欢
219 土家山歌的传播者王志凌/赵晏彪
222 人：一撇一捺，站立为人/顾作义

健康中国

224 大国医梁颂名/钟瑶

中国与世界

231 最后的古巴唐魂/朱颂瑜
244 泰国中华总商会的创立简史/曾伟富
251 寻找美国筑路华工的足迹/李柏达
257 近代侨批行业运营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杨雅丽
262 张爱玲：从上海到洛杉矶/叶周
266 我在加拿大当“无冕之王”/黄学昆

《华夏》编委会

编委会名誉主任：黎　静
编委会主任：邵　瑾　曹堪宏
编委会副主任：杨春华

总　　编　　辑：刘迪生
副　总　编　　辑：钟敏仪
总编辑助理：赵阳欢
广东采编中心主任：祝顺祥
北京采编中心主任：白　羲
香港采编中心主任：董榕辉

台湾采编中心主任：林　峥
美国采编中心主任：邝小平
新西兰采编中心主任：萧　萧
加拿大采编中心主任：赵　文
调查新闻中心主任：莫华杰
品牌推广中心主任：林建兰

视觉设计：广东阅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术编辑：骆销冰
文字编辑：钟小敏
社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广东侨联大厦6楼
邮编：510620
电话：020-38879808

邮箱：gdqlhx@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7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21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承印单位：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30　HK$40　NT$128　$20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华夏杂志社编辑出版



庄世平与改革开放

文 廖琪

他身价上千亿却生活低调，为国家无私奉献了一辈子。他，就是爱国侨领庄世平。他曾升起了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并一手把借钱创办的香港南洋商业银行送进世界 500 大银行之列，最终又把它无偿捐献给国家。在他的帮助下，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国内捐赠汕头大学，他还以自身的影响力积极地为大陆招商引资，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期节选廖琪所著《庄世平传》中的“庄世平与改革开放”的相关章节，以纪念庄世平先生诞辰 110 周年。

策划 /《华夏》编辑部

躬逢大治

1976 年 10 月 7 日，随着高踞在北京的四位窃国大盗落入人民的法网，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长达十年的政治浩劫终于结束了。

当整个中国沉浸在掌声、笑声、美酒之中，庄世平联系了那些劫后余生的老战友老领导，不及细说浩劫中的种种磨难，就又为中国临近崩溃边缘的经济状况皱起了眉头，苦心孤诣地思索着振兴中华的有效途径。

不论是过去，或者将来，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都是振兴中华、强盛中华的一支强大的重要力量。

问题是，在极“左”思潮长期的高压下，海内外同胞无不心有余悸，谁能够义无反顾地带这个头呢？

思索再三，他找到了庄静庵和李嘉诚。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庄静庵就为家乡潮州市捐建了绵德小学。然而，浩劫之年，红卫兵不仅把他的名字写在地上践踏，写在墙上画红叉，还扎起他的模型草人当众进行烧毁。继而，又附信寄去烧毁模型的照片，声称：“不论你走到哪里，一定要把你打翻在地，永远不得翻身！”为此，他伤心至极。庄世平对这一切自然是心知肚明，相见之下，禁不住为劫难中的祖国和家乡唏嘘不已。然而，庄世平的话题一旦进入美好的回忆，壮心不老的庄静庵立即表现出欣慰和向往——由庄静庵在潮州捐资负责的“集安善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司棺赠葬，司医赠药，扶危济困，不知安葬了多少穷困无助的孤魂，不知使多少患病绝望的心灵重新唤起了生的希望，不知在灾荒之年从死亡线上救活了多少难民；绵德小学以其高质量的教育，不知为多少贫困子弟提供了入学机会，为国家培养提供了多少有用之才……随后，庄世平又提供了大量数字和事例，说明祖国在浩劫之后面临的许多困难，强调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大治之年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殷切期望。他说：“静庵兄，我们都老了，已没多少时间去计较人世间的恩恩怨怨了。如果我们还能继续为国家为人民留下一点益处，那才是我们这代人的骄傲呀！”

“你说，我们做什么好呢？”庄静庵的爱国热情终于又被煽起。

“不用急。回去看看再说。”庄世平回答，“怎么，要我陪你回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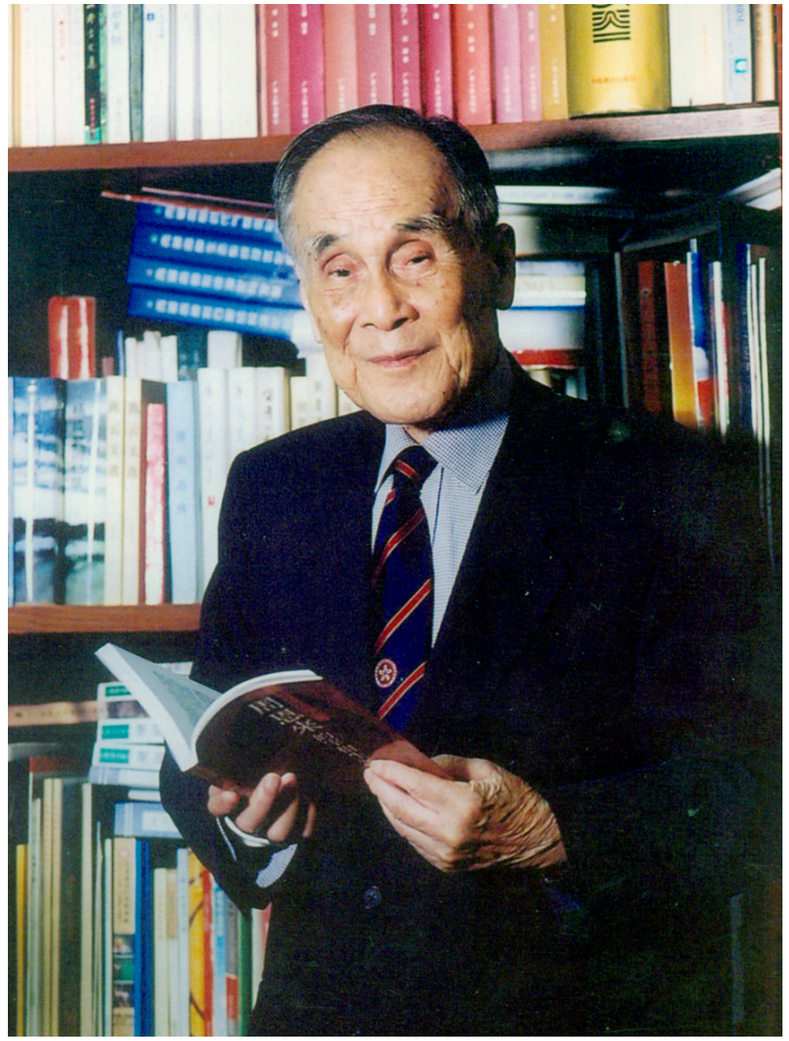
“说陪就见外了。你有空，一起回去走走，再好不过了。”庄静庵乐了。

于是，或自己带着家人，或由庄世平做伴，从 1977 年下半年至 1978 年，庄静庵多次往返于潮州。所到之处，备受各级党政部门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而内地百业待兴，人民群众在噩梦之后渴望尽快重建家园、振兴国家的热情和干劲，更时时震撼着庄静庵的心扉。1979 年他已暗下决心，决定斥巨资捐建潮州绵德中学和绵德幼儿园（绵德中学和绵德幼儿园建成后，他甚至将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也选在绵德中学校园内）。

庄静庵每次从内地回港，庄世平总要率领港澳潮籍乡亲前往聚会，听庄静庵介绍内地的情况和家乡人民的呼声。

而此时的李嘉诚，已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实业家。庄世平在《李嘉诚成功之路》一书的序言中，对李嘉诚有这样全面的介绍和评价：

> 李先生凭着敏锐的观察，分析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香港状况。香港是一个地狭人多、经济发展迅速的社会，土地的使用需求很大，而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政治环境，相对地比东南亚地区更为稳定。李先生由此预见到香港对海外投资者是极有吸引力的，也预见到这里的地价必然上涨的趋势。但是此期间许多人给内地“文化大革命”灾难性的动乱吓跑了，对香港的前景失去了信心，引起了恐慌性的疯狂抛售和贱卖。李先生却



庄世平，1911 年出生于广东普宁，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金融家。1949 年 ~1986 年创办南洋商业银行和澳门南通银行，任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历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华侨商业银行常务董事、集友银行副董事长、侨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1959 年起，历任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授予的“大紫荆勋章”。

2007 年 6 月 2 日，庄世平因心力衰竭在香港去世，享年 97 岁。

独具眼光，深信祖国局势会雨过天晴，香港市道会更为灿烂。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昔日“弃船”而去的财团大亨和投资者，相继旧地重返，香港又成了投资者的福地。

但此时李先生已掌握了有利的优势，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已非昔日的大亨所能代替。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逐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李先生的投资取向成为一股影响力，他更具备了英雄造时势的条件了……

在经济工作中成绩赫然的庄世平，如此评价和盛赞李嘉诚，真可谓相知之明、深交之见。

从零创业而一跃成为全球华人首富的李嘉诚，自然深知他的成功得益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那强烈的爱国心，如日月昭然。可是，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下，他是报国无门呀！但如今，祖国正走上拨乱反正的大治轨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摒弃了闭关自守的国策，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神州大地如沐春风，正呈现出朝气勃勃的景象。他内心无不欢欣鼓舞。因此，不用庄世平开口，他就毅然说道：“世平兄，祖国和家乡有什么需要我出力的，请多指教，我会竭尽绵力的。”

榜样的力量无穷！庄世平深知李嘉诚一旦向内地提供资助捐赠，将会在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中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力。时值1977年年底，他立即将李嘉诚的意愿向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转达并请他向广东省委报告。

在拨乱反正中敢于大胆解放思想、大力破除极“左”禁锢、倾心于国家富强之路的吴南生于1977年秋，在广东省文化工作会议上，一批蜚声海内外的作家、艺术家还被扣以种种莫须有罪名，在极“左”路线的枷锁中未能解脱之际，居然改变大会主席台的座次，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向后移，然后亲自点将，鼓动大家用掌声将欧阳山、秦牧、陈残云、黄新波、李门等老作家、艺术家请到主席台前排就座。由此，人心大快，广东的文化工作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时期……接到庄世平传来的信息后，他对李嘉诚的意愿在可行性上做了必要的调查研究后，立即电邀庄世平赴广州共商大计。

正当千家万户为挣脱了政治枷锁，欢天喜地准备迎接1978年春节的时刻，庄世平和吴南生这两位有着强烈强国富民之心的优秀潮汕之子终于在广州见面了。其时，庄世平已六十有七，吴南生则已五十有六。虽然他们过去并不相识，但竟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一段开场白，已见其情浓意切：

吴南生：“庄老，在外事侨务工作上，我是学生，你是老师。以后你要多指点、多帮助呀！”

庄世平：“不要客气！从今日起，我们就是一条壕沟的战友了。太客气，反而见外呀！”

庄、吴的友谊由此产生，并迅速转向深厚。两人商定，为了使李嘉诚的意愿百分之百地变为美好的现实，李嘉诚支援祖国建设的第一个目标应选在他自己的家乡，项目内容应以解决群众疾苦的福利事业为主。爱国心加上亲情乡情，有什么话不能说，有什么事不能办呢？

随后，他们立即将李嘉诚的意愿和刚刚商定的意见，传递到千里之外的潮安县和潮州市。实质性的准备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也正是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庄世平和吴南生从此紧密配合，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导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里程碑式的“大戏”。这是后话。

1977年9月，为了加强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凝聚力，中国人民政府决定邀请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代表参加当年国庆观礼。在北京观礼后，还将参观游览成都、重庆、三峡、武汉等地。港澳同胞国庆旅行团团长由庄世平出任，副团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罗克明、梁尚苑，团员包括李嘉诚、利铭泽、胡汉辉、廖瑶珠、马蒙、胡应湘等著名实业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当庄世平把邀请书郑重地送到李嘉诚手上，李嘉诚顿了顿，问：“你去吗？”庄世平回答：“我去的。”李嘉诚欣然：“那好，我去。”

深秋的北京，碧空万里，气候宜人。第一次来到首都的李嘉诚参加了国务院侨办的欢迎招待会，出席了人民大会堂万人国庆招待会和首都体育馆国庆文娱晚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和热情欢迎，参观了市容，听取了各种建设情况的介绍……面对祖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他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了。他问庄世平：“我打算为内地办点实事的心意，有消息了吗？”庄世平心中有数，欣然应道：“快了，快了。”

1978年10月8日，潮州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李春泽代表潮安县统战部和外事办邀请李嘉诚偕夫人返乡访问的信件寄到了李嘉诚的手上。家乡的领导很客气很诚恳，他们要让李嘉诚感受到乡情的温馨之后，再做实质性的安排。可惜，李嘉诚刚好商务繁忙，又难以婉拒乡亲们这一份沉甸甸的盛情。他只好把庄世平请来一同商量。庄世平一听，笑了：“都是乡亲父老，有什么困难，什么想法，直说就是。自己人嘛，不必客气。”于是，一封抒发了李嘉诚北京之行的观感和他关心桑梓的热情洋溢的信件，经庄世平修改过目后，即速发往潮安：

……承邀回乡一事，由于目前工作所羁，近期内恐难成行，一俟商务稍暇，当另函奉告……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推动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乡中或有若何有助于乡梓福利之事，我甚愿尽其绵薄。倘有此需要，敬烦详列计划示知为盼。

潮安县党政干部接此信后，激动不已。他们抓住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千百干部下放农村、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如今回城之后上无片瓦、难得栖身的突出问题，于11月6日向李嘉诚提出了一个筹建民房的计划，并制定了从54万元至60万元的几个建房的方案。李嘉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佳的一种方案，用“乐观厥成”的热诚揭开了他支援祖国建设的帷幕。

随着建房方案付诸实施，潮安县有关部门面对无房户困难户近三千户之众，僧多粥少，向李嘉诚征求分房的原则。李嘉诚又请来庄世平，反复商量探讨，终于确定将符合入居资格者的名单公布于众，然后通过大公无私的抽签方式予以确认的原则。并强调：“先让部分下放回乡，年老而家属成员众多之露宿户籍入居，同时居住于帐



1980年秋，庄世平和李嘉诚赴汕头参加筹建汕头大学工作会议时，在汕头市府招待所前合影

幕的住户，最好也能先获分配。”至于租金，原则上仅作为支付公寓保养费之用……1980 年 12 月 10 日，李嘉诚在庄世平和吴南生的陪同下，视察潮安“群众公寓”，检查了工程质量，慰问了广大工人。潮州人民对这位优秀儿女给予了红地毯的欢迎。当天刚好下雨，潮州市委书记彭启安专程为李嘉诚撑伞遮雨。对内地干部观念的转变和谦逊有礼的精神，李嘉诚和庄世平感到由衷的高兴。不久，分到公寓住房的一百多户人家，欢天喜地搬入新居。潮州人民对李嘉诚的义举表现出了由衷的感戴。

可惜，在租金问题上，当地有关部门试图利用这笔租金协助政府筹建更多的简易住房，以解全市住房的燃眉之急，由开始规定每户每月征收十二元，继而确定每户预征八年共一千元。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一些人写信向李嘉诚投诉，一些不明事理者更含沙射影指责捐建人“为富不仁”。李嘉诚虽心胸坦荡，一笑置之，但也不能不向有关部门“深表关注”。庄世平闻知此事，立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并对个别同志作了善意的批评。而后，他将情况全盘向李嘉诚作了介绍，感慨道：“国内建设千头万绪，资金紧缺，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呀！这只是工作方法的差误。”在他的斡旋下，李嘉诚决定再捐 100 万港元，作为代纳租金之用。有关部门把这 100 万港元捐款又作为李嘉诚赠建葫芦山简易民房的义举。双方经多次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一、凡经批准入居李嘉诚赠建民房及入居地方，这次



1982年11月20日，庄世平出席全国人大会议

统筹建设之简易平房之搭篷户、无房户一共五百户，一律不收预付租金；二、从第六年起之租金，按现有最低租金每平方米一角二分至一角四分计算。”至此，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前嫌尽释，皆大欢喜。

李嘉诚两次捐建民房，面积达 14500 平方米，楼房十四栋，解决了 276 户。其后，他对家乡公益事业的支持，更加热心了：

捐建“潮安医院”和“潮州医院”，每座各耗资 1100 万元，从 1985 年开始，两座医院都设立“医疗福利基金会”，每年各给予 20 万港币经费，用以救治经济贫困的患者；为建设韩江大桥先后两次捐赠 450 万港币；先后三次以其母亲李庄碧琴的名义，为修复开元寺捐赠 211 万港币。

在此之前，庄世平视察了汕头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面对该院设备简陋，经费短缺，难以进行高新医学研究，难以给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他耳边又响起李嘉诚多次的表示：“内地其他地方如需要我尽绵力的，也请你多予指教。”庄世平特请附属医院拟就了一份捐助设备项目的清单。医院对庄世平的好意极为感激，但由于是拨乱反正之初，一个国营单位接受华侨的捐赠在国内还绝无仅有，因此他们在拟定捐助设备项目的清单时十分客气，款额仅几十万元。这清单由庄世平审定后，亲自送交李嘉诚，请求给予捐赠。当年李嘉诚的父亲就是因为肺病而缺医少药离开人世的，因此李嘉诚在后来的岁月中，对缺医少药的贫困百姓寄予了极大的同情，曾给予香港医疗服务界以极多的支持，其送医赠药的义举在香港早就有口皆碑。李嘉诚看了庄世平送来的清单，沉思良久，说：“偌大的汕头没一间像样的医院，实在说不过去。我们要支持，就要干出效益来。像这份清单，仅几十万元，买一部高精尖的仪器都不够，能办多少事情呢？为家乡父老治病赠药，花多一点钱也没关系。所以，还请你再详细落实一下。”为此，庄世平再次视察了附属医院，从医疗需要到设备配置都做了更深刻更切合实际的了解，清单的捐赠款项也分为两级，一级为二百万元，一级为五百万元……最后，经李嘉诚确定，慷慨给予汕头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五百万港币的捐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这样巨额的捐助，在国内无疑产生了不同凡响的震动和影响。

李嘉诚捐赠捐建的一个个项目，在潮汕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心同德的努力下，都取得了极其良好的社会效益，正如他 1981 年给汕头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所写的信一样：“贵院利用先进仪器为人民服务，所获效果，远逾于本人想象，良感欣慰。”

在庄世平的努力组织下，又得到庄静庵、李嘉诚的带动，潮籍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创办家乡福利事业的义举蔚然成风。

潮汕大地上，改革开放，“好戏”连台！

历史突破

近百年来，随着全国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中等学校遍及潮汕各县，但潮汕地区却没有一所大学。潮汕的莘莘学子凡有志攻读大学者，无不考往省城、香港、厦门以至京、沪等地，交通不便，经济负担也十分沉重。求学深造之艰难，往往使人仰天兴叹。“粤东地区必须办一所大学！”这是近代先进中国人，特别是潮籍有识之士的夙愿。五四运动后，随着陈嘉庚在粤东地区的毗邻厦门独力创办厦门大学，在粤东地区创办大学的呼声就更加强烈了。

从 1920 年年初开始，粤东地区及海外潮籍的有识之士张竞生、杜国庠、刘侯武、林子丰等就为粤东创办大学筹谋划策，四处奔忙。可惜，一次次的努力，却由于经费困难，或由于政局动乱官僚腐败，军阀争斗，而一次次地夭折。特别是 1925 年 11 月，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周恩来推荐

澄海中学校长杜国庠任金山中学校长之后，粤东创办大学的美梦几近成真。杜国庠这位早年留学日本、受过革命新潮洗礼、思想作风正派的年轻人一到金山中学，就清校产，修宿舍，聘请进步老师，大胆提出改办高中，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扩充为大学的设想。他在给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许崇清的报告中说："年来潮汕初级中学林立，而高级中学独付阙如，为便利学子升学起见，高中之创设刻不容缓，决于本年秋季改办高中，满拟俟校产清理后，更进一步改办潮州大学，以应学生之需要，而树岭东学府之中枢。"周恩来对此给予大力的支持。1926 年 1 月 22 日他在《新金中校产事致广东省政府》电报中倾力为金中争回校产："查该校校产颇丰，该学生会所称本为公产一节，确有实据。谨电告请予照收作为公产，不收归省有。"并强调，"该校本年度筹办高中，需费颇多，而地方人士尤望清理有成绩，租息增多，俾将来扩充为大学，是该校校产如能切实整理，前途必有可观。"2 月 22 日至 3 月 3 日，周恩来在汕头市甲等商业学校主持召开江东各属行政会议，就潮汕创办大学一事专门作为一项议程提出，并得到会议的一致通过。他致电报告广州国民政府："东江教育确定了适应国民革命总需要，成为革命化、平民化；积极设法增加教育经费，不与行政其他项目公款相混；筹办岭东中山大学……"他在致《广州民国日报》的电报中指出："厉行强迫教育前期小学运动，于最短时间，做到完全免费，并筹办岭东中山大学。"这里，周恩来把拟议筹办的潮州大学改名为岭东中山大学。可惜，由于周恩来过早地离开东江，杜国庠也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迫逃亡，离开潮汕，粤东人民办大学的愿望终成泡影。

沧海桑田，潮涨潮落，几十年过去，人民政权顺应历史潮流的需要，在汕头地区办起了工专、医专、师专一类的高等专科学校。可惜，这些学校专业狭窄，学生较少，仍适应不了事业的发展。潮汕应创办大学，又成了海内外潮人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酝酿筹办汕头经济特区的同时，这种呼声就更为强烈了。庄世平和吴南生肩负起时代和潮汕人民的重托，一直为筹办这间大学而奔忙。

1980 年 5 月 24 日，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经广东省委批准，宣告成立。委员会由广东省委书记、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吴南生任主任，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蚁美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庄世平、广东省文教办公室主任李超、广东省高教局局长林川、汕头地区地委书记罗晋琛任副主任（1986 年 5 月 7 日增补汕头市委书记林兴胜、汕头市市长陈燕发为副主任），各有关部门负责人 8 人为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文法五系领导小组组长、新闻系主任罗列兼任秘书长。

汕头大学选点、察勘等实质性前期工作随之展开。

然而，办学的庞大经费则至今未有着落。

一直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一生兢兢业业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吴南生，其内心深处对于汕头大学的创办其实早就有着一套深思熟虑的蓝图：借鉴外国许多名牌大学的做法和经验，汕头大学将设人文学院、医学院、海洋学院、现代科学院……先期设立的学院以四至六个为宜，以后再随形势的变化而扩大，统一领导，分散管理；成熟一个，办成一个，既便于资金运筹，又便于短时间内产生效益和影响。第一次听到吴南生畅谈内心的宏伟蓝图，庄世平不由感慨道："好周密呀！和你合作干事业，真个痛快！我们党内的干部如果都像你一样忠诚，一样熟悉教育，一样热爱中华文化，我们怎么会走那么多的弯路！"唏嘘之后，他立即感受到吴南生向他投射来的灼热的目光，内心的深处，顿时涌动起一股不易抑制的激情。

历史重担明白无误地摆在庄世平的面前。他提出为了使创办汕头大学的信息尽快传到华侨和港澳同胞中间，可在香港成立基金会，作筹款建校准备。此建议获得筹备委员会的一致赞成。

自然，在吴南生和庄世平等人商讨之后，他们的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就是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众望所归的李嘉诚。

改革开放的年代，为潮汕教育事业的历史突破提供了具体的契机。

1980 年清明节刚过，在潮州市有关方面负责人陪同下，庄静庵偕夫人游览了厦门多处名胜古迹。随后，来到集美拜谒陈嘉庚坟。当看到清明过后前来悼慰陈嘉庚魂灵的人仍川流不绝，庄静庵感慨万千，赞叹道："为人子女，也难得如此呀！"接着，又参观了陈嘉庚纪念馆"归来堂"，瞻仰了周总理赠送的陈嘉庚铜像。"归来堂"的工作人员不仅热情接待了庄静庵，还赠送了《嘉庚集》二本。归来后，他加快了绵德中学和绵德幼儿园的建设，深有感触地对人说："我无力像嘉庚一样搞大学，但搞中学、小学、幼儿园，则责无旁贷呀！"并且，专程把一本《嘉庚集》送给李嘉诚。谈及厦门之行，老人又是一番感慨："人生能像陈嘉庚一样，足矣！"

李嘉诚早已听过有关陈嘉庚的事迹，读了《嘉庚集》，更是感动万分。于是，当潮汕筹办大学的消息传来，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胸中形成了。

1980 年秋的一个下午，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华人行二十一层一个宽敞的办公室内，一次有关潮汕教育事业的历史性突破的谈话，在庄世平和李嘉诚之间展开了——

李嘉诚："世平兄，你说，人生什么最有意义呢?"

庄世平："兴学育才最有意义。陈嘉庚先生的名字是和他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人生最有意义。"

李嘉诚感慨："祖国现在搞四化，潮汕没有一所大学就无法快出人才呀!"

庄世平点头称是："你说得很好。厦门有所大学，汕头也应有所大学，才能加快国内四化建设的步伐。厦门大学历史上培养了不少学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将来汕头办所大学培养现代化、高水平的人才，对祖国的贡献也一定很大。"

李嘉诚："办一所大学要多少钱?"

庄世平："大学像海洋一样，多少钱都可以投进去。我和吴南生先生商量过，第一期开办费需要 3000 万港币。"

李嘉诚："3000 万港币够吗?"

庄世平："这已是不小的数目了。作为开



1980年，庄世平在普宁县委书记刘峰、县长伍时耀的陪同下，于普宁华侨中学陈伟先生捐建的"伟华堂"前合影

办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也是可以的。至于以后要扩大发展，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投入。”顿了顿，他又强调，“只要有个良好的开端，会后继有人的，将来一定会得到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响应。”

李嘉诚顿时十分喜悦，一口提出捐赠 3000 万港币。他说：“筹建汕大第一期工程就由我开头吧。潮汕人遍布世界各地，豪商巨贾也不少。众志成城，集腋成裘，汕大一定能办起来的。”

在庄世平的牵引协助下，李嘉诚不负众望，勇敢地担负起创办汕头大学的历史重任。当晚，庄世平就打电话将喜讯告诉了吴南生。吴南生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立即将情况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中央有关部门做了汇报。国务院接到广东省委报告之后，深为海外侨胞创办大学的热情所鼓舞，尽管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仍拨出了 1000 万元作为汕头大学的创办经费。

在此之前，由吴南生和庄世平主持，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关部门已多次联合选择校址，并初步在汕头选定三个地点：礐石风景区、市郊龙湖和鮀浦桑浦山下。1980 年年底，李嘉诚决定亲自到三个地点考察。由于他商务繁忙，预定在潮州和汕头仅两天时间。而当时的广汕公路，仅是十几米宽的三级公路，且崎岖不平，陆路往返至少就要两个白天。为此，他和庄世平商量，决定动用他的游艇由香港直开汕头。庄世平考虑再三，认为：三百多海里的航程，风大浪急，危险性大，不可冒险。然后，他提出自己的方案：在港乘机直达广州，从广州乘坐专机往汕，再由这条路线返港。这在当时来说，应是最为理想的行动路线了，李嘉诚当即予以同意。当晚，庄世平即打通吴南生的电话，请求以广东省委的名义包租专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广东省委出面为一位著名实业家包租专机的情况几乎没有，但吴南生一口就应承下来。可是，专机包下了，因为省委对接待费用有严格的限制，包租专机的费用远远不够。庄世平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对吴南生说：“省委能出多少算多少，不够的都由我包了。”一个难题于是迎刃而解了。由于庄世平和吴南生的紧密配合，李嘉诚第一次回乡的路线和交通工具都得到了妥善落实。

1980 年年底，李嘉诚在庄世平陪同下由香港飞往广州，在广州会合了吴南生，转乘以广东省委名义包租的专机直达汕头。广东省和汕头地区负责人刘俊杰、罗晋琛、程春耕以及各界的群，专程往机场迎接，盛况空前。

由于当时市郊龙湖还是一片滩涂，建校费用繁重，已在选址中列为次要目标。而风景区礐石虽是理想之地，但不仅供水困难，而且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好长一段时间实行备战，汕头属前线，礐石许多地方辟为军事用地，军事设施随处可见。如要在此建校，部队提出需要数千万港元以上的搬迁费，而上级能否批准也不一定。还有，礐石的旅游场地本来就不大，再在此占地建校，既影响景观，又不宜校园环境，都有悖办校人美好的初衷。更难的是，当时礐石的水电十分缺乏，不宜大规模建设。因此，桑浦山下郁郁葱葱的丘陵腹地成了校址的最佳选择。

当情况摊开之后，李嘉诚重点踏勘了桑浦山下各处。预定的校址坐落在潮安、澄海、揭阳、汕头市区交界处，离市区仅七公里，背靠重峦叠嶂的桑浦山麓，面临广阔平原。校内日月坑水库澄碧如镜，清风习习，是避暑胜地；邻近的名胜龙泉岩，巨石巍峨，泉水叮咚，终年不断。岩前有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翁万达及第前潜心攻读的“翁公书院”。李嘉诚被眼前的秀丽风光所吸引，欣喜之下对吴南生和庄世平说：“学校，就建在这里。”竟和筹委会的意见不谋而合了。

桑浦山下的汕头地区党校，随即辟为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办公地点，并作为第一批创业者的临时宿营地。

随后，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决定：邀请内地和香港多个设计部门对校园进行总体设计，然后从中选择一个。

李嘉诚经和庄世平商量后，决定邀请香港著名的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进行总体设计。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汕大总设计图经李嘉诚多次指点，庄世平细致地审核，于 1982 年年初拿到汕头，征求有关专家和各部门负责人的意见。这个设计格调高雅，气势磅礴，不仅使许多人咋舌，还引来一些议论。而较为集中的议论是校园中央的主体楼群——行政楼、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生宿舍等近十幢环形大楼连成一体，楼下第一层一律作为空间走廊。有的说：太浪费了；有的说：增加噪音，互相干扰……对这些，庄世平深思熟虑，力陈好处：“楼下辟为空间走廊，有利于师生上课和生活上免遭雨淋风吹日晒。地下潮湿，不论是作为生活用房或工作场所，都影响师生员工健康，不宜考虑。至于互相干扰的问题，设计人员已注意到了，所以在设计时楼与楼之间的间隔达六十米，中间是绿化的庭院，噪音干扰的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地下空间还可做一些文娱场所，走廊更宜于师生散步休憩。这样的设计，我想在提高土地使用率、美化校园环境上是很有好处的。”严谨周密的设计构思终于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最后，由吴南生一锤定音：“我看这个设计好。按李先生和庄老的意见做修改后，可付实施。”这总体设计便被筹备委员会确定下来了。

正是在支援祖国建设、在汕大的创办过程中，庄世平和李嘉诚同心同德，志同道合，两人相互的信任和友谊与日俱增。1981 年 5 月 2 日李嘉诚致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的信，便是这种信任和友谊的明证——

吴主任委员南生先生

庄副主任委员世平先生　　赐鉴：

大学筹委会列位委员

昨与庄世平先生晤面，藉审大学筹备工作进行情况。为使建校计划及设备购置各项预算更臻完善起见，本人兹特自动建议将照原定预算全部大学建设费港元三千万元增加百分之五十共为四千五百万元。以使此计划能臻较为完善效果。本函作为正式证实，尚希查照，列入预算案内。

上述捐款，配合筹备需要，每次调动当接获庄世平先生通知七日后当即如数汇上。

在过去筹备期中，歉以事务纷如，未克参加实际工作，但或有需本人效劳之处，敬烦由庄先生转知，自当悉力以赴。深盼在各位领导下，建校工作能如期完成，早日发挥其长远而有价值之作用，为乡梓服务。庶几十年而后，乡亲子弟，均能身受其教。进而日益发扬光大。瞻望前景，本人谨以欣切之心情，追随各位，以期乐观厥成。

专此奉达，并颂

公祺

敝李嘉诚谨启

1981 年 5 月 2 日

在李嘉诚和内地的联系以至工作的协调上，庄世平无疑是桥梁，是纽带。

这其实也是广大海外赤子对庄世平的莫大信任！

为了表示对李嘉诚爱国爱乡的感激，庄世平决定：李嘉诚对汕大和国内福利事业的每笔捐款，经由南洋商业银行及其属下的业务部门处理；南洋商业银行在处理这项捐款时，不收一分一毫的手续费。

1983 年秋，汕头大学开学，第一批招收中文、法律、外语、医学四系学生二百零六名；首任校长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

汕头大学第一期工程总面积 12.6 万平方米，共 24 个工程项目。1983 年 5 月破土平整土地，11 月初开始动工兴建，1984 年元旦举行奠基典礼，1986 年 6 月竣工。整个工程的设计结构新颖，别



1990年，庄世平先生（右四）同李嘉诚先生（右三）在汕头大学参加校董会期间与董事会成员合影（左二为中共汕头市委会记林兴胜，左三为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左四为汕头大学校董会副主席林川，右二为汕头大学校长戴景宸）

具一格。十二幢教职工宿舍楼群坐落在校园西面，每套住房建筑面积 90 至 100 多平方米，客厅有莲花吊灯，厨房有壁柜，卫生间设备齐全；布局合理，实用舒适。八幢教授别墅楼坐落在校园深处的湖岸上，每幢建筑面积 158 平方米，家具雅致，小巧玲珑，环境恬静，是治学的好去处。位于校园中央的主体楼群行政楼、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生宿舍等近十幢环形大楼，用长廊相接，连成一体。衔接之外高耸着方形塔楼。整个主楼群由高柱横梁支起，格调高雅，气势非凡。这种采用密集、整体、高架庭园式的结构布局，充分体现了民族传统、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建筑艺术风格。

汕大建筑之花——投资 2250 万港币的集会堂，建设面积 5200 平方米，座位 1795 个。在集会堂的建设开始时，李嘉诚注意到要把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建筑材料和音响设备集中在一起，让学生从这里了解到国际上先进的科技信息，同时也给国内有关人士和部门起到展览作用。因此，集会堂的建设和装饰可谓精益求精。其中群众厅和展览厅采用日本三菱公司自动水冷式空调系统，舞台灯光由一台电脑控制光亮度，并可编入程序放映光景。台上有先进的演出指挥系统。此外，会堂内部有德国的音响，美国的灯具，日本的座椅，英国的吊灯，意大利的大理石，比利时的钢化玻璃，泰国的高级柚木，印尼的橡胶；中国香港的水泥，台湾的马赛克等，可谓集海内外先进材料设备之精粹。在集会堂建设之初，有关人员曾打算以李嘉诚或他祖先的名字命名，但受到李嘉诚态度坚决的拒绝：“兴学重教是我应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如果以我或我的祖先命名，无异于以钱买名，万万做不得。”他此举同时也得到庄世平态度鲜明的支持。因此，汕大一改国内许多重要场所被人乱题名乱题词的现象，净化了校园的环境。

第二期工程于 1985 年开始，建筑总面积 12.2 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的医学附属医院、8000 平方米的学术交流楼、8000 平方米的 B 座学生宿舍楼、7000 平方米的医科教学楼以及金凤疗养院、学校运动场等。第三期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的工程也随后开始……

事实证明，李嘉诚和庄世平对汕大校园建设的构思是广博远大的。如今屹立于南海之滨的汕大校园倾倒了无数前来参观访问的人们。国务委员谷牧在视察汕大之后指出：“汕大的建筑形式是全国高校之花。”著名诗人赵朴初则称之为“世内桃源现代家”。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四化建设的深入发展，随着支援祖国各个建设项目特别是汕大建设的顺利实施，李嘉诚对祖国建设进程和人民疾苦更为关切，目光更为深远。1985 年春，他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写信做出承诺：在非潮州地区兴建医院 3 间，参照潮安、潮州医院规模，捐赠总额为 4000 万港元。

可惜，近半年过去，国内有关方面迟迟未就捐赠计划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做出明确答复。李嘉诚于是托请庄世平前往询问。经了解，庄世平面复李嘉诚：“分社答复，有关部门还在研究之中。”对此，李嘉诚沉默无言。

时值国家教委批准汕头医学专科学校升格为汕大医学院，庄世平出谋献策道：“将这笔捐款投到汕大医学院去吧。医专的功能和规模毕竟不能与医学院同日而语，眼下正需要经费扩大医学院的设备和校舍。”

李嘉诚略一思索，摇了摇头：“说出去的话再收回来，恐怕不好吧。何况潮汕是我的家乡，人家会怎么看呢?”

“这你不必多虑。”庄世平早已成竹在胸，“我们不是提出要把汕大办成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么！汕大仅仅冠以‘汕头’二字，招生却遍及广东、全国，以后还要面向海外。她培养的人才和科研成果将来必为全省、全国以至海外共同分享。汕大是属于全省、全国以至海外的。因此，投资汕大同样是光明磊落、言而有信、造福人类的大好事。”

一番话说得李嘉诚连连点头：“你说怎么办?”庄世平说：“写信直接说明道理就行了。”

于是，李嘉诚立即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写信。信中说：考虑到汕头大学医学院在筹建初期，并未列入预算，如不预先绸缪，补充经费，则增置计划，无从下手。仪器设备未能适应时代需求，医学院之功能，自不能发挥尽善。希望将原计划在非潮汕地区捐建三间医院之四千万港元，拨作汕大医学院扩建校舍及购置仪器之用。

这封信随后由庄世平面呈分社负责人，并口头上作些补充说明。不久，这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同意。汕大的建设和规格，又更上一层楼。

汕大的硬环境日臻完善，但由于旧的人事体制的制约，人才未能充分流动，汕大的师资问题虽经吴南生、庄世平等校董事会成员四处奔走呼号，仍存在许多困难。汕大要成为全国第一流重点大学，师资已成关键。1986 年 4 月 17 日李嘉诚和庄世平经过深入讨论，以李嘉诚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信，针对汕大存在着“师资力量与教学实验设备跟不上专业发展之需要”的矛盾，请求邓小平“九鼎一言”，指示国家教委采取措施支持解决汕大三大问题：

一、给予大学更大开放，俾能招揽国外良好之师资及尽速调国内优秀人才南下。

二、给予大学更大权限，俾汕大能成立研究院，遣派研究生出国，早日学成归来，为汕大服务，使汕大学术水平能达至国际标准。

三、给予大学更大方便，俾国内外有心为汕大贡献一分力量之人士，有机会为汕大培养高素质之科技人才而努力。

不久，庄世平便从有关部门给李嘉诚带来了

喜讯：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将于近期在北京接见李嘉诚。李嘉诚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马上拿起杯子以茶代酒，与庄世平同祝汕头大学第二个春天的到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李嘉诚的母亲突然辞世了。李老夫人一生勤俭，端庄贤淑，相夫教子，深受潮人特别是族人的敬重。李嘉诚是个大孝子，对此悲痛不已。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华人视孝道为本，为长辈的治丧程度往往被视作后辈子孙的道德品格，还有社会地位，等等。李嘉诚的内心马上决定：举行七七四十九天的最高的祭拜治丧活动。临到要宣布这个决定，他顿了顿，又找来庄世平一起商量。庄世平其实早已有所考虑，他一听马上说：“以老夫人的功德，做七七四十九天的丧事，实不为过。古人不论官做多大，只要父母离世，都得丢下官职回家守制三年。从三年改至四十九天，已是简单的了。只是——”他略一沉吟，待李嘉诚说了一句：“您老尽管说。”他才又开口：“以你今天的事业，关系着许多改革开放的重大项目，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工作和生活，更何况还有北京随时随地的召唤，所以，四十九天又似乎长了。”他瞥了一眼李嘉诚，见他满脸的虔诚，才又再说下去，“只要规模和规格上尽善尽美，情到深处，绝对没有人计较时间的长短，老夫人也会欣慰于九泉的。我想，就三七二十一天吧。”李嘉诚应道：“我听你的。”庄世平马上赶到有关部门，通报了李家的治丧日期，请求北京的接见时间后延。此后他几乎每天都到李家，亲自过问祭拜治丧的各个环节各个细节，有时甚至亲自主持某个活动。正是他和一群乡贤的帮助，李老夫人的丧事办得情浓意切，感人肺腑，哀荣极一时之盛。

1986 年 6 月 20 日，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李嘉诚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邓小平对李嘉诚说：“我同意你更开放一些的观点，可以聘请外国教授来任教。”他强调：“汕头大学要办就要办好，国家教育委员会可以从全国调一批好的教师去，保证这个学校一开始就高质量。”他认为：“大学的质量高不高，决定于教师的质量高不高。教师如果质量低了，就教不出好学生。”他特别指出：“对汕头大学的教师要有适当的待遇，待遇不能太低了，这样才可以调到一些高质量的教师。”他还对在座的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说：“国家教委要全力支持汕头大学的工作，把这所大学办好。”并希望通过这件事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办事效率。

在北京得到最高礼遇的李嘉诚对办好汕头大学，信心更足，热情更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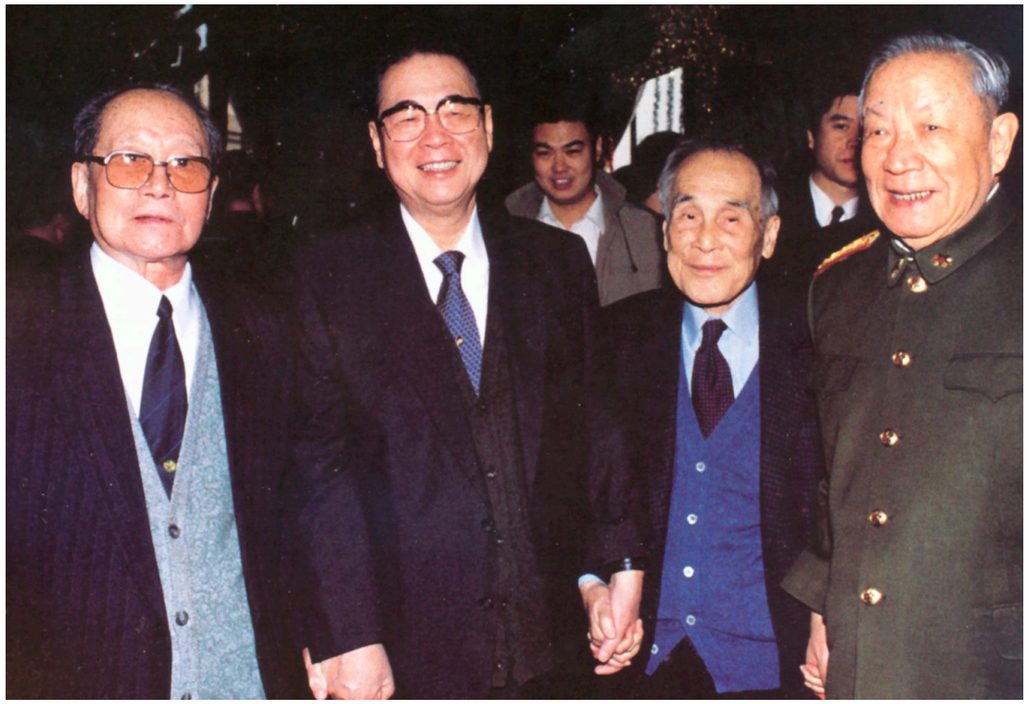
经过邓小平的“九鼎一言”，国家教委以最快的速度在 8 月 26 日于广州召开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中山医学院、汕头大学和广东省高教局的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共商落实邓小平关于办好汕大的指示精神，重点解决汕大师资问题。吴南生、林川等汕头大学核心决策人物在会上介绍了汕头大学的情况，并提出具体各种优惠教师待遇的措施。各方面对此反应热烈，初步确定了支持汕大师资的方案。

1988 年 2 月，国家教委又发出《关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支援汕头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通知》。

源源不断的人才新血注入了汕大这座粤东最高学府的肌体中。随后，李嘉诚、庄世平又多次前往北京寻求对汕大的各项支持。其中尤以 1989 年 3 月 27 日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会见庄世平时所谈的若干意见，极具深度：

1. 国家教育委员会对汕头大学放权；
2. 要鼓励汕头大学进行改革。

为了加快汕头大学的建设，允许汕头大学采取特殊措施。如果有些做法与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有的规定不一致，可以允许不按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有的规定办。因为，汕头大学是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办的，有特殊性；而且国家教育委员会对大学也在进行改革。



2002年1月1日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庄世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原副总理谷牧、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合影留念

任何一个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应该明白，作为国家教育主管机构的国家教委对一个下属单位采取如此特殊措施和放权，绝无仅有。

握有这把“尚方宝剑”的汕头大学，在吴南生、庄世平等的领导下，在李嘉诚多次主动提出和具体指导下，一个又一个的改革方案相继出台：《汕头大学校董会章程》《汕头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试行条例》《汕头大学校务委员会章程》《汕头大学系主任负责制试行案例》；设立汕头大学学术基金会，实行师生员工生活津贴和职称、职务津贴办法；成立汕头大学教师招聘委员会，向社会公开登报招聘教员；设立奖学金，吸收内地优秀人才往香港大学进修硕士或博士学位课程，学成后返回汕大任教；设立汕头大学教职员工敬业金，奖励在教书育人中做出贡献的教师，校长级最高金额可达港币 12 万元，副校长及学院院长级最高金额可达港币 5 万元……对每一个方案，庄世平无不逐章逐节逐字认真审阅，亲力亲为。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汕大管理体制一项重大改革，作为协助政府对汕大的建设和发展，进行积极的实质性的工作，对学校的重大事务起决策和审议作用的汕大校董会的创立，同样耗费了庄世平和李嘉诚、吴南生的诸多精力和心血。从 1986 年夏天开始，他们就多次辗转于广州和汕头、深圳之间，几经协商探讨，几易其稿，终于使《汕头大学校董会章程》于 1987 年 2 月

11 日获汕大校董会通过，于 11 月 4 日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在 1987 年 2 月 10 日汕大第一届校董会上，李嘉诚荣任名誉主席，吴南生荣任主席，庄世平荣任副主席。汕大的发展，从此更上一层楼。

特区先驱

此刻，如果你站立于高耸云天的汕头金海湾大酒店，俯视那高楼林立、车流如潮的金砂路，直视那同样凌空而起的国贸大厦、金碧辉煌的艺都大剧院，遥望那银星闪烁的特区管委会广场、那怡人的海滨浴场、那雄伟壮观的潮汕体育馆、那气势恢宏的汕头大学，还有那风格各异的现代化办公楼群、那鳞次栉比的标准厂房、那春笋般拔地挺秀的宿舍楼群……而点缀这一切的，自然是那天真稚童的嬉闹欢笑，那穿红戴绿的少男少女的轻歌曼舞，那鹤发童颜的老头老太的舒怀逸趣。不时，总会在汕头这座年轻城市的某一角落，炸响一阵或奠基，或开业，或大大小小的喜事乐事的喜庆鞭炮。而远处，打桩机仍在不停轰鸣，宣告着这座城市仍在延伸……于是，你也许会产生一种既神奇又新鲜的感觉。

也许，你对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淡忘，有的只是陶醉；也许，你记起了这里十多年前的点点滴滴，一股常感常新的亢奋就会蓦然从心底升起；但如果，你曾参与过这里的创造，你将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自豪。

1979 年 1 月，广东省委分工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个多月的时间，使他对汕头当地的情况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当时，全国、全省的任务是解放思想，落实政策。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无从说起。但在整个人民经济生活中呈现的种种现象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整座城市经常停电，晚上漆黑一团；工厂经常停电，亏损严重；自来水管和下水道大部分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旧设备，年久失修，破损不堪；马路上污水横流，随处可见粪便脏物……这还是表面的，“内伤”更为严重：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年准备打仗，汕头作为前线，不仅没有投资建设，而且还将一批骨干企业“迁往”三线地区。“文化大革命”后期，不少移民和知青回城，不少人在街道两旁搭起竹棚简易房栖身。待业人口猛增，治安问题严峻。何况，潮汕地区本来就是国际上人多地少最典型的地区，全世界人均拥有耕地五亩，中国是一亩半，广东是七分多，潮汕地区仅三分多。吴南生作为潮汕地区 1936 年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作为 1949 年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的领导人之一，心里深深地觉得对不起和共产党同甘共苦、养育了革命的人民群众。叶剑英元帅近两年来多次深情地同他谈到要想尽办法尽快振兴广东经济，尤其是尽快改变粤东家乡面貌的问题，更使他深感肩上的重任。这些，自然而然地使他加深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认识，反复思考如何使粤东这一经济中心——汕头市的经济发展起来。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由于工作关系，吴南生较多地接触了港澳报刊和海外经济信息，结识了一批海外人士，由此知道中国台湾办了出口加工区，带动了全岛经济的发展，眼下又正在兴办密集型的工业园区。这一切，他有意识地加以收集综合，联系到汕头的实际，一个大胆的设想随之在胸中形成了：办出口加工区！

2 月 21 日晚，他为自己的设想亢奋不已，夜不能寐，即向省委发去一份陈述汕头尖锐问题、振兴汕头经济的长达 1300 多字的电文，初步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随后，他又不能不感到由于长期闭关自守而导致我们在全球经济信息上的贫乏和麻木。即使是台湾的出口加工区，也仅仅是大概的文字资料。全球的出口加工区有多少类型，人家有什么政策、措施和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对这一切的不了解，又谈何发展和振兴汕头以至广东的经济！思索再三，他终于按捺不住，时间已是 22 日凌晨，仍给香港的庄世平打去了电话。

习惯了深夜来电的庄世平，睡眼蒙眬地听完了吴南生介绍的情况，神情一振，睡意全消，连连说道：“你这个想法很好，很好！解放这么多年了，人民群众还那么贫困，我们党有责任呀！你知道么，这几年我经常回潮汕，但不论是在汕头、潮州或普宁，我都很怕上街。为什么？街道肮脏，楼房破旧，群众贫困潦倒，市场物资缺少，看了伤心呀！”他好像在诉苦一样，言之切切。马上，又转了话题，“你直说吧。要我做什么，我支持你！”

“谢谢你，庄老！”吴南生说。“我这里只有台湾出口加工区的大概资料，但人家的做法、管理、政策法规，一概不知。至于世界上有多少类型的加工区，凭什么取胜，更是无据可查。我们要办加工区，不借鉴人家的经验，谈何容易。因此，请你尽快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供我学习参考。”

吴南生实事求是、勤奋好学的品性，感动着庄世平。要促使祖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愿望，早已使他们建立起极不平常的友情。因此，他马上就应承下来：“你放心，这些资料我尽快去找，尽快送到你手上。”

于是，在广州这边，吴南生以其下棋时“先走一步”预示着“先手”，“先手”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的比拟，在省委常委会上大谈在汕头以至其他地方设置出口加工区，使其在振兴经济上取得“先手”的经验后，再辐射全省、全国的宏图大略。在香港方面，庄世平充分利用他在经济界中的影响和关系，四处搜罗收集国际上有关出口加工区的各类资料。1979 年 3 月中旬，有关台湾出口加工区各种法规的全套资料，由庄世平直接传到吴南生手上。同年 4 月 6 日，又传来菲律宾、新加坡、墨西哥、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各类资料。

正是这些资料，为广东省描绘了第一份让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和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蓝图，于 1979 年 3 月底由省委写了报告向中央提出请求。叶剑英、邓小平对广东这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邓小平指出：就叫特区吧，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设立“出口特区”后，许多同志深感“出口”两个字远远不能概括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特区的广泛内容和深远意义。吴南生为此一再和庄世平商量，又和许多同志多次探讨。1979 年 12 月 12 日，吴南生向中央做报告时提出：“中央批转省委的报告中是说试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的朋友交换意见，都觉得改称‘经济特区’比较好。”12 月 17 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特区工作会议，吴南生又向会议作了口头汇报，并详细说明了理由，得到了到会同志的一致赞成。1980 年 3 月，中央正式批准，定名为“经济特区”。现在，中国的“经济特区”已经是举世瞩目了！

吴南生在报告中所说的“各方面的朋友”，最主要的是庄世平。吴南生常常说：“庄老是我



1985年11月22日，万里接见中国银行外行总经理会议代表



1985年，庄世平在香港召开汕头特区工作会议时讲话

的老师，我负责筹办特区中所得到的许多信息和知识，认识了许多海外的朋友，多数是庄老帮助和介绍的。在经济特区的建设中，庄老起了重要的作用。”

庄老的重要作用，在于他是中国体制内当时为数不多的熟悉国际经济形势、掌握国际经济运作的高级官员，办事有渠道，说话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他既是中资人员，又是境外侨领，社会活动回旋余地大，自由度高；他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使他的建言献策可以直达北京决策心脏。吴南生看准了庄世平这些特点，加上两人心心相印，因而才有一场场遥相呼应、互相唱和的好戏献演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大舞台上。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明确写道：创办特区的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上海的崇明岛。可是到了这年 5 月初，便有消息传来：因条件所限，汕头和厦门不办特区了。接到消息后，庄世平在半个月里两次托词前往北京，强烈要求会见中央负责特区工作的领导人，为汕头和厦门两地的人民请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早在经济工作中与他相识相知，终于在他第二次赴京时接见了他。再见面，庄世平半杯茶水还没喝下，就坦诚地说：“我这是专程前来请教创办特区的条件的。”谷牧望着眼前这位已年近七旬、瘦骨磷峋的老人，感动不已，忙指出道：“办特区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地缘优势，二是华侨优势”。庄世平是有备而来，马上应道：汕头和厦门的地理条件确实不及深圳和珠海，但两地的华侨优势又是深圳和珠海不能企及的；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厦门华侨素有支持祖国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捐办学校成风；陈嘉庚不仅办了厦门大学，还在香港创办旨在为厦门大学长期发展筹集经费的集友银行，声名远播；汕头地区至今在海外有一千多万的侨胞，李嘉诚是华人首富，陈弼臣是泰国盘谷银行董事长，廖烈文是香港廖创兴银行董事长……在这两个地方创办特区，势必激发全体海外侨胞支持祖国开放改革的积极性，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力。说到最后，庄世平拉住谷牧的手，动情地说：“我这是代表汕头和厦门两地的人民向中央请命呀！”谷牧当然没有当即表态，但他不能不为此动容，只好在庄世平青筋暴起的手上拍了拍，说道：“你的意见，我们会研究的。”北京归来当晚，有关他和谷牧会见的消息已传到吴南生的耳朵里。

当年 5 月 14 日，谷牧率领工作组来到广东。一天下午，他专门找吴南生交谈：“中央有个意见，汕头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呢?”吴南生是条铮铮铁汉，认准方向的事情自来是一往无前，毫不惧色，马上应道：“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了，我也不负责特区了。这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因为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欣赏吴南生这种倔强的性格和钢铁般的精神，其实他心里也早已有底，随即微笑着说：“啊，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吴南生马上应道：“行。”

这就是一个困扰人们有关特区创办的日期的谜团内幕：为什么深圳和珠海的创办日期为 1980 年 6 月，汕头和厦门是 1981 年 6 月，相差了整整一年。

在改革开放中获得先走一步优势的汕头和厦门人民，都必将牢牢地记住这两位为他们请命的特区缔造者：吴南生和庄世平。

1979 年年底，正是中央决策创办特区工作的关键时刻，广东省委和省政府邀请港澳人士来到广州，召开有关广东改革开放及创办特区的座谈会。会前，庄世平认真阅读了有关部门已经草拟的各种具体做法的文件。但失望得很，在这些文件中限制的多，关卡牵制多，条条框框多，但在如何按照国际经济惯例办事，给外商让利，给外商优惠，减少层次，提高效率，在软硬环境上下功夫等关键问题上，却谈得很少很少。特别在所得税率上，虽然比国内略低，但高达 30%，比香港高出近一倍。庄世平坦率地向吴南生公开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谁料，吴南生笑着说：“所以我将您老请来，希望您毫不保留地坦言。”

于是，会议的第二天，庄世平以其对社会主义的赤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一改他平和稳重的性格，发表了一次情绪激昂、言辞恳切的讲话——

为什么要办特区呢？中央和广东省十分明确，就是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说要由此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时间已不多了，再不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好，关系到我们政权的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解放以来，我们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今天学这个理论，明天学那个论述，偏偏就忘了马克思最经典、最根本的一条：物质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还有什么优越性？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再失望下去了，失民心者失天下呀！

办特区，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增加就业，无疑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加速经济发展的一条好路子。从 1547 年意大利西北部那热亚湾的港口来被亨定为自由港开始，世界上创办特区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如今，世界各地以取得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特区已有三百五十多个。当然，世界上发展经济的机遇是随时存在的。当前，国际形势对我们

十分有利。70年代中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至今还未消除，许多游资正渴望投资。单是香港，据估计眼下就有二百亿至二百五十亿游资正寻找投资对象。我们在这个时刻创办特区，可以说是十分适时的。但是，作为创办特区的后来者，我们如果不在方针、政策和做法上更具吸引力，又谈何容易！

有许多同志说，可以在众多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先做起。这是对的，是我们的优势。血浓于水，同胞之间说话容易。但是千万不要把爱国心和投资设厂办实业混为一谈。他要表现爱国心，完全可以从别的地方赚来的钱，为内地捐赠几吨化肥、几辆汽车，捐建学校、医院、图书馆……要他来做亏本生意，他绝对不愿意。商人言利，天经地义，自古如是，将来如是。衡量外商的好坏标准只有一个：守法。只要他们不反对我们的政权领导，不反对社会主义，遵守我们的法律，就是好的。任何强迫人家接受政治信仰的做法，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强迫人家穿军队服饰、剃平头、戴像章、念语录、跳忠字舞等，都是错误的。西方人会把这样的做法当作是歧视，是侮辱。

营造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是我们马上就要行动的头等大事。硬件方面，交通、通讯、水、电，还有各类先进的现代化服务设施，应尽快着手规划、完善、提高。软件方面，关系整个方针、政策、管理效率、优惠条件、劳力素质等等。这几年我经常在内地各处跑，许多状况令人深感忧虑。我们的出入境手续过于繁琐，外国人或侨胞一次出入境时间长达四十分钟至一个钟头以上，边检人员不该说不该问的都说了问了，很粗野很不礼貌。须知当今西方许多国家都互相开放边境，出入境不必签证，每次往返也就是一分钟内的事情，只检查其身份的有效证件就行了。特区开办之初，有些外商或许不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设施还未配套，或许白天在特区工作，晚上就返回香港；或许星期一至星期五在特区工作，星期六就返回香港。如果我们的出入境手续还是那么繁琐，人员还是那么粗野，人家终会有一天不留下来，打起包裹走了。过去我们提倡阶级斗争，从上到下层层设卡，各种限制和约束多如牛毛，一幢三个月可以建成的楼房半年以至一年才报批完毕，要盖章上百个。当今世界上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商业信息瞬间万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各国实业家奉为信条。如果我们还是老样子，人家在时间上赔不起，还是要走人。所以，要减少管理层次，简化办事手续，一小时能办的事绝不用两小时，一天能办的绝不拖两天。这就要求，特区的机构设置应尽快改革。须知，世界上花钱买限制、买约束、买麻烦、买难受的，大概只有傻子。特区管理人员的选择应该高素质，高标准，严要求。我听说，眼下有些地方连知青回城入个户口都要送礼，一次送不行，还要两次、三次、几次。如果我们特区管理人员中掺进这样的腐化分子，不但开放引进的工作受阻，国家的形象和声誉也将受到损害。周总理生前说过，“外事无小事”。特区工作大部分是涉外性质，所以我们的管理人员必须是廉洁奉公、勤奋谦逊、富于奉献精神的优秀分子。

和香港相比，我们有什么优势呢？最突出的一点，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和低税率的地区。香港除烟、酒、汽油、化妆品和汽车等极少数商品征收进口税外，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不论是当地厂商或外商，香港的所得税仅16.5%，明显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因此，许多国家的产品在香港的价格甚至比在本国还便宜，日本人到香港旅游就常常购买日本的产品回去。同样原因，因为低税制，许多外资感到有利可图，争相在香港办工厂、搞贸易。全世界50家最大银行中，有44家在香港营业。据统计，60年代香港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11.7%，70年代也将超过9%，劳动就业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这些数字，即使是部分工业发达的国家，也难以达到。我们更是望尘莫及。我们办特区的现有优势，仅仅在于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和低廉的厂房租金。所以在法规的制定上，特别在税收上，一定要显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宽松和优惠，让外商感到有吸引力，有利可图。否则，由于我们在整个环境上的劣势，我们将难以在竞争中取胜。我们的第一步目标是：让荒滩废墟尽快建起楼房，让楼房里摆上设备和机器，尽快地提高就业机会，使人民群众有安居温饱的基础。为达这一目的，我赞成邓小平同志的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有走出这一步，我们的事业才可能有第二、第三步的发展和深化……



1983年1月，继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之后，南商蛇口分行成立，庄世平与梁湘市长（右二）、袁庚主任（左三）在开幕宴会上。这在当时是国内最早引进的两家外交银行，也是庄世平为国内金融界的改革开放做出的特殊贡献

年近七十的人，近一个钟头的讲话，居然不用讲稿，不用喝水，体现了庄世平对改革开放、创办特区的迫切和热忱。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也许没什么。但在两个“凡是”的阴影还笼罩着神州大地、为穿什么衣服剃什么头还要做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辩论的1979年，说这话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魄。

可惜的是，尽管参加会议的同志深为庄世平的讲话所启发和鼓舞，但一旦要求在一些文件、特别是在“特区条例（草案）”中修改降低税率，立即遭到许多职能部门的反对。即使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特区条例（草案）”时，宽松优惠的正确构思仍未能从中得到体现——为特区立法，使特区拥有法律地位，中央从一开始就同意，但起初的设想只是由广东和福建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法规立法；吴南生、庄世平等特区先驱高瞻远瞩，大胆进言：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是一项历史性的伟大事业，必须由中央立法。叶剑英、邓小平、习仲勋、谷牧等中央领导马上意识到：这样的伟大事业，势必牵动方方面面特别是那些极“左”分子的神经，由中央立法，无疑赠予特区开拓者一把开天辟地、无可畏惧的尚方宝剑。当然，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发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庄严宣示。对此，庄世平不遗余力地逐个找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明解释，力陈利弊，仍未完全取得人家的理解。虽然这些人未说出隐忧，但极“左”的阴影对这些人的影响却一目了然，仿佛税率比香港低了，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卖国了。为此，庄世平愤愤难平，终于忍无可忍地声言：“如果不按经济规律、不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的‘特区条例’订它何益！如果这样的条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付诸表决时，我和港澳的代表将投弃权票！”言语铿锵，如雷贯耳，顿时惊醒四座。

在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国度里，中庸之道早已成为国粹，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和和气气，皆大欢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党代会、人代会、政治协商会议，一贯的主调都是“团结一致”“一致拥护”“一致通过”，绝不允许有哪怕是“弃权”一类的不谐音。如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庄世平居然表明要和港澳的代表对某项重

要议题行使“弃权”的职责、这自然有他激动的情绪化的一面，更有他开创兼收并蓄、充分容纳各种不同意见、造就良好民主风气的政治局面的决心体现。但这不啻是一个惊雷！由广东省港澳区的人大代表对广东特区条例行使“弃权”，不是要贻笑大方吗？于是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省委副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杨尚昆先后都来了。他们调查了情况之后，对许多职能部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表示要尽快地按照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对“特区条例（草案）”作更加深刻有效的修改。随后，又各自来到庄世平的住处，和他恳切交谈。庄世平从习仲勋和杨尚昆的行动中，看到了中央和广东省最高领导层对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的坚定信心，笑着对他们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条例修改了，我还投什么弃权票?”

这一场争论，庄世平在习仲勋、杨尚昆、吴南生等人的支持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为创办特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法律基础。

以后，有关广东创立特区的文件，庄世平都不遗余力地参与修订，自始至终地坚持和表明自己“宽松和优惠”的观点。这不懈的努力，终于使他的观点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接受并体现在创办特区的许多文献式文件上。

经方方面面上百次修改的、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0年8月26日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有许多具体规定也吸取了庄世平的具体意见。尤为突出的，是让利优惠方面。比如文件中规定，特区的所得税为15%，比香港还低！其他如外资银行进入特区设立分行、在特区创办保险公司、在特区设立二线以显示特区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和特殊环境，从而加快特区的建设等条款，也都出自庄世平的智慧。

1980年9月2日，香港《文汇报》对港澳代表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表现，作了点滴的透露：

出席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在小组会上，一致赞同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认为建设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对内地、对港澳本身均有好处，并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庄世平说，东南亚有些国家建立了“一站制”，把需要到各部门办理的事集中在一处，包揽起来，很是方便。这种做法，值得仿效。

庄世平提出的建议，仍然是今天我们许多部门许多同志津津乐道、努力实现的新鲜事物！

在后来全国人大讨论审议外资对华投资的法规时，同样在税收问题上，许多人仍难以接受体现“宽松和优惠”的正确观点的低税制，庄世平不论大会小会，都不遗余力地列举了国内外不同的税制，指出了低税制在当时条件下对加快中国引进外资工作的好处，并和广东省、港澳人大代表一起，争取了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使低税制在外资对华投资的法规中得到了体现并通过。正是中央的正确指引，正是庄世平和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的不懈努力和推动，才出现了后来的其势如潮的全国性开放局面。这是后话。



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及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代表和委员（二排左一为庄世平）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打开了门户，向外国资本露出了诚挚的笑脸。这无疑是给世界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惊喜。美国《商业周刊》1982年1月的文章，就为这种惊喜注明了十分清晰的注脚：

今年1月1日生效的一批新制定的地方法，将使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南方的经济特区得到无先例的权利，自共产党人1949年掌权以来，外国人第一次有权签订长期土地租约，有权自定工资和解雇工人。

这些新法律是北京在南方靠近香港的广东省的三个特区对投资采取日益灵活态度的最新步骤。

……根据新的规定，允许管理人员在做生意时不用事事请示行政官员。中国还打算改变海关和移民手续，以便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人员和商品易于来往，并在特区和中国特区以外地区之间再设立一个检查站。

在特区，也允许外国人建立百分之百为他们所有的子公司——这是直至最近以前在中国还没听说过的事。

华侨投资者把经济特区看成是压力过大的香港和澳门的一个安全阀。譬如，南新朵厂有限公司把它的纺织印染厂迁到深圳最东部。该公司欣然同意以每平方英尺仅三分的价格租借土地，租期为25年。在香港的新界地区，地租相当于这一数字的十多倍，而且在新界签订的地产租期不得延长到1997年之后。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改革的神经中枢金融界为适应开放的需要，方便外商投资和友好往来，决定发行外汇兑换券。身兼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的庄世平对此本来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因为外汇兑换券可以在国内一些特定市场或行业上流通，一个国家拥有外汇兑换券和人民币两种货币，总不是好事。如果考虑得周到一些，让人民币有限制地出口，也不至于后来舆论上闹得沸沸扬扬。但由于这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事物，利大于弊，庄世平终究没有公开提出不同的意见。然而，兑换券发行后，社会上看法不一，各种意见纷呈，甚至有全国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提出借询：“一个国家怎么能发行兑换券和人民币两种货币?”对这种缺乏严肃性和周密性的做法表示了不理解和严厉的批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本可以坦率地解释这是特殊情况下发行的特殊货币，属权宜之计，把手段和目的讲清楚，人们或许还会谅解。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却解释为：“外汇兑换券不是货币，仅仅是凭证。”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恰当的，自然难以得到人们的谅解和理解。于是，反对意见反而有增无减。到1986年年初，有关部门大概迫于舆论压力，开始议论停止兑换券的发行流通。不久，停止发行兑换券的意见在金融界内部也占了上风。

庄世平听到这些议论，心里十分不安。此时全国性的开放已势若大潮，一浪高于一浪，骤然停止兑换券发行而未有具体的对策，势必造成许多不便，影响并放慢改革开放的速度。1986年夏天，他专程赶到深圳会见中国银行主要负责人，听到取消兑换券已成定局，即将实施。他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并请这位负责人向更高层部门反映。随后，他权衡再三，又慨然命笔，向中央多个决策部门以至国家领导人写信。信中说：除非人民币能够自由兑换外汇，或者为了便利旅客允许人民币有一定限额的出口，否则，取消外汇兑换券只能损害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在我们的对

外经济活动中造成阻碍，同时降低和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威信和尊严，刚刚热起来的开放局面也将冷落下去，最后损失的是我们国家。他举了这样的小例子：如果外商明天一早要回去，晚上银行又已关门，他身上的人民币带不出去，又换不回来，不是存心使人无所适从吗?！即使是他换回外币，国内又只能使用人民币，明天一早他的生活将如何对付呢？如果在中国可以使用外币，即使情况十分特殊，也是真真正正涉及国家主权的大问题。由这些例子，还可以引申到合资企业中外商的外汇结算等敏感问题……言之凿凿，情之昭昭，透露出金融家庄世平为国家整体利益着想、全力维护改革开放的赤胆忠心。也正是他和一批熟悉金融经济规律的行家里手的力陈利弊，在还未制定新的适应形势发展的币制办法之前，使取消外汇兑换券的工作放缓下来，使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局面顺利地发展下去。

从 1979 年年底起，庄世平就邀请或陪同东南亚实业家罗新权、谢国民等参与汕头特区的踏勘选址，探讨在潮州意溪建设低水头发电站的可行性。汕头特区最初选址在市南郊达濠的广澳、东郊的珠池肚。广澳因为水、电问题比较严重，首先被淘汰。珠池肚是濒临大海的一片滩涂，离市区八公里左右。由于珠池肚靠近港口，有利于特区的发展，罗新权曾建议在临海的浅滩上垒筑海堤，从堤外采用现代化的“吹填”办法抽沙填土，营造一块崭新的土地建设特区。但由于垒筑大堤耗时长，巨大的投资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办到，因此最终将特区选定在毗邻市区的龙湖。

由于长期的封闭，国内的建筑设计和整体规划未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大局，特别是创办特区的需要。1980 年 1 月，经中央批准，吴南生率秦文俊、丁励松等人前往香港考察。吴南生等人在港期间，由庄世平亲自陪同或安排，重点考察了新界沙田的规划和建设，了解了大埔、元朗两个新兴工业村的建设和管理，并获得庄世平送来的大量这方面的材料。后来，深圳特区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就参照了香港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

也正是这次考察的某一天下午，庄世平和吴南生在南洋商业银行的会议室里，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交谈。吴南生作为新兼任的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苦于邓小平已经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真的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于是吴南生向庄世平要求：你银行里有大把的钱，借点给深圳特区搞建设吧。庄世平沉思良久应道：你向银行借钱是要还本付息的，期限一到就得偿还。如果深圳特区政府将贷款拿去搞基本建设，不论是三通一平还是六通一平，都是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收回成本不容易。借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作为长期性的基本建设资金是不可行的。他见吴南生听得入神，开玩笑说：南洋商业银行是境外银行，要遵守香港的金融法规，而银行的钱说到底是储户的钱，届时你借了钱还不了，你没倒下，我却要下台。吴南生本是个满身诙谐细胞的文人，但已被一个“钱”字愁住，笑不出来。庄世平顿了顿说：其实你有大把钱，特区政府比银行还富。吴南生问：“钱在哪里?”庄世平顿足应道：“就在你的脚下，你的脚下是金山银山呀！特区 327 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何等珍贵的资源呀！现在国内实行计划经济将生产资料及许多生活资料，只允许它有使用价值，不允当作商品去流通交换，失去了原来具有的交换价值。深圳既然是经济特区，是否可以在‘特’字作点文章？在特区内，实行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呢？把全民所有制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土地都变成商品，让它既有使用价值又恢复其原来具有的交换价值，可以进行流通交换，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则和非常重要的问题。”吴南生茅塞顿开，欣喜的神色流露在脸上。他有坚定的党性原则，他倡导创办特区恰恰是他的党性原则使然。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把主持特区的担子交给他，并喻他为“孙悟空”。孙悟空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不信邪、敢闯关的铁汉子！如今，眼看横在他眼前的一道难题即将得到破解，他的内心顿时充满了豪情和期待。庄世平见他这副神情，又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英国人占领香港时，并没有带什么资金来开发、发展这块殖民地。但港英政府在香港实行土地、楼宇、建筑物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并制定与之关联的税收政策，培育、发展、繁荣房地产业，带动了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促进香港的繁荣；从而使港英政府获得丰厚的财政收入，不但拥有大量的资金支付香港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港英政府的行政开支，还负担驻港英军军费的开支。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是否可以借鉴香港这一做法，在政府规划下，对土地进行公开的招标、拍卖，让商人在政府土地规划部门的指引下，按规定有年限地经营，进行开发建设；允许拍卖土地，让建造的商住楼宇，工厂依章纳税合法进行买卖、出租、转让、抵押，并允许银行对其办理按揭、分期付款的业务；深圳特区政府拥有大量的土地，可以从土地、房地产产业入手，做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文章。“你何愁没有资金来建设深圳特区呢?”庄世平最后说。

结束谈话，吴南生本想说一声“谢谢”，但临了却感到多余，只用双手紧紧地握住庄世平青筋突起的老手。

可叹的是，直到庄世平去世，竟然还有人怀疑庄世平和吴南生怎么敢于在极“左”思潮十分猖狂的 1980 年将“市场经济”这四个谈虎色变的字眼与特区联系起来。除了“市场经济”，谈话中关于“允许拍卖土地”“买卖、出租、转让、抵押商住楼宇”“允许银行对其办理按揭、分期付款的业务”等，都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里程碑式的创举。

不久，连同香港房地产印花税收据、银行办理按揭的有关资料等一系列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全部文件，由庄世平派专人送到吴南生手上。



1997年秋，庄世平与董建华等参加香港金融界庆祝回归委员会庆祝活动

吴南生底气十足，暗暗地做了一些尝试。

1981 年 12 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任仲夷、江泽民（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在一次座谈会之后，吴南生单独找谷牧，要求给予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深圳贷款。谷牧略一思索问：“什么用途？如何还贷呢?”吴南生此时已胸有成竹，说：“深圳特区建设的第一步在罗湖开发 0.8 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投资 90 元搞‘五通一平’，要 7000 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 40 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 5000 港元左右，总计可以收入 20 亿港元左右。”谷牧不愧为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竟然极为少见地拍了拍吴南生的肩膀说：“就贷给 3000 万吧。”吴南生喜出望外，马上表示：“有了这 3000 万的‘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也正是中央的允许，1981 年 11 月广东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为了减少极“左”们的非难，也为了避免争论，有关土地“出租”“买

卖”“拍卖”一类的字眼一律不用，换上十分中性的“土地使用费”。不同的用词，实质却一样。

特区作为窗口，除了传播崭新的思想观念，也传授了获取财富的手段和方法。全国势若大潮的改革开放，正因为土地所产生的巨大财富作为强大的动力，所以提速，进而振兴整个民族。

针对香港的金融市场全部开放，资金进出完全自由，各国资本高度汇集，因而带动了全港各行各业高速发展的经验，庄世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金融改革的深度；一个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必然影响以至阻挠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没有国际化的金融业务，特区就不可能与国际化的经济接轨。当然，也出于对国内金融界封闭、保守，随意性代替严肃性、法律性的管理和做法的忧虑，他决心用先进的国际化的金融管理和做法改变国内这块领地。1981 年 10 月，他决定在深圳特区创办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经各方面批准，分行于翌年正式创立。为了使分行尽快产生影响和效益，最初的行址是租来的罗湖华侨旅行社的一间平房，条件十分简陋。他和一群西装笔挺、过去工作环境至为舒适的职员，一起加入了与特区共命运的开荒牛行列。直到翌年，才在罗湖买下 5000 平方米的土地，建起一座分行大楼及两座高层住宅。这一举动，对完善特区投资环境，增强外商的投资信心，意义十分重大。



1996年夏，庄世平、陈伟南、陈大河等在普宁参观制衣厂

为了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的创办，晚年的庄世平可谓呕心沥血。向北京有关部门申办手续时，几乎一切银行业务都可以让深圳分行开展。但到了实际工作中，由于当时全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各项银行业务都有国内各家专业银行把守，画地为牢，南商深圳分行碰到的都是禁区，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很长时间内，深圳分行的业务几乎无法开展。为此，同时作为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的庄世平四处奔走，上北京，进广州，入深圳，私下沟通关系说明情况，大会小会上据理力争，殚精竭虑。1982 年年底的一个夜晚，他在广州和后来担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特区办主任丁励松深谈之后，感叹道：“我晚年创办南商深圳分行，很难说将成为我一生的唯一错误呀!”表现出对南商深圳分行的命运的深深忧虑。然而，翌日，他又精神抖擞地去争取和谋求南商深圳分行的生存和发展。

当时，香港汇丰银行也和南商同时进入深圳，打算设立分行。但碍于当年各种矛盾和困难，汇丰银行退怯了，鸣金收兵，庄世平却说：“我们既然来了，就不走了！我就不相信国内的金融体制是铁板一块!”为了安定十多位分行员工的情绪，他找到了中国银行，义务为他们做代办。当时，包括港币在内的一切外币只有兑换成人民币或兑换券才能在国内使用，而人民币和兑换券又不能带往境外，否则，便视为违法。加上中国银行有着严格的工作时间限制，这就给境外那些早出晚归的商贾华侨带来许多的不便，产生许多矛盾。于是，庄世平利用境外银行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延长南商深圳分行的营业时间，无偿为中国银行开展兑换业务，为广大商贾华侨提供了不少的便利。虽说这些劳动都是义务的，但也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乃至全球的声誉，为南商深圳分行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十分扎实和稳固的基础。直到两年后，在庄世平的努力下，国内僵化的金融体制才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有了松动，南商深圳分行的业务才得以发展。

在南商深圳分行极为困难的时期，深圳特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中冠印染厂”的港商罗老板恰恰因为得到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才合资成功。可惜，罗老板后来因在香港搞房地产失败，宣告破产。庄世平为了清理罗老板的债权债务，不遗余力地做了上至深圳特区最高领导层、下至中冠印染厂的中方负责人的工作，终于由南洋商业银行在港成立了另一家公司，全盘收购了中冠印染厂的港方股份，保证了深圳特区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家合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后来，又应中方的要求，庄世平从大局出发，将港方股份全部转让给中方，维护了特区的形象。

1982 年，经庄世平动员和介绍，泰国知名实业家郑亮荫透露了到国内投资的意向。郑亮荫第一次回来考察时，庄世平亲自陪同，重点访问了汕头特区。郑亮荫回国后，经过研究，决定多跑几个地方，再作实质性的考虑。庄世平碍于事务缠身，特地打电话给广东省侨联副主席黄大同:“郑先生以前在泰国和在国内都见过你父亲，对祖国很有感情。他如能投资浮化玻璃项目，不论科技水平或是投资规模，都是国内至今首屈一指的，具有较大的影响。希望你全力以赴，促成实现他的愿望。”黄大同陪同郑亮荫考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又到了汕头。最后，还把他直接介绍给了吴南生、丁励松以及广东华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罗彦。由于庄世平和吴南生、丁励松、黄大同、罗彦以及各方面的紧密配合，关心支持，郑亮荫不仅感受到祖国的热情和期望，还获得了各地的具体资料。考虑到汕头在能源和交通条件等方面的不足，他终于把投资浮化玻璃的项目选定在深圳蛇口，并和香港招商局合作。这个项目投资八千万美元，居当时全国合资企业之首。该项目于翌年建成投产，作为一个窗口，它在特区创业之时，备受国内外关注，参观考察的国内外宾客络绎不绝。

深圳和其他几个特区初创之际，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有待改变，各种思想交锋层出不穷，“以言治罪”的文件仍比比皆是，这些都绝不是一纸《广东经济特区条例》就可以在一朝一夕解决问题的。即使是在特区管理者内部，也时常出现不同思想观念碰撞的火花。有感于思想观念转变的艰难，特区的建设又箭在弦上，实在没有时间去作扯扯攘攘争论，吴南生在特区管理者内部“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

极“左”分子当然不会让特区的建设者们沉默下去，他们都是得了歪理还要下井投石的角色，利用舆论叫嚣。

1982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5 日，在北京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经济工作召开的会议上，主持人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如此深刻的指责和“教导”:

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哪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

我建议省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因此，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这位主持人犯了一个常识性的大误：西方国家的计划经济怎么能和我们的计划经济相提并论？那是两种性质的问题呀！更何况，“以市场调节为主”是写进全国人大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他难道没有看过？他怎能有法不依？

特区的建设者们翘首以待，何时可以听到中央决策者的公道话、壮胆声！

1982 年 12 月，声名赫赫的理论权威胡乔木视察深圳特区。其时已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刚好病休在家，改由接任的梁湘全程陪同。梁湘是一位很率直、很实干的老同志，也不知道特区初创时吴南生立下的“约法三章”，就和陪同的其他同志向胡乔木请教了有关特区性质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胡乔木当仁不让，于同年 12 月 18 日作了十分具体的解答。下面是记录稿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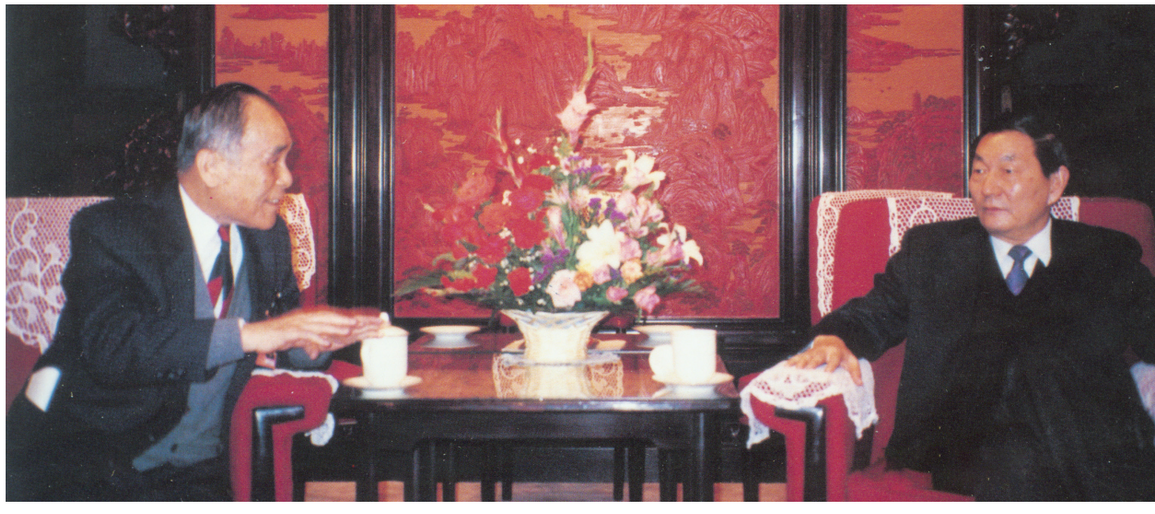
1982 年 12 月 18 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至五时三十分，乔木同志来蛇口工业区视察，交通部顾问潘琪同志当面向乔木同志请教了当前理论界和在总结蛇口工业区经验中所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1. 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2. 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主；3. 对外来投资者的方针是否还是限制、利用、改造或采取什么新的方针等问题。乔木同志看了潘琪所递交的这几个问题后说：“你提的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在参观完毕将要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他向潘琪同志和陪同的其他同志，就特区的经济性质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全中国都可以建立特区了。特区要按特区的口径，那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不然就不叫特区，恐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一小片国家资本主义。本来列宁也没有搞什么全国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跟他们的情况、条件更不同。但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更不好办了。（梁湘同志说，但公开不公开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公开讲不公开讲要看必要，就是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候，有这个需要才去讲，没有这个需要去讲干嘛？（梁湘同志说，我们内部要说清楚。）还是社会主义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里面还有个体经济嘛！就是这种关系。至于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共产党，烧成灰也是。（梁湘同志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还是有精神压力的。）当权派嘛，还是社会主义的当权派。

胡乔木这一次的讲话，是言不由衷，是碍于隐情，还是思想观念使然？我们不得而知。

如此政治气氛，特别是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崇明岛没有办成特区，也就有迹可循了。

胡乔木这次讲话当晚，梁湘就拿着记录稿到广州找吴南生。吴南生看完记录稿，十分平静地说：“乔木同志的意见是理论探讨的意见。理论问题，有时几十年、几百年也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不问，他不会说。问了，他不好不答。但他也还会再观察、再思考，再和大家，至少要和我们讨论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们才开始实践，不急于去讨论这些问题。”其实他早在 1979 年就集中了多位理论工作者研究探讨过这些问题，心里有数，只是不想引起争论才不说而已。看着吴南生如此从容镇定，豁达大度，梁湘紧张的心才放松下来。随后，吴南生与他谈到了“约法三章”。“约法三章”当然只针对内部的同志，非说不可的话可以让海内外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去说，比如国内刚刚挣脱极“左”枷锁的文艺界，比如海外境外有影响的人物如庄世平等，两位战友促膝谈了近半夜，待梁湘心情平静地站起身告别时，不由泛起一丝的愧疚：吴南生正在病中呀！



1995年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庄世平获朱镕基副总理接见

从 1980 年 10 月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决定在深圳创办分行开始，庄世平就不停地奔跑于香港和深圳两地，他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特区人。为了发挥这位特殊的特区人的重要作用，梁湘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们见面的地点常常在深圳罗湖华侨旅行社旁边的林荫道上——庄世平在旅行社里租了一间条件十分简陋的平房作为筹办分行的地点，他们的见面往往像闲庭信步时的无意偶遇。起初都是拉一番家常，随后便是梁湘提出问题和要求，庄世平予以解答和帮助。比如 1981 年 11 月底那次偶遇，梁湘随口问：“机关团委要在元旦开个舞会，你说我批不批呢？”庄世平：“怎能不批呢？”“跳舞本来就遭非议，何况他们跳的士高，有人说这是颓丧。”“什么颓丧！你当年是没有去过延安，去过重庆红岩村吧？听说毛主席、朱德、周恩来都喜欢跳舞，每月都要搞上几次。跳舞可以放松身心，可以解除疲劳，何乐不为！领袖们跳的是交际舞，要身体接触的；年轻人跳的士高，不用身体接触，就是动作粗野点。你说两者哪样更好？都一样的。”“那我就批了，但你得来跳舞，顺便把这番话说说。”“舞我不会跳，说话还可以。”又比如 1982 年春节前的那次偶遇，梁湘问：“竹园茶座请了几个歌手演唱，被人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庄世平竟真的有点恼了：“难道泡在浴池里，坐在马桶上听歌唱歌，就是无产阶级了？让茶馆和歌手多赚些钱，让茶客得到视觉听觉享受，双赢的事嘛！”“听说明天有几个京剧名角登台，你老来么？来了把你这番话说说。”“说话可以，茶钱你付！”如此这般，两人心心相通，但都不点破，都是为造就特区的开放氛围而努力呀！然而到了 1982 年 4 月 12 日，梁湘已无暇再装糊涂了，他必须借助庄世平的巨大影响力和深厚学识，去为特区洗清不明不白泼来的污垢，还特区一个清白。于是，他



⏩⏩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香港中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经理级人员

让人给庄世平送去深圳特区货币问题座谈会的请柬，还往信封里塞进了同年3月29日的《文汇报》和4月8日的《解放日报》。

为此，庄世平在1982年6月16日的深圳经济特区货币问题座谈会上，就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发表了一次有理有据、言情激昂的讲话——

首先经济特区会不会变成殖民地？这是一个关系特区性质、发展前途以及制定特区经济政策的出发点的大问题，我们认为，特区是不是殖民地，首先要看特区的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哪一种性质的政权？我们深圳特区的梁湘市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政府任命的，我们特区的一些法律、法令，尽管有些地方和内地不一样，但都是我们自己制定的，绝不是过去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之类的东西。

这次讲话，无疑是对极“左”阴魂对设立特区的诬陷的一次强有力反击！对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极大的帮助。

1984年1月24日，广大特区建设者日盼夜盼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终于迈开他总动员的第一次南行。中午抵达后，他仅稍事休息，就出席深圳市委常委会会议，听取梁湘的工作汇报。然而，会议才开了四十分钟，邓小平喝了一口茶水，说：“不谈了，出去看看。”当时，寒风呼啸，气温下降至十一摄氏度，邓小平不顾旅途劳累，冒着严寒兴致勃勃地登上刚刚竣工并开业的22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天台，俯瞰深圳全景。邓小平从天台的东面走到北面，又从北面走到西面和南面，时而凭栏远眺，时而鸟瞰近景，尽情地饱览深圳特区的建设风貌。虽说他时常露出笑容，却始终未吐露只言片语。这就像往梁湘等人的心头投下一块石头，而且越来越沉重了。直到视察结束，他神情轻松地说了一句：“我都看清楚了！”梁湘的心情才放松了一点。直到27日，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也没有留下一句结论性的话来。好在，他在珠海一反沉默的态度，欣然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经济特区下了结论。梁湘接到消息，又平添了另一种压力：四个特区中，人们无意中都把深圳当作老大；老大得不到题词，脸上无光呀！想了许久，他当晚就给吴南生打去电话。大病初愈的吴南生一听，马上说：“你马上派人跟踪落实一下。”“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咱这是请领导作指示嘛，光明正大。啊，对了——”吴南生的思维像飞轮翻转，“你让人在深圳市委去年的总结里，或是近期给中央的有关报告里，找出十几条结论性的警句来，每条都在五十个字以内，以便小平同志在题词时作参考。”梁湘的心稍微平静了些，马上张罗开来。

1984年1月30日上午十时，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的陪伴下散步之后，回到广州下榻处的会客室，一眼就看到站在门口焦急地徘徊、在深圳陪伴了他们三天的深圳市委接待办张荣主任。邓榕打招呼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张荣愁眉苦脸地应道：“我们的领导说了，拿不到首长的题词，就不让我回家过年了。”邓小平会心一笑，大步走到早已摆好笔墨和宣纸的书案旁边，略略运气，便写下了二十五个宣言式的大字：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总设计师早已为深圳的开荒牛们酝酿下气势磅礴的腹稿！落款时，办事缜密的邓小平又把日期写为1984年1月26日——他视察深圳的日子。

翌日是大年初一，万家欢庆的日子。因为有邓小平南行的新闻，人们看到他为深圳和珠海的题词，欢乐的气氛骤然高涨，千千万万的特区建设者一边欢笑，一边噙满了泪水。曾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许多质疑和骂名，终于可以一洗而清了！吴南生夜不能寐，起了个大早，随即便秉笔直书：“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取自《孙子兵法》）。”随后正要好好欣赏这气势昂然的条幅，庄世平的电话来了。“今年春节没有外出避年，睁着眼等到天亮，就等着与你聊聊。”庄世平一改往日平缓的口气，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破了耳膜的吴南生都觉得话筒里有点噪。避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风俗，年迈的老人家避开年关出外稍住，据说就可以增寿。庄世平当然不信这样的说法，但挡不住好心的乡人的劝说，往年也常把避年当作外出休息。“邓大人一题词，我都年轻了二十岁，你还避什么年！”吴南生乐呵呵地应道。“是呀是呀，太平盛世，咱们都得好好活着。你在干什么呢？”庄世平问，吴南生把刚写好的条幅念了一遍。

“也给我写一张，我要挂到办公室去。”“我马上写，但你要亲自到广州来拿。”“我明天就过去。”吴南生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这老顽童，索字是借口，偷闲是真！

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吴南生、庄世平和特区的建设者们，终于再不用躲躲闪闪地以“市场调节为主”来概括经济特区的特色，可以挺直腰杆地面对世界宣布：经济特区就是要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市场经济，富强之路——中国的选择。

特区初创时期的辛酸苦辣，当然是创业者自知。丁励松在《广东经济特区十年》上所发表的文章《特区始创纪事》中的一段话，对庄世平在这一时期的业绩作了最有力的见证和概括——

诸多关心特区的老朋友，而今难以一一列举。我想，不能不提及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原董事长庄世平先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家事务的批评往往慷慨陈词，甚至尖锐刻薄；而为国家办事尤其是对试办特区，又是倾注一腔热血，竭尽全力，以年迈体弱之躯，不辞劳苦地来回奔波。他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世界经济动向和经济性特区的资料，难以数计。深圳建设开始后，他坚持要求南洋商业银行进入特区设立分行。在当时国家金融体制僵化模式的框围下，这无异于一种自吞苦果的冒险。尔后数年间，南洋商业银行驶入特区之船一直在暗礁中挣扎，苦果的滋味难以言喻，以至庄老先生亦曾慨然长叹……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特区事业的发展，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业务日益扩展，这该使庄老先生宽慰释然了。

直到1998年年底，当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接受记者的采访，谈起当年拓荒创业的一幕幕往事，仍掩饰不住对庄世平的崇敬之色和爱戴之情。有关的访谈录，发表在同年12月1日的《南方日报》上：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庄老——全国政协常委庄世平先生。当时他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从1979年春节前后开始，他就为创办特区，创办汕头大学（这两者是同时酝酿、提出和筹备的）而不断奔走于香港至广州、汕头之间。他熟悉世界经济，他为我们寻找来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几乎我们需要什么资料，他就会立即给我们找来。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更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则。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计划38平方公里，后来了解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工业区很大才下定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全都划成特区。又例如，我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时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只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含义会更确切些……

扎实的第一步已经迈出，敏感的人们已能预感到特区明天的绚丽和辉煌。然而，对庄世平来说，他自觉地投身其间的、参与开拓和组织的这一项宏伟事业，还仅仅是开始。

大量的工作和意想不到的困难，还会不断地向他涌来。

开放引路

1981年11月14日，是潮汕人民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广东省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刘峰任管委会主任。汕头特区设在汕头市东郊龙湖，区域面积0.8平方公里。

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0.8平方公里实在太小太小。然而，如果作为一扇窗户，一个样板，它完全可以汇集东西南北中的各种新观念、新意识、新事物，然后积聚成可以漫卷全国的旋风，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就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而言，它是建立业绩、大展鸿图的人生大舞台。

对刘峰出任汕头特区开荒牛的领头人，庄世平感到由衷的欣慰。刘峰出生于泰国。当年庄世平从泰国转到香港时，刘峰却从殷实的家里偷了枪支，径自回国参加了革命队伍，踏上了解放中国的烽火之路。极“左”路线泛滥期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刘峰也曾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和触及体肤的“教育”。然而，当阴霾散尽，刘峰受汕头地委委派，前往普宁进行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时，他立即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正气凛然、义无反顾的品格，不仅解放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以至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非难的一大批干部，而且率先在归还老干部和华侨的财产上做了大量工作。不久，他就任县委书记，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受破坏最严重的灾区农村，他率先在广东以至全国推行了农村联产责任制，将农民从极“左”思潮和贫困线中解救出来。如果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召开，他差点又要为此经受另一场政治灾难。自己家乡发生的种种变化，庄世平目睹耳闻，深为欣喜。特别是多次面谈，刘峰那灵敏尖锐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给庄世平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刘峰有这么几句话：“虽说比起您老我是晚辈，但也是五字头的年纪了。人生最美好最能干的时光已浪费了，这时再不干，不大干，还待何时！”庄世平是十分欣赏的。

1979年，为了恢复“文化大革命”被撤销了校名、改变了办校初衷的普宁华侨中学，庄世平与罗志清、陈伟、陈大河、张元利、孙振文等香港普籍实业家回到家乡。一天晚上，讨论完修缮校舍、增加教学设施等事宜之后，刘峰意犹未尽，和庄世平继续深谈。刘峰带着一点不好意思说：“恢复侨中看来又要您老和广大的侨胞出大力了。不是家乡这么穷，何至于……眼下全县的政治局面已好转，能不能把经济搞得更快些，我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很少，还望您老为家乡多指出一些路子来。”

庄世平长期搞经济工作的思想被刘峰一触动，话匣子倏然打开了：“香港是个人多地少资源缺的海岛。它拥有今日的繁荣，是由自由贸易带动了各行各业而发展起来的。我们普宁旧称‘草县’，有山无海少平原，有草无鱼缺粮食，情况和香港相像。所以，过去许多人只好出洋过番谋生，是广东的侨乡大县。如果能从贸易做起，发挥市场的物资聚散的功能，从中获利得益，不失是一条发展经济的路子。对了，如今开放了，华侨回来的很多，同时也带回很多国内紧俏的日常衣物、电器等物资，这些物资，侨眷不一定用得完，县里如果能组织收购，销往内地，我想是可以获得利益的……”

一夜深谈，拓开了刘峰的视野。从那以后，他冒着因“投机倒把”而随时影响其政治生命的危险，组织成立了各类贸易公司——普宁后来发展建立起来的闻名遐迩的十大市场，以及县内人民群众强烈的商品流通意识，正是由此孕育并产生的。其中单是华侨物资的收购和销售一项，就赚了七百多万元。普宁的经济起死回生后，县城的城市建设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专门安置无房缺房户的广南新村在镇东南角建起了；被冠为“超标准建设”的影剧院建起了；排污设施开始铺设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翘首以待的自来水也终于流进了千家万户……也许正是刘



1992年5月，江泽民接见庄世平、李嘉诚

峰强烈的开放意识和义无反顾的胆识，1980 年年底，一纸任命书下来，他要去筹备汕头特区了。临走，他忘不了为“侨联大厦”立项并落实各项建设措施，为联络海外侨胞的县侨联谋取一条长期获利生息之道。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的召唤，出于浓郁的乡情亲情，似乎还有一丝他和吴南生、刘峰友谊日深的感情维系，庄世平对汕头特区从大至微的每一个建设和行动，都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精力。

汕头特区的优势在哪里呢？汕头离香港和澳门，水路与陆路分别三百多海里和四百多公里，比起深圳和珠海两个特区，在地理位置上明显处于劣势。而且，汕头特区起步晚，深圳和珠海已成为国内外投资的热点，要转移人们的投资视线并非易事。因此，汕头特区从一开始，庄世平就和吴南生、刘峰、杨峰（汕头特区管委会副主任、原汕头市副市长）等人制定了“开发一片、投产一片、收益一片”的战略方针，另辟了发展蹊径。更重要的是，汕头特区的优势在于这里是著名侨乡。潮汕地区人口一千多万，海外潮人也有一千多万。如何发挥汕头特区的优势，成了汕头特区的发展关键。在此之前，已有李嘉诚、庄静庵等著名潮籍实业家回家乡开展多项捐赠援建工作，汕头大学后来也归入特区项目，影响很大。但如何动员更广泛的华侨参与特区的建设呢？从以往的许多经验中，庄世平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庞大的海外潮籍华人社会，寻找着能够发挥效应的领袖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好长时间，我们曾将广大华侨划入另册，当作异己阶级对待。“文化大革命”时，更视华侨为洪水猛兽，稍有接触，往往会被斥以“里通外国”“特务”“奸细”的嫌疑。至于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侨领，其国内的眷属更不同程度地在各个运动中受到严厉“教育”或无情“专政”。因此，尽管国内推行四化和改革开放政策，他们或多或少地表示欢迎和赞赏，但要他们回来绝非易事。庄世平所动员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一次动员即能成功的。多次苦口婆心的工作之后，绝大多数人表示可以回去看一看了，甚至表示环境适合的话可以进行投资，但往往会对庄世平说：“你一同去，我才去。”庄世平总是义无反顾地应道：“我去，一定去。”在海外华侨的心目中，庄世平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侨联副主席、中资企业的负责人，有他同行和指导，安全就有了保障，投资的利益也有了保障。而庄世平所以乐此不疲地往返于内地和海外之间，是深感于华侨对自己信任，深感于只有良好的第一次接触才有长久的愉快的合作。

由于极“左”思潮所造成的愚昧无知，从踏入国门的第一步开始，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他必须尽其身份和威望，去杜绝和减少这些祖国的赤子和尊贵的客人极有可能受到的无礼和非难。这一点，不仅他身边的许多人曾遭遇过，就连他自己也有过深刻的教训。1976 年年底他到广州时，由于身份证上繁体的“莊”字和回乡证简体的“庄”字不一样，任凭他再三解释，无知的边检人员就是不予签证放行。一直纠缠了半个多钟头，直到迎接他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发现情况不对，出面干预和交涉，才得以脱身。香港普籍实业家陈大河在过关时，海关人员竟然不知道有可以在某些规定范围内流通使用的信用卡，尽管陈大河再三解释：“这是钱。也可以说是银行方便流通使用的一种证明，另一种形式的货币。”仍被拘羁了大半天，甚至受到侮辱。泰国著名实业家谢奕初是个爱国老人，四个儿子的名字专门用上“正大中国”四个字。他偕女儿回国时，海关人员在检查衣物时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女人衣服?”谢老先生反问：“有什么规定不能带女人衣服呢?”海关人员竟说：“因为你是男的。”谢老先生愤怒了：“是我女儿穿的，还要送给亲友眷属。国内除了男的，没有女的吗？你不知道这样问话有损人格吗?”……更有甚者，大埔县一位华侨在家乡一座桥边照相以留念，竟被指责为拍摄“军事设施”而遭判刑。武汉长江大桥都可以让人随心所欲拍摄，这条没有任何标志的小桥怎么一下子成了“军事设施”，法律何在？公理何在？对这些，庄世平有多痛心呀！因此，几乎与国门打开同时，他就开始就边检海关人员的粗暴态度和低下效率，频频向中央、省及有关部门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其言辞的恳切，其不厌其烦的程度，为一般人所少见。

1982 年年初在汕头召开的有省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特区工作会议上，他慷慨陈词：“国门打开了，本是好事。但如果国门是令人厌恶生畏的，开它何益！这比关起来不要脏人耳目不是更好！有些人连人家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头发都要管，这本身就违法悖理！留长头发就是阿飞了？那么，天安门广场上悬挂的、留长头发的恩格斯画像，你敢说那是阿飞么？绝对不敢!”几句话已表达了他愤懑不平和恨铁不成钢的情感。到后来，由于放心不下，对于影响大的侨领或实业家，人家还未开口，他就主动提出陪同回国的方案。有的人不仅陪同一次，甚至陪上两次、三次、四次……谢奕初正是他热情的相邀和引导，仔细考察了国内许多地方，终于在汕头特区还未正式成立时就在汕头建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地毯厂，随后又在深圳和汕头建起了独资的饲料厂。此后，谢老先生以至他的儿子对国内的投资热情有增无减，在各地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达数十家。

1983 年年初，经庄世平再三介绍动员，土改时家庭被划为地主且已离家出走四十多年的香港潮州商会会长、著名实业家刘世仁终于决定由庄世平陪同，回家乡和汕头特区看看。庄世平和刘世仁是在爱国的旗帜下相识相知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潮州商会做为香港潮人最具规模、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之一，但抱着在商言商、对政治不闻不问的态度。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刘世仁担任会长之后，立即树立起爱国的旗帜，鲜明地成为香港一股不可小视的进步力量。像国庆一类的重要节日，商会都要高挂五星红旗，都要举行酒会一类的庆祝活动；对祖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也抱着强烈的乐观其成的积极态度。刘世仁是因为残酷的阶级斗争斗怕了，才把烫热的爱国之心冷却下来。庄世平立即把信息反馈给刘峰，并希望以特区或市的有关部门的名义发出正式邀请，力争刘世仁组织强大的工商阵容莅汕，以求有更加广泛的影响。不久，汕头特区和汕头市工商联的联合邀请书送到刘世仁的手上。对家乡的盛情呼唤，刘世仁顿感一种受到承认的人生价值，一种回归母体的自豪。果然，他马上找到庄世平，说：“与其静悄悄地回去，不如大张旗鼓把香港的潮籍有成之士都组织起来，风风光光地在家乡热闹一番。家乡看得起我们，我们也要为家乡添光加彩。”这当然是庄世平所渴望的。于是，经过两人紧锣密鼓的串连组织，一个以刘世仁为团长，以宋裔德、罗道德、杨文波、张中阱为副团长，以庄世平、李春融、陈复礼、陈维信、庄静庵为顾问，人数达 73 人的阵容庞大的潮属工商界观光团于 1983 年 2 月 20 日抵达汕头。由于观光团集工、商、金融、文化等各行各业于一体，在汕头长达九天，庄世平亲自审定过问各种安排；观光团不仅深入汕头特区考察，还在市内以至一些县镇参观访问，影响及至方方面面。而观光团的许多成员有感于家乡人民的热情和祖国新时期政策的英明，在 3 月 1 日离汕时已明确表示了捐赠或投资的意向。

泰国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不仅经济实力在泰国以至东南亚屈指可数，还是个资深的社会活动家。可惜由于有着和刘世仁一样的遭遇，望乡思归的念头早已淡薄。庄世平以国内有关部门的名义向他发出回国邀请的同时，特地向汕头市以及陈弼臣家乡潮阳县（今潮阳区）传去信息，希望共同做好工作，并特别提示要察看陈弼臣的祖

屋祖坟，如有损坏，应及时修缮。华侨有特别看重祖居祖坟的习俗，因为这是他们赖以和内地联系的根。庄世平第一次转达了国内有关部门的邀请后，虽然陈弼臣和他早有往来，印象很好，但仍有些踌躇，所以一声不吭，不置可否。于是，庄世平又一而再地介绍内地情况，而这时国内有关部门的信息也传到了陈弼臣的耳里。当他听到祖居完好，有关部门甚至正在修缮他的已经破损的祖坟，不由怦然心动。但是，他仍有顾虑。庄世平于是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串回国回乡的人士的名字，并叙说了这些人在家乡受到的礼遇，说："百闻不如一见，家乡正在变化，我们一起回去看看吧。"陈弼臣这下不能不表态了："那就悄悄回去一趟吧，千万别声张。"可惜像他这样的人物，要静悄悄行动也难，儿子媳妇孙子加上几个心腹好友，已是浩浩荡荡的二十三人。而庄世平也早已向汕头发出信息，提示要隆重接待。于是，当 1983 年 11 月 13 日陈弼臣一行飞抵汕头，有关部门以及家乡潮阳的政要乡亲早已在机坪迎候，电视台派出专人拍了新闻。开始在汕头参观时，陈弼臣总是点头微笑，不轻易开口说话表态。到了家乡潮阳峡山镇，居然出现上千学生鼓乐齐鸣吹奏迎宾曲、上万群众夹道欢迎的盛大场面，这位海外游子终于禁不住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当看到祖居和祖坟完好无损、焕然一新时，他激动之余，深感家乡的巨大变化，当下就向峡山镇的负责人表示：捐建一座中学！款项不下于二百万元。由他捐建的峡山中学，气势非凡，在当时国内同等学校中首屈一指；十几栋现代化的教学楼、宿舍楼，一律用他的先祖先贤、以及儿子媳妇的名字命名。深知内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是老人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明意识的刻意传递。他要告诉儿孙们：这里是我生命的根，也是你们生命之源，切记，切记！后来回到汕头特区，他集几十年搞经济的经验所提出的意见，如流水般涓涓汇入特区创办者的心里，成了创办特区的很好借鉴。1985 年年初，陈弼臣再次回乡，庄世平这一次邀上了廖烈文、庄静庵等知名人士相陪。同年 1 月 21 日下午，正在汕头特区视察的万里副总理在汕头特区亲切接见了庄世平、陈弼臣等人。



1991年，李鹏总理在北京接见以庄世平为团长的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赴东北视察员

谢奕初、刘世仁、陈弼臣、廖烈文、庄静庵等侨领和知名人士的到来捐建、投资、访问，表明了广大侨胞对祖国的热爱，同时提高了中国特区的知名度，增强了海外对特区投资的信心。

对侨领是这样，对一般的外商，庄世平也是尽力做到亲躬亲为，随时为之排忧解难，竭诚推进特区的建设和发展。菲律宾一位姓林的侨商来特区合办良种瘦肉猪场，第一批种猪从欧洲空运到香港，再从香港用车准备运入内地时，在边境被动植物检查部门卡住了。这些猪由于长时间空运转运，确实显得疲态异常，傻里傻气，中方由此断定这些种猪得了什么病。可惜查来查去，就是说不出个病因病理，最后只好说这是一种潜伏的少见病毒，强要林老板把猪运回去。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又说不出什么病，林老板当然拒绝将猪运回。他搞了个折中，请求将猪就近在边境养起来，经观察无病，则放行；如有病，或运回，或就地埋了。我方人员一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要埋现在就埋！"甚至就有人动脚动手起来，真像要挖坑埋猪的样子。这架势，吓得林老板就要跪下，泪也流了："要埋猪，你们先埋我好了！"从中午一直争执到下午近四点，林老板赶紧向庄世平打去电话。庄世平一听，急切切赶来，先是向检查人员解释。可惜，任庄世平说得口干舌燥，检查人员仍铁板一块，认死理不放行。最后，庄世平找到省、市有关部门，才使问题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

当晚十一点多，庄世平回到家里，愤愤难平，立即给北京有关部门写信："……从这批猪的问题，已突出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和愚昧野蛮作风……世界各国在动植物检查管理上都有严格规定，但同时都有一定的限定和变通的办法。我们也应当讲究科学，讲究变通。如果只是铁板一块，开放的道路就会被自己堵住……"

也正是庄世平的支持，国内有关部门的关注，使林老板虽感到在国内投资还存在许多困难，但更感到中国开放政策所产生的光明前景。后来，他又在宝安创办了一个大型猪场，促进了中国畜牧业的发展。

新加坡一位姓罗的侨商，曾为新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为国家在国际上购买了石油探井等设备，为新中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汕头特区初创时，他在庄世平陪同下前来考察。在汕头东面珠池肚的一片临海滩涂上，他提出垒筑海堤，从堤外采用现代化的"吹填"办法抽沙填土，营造一块崭新的土地来建设特区。这个当时极具科技含量的方法，对解决潮汕地区人多地少的实际困难也有着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可是，为了查清海底地质，当有关人员向汕头海军某部要求借用"海纹图"时，部队方面却以"军事机密"而拒绝了。无奈之下他和庄世平只好另辟蹊径，到香港重新想办法，结果很容易就从国外有关方面找到了汕头海域的"海纹图"。他们对"海纹图"作了深入研究，在重回汕头时特地将找来的"海纹图"送给了海军某部。曾有消息反馈，他们送去的"海纹图"比海军的"海纹图"还要精细！后来，抽沙填土的方案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实施，但庄世平和罗先生无疑为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信息和经验。20 世纪 90 年代始，汕头终于迈出了向海洋要土地的步伐。在汕头投资没有成功，罗先生又在北京投资了一家上亿美元的酒店。然而麻烦事仍然不断，一次，他从香港坐船到广州，在华侨大厦和中国侨办一位副主任谈完工作，于当天赶回码头准备出境，翌日在港搭飞机去美国。可惜他忘记在护照副页上请华侨大厦盖章，海关硬卡住不让出境。罗老板对海关说："我经常出入于此，是什么人，和什么人联系，你们也知道。"本是一句通融的话，但海关人员说："你别拿来头吓我们！"连中国侨办副主任打电话请求甚至亲自到码头作证也无效。浪费了船票和飞机票不说，

更浪费了宝贵时间。他回到香港和庄世平谈起这件事，两人不禁为此唏嘘不已，感慨万分。

于是，庄世平在1984年全国人代会期间，以议案形式提出了问题，并再一次给国务院写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实行多次往返的护照制度已刻不容缓。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已实行免签证出入境，即使我们这样做也并非先进……从另一个侧面看，也反映了我方工作人员办事欠灵活、死板僵化的官僚作风……”就此问题，庄世平一次次向各级部门或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建议、批评、议案、提案。1985年，他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有关部门终于向来华投资的外商颁发多次性往返护照。而出入境时，各种手续也在迅速简化，开关时间延长，开放口岸增多，办事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除了火车等交通设施不断投入巨资，多次提速并增加车次，还增加了港商自驾车自由往返的项目。过去从香港到内地一段短短的畏途，如今一路通畅。

下面，我们将按汕头特区的发展时间顺序，就庄世平在特区的大事活动，作简略的介绍——

1983年年初，汕头特区中外合资蛋粉厂签约生效，中方迅速将二百多万美元作为合资金额汇入中国银行。然而，迟迟不见港方签约人落实港方资金。经了解，签约人在资信以至经营上有蒙骗等行为，不可靠。为了解除协约，并取回二百多万美元的抵押金，庄世平三次来汕商讨对策，两次上北京解释，并在港做好善后工作，才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避免了特区的一次大损失。

1983年8月12日，汕头特区管委会主任刘峰率领考察团赴港，作为期十天的考察访问。庄世平和众多知名潮籍侨胞前往车站迎接。在港的一切活动安排，庄世平都亲自组织参与。因此，出席特区招待酒会的一百多名中外来宾，无一缺席，盛况空前。随后，考察团拜会李嘉诚、庄静庵、刘世仁、廖烈文等知名人士和有关社团，并参观部分工商企业，庄世平一一陪同。这次考察，加深了认识，增进了友谊，并为特区带回了一批协议投资项目，打开了特区建设的局面。

为了加强汕头特区对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沟通和联系，发展特区本身的外向型企业，1984年6月30日，汕头特区在香港成立了粤东发展有限公司和联络部。公司和联络部的地点选择，得到庄世平的指点帮助，购买楼宇的资金绝大部分由他出面贷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有关规定，为了动员海外广大潮籍知名人士为特区出谋献策，由庄世平根据香港实际，深入考虑了各个经济领域的代表人物，选定21人作为汕头特区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批顾问。1984年9月6日，汕头特区顾委会副主任倪克屏专程带队前往香港，郑重地向第一批顾问发送聘书，同时聘请庄世平为特区顾委会主任。每届顾问任期四年，每两个月聚会活动一次；每次的活动议题由庄世平与特区商讨之后确定；每次的活动经费采取顾问轮流做东的形式，尽义务不要特区一分一毫。此后，北京、澳门、加拿大、上海的汕头特区顾问团（组），分别仿效香港的做法，于1985年10月、1988年12月、1989年8月成立。各地顾委会在沟通各个阶层，争取资金投入，优化投资环境、协助解决各种困难等重要关键问题上，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1985年1月1日由汕头特区航运公司和泰国大众旅游公司（香港）合作经营的汕泰船务有限公司的“龙湖号”豪华客轮正式通航香港，为方便侨胞来往于特区，完善特区的投资环境，开创了新的局面。可惜，1987年年初开始，由于合作双方缺乏沟通，造成许多矛盾，泰方相继在泰国和香港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中方的多种做法。中央和广东省有关部门对此特别关注，国内外舆论纷纷，汕头特区的信誉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庄世平始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既动员香港顾问团的成员通过各种关系疏通制和，自己更多次往返于香港、汕头、泰国三个点上，尽其所能把中泰双方最终拉到一张桌面上，心平气和地坦露观点看法，使一场眼看是暴风骤雨式的矛盾，化解于亲情乡情的谈笑之间。舆论界后来把这场纠纷的烟灭灰飞归结于“双方最大的克制”，但又有谁知道，有多少人为此花下了多少心血和精力，耗去了多少个不眠的通宵长夜！

从创办特区伊始，庄世平就针对汕头飞机场属军用，体制和规模都难以适应特区与外界的大量联系，广汕公路更是狭小破损，无法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等交通问题，调动各方力量，以建议、报告、议案、提案各种形式，上到中央，下到省、市各有关部门，寻找各种有效渠道，努力改善汕头特区以至整个潮汕地区与外界的交通条件。每次全国人大召开时，为了达到30人联合才能提出议案，庄世平总要东奔西走，乐此不疲。这些努力，自然得到了上级的极大关注。1986年初，胡启立、田纪云等中央领导人视察汕头特区，对这里和外界联系的交通条件深有同感，一举决定扩建汕头飞机场。翌年，飞机场扩建完工，从只能飞几十人的小型客机到能飞波音各类大型飞机，承运能力大大加强。不久，汕头到香港实现包机通航，庄世平率领首航的香港观光团飞抵汕头，共享这一长期努力的丰硕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广梅汕铁路、广汕公路、汕头至深圳汽车专用公路（次高速公路）分别立项并先后动工。已于1992年底建成的广汕公路为二级四车道水泥路，过去从汕头往广州需十二小时以上，一下子仅八个钟头就足够了；1996年深汕高速公路连接广深高速公路后，如今只要五个钟头就行了；广梅汕铁路也于1995年铺达汕头。

诚然，汕头机场毕竟是军用机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它绝对满足不了潮汕地区长远的空中客运的需要。为此，庄世平和潮汕地区的政府官员林兴胜、陈燕发、陈远睦、陈喜臣等，高瞻远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为潮汕大型的客运机场筹谋划策。1989年，庄世平的家乡普宁市根据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曾在赤岗镇的英歌山下修过一个简易机场——近三百米的跑道至今还横卧在杂草野岭之中，决定在此基础上修建大型客运机场，填补潮汕空中交通的一大空白。庄世平力推这项决定，县委县政府也为此做了总动员，并做了多方的协调沟通。至1993年，国家民航总局本来已作了前期勘探和论证的指示，可惜因为军事上的原因，最终不了了之。但庄世平和潮汕的实干家们并不死心，经多方踏勘，又把目光锁定在离潮汕三市各二十公里远的揭东县炮台镇范围内，同时对当地的土地使用实行十分严格的控制。潮汕机场建设项目于1999年获得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立项，2011年建成通航，整个机场占地面积达5082亩。在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先驱们未雨绸缪，怎么还有这么一大片完整的土地用于机场的建设！至此，潮汕地区形成了海陆空极为便捷的交通体系。

从1987年开始，汕头每年都举行旨在加强海内外潮人联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通各种信息、洽谈投资的迎春联欢节。每次，庄世平都率香港庞大的观光团前来参加，既增强了海内外老朋友的情谊，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为新一代侨胞认同和服务祖国家乡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信息交流，提供向特区投资的意向和渠道。

由于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采取“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因而在一些有条件高速发展的地区，却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汕头特区创办的前几年，资金的紧缺就严重制约了发展的速度。能不能自身筹集更多的资金呢？庄世平和特区管委会的领



2000年2月24日在普宁市为庄世平90岁寿辰举行的宴会上，各界人士纷纷向庄老祝寿

导们经过调查研究，都响亮地做了回答：能！大片大片的土地就在眼前，我们为什么不能向香港学习，实行土地有偿出让、有偿使用呢？土地一旦有了本身的交换价值，不是也同时开通了一条新的巨大的财源和税收渠道么！不是说特区要特办么？不是说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么？那么，就从土地有偿使用这一项来做突破吧。于是，庄世平立即行动，四处搜罗，带回了一整套香港土地管理的资料。接着，他把香港厂商会会长、立法局议员倪少杰请来了，具体讲解土地有偿使用的立法程序和具体管理。

随后，庄世平把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的行长也请来，介绍了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特别是在深圳开展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的做法和经验……经过请示上级领导部门和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988 年 6 月 1 日，汕头特区管委会终于批准公布了《汕头特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试行方案》，并开始在龙湖片区试行实施。为了支持这项触及根本理论和观点的重大改革，庄世平还和许多香港顾问积极参与到特区土地的成片开发。此后，汕头特区房地产开发进入佳境，并带动了老市区以至潮汕各县，有关的法规也趋于完善。1989 年 1 月 18 日，汕头市人民政府颁布《汕头经济特区土地管理规定》和《汕头市市辖区、汕头经济特区征地补偿暂行规定》，7 月 25 日汕头特区管委会颁布《汕头经济特区房地产交易暂行办法》；1990 年 4 月 24 日，汕头特区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联合颁发首批特区房地产权证……这些法规连同其他特区和地方的做法和经验，终于孕育出 1991 年 5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广东省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沉默的土地，在共和国的法典里，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从此成为极具价值之宝。

自 1980 年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创办了分行，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和国内一些地方也强烈要求庄世平前去创办分行或办事处，完善投资环境。庄世平除了让南商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之外，考虑到人员的配搭，更考虑到香港中资银行众多，中资和内地是一家，内地的业务应有合理的分工，决心促使更多的中资银行回内地创办分行或办事处。于是，经金融界同仁的多方努力，终于使集友银行和华侨商业银行顺利地分别在厦门、汕头先后设置了分行。随着 1991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汕头特区第二次扩大范围（第一次是在 1984 年 11 月，范围扩大至 52.6 平方公里），香港的廖创兴银行、泰国的盘谷银行和泰国泰华国际银行在汕头设立或创办了分行、总行。

庄世平和泰国泰中促进投资贸易商会主席李景河的联系原来并不多，庄世平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泰国为普宁华侨医院进行募捐时才认识。李景河感于庄世平的平易近人和坦荡爽直，多次前往请教在中国的各种投资事项。后来，李景河决定在汕头创办泰华国际银行的同时，打算让儿子到汕头主持银行的工作，然而又恐怕在英美留过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儿子因银行初办时业务太少，而荒疏了学业。庄世平获知消息，把他儿子介绍给汕头大学，让其一边工作一边教书，使所学的知识巩固下来。泰国的泰华国际银行把总行设在中国境内，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和赞赏，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已得到极大的完善并正受到广大外商的关注和欢迎，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金融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汕头特区的投资环境日臻完善，外向型经济踏上新的台阶。

1991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批准汕头特区范围从 52.6 平方公里扩大到 234 平方公里，同年 11 月 1 日实施。

1991 年 11 月，在汕头市创办特区十周年和扩大特区区域的庆典座谈会上，面对汕头老市区并入特区，还要带动潮阳、澄海、南澳三县，深思远虑的庄世平发表了真知灼见的讲话。其中的两点，不啻是苦口良药：

……是新特区化老特区，还是老特区促新特区，是特区扩大后的大问题。老特区在机构改革，减少层次，精简人员，提高效率等方面已形成一整套制度，收到了众人皆知的好效果。我们愿意看到这种优良的新机制得到继续发扬光大。

……潮汕变成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汕头特区能不能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暂且不说，但至少应成为潮汕的窗口。行政上分开了，但大潮汕互相联系、互为支持的传统不能丢！不能搞“三国鼎立”，应搞“桃园三结义”。

当许多人陶醉于成为“特区人”的欢呼声中，庄世平的告诫也许有点忠言逆耳。然而，对于一个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了六十多年的老人，关键时刻敢于开诚坦言恰恰出于他美好理想和神圣使命的一种必然。

他的真知灼见，历史将予以证明。

历史，也必将记下他和许许多多的特区创业者所创下的功绩。

魂系中华

作为一个坚毅的民族主义者，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庄世平的奉献当然不止一个地区。他的胸怀所及，属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内地的极“左”思潮还十分根深蒂固，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得到转变，经济生活仍十分贫困。于是，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十分强烈，对尽快走向富裕有着热切的期望。摆在各级领导人眼前的难题是：经济建设要尽快搞上去，但大量的资金去哪里找呢？为此，庄世平无不殚精竭虑，四处筹划，同时又不能不处处小心，谨慎行事，唯恐刚刚走向开放的各级领导误入形形色色的金融陷阱。十分幸运，由于海外工作的关系，庄世平本来极少写信，但我们仍然找到他 1980 年 5 月写给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的信：

南生同志：

关于国外财团拟贷款五亿美元给广东省事，上星期我行荣副理赴穗之便，我曾让她转告对此项贷款之意见，荣副理回来后，我们对此事再加以认真研究。昨晚 10 点半和今早 7 点 45 分，我曾两次挂长途电话 (78630) 找你，两次电话虽打通，但没有人接电话。故只好函告如下：

1. 贷款之事。建议省里首先要考虑对这笔贷款要有具体安排用途，因借款成本较高，应力争于短期内能用出去。只要对建设或投资生产有利，短期内（如在一年以内）能把资全用出安排在生产建设上，这样借进外资是可以的。

2. 贷款金额。建议需要多少借多少为宜，如对方仍坚持借出五亿，在此种情况下，我方如确有需要，为照顾双方利益，使对方手续费收入不会太少，建议我方借款最多不超过三亿元，其中两亿元由省里自己用；一亿元可以转给我行使用。对省里自己用的两亿资金，在短期内未用的小部分，可以委托我行转出套息，但数目不宜过多。

3. 借款年期。最长为十年。

4. 利息。包括手续费在内，争取年息八厘半，最高不超过九厘为宜。因目前欧洲美元存款利息日趋下降，美国贷款优惠息最近由 20 厘降至 17 厘；今天美元存款利息一年期为 10.875 厘，6 个月 11.0625 厘，3 个月 11.1875 厘。另在欧洲银行美元存款最长为五年期，其利率目前只有 11.325 厘，长期资金趋势看跌。

5. 本息偿付办法：拟息随本减即分期付款的办法为好。以上意见供参考。

世平　鉴启

1980 年 5 月 8 日

文如其人，信写得朴实无华。但势之迫，情之切，言之慎，却无不溢于字里行间。至于资金如何筹措和处置，他更像一位诲人不倦的长者，其精算，其稳妥，无不令人折服。在资金引进这一点上，他无疑是一位勤奋而又无微不至的掘井人，是一位勇敢而又义无反顾的捐血人。

1985 年年底，汕头市男女篮球队在汕头市委副书记陈厚实的带领下，赴港参加友谊比赛，庄世平不仅率潮籍侨领乡彦前往车站迎接献花，并亲临球场为家乡的球队助威鼓劲。有感于汕头市男女篮球队这次出访的良好成绩（取得邀请赛第二名），庄世平和叶庆忠、陈才燕、许伟、廖烈科、陈伟等侨领深为潮汕地区于今未有一座现代化体育馆而惭愧，一致向陈厚实提出在汕头兴建体育馆的建议，并表示大力支持。此建议立即受到汕头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不久就成立了筹建委员会。可惜，1986 年年底以后一段长时间，香港股市大跌，部分潮籍实业家经济出现困难。1987 年 10 月，汕头市副市长陈远睦为此前往香港宣募，面对萧条的经济形势，宣募的话难以说出口来。香港潮州商会会长刘世仁见况，指点迷津说：“请庄老出来吧。成立一个机构，庄老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他掌舵，我跑腿，不信搞不成体育馆。”于是，香港潮人助捐潮汕体育馆委员会成立，庄世平任主任，刘世仁、廖烈科、叶庆忠、马松深等乡贤任副主任，宣募工作深入香港潮人的每一个角落。随后，又由于“六四”风波，宣募工作出现困难，一些侨胞观望不前；再因为国内建材价格不断上涨，体育馆从原计划投资 500 万元，不断增加投资预算，从 800 万、1200 万、1500 万一直提到 2000 多万，难度更大。为此，庄世平和助捐委员会的成员多次策划组织，具体分工做重要人物的工作，劝捐工作得到了潮籍侨胞的拥护。其中，李嘉诚、林伯欣两位潮籍富商名士各捐资 200 万港币以上，廖烈科捐 100 万，刘世仁捐 100 万，马松深捐 100 万；其他捐出几十万、几万、几千的潮人，则难以胜数。最后，共捐集达 2000 万港币。

1990 年元宵，耗资 2600 万币人民币、建筑面积 8230 平方米、可容 3888 名观众的潮汕体育馆终于落成。随后，盛事接踵而至，第四届潮汕迎春联欢节开幕式、广东省第七届全运会开幕式、汕头特区十周年暨扩大范围庆典都在潮汕体育馆举行。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不仅出席了汕头特区十周年暨扩大范围的庆典大会，还在体育馆会客厅会见了海外各地侨领、知名人士、著名实业家。庄世平接受会见之后，抚摸着体育馆的梁柱座椅，感慨万千。联想到潮汕从此结束没有体育馆的历史，今后的体育文化事业将因此而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他不由展露出了舒心的微笑。



2004年7月，第七次全国华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庄世平连任全国侨联副主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与庄世平亲切握手



1992年11月在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广州分行开业典礼宴会上，庄世平与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欢谈

也许是为了圆回自己早年热心体育、有志当一名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梦想，庄世平考虑到普宁的篮球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拥有一批技术骨干。20世纪50年代末普宁篮球队曾打遍大江南北同级球队而无敌手，后与全国甲级劲旅八一队交手也仅以小比分败落，虽败犹荣。为发扬这光荣传统，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就联络海外侨胞，耗巨资在家乡组织“华侨杯”篮球邀请赛，每年举行一次，邀请全国各大城市的篮球劲旅参加。每次，庄世平都亲自观看重要赛事，为优胜者颁奖。对普宁重振篮球运动雄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1987年年初，香港立法局议员、知名潮籍实业家詹培忠和庄世平商讨后，决定将“华侨杯”篮球邀请赛扩大到整个潮汕，一年一届，由各县市轮流主持赛事。每年赛事既可以是各县市代表队，也可以是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各县市中学尖子队，并更名为“世平杯”“培忠杯”男女篮球邀请赛。同年底，第一届“世平杯”“培忠杯”篮球邀请赛在普宁鸣金开幕。第二届在澄海，第三届在揭阳，第四届在饶平，第五届在汕头……每一届庄世平都出席重要赛事，发表激励讲话，为优胜者颁奖，表现了振兴潮汕篮球运动的强烈愿望。1989年元旦，第三届“世平杯”“培忠杯”篮球邀请赛将于晚上在揭阳决赛，并举行闭幕式。当天上午八时，庄世平和詹培忠在汕头市委负责人的陪同下，前往潮州市，与该市侨务办公室负责人商谈由詹培忠捐资120万港元在家乡建设一间学校的事宜。午饭后，潮州市委的负责人闻讯赶来，又交谈了一些工作。下午，赶到揭阳匆匆吃完晚饭，就出席了决赛和闭幕式。

当晚，揭阳代表队在几千观众呐喊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气势如虹，勇夺冠军。庄世平在闭幕式上讲话和颁奖时，体育场外已是鞭炮齐鸣，为主队的获胜而庆贺欢呼。由于庄世平是第一次莅临揭阳，且他在经济工作中的丰富经验和卓绝贡献，揭阳县党政负责人和许多群众是多么希望他能留下来，或到各处看看，指导他们的工作。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天气寒冷，北风凛冽，公路正在拓宽，崎岖不平。可是，庄世平早已和汕头市党政领导人约好，晚上不管多晚都将一起讨论商议汕头大学的建设和其他重要工作。于是，汽车开来了，庄世平仅和揭阳县负责人相约不久重来补饮庆功酒，就在体育场外登车返汕。一路颠簸，回到汕头国贸大厦，已是凌晨一时多。汕头市党政负责人不忍心年近八旬的庄老过于劳累，意欲翌日商讨工作，但庄世平执意会议立即开始。商讨完工作，已是凌晨三点多钟，黎明在即了。

在庄世平的奋斗生涯中，这样的工作日程，难以数计。

1990年2月，鉴于庄世平在汕头市做出的重大贡献，汕头市人民政府授予庄世平“荣誉市民”称号，赠予金锁匙一把。

新加坡著名华侨实业家罗新权经调查研究，在庄世平大笔贷款的支持下，在北京离首都机场不远的地方投资了“丽都大酒店”。国家刚开放，服务行业的配套至关重要，他的这一思路应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建设和开业之初，各种困难和麻烦就接踵而来。不说申报手续的冗长繁杂，单是场地上三棵影响建筑的松树，有关部门借保护林木之名硬是不准砍倒，致使酒店迟迟尤法开工……后来，尽管酒店地处机场路边，但知者甚少，于是在路边设置了一个指引的标志，可是又有部门出来干涉，美其名“通往机场的道路不准设置商业性的标志”而限令拆除。罗新权面对这些不合理的禁令，虽多次申诉但都不得要领。这些，不能不使他对在国内的投资感到心怯。每每路过香港，他都要向庄世平诉苦一番。

不论是在香港，或到北京，庄世平对丽都大酒店的发展都极为关注。对这位爱国侨商的任何一点伤害，都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沾污抹黑呀！

因此，酒店碰到的任何困难和麻烦，无论巨细，他只要知道，都挺身而出予以帮助解决，有时候，他连夜给有关部门写信、打电话；有时候，他乘北京市的领导来港办事，当面反映情况。北京市市长林乎加访问日本途经香港，仅停留不到一天的时间，竟让庄世平找到，谈论的仍是丽都大酒店的事情。而更多的时候，是庄世平亲往北京，向有关部门面陈酒店的困难。好多次，习惯于红头文件的有关部门也无法解决问题，庄世平只好请出林乎加，召集有关人员和他一起吃饭，在饭桌上摆情况提意见，最后由林乎加拍板解决。正是庄世平的努力，丽都大酒店这个在开放之初就创办的服务性外资项目，才得以生存和快速发展，成为北京市引进外资的一个样板。像以上这样的事迹，几乎不胜枚举。



2004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会见香港侨界访京团，与庄世平亲切握手

大连市的富利华酒店，得到庄世平主持的南洋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

杭州市的黄龙酒店，得到庄世平主持的南洋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贷款额一再追加。

天津市的汽车轮胎厂由他引进，并得到他的贷款支持。

汕头市第一座高达 26 层的四星级国际大酒店——国贸酒店，建设过程中资金难以为继，得到他的贷款支持；酒店开业之后，邀请香港利园集团给予现代化管理，使汕头酒店业的管理水平提高到新的更高的层次。

汕头超声印刷制版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精技术型的合资企业，1985 年由他引进后，经济效益一直十分显著。

惠州市著名的 TCL 电子集团在初创时，资金十分困难，庄世平率南洋商业银行予以巨额的贷款支持。

1993 年年底，湛江市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水灾，26 万群众被洪水围困，其中有 7.8 万人被围困了三天三夜，灾后生产和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庄世平对灾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四处奔走募捐，仅三天就为灾区筹得了 1200 多万元的赈灾款。随后，在他的动员下，香港的慈善机构也纷纷前往灾区，带去灾民急需的大米、棉被和衣物，留下一片爱心。1996 年秋，该市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台风，庄世平再次伸出援手，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他出任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副会长，不仅时刻关注中国年轻一代的成长，还多次协助筹资支持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入学就读。

他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为基金会在港创办贸易公事，创造利润，致力于扶持贫困地区的人民脱贫致富。

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启迪了多少人的心扉，结下了多少丰硕的果实。

他多次代表国家有关部门出访，赢得了国家利益，增进了中国和各国各地区的友谊。单 20 世纪 5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他就出访越南两次。由于他在越南抗法救国时期就具体负担援越重任，对增进中越人民的友谊，对恢复两国政府的正常关系，都起到极大的作用。

对原泰国总理比里一家的关注和关怀，体现了庄世平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怀和精神。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任泰国总理的比里，对中国人民一直怀着十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广州和北京生活，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才离开。他的三女儿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中文，离开中国前往巴黎教授中文期间仍多次到中国访问，并在许多国际场合为维护中国的形象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辩论。

然而，尽管他在共和国的大地上肩托起一座座大厦，肩负起一项项重任，但谁能知道：在各地繁忙的国事商务中，他几乎都用双手自己洗衣服。他的一身穿着几乎没有一件名牌，戴在手上的是已购置了二十几年、极普通极廉价的“精工表”。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尽管他的事业如初升的骄阳，南洋商业银行的发展蒸蒸日上，但他舍不得购买一辆专车，上班下班一律步行或搭电车。如今的住房仍是三十年前香港中国银行分配的宿舍，充其量也仅一百平方米出头，而客厅的空调还是 1995 年年末才安上的。直到今日，只要不涉及外事活动，不论是带团出访考察，或是外出洽谈商务，甚至是上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大会、中国银行董事会，他总是搭乘飞机的普通舱，绝不为一两个小时的舒服而多花国家的钱财。这在香港同一层次的人士中，绝无仅有！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香港经济金融界发生了强烈动荡，房地产出现危机，多家银行遭受挤兑，个别银行倒闭。由著名侨领陈嘉庚集股创办的香港集友银行由于经营不善也在动荡中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甚至，已有外资银行决定收购集友银行的传言。紧急之中，集友银行只好向中国银行发出注资援助的请求。一直深为陈嘉庚兴学育才、仗义爱国的行为所激励的庄世平，不能不为此而动。从中国银行的最高层到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直至周恩来总理，他都为这件事建言献策，披肝沥胆。在他的帮助下，终于使香港中国银行向集友银行注入巨额资金，把集友银行从危困中解救出来。从此，中国银行成为集友银行的大股东，集友银行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营方法灵活稳妥。中银机构这一行动连陈嘉庚当时的亲属后代也深为感激。

然而，二十年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围绕着集友银行当年被收购一事竟空穴来风，掀起大波。陈嘉庚先生的个别亲属眼看香港金融市场走势强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散布不实之辞，否认当年中国银行巨额注资集友银行，并成为集友银行的大股东的历史状况和实际情况。为此不仅搞得香港舆论沸沸扬扬，而且直捅到北京的中央有关部门，令不知情者将信将疑。中央有关部门派专人赴港调查此事。庄世平为此据理力争，力陈当时中国银行注资集友银行的真实情况。可是，不仅有些人偏听偏信，有关部门甚至有做出倾向于闹事一方的决议的趋向。为此，1991 年 3 月，庄世平联系到原在集友银行任职、当年收购过程的见证人、全国政协常委黄克立专程赴京，不辞劳苦一而再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还联合向李鹏总理写信，陈述历史事实，提



1990年，庄世平率团在北京参加亚军会，同马万祺夫妇、曹宏威夫妇合影

出妥善解决的办法。李鹏总理对信中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视，不久，亲自接见了庄世平和黄克立，详细听取了他们的具体意见。随后，李鹏总理亲自参与这事的处理，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使这宗年代久远的历史悬案得到了公正的裁决。

庄世平坚持原则，公平公正处理这件历史悬案的行动，又一次博得了人们的敬仰和赞扬。

1991 年盛夏，长江流域经长时间大雨倾注，各支流水位高涨，洪水漫过堤围，淹没农田，冲毁农舍，漫浸都市。整个华东地区深受水患之苦，损失巨大。中国民政部首次向全球发出呼吁，期待国际力量施以救援之手。

这是八月初一个热气迫人的夜晚，富有强烈爱国心的著名华人实业家李嘉诚又一次听完了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不由感慨万千，夜不能寐。对中国民政部的赈灾呼吁，他举双手赞赏，从心底里决意要为赈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他又不能不将信将疑，因为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海外曾有多少有识之士要为此献策出力，却被拒于国门之外。如果这一次广播的消息不准确，自己就贸贸然捐钱捐物进行赈灾，难免要将自己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呀！思虑再三，他给庄世平打去电话。

庄世平接到电话，了解了李嘉诚心中的疑虑，蓦地豁然应道：“有关的消息我也听到了，既是中央电台的广播，我认为是不会错的。由此也可以肯定，华东的水灾确实十分严重。”

李嘉诚听了，心结顿时释然：“既然如此，我想多捐一些，希望由此带动全港同胞一同参与赈灾行动。我的赈灾款确定为 5000 万港元，不知您的意见如何？是否应向香港新华社通报一下？”

“很好！我这就向新华社通报。”庄世平顿了顿，又说：“我想还应该尽快在报纸上登载您赈灾行动的消息，这样才能带动全港尽快掀起赈灾的热潮，可以吗？”

“可以。”李嘉诚言犹未尽，又随口问道：“不知香港中银机构有什么赈灾行动？”

“这——”早于 1986 年就在南洋商业银行转为名誉董事长的庄世平，由于不再管理具体事务，对这事并不了解。“估计行动是有的，但具体的捐款数字我还不知道。”

经李嘉诚这一提问，庄世平不由心生疑窦：中银系统的赈灾行动理应在报上发布消息的，为什么默默无声呢？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之处呢？

这天早上，庄世平来到南洋商业银行办公室，向总经理询问了中银系统赈灾的情况。原来，中银香港管理处不久前已召开下属机构的会议，为各机构定下几十万元的赈灾款额。也许是各机构的款额不大，所以未在报纸上宣传公布。庄世平听罢，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赈灾工作热情高涨，香港更是其势如潮的情况，希望总经理增加南洋商业银行的赈灾款额，增强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同胞心目中的声誉和形象。总经理表示同意，马上打电话向管理处汇报。可是，这意见立即遭到有关主管人员“已有组织决定，不能更改”为由加以拒绝，总经理不由面露愧色。站在一旁的庄世平抑捺不住了，径自从总经理手里接过话筒，耐着性子向有关主管人员解释南洋商业银行增加赈灾款额的意义。有关主管人员辩解说：“香港中银系统和华东地区同属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肯定会向华东地区拨款赈灾，而中银系统所赚的钱也是要上缴中央政府的，不必要在此问题上多此一举；中银各机构的赈灾工作，只是表个态而已。”庄世平据理力争道：“中央政府的拨款和中银机构的赈灾捐款完全是两回事。正因为我们和内地完全是血肉相连的整体关系，所以更应该在赈灾工作中带好头，增加赈灾款额，为香港同胞做出榜样。这同时也是消除‘六四’风波在港澳同胞中所产生的影响和误解、在 1997 年即将到来之际表明我们和海内外同胞同舟共济的一个极好机会。”听了庄世平的话，有关主管人员指责说：“你还有组织纪律原则吗？组织的决定怎么能随意更改！”庄世平终于被激起义愤，驳斥道：“我向上级反映情况提意见，犯了哪一条纪律？这完全是我的权利！你不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才是真正的犯了纪律！你不同意南洋商业银行增加赈灾款额，我还要向更上一层的部门反映。”在庄世平的努力推动下，中银各机构也纷纷提出增加赈灾款额的要求。最后，上级终于赞同大家的要求。于是，中银各机构的赈灾款额一下子比原来增加了十倍以上，南洋商业银行的赈灾款达到五百万港元。

强烈的爱心，构成了庄世平的大义大智大勇！

随着李嘉诚为华东赈灾五千万港元以及中银各机构的赈灾具体行动在香港各大报纸上登出，香港的赈灾工作迅速进入高潮，各社会团体纷纷上街募捐，各处商铺无不举行赈灾义卖，连中小学生也背上募捐箱上街宣捐。仅仅一次集全港明星艺员参与的赈灾大献演，就筹集到善款二亿多港元。庄世平的家和办公室成了赈灾询问场所，整天里电话不息，客人不绝。他总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在赈灾方法、捐赠渠道、物资运输等方面，尽其所能地为各方的热心人士提供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想不到一次华东水灾，竟从另一个方面唤起了广大侨胞的血浓于水的强烈爱国心，增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和强盛，从这次赈灾行动中又一次得到证明和体现。

1991 年秋，庄世平带领由香港华资银行高级职员组成的考察团往东北考察途经北京，李鹏总理在百忙中予以接见。对香港同胞在赈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李鹏总理再次给予了热烈的赞赏，并代表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考察团的全体成员，转达对广大侨胞的爱国行动的衷心感谢和亲切问候。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这样评价庄世平：“很念旧，总让朋友感到他就生活在你的身旁。公干之余的聚会，或是一个电话，都成了他维系朋友感情的重要渠道。重要节日的一点点小礼物，比如一张贺年卡、一份挂历，总是记挂在他心头，不仅让人感到他的存在，更让人感受到他的活力和热情。珍惜友情的人，是心理年龄不老的表现，说明他还有很多的追求和向往。”原普宁县委书记林



作者简介

廖琪，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原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原专职副主席，暨南大学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文学创作一级，已出版《廖琪文集》（五卷本）等文学专著五十余种。曾获“中国改革开放文学成就终身奖”“首届全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等奖项。



1988年，在山东威海考察时，庄世平和夫人林影平留影

良孝的评价则另有一番新意：“只要庄老认为这个人对祖国对家乡有用，不论这个人过去对他或他的亲人怎样怎样，或者这个人根本就误解他、鄙视他、冷落他，他都不会放在心里，总是襟怀坦荡地去接近，去沟通。一次去无法接近，二次去无法沟通，他还会去第三次。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让一个八十来岁的老人为着说几句话而跑来跑去难道能够心安？于是，终于面对面坐下了，家乡话说开了，工夫茶喝下了，一切也迎刃而解了。我陪庄老去过泰国、新加坡等地，他就是这样做侨胞的工作，许多的捐赠项目也是这样谈成的。比如泰国的知名巨商张锦程，起初对庄老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有误解，但最终被庄老的真诚所融化，最终为建设普宁职业技术学校捐出了巨款。庄老是真正的朋友遍天下，但像他这样结交朋友要作出多少付出呢？难哪！”一切当然都尽在不言中，如果不是为着国家利益这个大原则，不是为着繁荣家乡这个大前提！我们仿佛触摸到庄世平那颗永远热烫烫的、至死不老的爱心。

1995 年年底，汕头市人民日夜盼望的海湾大桥和深汕高速公路汕头路段终于建成了。为了汕头的海、陆、空交通，庄世平不论在全国人大或政协会议，不论在香港或是北京或是广州，一直给予最为迫切和真切的呼吁。如今，一桥飞架南北，汕头的交通史写下了新的辉煌的一页，国家主席江泽民率中央众多政要南来了，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率广东的众多要员赶来了，潮汕三市党政军的负责人汇聚来了，庄世平和李嘉诚、林伯欣等潮籍海外侨胞庆贺来了。然而，在举行大桥的通车典礼上，在当晚中央电视台以至广东各地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节目中，人们欣喜中不由有些遗憾：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海外侨胞中，居然没有庄世平的位置。庄世平却笑呵呵道：“我这么大年纪，又那么远跑来，就为了争一个位置么？我如果这么想，是自己看轻自己；你们这么想，是小看了我。任何事情，特别是这样有历史意义的大喜事，只要参与了，心里也就无憾了，还有什么可计较的。”说得在场的人再也不好出声了。

1998 年 8 月初，有消息传来：庄世平被列入第三批“深圳荣誉市民”的名单。他是创办特区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第一个提供世界各地创办特区的资料，第一个在城市建设规划上向深圳提供了香港新界建设规划上的有益经验和各种考察便利，第一个为深圳引入了境外银行，支持并挽救了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将特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租界”相联系的时刻挺身而出给予了迎头痛击的，深圳的繁荣无不浸透满他的心血……有人说，即使在深圳为他立一块纪念碑，也不足为过！更有人为他打抱不平，这“荣誉市民”还是第三批的！可是他一点也不为所动，反而说了一番道理：“办特区在中国来说是一项创举，是上至邓小平、下至方方面面千千万万人都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仅仅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如今人家记住了我，我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能去计较第一批还是第三批呢？如果第三批还没有我，你们会不会又要说人家无情无义呢？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能计较，计较便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也伤害了事业。”9 月 28 日上午九时，庄世平高高兴兴地来到深圳，接受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和证书。下午三时整，他又匆匆赶往香港，参加晚上有关部门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49 周年”的活动。

只有时刻将自己当作一粒水珠，大海拥抱了她她才会如此博大精深、豪放轩昂；只有时刻将自己当一把泥土，高山托起了她她才会如此高瞻远瞩、一往无前。早已将自己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并将个人的荣辱利弊置之度外的庄世平，也恰恰因共和国的崛起而高大，因共和国的辉煌而灿烂。

他的名字，将和共和国同在。

陈峰：微藻界的“Steven Chen”

文 《华夏》记者 钟敏仪

2020 年 12 月 1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陈峰又收获了一份荣誉——中国侨联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这个奖项，是祖国对我们这些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的肯定和鼓励。”陈峰说。

数十年来，陈峰潜心微藻研究，早已名扬全球微藻界，在业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尤其是他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利用异养方式规模化高密度培养微藻，以生产高附加值功能性食品成分及藻类生物能源，这一创造性的革新，对微藻的规模化生产影响至深。当有人要涉足微藻领域时，同行常常会建议他们向 Steven Chen（陈峰的英文名）请教。陈峰在微藻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陈峰，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广东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广东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侨联委员。2017 年被科睿唯安评为全球高被引科学家，2018 和 2019 年被爱思唯尔评为中国高被引科学家；申请和获得授权专利 34 项（包括 4 项美国专利和 2 项 PCT 国际专利）；现任 8 个国际学术期刊编委。

不甘平庸，留学深造

从小到大，陈峰都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小时候，他调皮捣蛋，但一直没有拉下功课，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中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扰了学堂的清净，读书不再是正业，班里的同学们都搞起了文艺，只有上午上课，下午都跑去排练。后来，他的一些同学踏入文艺圈，还成了职业音乐人。那个时候的陈峰没有随波逐流，虽然他学了一手好琴艺，但他很清楚，音乐仅仅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他更喜欢读书。刚上高一，他就定下了要考大学的目标。但那个时代的教育体系已被破坏得支离破碎，老师无法系统教导，书籍匮乏，但陈峰依然想方设法自学，终于在 1979 年考上了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喜欢钻研的陈峰选择了应用性强的工科方向——微生物工程专业，因为感觉“很新颖，挺前沿”。

大学毕业后，陈峰被汕头防疫站录用，主要负责食品安全监督。“不用做什么研究，比较清闲的工作。”对于这份不少人艳羡的“闲差”，陈峰却不满足。他初入社会想大展拳脚的激情正被这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安逸消磨着。他感到苦闷，寒窗苦读数载学习到的知识无用武之地，“现实工作与我向往的科研之路离得越来越远，我看不到前景”。在亲友不理解的劝慰声中，陈峰还是辞职了，去了汕头大学当助教。

回归校园，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没有了束缚，陈峰一边教书，一边规划着自己的未来。他很清楚，如果想在科研上有所作为，就有必要去国外历练一番。

有一年暑假，汕头有关部门请了外教培训当地的中学英文老师，活动在汕头大学举办。陈峰得知消息，留在学校与那些中学老师一起跟着外教学英文。一个暑假下来，陈峰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为出国深造做好了准备。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与国外的通讯还不发达，国人了解海外高校的渠道不多。“不像现在，有留学中介，或者打开电脑搜索一下，就能查到全球的留学信息。”陈峰说，他那个时候找出国留学的信息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到省图书馆查阅报刊，一个是找人推荐。幸运的是，陈峰的大学母校有一位老乡郭教授刚好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读博回来。得知陈峰想出国留学，郭教授向他推荐了澳大利亚的 4 所大学。没有电脑，陈峰用打字机打印了 4 封长长的英文自荐信，附上留学申请材料分别邮寄给了那 4 所大学。几周后，陈峰收到了昆士兰大学化学工程系、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物技术系的录取通知书，“他们都愿意给我奖学金”。陈峰最终选择了昆士兰大学，因为昆士兰大学化学工程系是澳大利亚数一数二的院系。“如果郭教授是留美归来，那我可能就去了美国留学。”陈峰回忆说，那个信息闭塞的



陈峰（前排左三）荣获中国侨联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

年代，可供选择的出国道路很少，他只能抓住当前的机会，选最好的专业去读。

与昆士兰大学化学工程系系主任几次书信沟通商议后，陈峰于 1987 年远渡重洋赴澳大利亚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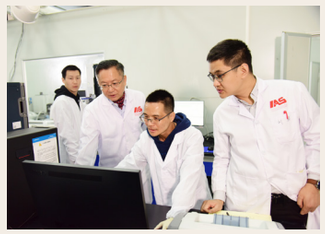
挑战微藻，展露锋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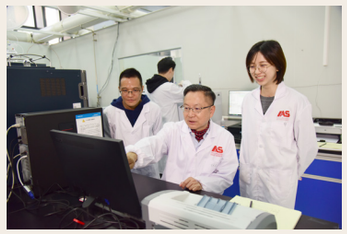
留学期间，陈峰很是勤奋，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导师一般 9 点才到办公室，他总是 8 点半就等在办公室门口，希望导师多给他布置任务。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大学时主修生物工程的陈峰，对微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微藻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单细胞微生浮游植物，存在了几十亿年，分布很广，在陆上、淡水、海洋、土壤、冰山、沙漠中都可以生存。中国对微藻的研究起步较晚，陈峰出国前也仅是在书本上知道这种生物，从未亲眼见过。而国外，尤其是美国，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有比较多的研究，微藻的开发价值很高，在医药、食品、化工、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地球上微藻品种最少有 20 万个，可能多







陈峰在实验室指导博士生及博士后开展研究

“深海里也有微藻，但海的深处，阳光很难照射到，所以微藻培养不一定需要阳光。”通过观察，以及研读大量有关微藻的文献和论文，整理出充分的理论依据，陈峰提出“异养培养”微藻的革新性理念。为证实自己的想法，陈峰做了大量实验。他找人做了一个类似集装箱的密闭式实验空间，无光，温度可控。为了排除光这个因素，陈峰进行的所有实验几乎都是摸黑完成的，只在密闭的发酵罐里添加了葡萄糖作为微藻培养的养分。最终，实验结果证实了陈峰的判断。

陈峰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投给了业内权威杂志《应用藻类学》。满心期待着业界认可的陈峰却收到了拒稿通知，该杂志主编、英国 Durham 大学教授 BrianWhitton 认为微藻不借助光合作用的异养方式是不可行的。

面对业内权威的质疑，陈峰摆出自己的实验数据，最终说服了 Whitton 教授，论文得以发表。多年后，Whitton 教授还专门到香港大学当面邀请陈峰担任其杂志的编委，这是后话。从此，陈峰在世界微藻界展露锋芒。

陈峰提出的异养模式有四大优势：摆脱了传统养殖中对光的限制；所需的能源及碳源以廉价糖类提供，降低成本；在密闭的发酵罐中培养，解决了被其他微生物污染的问题；培养过程中的温度、pH、营养物的供应等都能得到较好的控制，实现高细胞密度培养，从而促使微藻产业从农业提升到生物技术层面，引领和推动微藻的规模化生产。

达 80 万个，目前已知品种近 5 万种。”陈峰说，如果可以大规模培养微藻，带来的价值将不可估量。但当时全球微藻学界都普遍认为，藻类属于自养型植物，即需要在光和二氧化碳的帮助下，通过光合作用才能实现生物合成。“大家通常把微藻当成是植物，如螺旋藻，其普遍的培养方式是养殖于跑道池，以光能作为能源，就跟农户种菜一样。”陈峰说，他在澳大利亚读研究生的时候，学界对微藻培养的认识基本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光合自养培养模式。

喜欢挑战和创新的陈峰，没有止步于业内目前的科研成果，他想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陈峰在大学时期深耕微生物工程领域，对生物发酵研究得很通透。“细菌、酵母菌可以在发酵罐里培养，用糖类作为主要的碳源辅助生长。”触类旁通，陈峰大胆推测：微藻或许也可以用发酵方式培养。

近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微藻异养由于具有可控性更适合工业化生产。目前国内外最成功的微藻生产均属异养的方式。

逐梦前行，勇攀高峰

学成归来，陈峰第一站选择了香港大学。

“当时内地在生物工程等前沿学科的研究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研究条件也比较有限，更缺乏研究氛围。”痴迷微藻研究的陈峰希望能有进一步的突破，恰好东方之珠的香港拥有良好的科研环境。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又先后担任香港大学植物学系主任、生物科学学院执行院长，陈峰在香港大学深耕了十七载，在微藻学界闯出了一方名气。从微藻藻株的分离筛选、生理直到它们在医药、食品、能源等领域的应用，陈峰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迄今已发表 300 多篇 SCI 论文，被引用 25000 余次，学术产出 H 指数达到 85。

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不断提速，内地科研环境日益改善，且有充足的研究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撑，中国对世界高精尖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2011 年，陈峰由国家人才计划引进回到内地，北京大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看好内地广阔的前景和开放的环境，陈峰携家带口赴京上任。凭借着中国最高学府的平台，陈峰大展拳脚，在生物资源工程研究上更上一层楼，将微藻研究做到世界最前沿。

2018 年，陈峰再次逐梦前行，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受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先生之邀，出任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经济最活跃的城市，这里更为宽广的舞台让陈峰更兴奋。

在深圳大学，陈峰继续深入微藻研究，先后创建了“深圳市海洋微生物组工程重点实验室”“深圳大学食品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并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项目在内的 5000 多万元的科研专项，同时将海外和北京大学的先进管理制度引入深圳大学，为科研和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环境保障。

从香港大学到北京大学，再到深圳大学，陈峰初心不变，执着于在微藻事业上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以前我们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学术层面，注重论文发表，错过了很多科研成果的转化。”陈峰说，但在国外，不少教授除了搞学术，同时注重将研究成果产业化，“有的教授甚至是几十家公司的股东。”如今，国内的“产学研”有了更宽容的社会氛围，政府也鼓励有前景的科研成果产业化。这让工科出身的陈峰更加激动，他着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产业化，让研究变得对社会更有价值。

DHA 是人体每天必须摄入的重要营养成分之一，同时也是婴儿奶粉中强制添加的营养素，是缓解心脑血管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功能成分。20 世纪 90 年代末，一种新型 DHA 生产方式出现，即微藻 DHA，所得产品品质远优于传统的鱼油 DHA。该技术被美国马泰克公司垄断，进口至中国的微藻 DHA 油每吨售价约 170 万元。陈峰于 2000 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导创建的润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使得微藻 DHA 油的价格下降至每吨 30 万元。目前，润科是继马泰克公司后全球第二个利用微藻规模化生产高纯度 DHA 藻油的公司，实现了微藻 DHA 在中国的产业化，建立了年产 1000 吨微藻 DHA 生产线。这一技术的突破，造福了中国广大消费者。

陈峰还研究突破了植物不能积累虾青素的瓶颈，将微藻的虾青素合成系统引入到番茄中，首次实现以番茄为细胞工厂高效合成虾青素。这项研究大大推进了微藻基因在农作物中产生功能活性成分的可能性和进度，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攀登科学的高峰，陈峰永不止步。

钟南山产学研团队：“中国制造”的防疫科技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闷在家里的人们在短时间内学会了许多新技能，比如剪头发、擀面条、做女红、自制口罩，等等。不过，在这个“长假”当中，大家学会的最重要的技能，肯定是与疫情有关的生物、医学知识。

什么是核酸检测？病毒、病菌传播有哪些途径？怎么洗手才能洗得最干净？随着新闻频繁播出的疫情知识科普，人们才发现，原来新冠肺炎病毒除了存在于患者体内以外，还可能附着在手机、电脑键盘、门把手、电梯按钮上。一时间，消毒杀菌成了头等大事。人们每天频繁洗手、出门戴口罩自不必说，公共区域大面积的消杀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自 2020 年 2 月 9 日起，武汉全城一天消毒两次。3 月 20 日，蓝天救援队队员身背二氧化氯消毒液，手执双管脉冲弥雾机，对武汉汉口火车站开展消杀工作，视频上传到网络后，有数百万的点击量。

然而，在一些人们甚少关注到的地方，许许多多防疫“黑科技”正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重要。记者采访了钟南山院士产学研团队负责人周荣教授，了解这些防疫“黑科技”背后的故事。

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

2020 年 2 月 18 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何有效预防院内感染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全国医护人员感染数据是 1700 多名，其中不少发生在武汉的医院。在疫情防控的早期，医院成了交叉感染的主要场所之一。”

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钟南山院士产学研团队早就重点关注了这一国际难题。由钟南山院士产学研团队负责人周荣亲自率领的团队，从 2013 年起就开展了“院感防控”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持续科技攻关，创造性提出“单人隔离、即时消杀”理念，2017 年起步入正轨，目前已研制了负压隔离病床、半开放式的隔离病床、隔离椅等感控设备，申请及授权 53 项专利，并成立了专项公司“广州安捷生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广东省政府直接支持下，广东省药监局于 1 月 19 日迅速组织专家对隔离病床产品进行论证、现场评审，通过绿色通道于 1 月 22 日应急审批了隔离病床的生产注册证，应用于疫情防控工作中。他们的首批量产产品陆续被送到疫情防控一线，春节前后，应防疫需求，院感防控生产部工作人员奔波在珠三角地区乃至海南、新疆、云南、江苏等地近 50 家定点收治医院，协助建立隔离病区，完成系列隔离防控器械配置和安装、培训工作。

“在疫情期间，全国各地都设置了很多隔离点。当有疑似病人时，就可以让他们先分别在隔离椅上休息等候，我们的隔离椅内置负压抽吸系统和高效消杀系统，可以即时收集呼出气体、即时消杀病毒。这样就可以防止疑似病人在临时隔离期间传染他人。而当医院收治确诊病人时，就可以让他们在隔离病床上接受治疗，隔离病床与隔离椅一样，都具有即时消杀的作用，可以有效地防止交叉感染。”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医师廖小红说。

拼装式单人负压病房也是研发团队的一大创新。2020 年 2 月 4 日，为了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仅 10 天时间，武汉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堪称“中国奇迹”。4 天后，武汉雷神山医院也正式交付使用。两所为抗击疫情的“临时医院”均采用装配式结构进行搭建，拥有各项必备的医疗、生活设施。其中作为长期容纳病患的“负压病房”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负压病房内的气压比病房外低，因此病房内被污染的空气不会直接泄露出去。但大型负压病房造价较高，需要较大的建筑空间，且负压病房内也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性，而拼装式单人负压病房造价较低，需要的空间小，即时隔离、消杀的效果更好，因此可广泛应用于中小型医院的传染科、呼吸科及出入境海关隔离区等。

与此同时，随着疫情的蔓延，大部分的上班族，尤其是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快递员、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及生鲜仓储人员等都接受了核酸检测。我们都知道，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因此在采样过程中，采样人员直面受检者的口腔，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因为高危，所以采样人员的防护措施要更加严格，防护服、护目镜、口罩一样也不能少，在夏季高温环境下，采样人员往往汗流浃背，有些甚至因中暑而晕倒。

广州安捷生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适时推出了新型的“隔离净化采样台”，通过采样台挡板将受检者与医护人员形成物理隔离的同时，台面上内侧提供洁净、气流斜向上（偏向受检者）吹的正压风帘，形成无形的风帘隔离。采样台内部风机抽取受检区域内的空气并作净化消杀处理。采样台挡板上开有 2 个圆孔，便于检验人员双手伸进去，对受检者进行相关咽拭子采样操作，亚克力板底部开槽，便于检验人员对受检者进行血液采样。采样前后可开启紫外灯，对采样区域进行消毒。如此一来，采样人员就不必在室外暴晒，也不需要再穿厚重的防护服，戴护目镜，在凉爽的采样台后即可完成采样工作。



周荣（前排左2）与团队合影

新冠肺炎的有效防控离不开诊断试剂。针对新冠病毒，当前共有三种检测方法可以确定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分别是分子检测、抗原检测、抗体检测。

分子检测即我们熟知的核酸检测，又名 RT-PCR 检测。在采样人员采样完毕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专业处理。在新冠肺炎暴发期间，核酸检测的结果需要等待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才能得出，因此不少接受检测的人都是当天采样，第二天才能拿到检测结果。这样的检测速度，对于很多需要处理紧急事务的人来，仍然不够快。对此，周荣牵头研发首创超快速变温技术，将普通反应管荧光 RT-PCR 反应 40 循环常规需要 1 ～ 2 小时实验时间缩短到全过程 30 分钟内完成。如

今，这种新型超级快速即时荧光 PCR 检测仪已被送往有关部门进行检定审批，一旦量产及推广应用，将大大提升新冠肺炎的检测速度。

抗体检测主要是检测患者血清或血浆样本中是否含有 IgM 和 IgG 抗体。我们知道病毒入侵人体后会刺激机体免疫反应，从而产生抗体，通过检测机体内是否含有某种病毒的抗体，可以知道当前是否感染或者曾经感染。

新冠病毒侵入人体后，能够产生 IgG、IgM 以及 IgA 等不同亚型的抗体，其中疾病诊断用得较多的为 IgM 及 IgG 抗体。IgM 抗体产生早，一经感染，快速产生，维持时间短，消失快，血液中检测阳性可作为早期感染的指标。IgG 抗体产生晚，维持时间长，消失慢，血液中检测阳性可作为感染和既往感染的指标。

目前广泛采用的是分子检测（核酸检测），抗体及抗原检测的准确性还有待提高。核酸诊断为“金标准”，抗体检测可有效防止漏检发生。

3 月 11 日，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广东和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恩宝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新冠病毒（2019-nCoV）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通过国家药监局应急审批。该试剂盒应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检测人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IgM 抗体，仅需采取一滴血就可在 15 分钟内肉眼观察获得检测结果，且患者的血浆稀释 500 ～ 1000 倍后，仍能检测出阳性条带。

该试剂盒与 RT-PCR 核酸检测联合使用，可以更有效地应用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中。

科研既要顶天，也要立地

以上这些防疫产品不仅凝聚了许许多多科研人员的心血，也体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它们的背后隐约可以看见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身影。

2003 年的非典让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走入了人们的视线；2007 年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获批建设了呼吸疾病领域唯一一家国家重点实验室，至今，已积累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科研成果。对于这些科研成果，钟南山院士有着非常务实的想法：“顶了天的研究，不能立地解决老百姓的实质问题、解决患者实际痛苦，研究的意义就会打折扣。产学研成果转化工作是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重要责任和义务，与发表论文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从这个思想出发，自十年前，钟南山院士团队就努力搭建及打造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产学研体系。这一体系以呼吸疾病临床诊防治需要为导向，以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为依托，以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为枢纽，以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载体，吸引社会资本，在广州市黄埔区建设了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基地园区，由钟南山团队核心成员周荣担任总经理，全面推进相关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工作。

“自己的孩子要自己养，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自己的孩子。”这是周荣的深切体会。有别于一般的企业孵化器在市场上搜寻项目，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重点在于深挖钟南山院士团队自己的创新成果。经过充分论证后，广州市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会作为天使投资方为团队成立创业项目公司。

“我们每一个项目的领头人都是科学家，在项目公司创立初期，我们会给它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我们有多年积累的临床资源、行业品牌、专家团队、专业的管理团队，还专门成立了投资公司，大部分入园孵化的项目公司都是由我们参与投资持股。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数场投融资对接会，等到这些项目公司慢慢发展成熟了，它们可以在对接会上吸引投资。”廖小红说。

据介绍，产学研平台同时通过“广东省南山医学发展基金会”“广东省南山医药创新研究院”作为连接枢纽，有机衔接产学研企业与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临床研究中心，经过几年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科学的互促发展的机制。

从成立以来，广州市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投资参控股方式推动了 20 余家关联项目企业的设立。其中除了前文所述的院感防控技术及产品项目、超级快速即时荧光 PCR 监测系统项目和创新诊断试剂项目以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钟南山院士联手美籍台胞吴宜庄博士历时 20 余年、完全自主创新的 PTS1.1 类瘤内化疗药物创新研发与应用中心项目；广东华南疫苗股份有限公司的昆虫细胞杆状病毒表达系统（BEVS）基因重组疫苗项目；广东风和洁净工程有限公司的空气净化新材料及新风系统项目；广州恩宝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腺病毒疫苗项目等。先后共孵化出国家千人计划 3 项、国家万人计划 1 项、广州市创业领军团队 5 项、广州市开发区创业领军人才 7 项、佛山市创业领军人才团队 1 项、南海人才团队 2 项，其中 4 家企业为与上市公司合资企业、12 家企业获得风投资金入资。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这句话，对于钟南山院士产学研团队来说，是一剂强心针。多年来，尽管国家一直希望工作推动产学研转化，但许多科研人员对“投资”和成果转化仍存顾虑，因为不少人对于科研人员的定位似乎就仅限于埋头做研究，如果科研人员转变做产业，则可能会被视为急功近利、不务正业。然而，事实证明，当最新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产品投入市场时，普通老百姓才能真正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成果。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支持推动创新创业，人们的思想也开始逐渐转变，相信未来会有更好的局面。

钟南山院士产学研团队也将立足于广佛、深耕粤港澳大湾区、聚焦呼吸健康产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成绩。



周荣（左）向来访者介绍隔离床



周荣（左）向来访者介绍隔离净化采样台

田野里的拳拳爱国心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广东省农科院侨联成立于1988年4月，成立之初，共有66个会员，其中有归侨42人，侨眷24人，其后会员人数慢慢增加，最高峰时为114人。这些会员当时都是年富力强的骨干，为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有6位是广东省农科院下属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多位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三十二年过去，不少会员移居国外或离世，现有会员60人，其中28位是归侨，32位是侨眷，他们大多已是古稀之年，日前，笔者走访了其中几位会员，记录了他们独特的人生经历。

致力于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专家

黄炳超是广东省农科院侨联现任主席，他于1949年出生于广州市，祖籍是广东开平。他从小勤奋好学，在开平一中读初高中时，每次期末考试都是全班第一。然而，1968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高考制度被取消，黄炳超不得不回到家乡务农，从插秧、割禾、犁田做起。在务农期间，黄炳超担任了生产队的科技组组长，负责病虫害的防治，还担任了柑桔生产组的组长，与其他年轻人一起在山上种了三年的柑桔。所以他对水稻、柑桔和农作物有一定了解。

在十年务农期间，黄炳超始终坚持学习，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顺利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是全镇600多名考生中考上大学的三名学生之一。热爱科研的他不满足于本科的学习，继而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他依据自己务农的经历，选择了柑桔木虱传播柑桔黄龙病的研究。读研期间，中国著名昆虫学家赵善欢院士对黄炳超及其他研究生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贴近生产，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二是要走向世界，也即研究的水平要领先于世界水平。这两个要求成了黄炳超毕生追求的目标。

研究生毕业后，黄炳超被分配至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当时研究所重点攻关的项目是水稻病虫综合防治，作为植保所的第一位研究生，黄炳超被安排去承担这个任务。

“举个例子：螟虫是水稻害虫，它有成虫阶段，也就是蛾的阶段，蛾产卵，卵孵化之后幼虫就去吃植物的叶，化蛹之后就不吃了。我们研究如何防治病虫害，首先要弄清楚害虫什么时候产卵，卵要经过多少天才能孵化出幼虫，幼虫到什么时候化蛹，化蛹之后什么时候成虫，会不会越冬，研究害虫生长的规律，找出害虫比较弱的时期，打断它的那一段，它的种群就发展不起来了。”经过不懈的努力，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项目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黄炳超主编的《水稻病虫害实用防控技术》一书在2011年出版，为农业技术员研究和防治水稻病虫害提供了参考。

除此之外，黄炳超还在农业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2004年，黄炳超参加完成的《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项目获得了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6年，黄炳超研究的项目《抗稻瘿蚊新基因Gm6在分子标记抗性育种中的应用》获得了2005年度广东省农科院科学技术一等奖、2006—2007年度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三等奖。

多年来，黄炳超除了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外，还花了大量时间去广东省内不同的农村驻点调查研究。即使是退休后，黄炳超仍然经常和其他同事一起到农村给农民做培训，为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贡献余热。“我们主要是针对广东省的各个主要稻区的病虫发生和综合防治的技术，通过研究结合培训形成技术体系在全省推广，这是我们的主要工作。”

黄炳超是美国侨眷，省农科院侨联成立后，黄炳超就加入了侨联，并曾担任过第三届侨联副主席。2011年2月，省农科院侨联进行换届，黄炳超被选举为主席。

一辈子研究花生的“大小姐”

廖小妹今年八十多岁了，她与花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廖小妹的父母在年轻时远赴印尼打工，挣了不少钱，按照当时的习俗，廖小妹的父亲荣归故里，在家乡梅县广置田地、建造房屋，还开了一家酒店，家境很不错。在父亲七十岁那年，廖小妹出生了，与留在印尼的哥哥姐姐不同，她在中国的乡间长大，从小就热爱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1960年，廖小妹从中山大学毕业，两年后，她来到广东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后合并为作物研究所）工作。她坦承，由于她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与后来从事的农学并不对口，一开始她感觉有点不适应，但她并不娇生惯养，每天和省农科院的工人一起下田劳动，从不拈轻怕重，大家见状，纷纷向她竖起大拇指：“你这个小姐不错啊，挺能吃苦的！”

廖小妹曾作为课题主持人负责过两个课题，其一是花生的选种，其二是“花生品种资源的保存、引进和利用”。据她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粮食和食用油比较短缺，为保证市场供应，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中央政府于1953年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城镇居民实行粮油计划供应，采取划片、定点、凭粮油证供应的办法，按照计划分配供应粮食和食用油。粮食和食用油的生产成为国家农业发展的重点，因此廖小妹负责的两个课题也是比较重要的。据她回忆，为了寻找不同的花生品种的种子，她和团队里的其他队友跑遍了广东大大小小的乡村，找到种子之后还要自己亲自下地去种。“当时我们没有种子冰库，如果种子长时间储存而又不播种，发芽率就会大大下降。所以我们要把搜集到的几百个品种的种子轮着种，今年种几种，明年种另几种，这样一直种下去，保持它们的发芽率，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廖小妹及其团队的工作没有白费，她们把搜集到的数百种种子送到了国家种质资源库，并提供了大量的分析资料。在廖小妹退休之后，研究人员依然可以凭借她们搜集到的种子进行杂交育种，为人类造福。因为做出了卓越贡献，廖小妹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廖小妹在省农科院侨联成立初期就加入了侨联。谈及这些年在侨联的经历，她摆摆手，谦虚地说：“我这个人不善言辞，所以我就负责

发通知、收会费、组织去旅游，等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跟着老师跑回国的印尼小姐妹

1955 年，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两个女学生——何月珍和黄秀荣，与另外两个学生一起跟着老师坐了九天九夜的船，回到了祖籍地深圳。

何月珍回国的理由很简单——她想继续读书。

何月珍的父母在中国结婚后，生下几个孩子。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家积贫积弱，光靠种田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何月珍的父母只能抛下孩子，远赴印尼苏门答腊岛谋生。经过数年的打拼，何月珍的父亲在苏门答腊岛某个农村的山顶开了一家杂货店，平时将农村的山货运到城里卖，再将城里的工业品运回来卖给村民，如此，夫妻俩终于在印尼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并继续生养了四个孩子。

然而好景不长，何月珍小学还没毕业时，某天夜里，一伙强盗跑到何家的杂货店抢东西，何月珍的父亲为了保护财物，与他们打斗起来，最终因势单力薄被强盗打成重伤，又无法得到及时的医治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过世后，杂货店开不下去了，母亲只能靠贩卖自己做的糕点维生，何月珍的学费也交不起了。她找到了同在苏门答腊岛的叔叔，祈求他帮忙支付学费，但叔叔自己也生养了很多孩子，生活极为拮据，对于侄女的请求爱莫能助。

正在此时，何月珍听学校里的老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祖国换了新颜，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最重要的是，学生可以免费上学。何月珍动了心思，便辞别了母亲，跟着老师踏上了归国之路。

回到中国后，何月珍先是在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补习，经过统考，她考上了广州市第五中学，靠助学金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然而相比起许多归国的学子，何月珍是幸运的，因为她有一位远在法国、素未谋面的叔叔。叔叔通过书信，得知侄女的窘境，便开始每年给她寄钱。

高中毕业后，由于有“海外关系”，何月珍被大学拒之门外，经人介绍，来到了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的前身），成为一名打字员。那时候何月珍使用的老式中文打字机与我们在咖啡厅里见过的装饰品英文打字机不一样，老式中文打字机上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键盘”，里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 2000 个中文字，“键盘”上方是一个大滚筒卷放蜡纸，打字员必须从这 2000 个中文字中精准地挑出自己需要的字，若遇生僻字时，打字员还需要到备用木箱中用金属镊子一个个寻觅、再调换入盘。这不仅需要考验他们的脑力，更考验眼力和体力。“当时整个农科院的文件都送到我们打字室，我们就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个月工资是 41.5 元，加上丈夫的工资一个月总共才 98 元，每个月请保姆就要花 17 元，我丈夫下乡工作每月要花 25 元，生活真是不容易。幸好在法国的叔叔每年给我寄几百元港币，我们一家才能比较安稳地生活。”1985 年，何月珍因患有眼部疾病被调到政工科，负责工会、计生、退休人员及妇女工作，直至退休。

1988 年，广东省农科院成立时，何月珍通过选举成为组织委员，后来又任广东省农科院侨联水稻所小组长，负责组织侨联会员学习侨务政策，吸收归侨侨眷加入侨联，慰问生病住院的会员，组织会员外出参观学习等。2012 年卸任，但仍积极参加侨联活动。

黄秀荣与何月珍一起回到广州后，通过统考进入了广州市第六中学。至今，黄秀荣还记得，那一年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这个题目对她来说比较简单。后来，她考上了某大学的畜牧和兽医专业，毕业后自愿申请去海南岛，成为当地的一名兽医。“当时海南偏僻落后，没人愿意去。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只觉得海南的气候可能跟印尼的气候差不多，我应该能适应，就主动要求去。”这一去，就是十七年。身为兽医，黄秀荣经常要早出晚归去农村为牲畜打针，后来，由于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她转行从事财务工作。



广东省农科院侨联成立30周年合影

据她回忆，当年她回国时，父母和兄弟姐妹极为不舍，哭了整整一个星期。没想到，1960 年，她的姐姐、弟弟和母亲却因印尼排华事件被迫回到中国，后来在香港定居。“香港和海南相距较远，与香港的亲人沟通十分不方便，所以我多次申请，最终通过侨联的协调帮助，1980 年调回了广州，进入广东省农科院工作，直至退休。”

植物生长的“守护神”和农科院的“多面手”

1942 年 3 月，日军入侵缅甸并占领仰光，四岁的陈怀仰与弟弟妹妹跟随父母回到了老家——广东省梅县。回国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陈怀仰靠着助学金读了四年书就辍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家里总共只有三分地，养活不了一家人，母亲就打算带着他们兄妹回缅甸生活，但陈怀仰的叔侄父强烈反对，母亲只得作罢。母亲没有什么手艺，唯有靠帮人挑担、干农活勉强维持生计。幸好陈怀仰和弟弟读书都很用功，陈怀仰先是考上了程江中学，然后考入梅县农校。梅县农校是中专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包吃包住，还包分配工作。有别于现在的中专学

校，每年梅县农校的毕业生中有 5% 的学生可以去参加高考，陈怀仰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且家境贫寒，符合当时的选拔标准，成为最终参加高考的十个学生中的一名。1959 年，陈怀仰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农科院，在海南工作，后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机构变革，陈怀仰被调入广东省农科院。据他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工作受到极大干扰，他几乎没什么工作可干，一度被要求去韶关接受工农兵教育，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直至 1970 年，他才回到广东省农科院，跟随水稻遗传育种及其应用基础理论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耀祥做研究。

陈怀仰的专业是植物保护，因此他的研究一直围绕着水稻繁育的植物保护，主要研究病虫灾害。他从植保员做起，每天都要去地里巡查，做病虫的预测预报，采取防治措施。1975 年，广东省农科院成立了植物保护所，陈怀仰担任业务秘书，后升为所长。他回忆说，20 世纪 80 年代，根据上级指示，植物保护所不仅要出科研成果，还要有经济效益，陈怀仰就带领植物保护所的同事一起到乡间向农民收集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研发农药，帮助农民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各个省市的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的一次评比中，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所得了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

李秀莲是个不折不扣的“多面手”，她一生干过六个工种。

李秀莲的祖籍是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她出生于文莱，读小学时跟随父母回到中国，在广州市华侨新村的华侨小学继续读四年级。中学时期，因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李秀莲就去广州珠江农场当知青，与其他归侨一起种甘蔗、水稻、香蕉。后来，韶关市仁化县成立了大岭农场，李秀莲作为农场骨干被抽调去大岭农场工作。农忙时，她要下地干活，农闲时，她就参加场里的文艺宣传队，去各个区慰问演出。

一晃十四年过去了，李秀莲也在农场里成了家，根据当时的子女顶替就业制度，李秀莲的奶奶从广州某药厂退休后，李秀莲接替了奶奶的职位，成了一名工人。几年后，她调入广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做过财务、广播员、电话总机接线员、售货员、业务员等多个工种。“20 世纪六七十年的时候很困难，工资只有十几块，买东西都要凭票。现在不同了，日子好过多了，我们都很高兴。”

追忆往事时，老人们都面带笑容，语气平和，他们有的翻出自己的手机，给我看儿时在印尼吃过的美食，有的给我看他们在聚会时穿的异国风的服装，他们的晚年安稳而幸福。他们在祖国一穷二白的时候怀揣一颗爱国心归来，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见证了祖国数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执着让人震撼，他们的奉献让人感动。

续写“春天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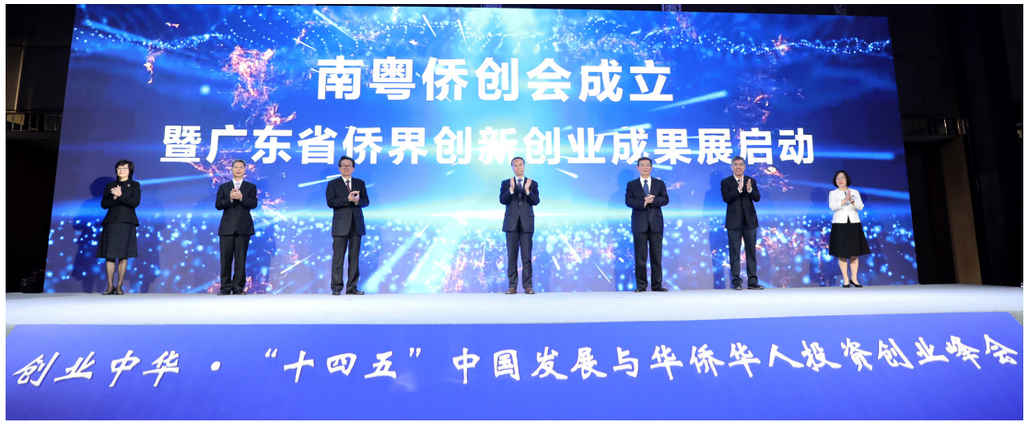
文/图 《华夏》记者 子言

汕头，一座因侨而生、因侨而立的城市，于 2020 岁末迎来一场侨界的盛会，谋篇布局“十四五”，奋勇挺进新征程。

2020 年 12 月 11 日，由中国侨联、广东省侨联、汕头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中国侨联经济科技部、中国侨商联合会、汕头市侨联、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承办的“创业中华•‘十四五’中国发展与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峰会”在汕头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侨领、侨界企业家、创新创业人士、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和双创联盟代表等近 300 人齐聚鲘城，续写“春天的故事”，同圆共享中国梦。

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

“创业中华”是中国侨联倾力打造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至今已走过 10 个年头。本次峰会在汕头举办，又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汕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港，是全国首批 4 个经济特区之一，汕头港是国家“一带一路”重点建设的 15 个港口之一。汕头也是著名华侨之乡，大批潮汕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素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说法。“港口”和“侨乡”，是汕头的显著优势，是汕头改革开放的助推力量。



峰会当天，南粤侨创会宣布成立，同时广东省侨界创新创业成果展启动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在峰会上做主旨讲话



广东省委常委黄宁生在峰会上致辞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汕头考察时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华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爱国爱乡。他们在异乡历尽艰辛、艰苦创业，顽强地生存下来，站稳脚跟后，依然牵挂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心。”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出席峰会开幕式并做主旨讲话。他指出，广东省侨联、汕头市侨联要贯彻“三有利”原则，做好为侨服务工作，将汕头建设成为华侨华人的投资乐土、创业福地、乐居天堂和精神家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要观大局、识大势，看清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现象下的本质，把握新阶段中的战略机遇与危机挑战的关系，既能时刻把握机遇、顺势而动，又能及时规避化解危机、转危为安。

当前，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恢复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十四五”规划既是从持久战角度着眼制定的一个中长期规划，又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需要海内外华侨华人的参与，同时也为侨胞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平台。万立骏希望广大侨胞发挥独特优势，在“十四五”发展中贡献侨的力量；希望广大侨胞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在“双循环”格局中再立新功；希望广大侨胞瞄准科技前沿，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彰显独特优势；希望广大侨胞增进中外友谊，持续用力，再续辉煌。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也是广东奋力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关键时期。广东省委常委黄宁生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参与下，广东敢为人先，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19年，全省生产总值达10.77万亿元，连续31年居全国首位。2020年以来，广东有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供需关系逐步改善，新动能发展壮大，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中国开启新征程、创造新伟业，新时代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必将为海外侨胞包括广大华商施展抱负、拓展事业、实现梦想带来新机遇新舞台。他希望华商朋友加强与各级侨联组织沟通联系，热情参与广东建设、共享发展机遇、共谋合作共赢，为广东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增添新光彩。

深度参与中国发展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海外华侨华人翘首以盼，期盼“十四五”新航程，冀望更多参与中国的建设发展。

“‘十四五’蓝图增强了华侨华人搭乘中国经济发展‘顺风车’的信心，同时也将为华侨华人住在国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机会与选择。”广东省侨联海外顾问、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表示，海外侨胞将一如既往地心系家国故土、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发挥好商贸网络、资金和人脉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自身的发展需求和优势，找到事业发展的新起点，当好连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桥梁和纽带，使“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为世界经济恢复发挥更大作用，“我本人也将继续力所能及地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在海外侨胞尤其是青年一代中大力支持中华文化认同培养，带动更多的海外侨胞进一步参与中国发展建设。”

“站在‘十四五’开局新起点，我们不能做旁观者，而是要将老一辈华侨华人爱国爱乡、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传承下去，牢牢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担当侨商新使命。”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古润金，从马来西亚回到祖国创业已有二十余载，“小的时候，父辈教导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一直都觉得中国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海外华人充分感受到身后有强大祖国的幸福和自豪，只有中



广东省侨联海外顾问、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在峰会上发言



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古润金在峰会上发言



中国侨联特聘专家、中国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副理事长李然在峰会上发言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会见与会侨胞代表



广州归谷科技园有限公司总裁范群在峰会上发言

国好，我们才能跟着好。”

古润金始终相信，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正积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信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将会更足、动力更强，华侨华人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桥梁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在广州有多年创业经验的范群博士，作为广东省科技创新人士代表进行发言。他从“侨芯·侨力·科学梦”的角度分析了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留学后归国就业或创业的趋势，坦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新侨中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到中国发展。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大的华人华侨在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中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中国侨联特聘专家、中国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副理事长李然说。

“人才是第一资源，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李然认为，华人华侨有创新开放的视野，有敢为人先的锐气，有上下求索的执着，而新侨人才资源更是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新侨人才以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为主，在教育水平、职业构成、经济能力等方面具有数量大、层次高的特点。近些年，新侨在国内创业成绩斐然，不少已经成为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领军人物，或是高科技产业的创业者，或是跨国公司的研发带头人，在推动国家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蓝图已经绘就，使命催人奋进。此次汕头峰会，凝聚起侨心、汇聚起侨力，奏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最强音。

凝聚侨界力量，助力广东发展大局

谭铮（羊城晚报记者）

“世情、国情、省情、侨情带来的深刻变化为新时代侨联组织维护侨益、参与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黎静在省侨联 2020 年 1 月 7 日举行的法顾委成立 15 周年纪念交流会暨维护侨益学习活动上表示，广东作为重点侨乡，在新形势下更要致力于团结联系广大海内外侨胞，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侨智，努力围绕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打好“侨”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与世界连通的桥梁，广东省侨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与粤籍侨胞一起迈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黎静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提到，侨联组织、侨务工作要深入贯彻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凝聚侨界力量，不断开创新时代侨联事业发展新局面。

产业改变引来海外高层次人才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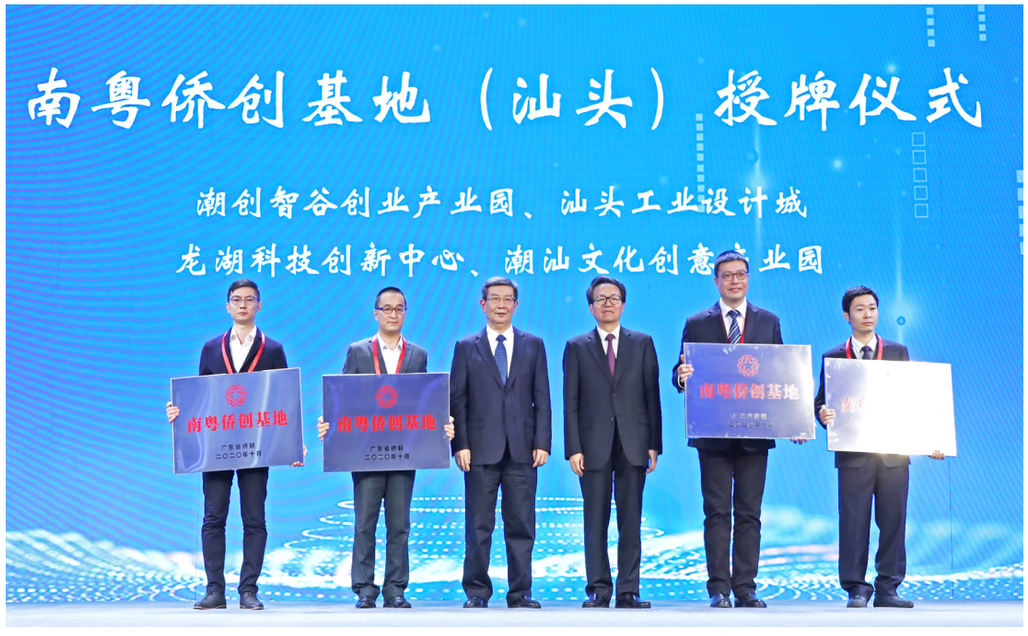
羊城晚报：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您看来，侨务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黎静：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作为侨务工作者，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国际形势的变化。面对世情、国情乃至省情的新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新趋势，广东省侨联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侨联、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一如既往地把服务经济发展和为侨服务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处，努力帮助侨资企业发展壮大。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广东的侨资企业利用自身独有的优势，紧贴广东的经济规划和发展导向，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累计在粤投资企业 6 万多家，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的六成多；累计实际投资 2600 多亿美元，占全省引进外资总额近七成；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向我省捐赠慈善公益项目 5 万多宗，捐赠总额折合人民币逾 540 亿元，占全国的 60%以上。

随着国家的发展，海外侨胞也留意到国内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的新形势。近年来，海外侨胞在产业投向方面，尤其是回国创新创业的高层次新侨人才的加入，产业集聚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海外高层次人才也逐步进入研发、制造、销售同步发展与不断升级的阶段，他们在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发展过程中，发挥行业影响力和经营示范效应。

如最早布局农牧业领域的正大集团，如今全面扩大到金融、商业零售、传媒、工业和制药业，先后入股中国平安，收购中信股份，其大健康产业也有长足发展。还有医药领域的康方生物、航



广东省侨联推动与各级侨联、直属团体以及高新区、高校、产业园区等多方共建“南粤侨创基地” 摄影/钟敏仪

空航天领域的珠海欧比特、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圳云天励飞、珠海四维科技、东莞微模式，新材料领域的深圳光启、柔宇科技等，都是侨资侨力侨智结合，在战略新兴产业布局中新侨创新创业的突出范例。

统计显示，如今在粤华侨华人高层次专业人士达5万多人，主要从业于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精密制造、新材料等高新技术行业，创新创业团队及其主要带头人和领军人中，超过90%是侨界高层次人才，已成为广东省推进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羊城晚报：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了“人才强国”。在您看来，广东省侨联如何进一步发挥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优势？

黎静：为了服务好侨资企业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发展，广东省侨联着力打造“侨创南粤”工作品牌，积极筹备成立“南粤侨创会”。

为进一步促进侨界创新创业人才交流、技术转化、项目合作、资源共享、发展共赢，凝聚侨界创新创业力量，更好地服务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省侨联于2019年开始推进筹备成立“南粤侨创会”，成员主要包括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奖单位或个人；各地级以上市侨联、省侨联各直属团体、各有关方面向广东省侨联提名推荐中国侨界贡献奖的参评单位或个人；有代表性的新侨聚集的创客空间、创客工场、创投基金、投资机构或投资人；有影响、有实力、热心侨联工作的侨界创新创业企业、侨界创新创业人才等。

“南粤侨创会”于2020年12月在中国侨联和广东省侨联主办的“‘十四五’中国发展与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峰会”上成立，作为广东省侨联团结服务侨界创新创业人才、对接创新创业要素的组织载体和平台。

此外，2019年以来，广东省侨联推动与各地级以上市侨联、各有关直属团体以及高新区、高校、产业园区、创业空间、侨资侨属企业等多方共建一批“南粤侨创基地”。经对共建申报点开展调研、考察，2020年10月，我们确定了广州归谷科技园等35个单位为第一批省侨联和各级侨联组织、基地等共建的“南粤侨创基地”。各共建方充分发挥“南粤侨创基地”的平台载体作用，凸显侨界优势和特色，依托基地积极组织开展侨界创新创业产业投融资、人才交流引进、技术转化推广、项目合作对接等活动，凝聚侨界创新创业力量，着力把“南粤侨创基地”打造为广东省侨界创新要素聚集空间和服务阵地。

在这些基地当中，如广州归谷科技园是广州市科技创新基础设施重点项目、中国海交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广州海归小镇起步区，注资引入全球知名科技创新加速器PlugandPlay（中国）并在广州开发区共建“广州PNP国际创新中心”和“PNP跨境科技发展中心”，打造集研发孵化、高端人才、文化交流、科技金融的全球综合性专业化跨境孵化服务平台。

我们希望以“南粤侨创基地”为空间载体，与各地市侨联、省侨联有关直属团体和基地共建方合力发挥“南粤侨创基地”的平台作用，充分发挥侨界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组织开展侨界创新创业人才交流、技术转化、项目合作等活动，凝聚侨界创新创业力量，构建侨界人才、资金、项目、空间等多要素良性循环，助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做“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积极贡献者

羊城晚报：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海外侨胞是我们连通世界的一座桥梁，面对“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请问广东省侨联将如何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

黎静：面对新发展格局，侨界的优势将更加明显。因为他们熟悉在国的社会、法律、风土人情，同时还融通中外文化、政治、经济，是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重要而独特的力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4000多万华侨华人，华侨华人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优势明显，空间广阔。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将成为全球华侨华人资金、技术等资源聚合的重要战略平台。通过汇聚国内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建设全球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合作，促进大湾区和国内产业在转型升级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重新分工合作，再塑区域国际竞争力。华侨华人在落实双循环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

为助力后疫情时代广东经济复苏，助推“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省侨联在2020年下半年策划了两次华商南粤行活动，组织了近200位杰出华商和侨领侨胞，先后走进清远、中山市进行投资经贸交流，引导侨界力量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全力把握新发展格局机遇，推动全省及有关地市高质量发展。

华商们通过此行，已陆续在两市洽谈对接了30多个投资项目。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华商们将是“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积极贡献者和坚定支持者。

羊城晚报：在助推“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广东省侨联为侨胞提供了哪些“专属”服务？

黎静：结合“双循环”的背景，面对疫情带来的风险挑战，广东省侨联跟紧形势发展，多维度、多层次地为海外侨胞提供服务。

2020年以来，为服务海内外华商事业发展

和广东与海外的经贸投资合作交流，我们启动了“云行动”，联合深圳市侨联、深圳侨商智库研究院等机构，发挥海外华商遍布全球的优势，举办了“侨路天下”跨国云访谈节目。以海外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主线，针对商界关注热点，聚焦分享当下全球经贸资讯，探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发展商机和应对策略。

同时，我们充分利用融通中外的优势，积极对接海内外市场，主动疏补海内外市场的流通堵点、供需断点，开通“线上线下”双侨路，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市场”。

广东是侨务资源大省，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众多，这是广东新一轮改革发展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资源。在“促进内外双循环，探索出海新路径”为主题的第六届侨交会上，我们为国内外企业线上交易搭建平台，助力侨企全球抓订单、保市场、渡难关。这次会议也吸引了海内外共1000多家企业参展，5.5万多家采购商在线上观展询盘，参与产品对接会的海外侨商及采购商近5000人次。

此外，推进构建华商协作网络，着力青年华商骨干的持续培养和服务，依然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在这特殊的一年里，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如期举办了“海外青年华商高级研修班”。该研修班以国际视野和区域布局的角度以及构建华商协作网络的需要，遴选了40多位发展潜力大或二代接班的青年华商参加研修，并在研修后形成常态化活动和联系机制，培育和扶持一批青年华商骨干力量，为“一带一路”建设涵养华商资源、构建华商合作网络打好基础。

开创新时代侨联事业发展新局面

羊城晚报：您之前提到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请问接下来，广东省侨联如何引导侨界支持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助推我省高质量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

黎静：十九届五中全会后，广东省侨联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希望不断开创新时代侨联事业发展新局面。

我们坚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坚决贯彻执行政治要件闭环落实机制，建立并及时更新《中共广东省侨联党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工作台账》。同时，结合举办“情系南粤”“侨创南粤”“风韵南粤”“侨爱南粤”等系列重点工作品牌活动，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省委十二届九次、十次、十一次全会和中国侨联二次全会、五次常委会议精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一核一带一区”建设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进行部署，推动省委省政府“1+1+9”工作部署在广东省侨界落到实处。

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广东省侨联启动后疫情时代侨联工作“云行动”，制定《广东省侨联促进海外及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交流“云行动”工作方案》及一系列工作项目清单，及时对原年度工作计划中的部分涉外项目进行调整，线上线下同步推进，不断拓展整体工作局面。

羊城晚报：多年来，广东省侨联已经建立如“情系南粤”“侨创南粤”“风韵南粤”“侨爱南粤”等工作品牌，未来侨联将如何继续在这些品牌活动中发力？

黎静：这些年来，省侨联在汇集侨资侨才、凝聚侨心侨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情系南粤”“侨创南粤”“风韵南粤”“侨爱南粤”等品牌活动，正是侨联组织多年来努力的结果。未来，广东省侨联将聚焦工作职能，努力寻找新时代侨联工作服务广东大局，服务侨界群众的结合点、着力点和创新点，扩大侨联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海内外影响力。

以“情系南粤”这一品牌来看，它是一个拓展全球联络面、凝聚全球广东乡亲力量的平台。2019年12月召开的广东省第十一次侨代会，共聘请了来自131个国家和地区的476人担任海外顾问和委员，国家和地区数与人数均有所提升。我们将省侨联海外顾问和委员按洲分片建立了微信群，密切加强与海外顾问、委员的联谊联络、信息互通等工作，并通过他们以点带面，加强与当地重点侨团的联系，全面拓展了省侨联的全球联络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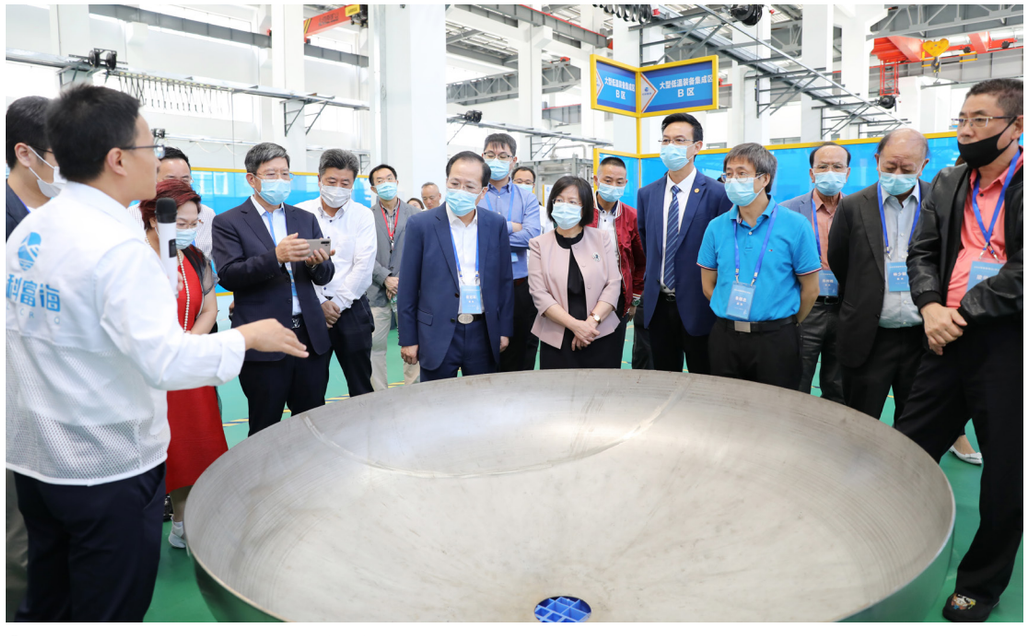
此外，原定2020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虽受疫情影响延后举办，但我们坚持定期向海外侨领侨团们推送国内各类宣传信息。特别上半年全球疫情暴发时，我们及时通过“云行动”，第一时间向海内外侨界通报情况，引导侨界驰援国内抗疫。

据不完全统计，向国内捐款捐物的粤籍海外侨团涵盖五大洲57个国家和地区，累计4.7亿多元，其中捐款3.2亿元、捐赠抗疫防护用品等价值1.5亿元。侨联组织还配合政府搭建海外采购平台，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紧缺防护物资对接渠道。同时及时支援海外侨胞参与住在国抗疫，创先开展“侨连五洲·同心抗疫——新冠肺炎科普‘云讲座’暨全球连线”活动，提振海外侨胞抗疫信心。我们还免费开放中医医疗服务平台，向7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个侨团捐赠4000多份“侨爱心防疫包”和20万个口罩。中秋国庆期间，省侨联还与海外侨团联合举办“风韵南粤”2020迎中秋庆国庆云联欢会，通过采取线上线下不间断地与侨领侨团交流的方式，进一步广泛凝聚海内外侨胞力量，让其在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此前提及的“侨爱南粤”品牌，也是广东省各级侨联自觉践行“以人为本、为侨服务”宗旨，创新服务体系，打造为侨服务的工作平台。我们不断努力为侨界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



2020年12月11日，“创业中华‘十四五’中国发展与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峰会”在汕头举行，广东省委常委黄宁生致辞　摄影/钟敏仪



广东省侨联于2020年组织了两次2020华商南粤行 摄影/钟敏仪

在刚结束的法顾委成立 15 周年纪念交流会暨维护侨益学习活动中，我们增聘一批法顾委委员，法顾委工作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目前全省共有 16 个地市侨联成立了法顾委。维护华侨华人权益是侨联工作的重要职能。各级侨联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侨界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权益、解决问题，营造全社会“知侨、爱侨、护侨”的良好氛围。为更好地履行依法护侨的基本职能，推进侨联工作专业化、社会化服务。通过建立健全侨情汇集、分析机制，畅通侨情反映渠道，加大合法维护侨益的工作力度。省侨联法顾委连续两年分别在广州、中山举办了“侨爱南粤法治沙龙”，为侨资企业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促进企业发展。

除了维护华侨华人权益，我们还努力助力建成小康社会。根据中央和广东省有关华侨事业费的精神，省侨联严格按照要求，管理发放华侨事业费。2019 年经过各地市侨联摸底筛选，先后有 941 名困难归侨列入困难归侨救助对象，发放困难归侨救助金 309.45 万元，资助 388 名困难归侨家庭新生“圆梦大学”，发放困难归侨子女助学金 120.61 万元；帮扶 4239 名困难归侨，发放临时救助金 1301.08 万元。该专项资金的发放，切实改善归侨民生，有效地保障了困难归侨家庭的基本生活，缓解了部分归侨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生活困难问题，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困难归侨生活的关爱和帮助。

广东省侨联深刻认识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会立足侨联实际，动员侨界力量，进一步发挥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做出侨界贡献。（原稿刊发于《羊城晚报》2020 年 11 月 28 日）

广东侨联的时代担当

文 乔萱

时隔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赴广东调研，第一站选择了“因侨而兴”的汕头。“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新时期打好‘侨’牌，要深入调研、摸清情况，调动广大华侨的积极性，引进先进技术和高水平产业，扬长避短、久久为功，团结广大海外华侨共同实现中国梦。”2020 年 10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有海外侨胞的一份功劳，温暖侨心，更为新时代党的侨务工作指明了航向。

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群团组织，侨联组织联系着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侨务大省广东，“侨”是一大特色与优势，有 3000 多万海外侨胞分布于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省内还有 10 多万归侨、3000 多万侨眷，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基于如此丰富的侨务资源，广东省侨联凝侨心汇侨智聚侨力，为全省坚决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侨界智慧和力量，以奋进姿态确保“十四五”的精彩开局。

高举旗帜 以思想引领自身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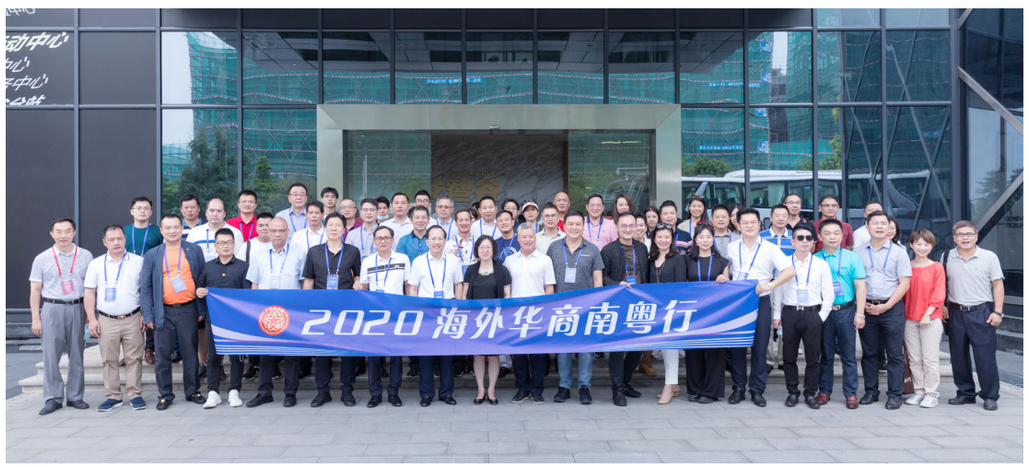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有着深厚的感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对侨务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侨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侨联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省侨联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等作为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通过党组会议、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全省侨联系统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和全省基层侨联干部培训班，以及会议活动、基层调研和会见侨胞等形式，广泛宣传宣讲，及时将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到侨联干部，强化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侨乡、进侨场、进侨企、进侨社，引导侨界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同时，坚持以“党建带侨建”推进侨联基层组织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好，成立全省各级侨联组织 8000 多个，共建“侨胞之家”1678 个，上下联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画好侨界团结最大同心圆。

打好侨牌　服务大局展现侨力量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活跃着华侨华人的身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累计在粤投资企业 6.18 万家，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六成多；累计实际投资 2600 多亿美元，占全省引进外资总额近七成；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向我省捐赠慈善公益项目 4.1 万多宗，捐赠总额折合人民币逾 520 亿元，占全国的 60%以上，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目前，在粤华侨华人高层次专业人士达 5 万多人，主要从业于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精密制造、新材料等高新技术行业，“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团队及其主要带头人和领军人才中，超过 90% 是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高层次人才。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愿景目标建议的实现，同样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团结奋斗，需要海外侨胞参与和支持。为服务好侨资侨属企业的发展，顺应新形势发展，引导侨界力量积极参与和支持“十四五”规划，广东省侨联通过搭建载体、共建空间和举办活动，调动华侨华人的活力。一是继续夯实广东国际华商会和广东省侨界海归协会两个服务平台和组织载体，每年度举办一期“青年华商研修班”，涵养华商资源、构建华商协作网络。为顺应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广东省侨联创建“南粤侨创会”，促进侨界创新创业人才交流、技术转化、项目合作、资源共享、发展共赢，凝聚侨界创新创业力量，更好服务全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二是推进建设空间载体，与各地级以上市侨联、各有关直属团体以及高新区、高校、产业园区、创业空间、侨资侨属企业等多方共建“南粤侨创基地”，凸显侨界优势和特色，依托基地积极组织开展侨界创新创业产业投资融资、人才交流引进、技术转化推广、项目合作对接等活动。目前已授牌共建的“南粤侨创基地”有 35 个。三是举办“创业中华·侨创南粤”“创业中华·深耕广东”“创业中华·圆梦广州”“华商南粤行”“智荟深圳”等品牌活动，发起、参与承办或协办粤商大会、世界客商大会、粤东侨博会、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客属青年大会、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国际潮青联谊年会、潮商大会、世界江门青年大会、华侨华人产业交易会等各类涉侨经贸合作活动，汇聚侨智凝聚侨力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助推我省高质量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



2020海外华商南粤行走进清远，助力“广清一体”“入珠融湾”

同时，广东省侨联紧紧围绕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中心工作，紧跟形势发展，启动“云行动”。广东省侨联联合深圳市侨联、侨商智库研究院等机构，发挥海外华商遍布全球的优势，举办了“侨路天下”跨国云访谈节目，以海外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主线，针对商界关注热点，聚焦分享当下全球经贸资讯，探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发展商机和应对策略；指导支持深圳举办“第六届华人华侨产业云交易会”，海内外共有 1000 多家企业参展、5.5 万多家采购商在线上进行观展询盘，参与产品对接会的海外侨商及采购商近 5000 人次。“云行动”进一步发挥侨界的特殊作用，更好地凝聚了海内外数千万粤籍华侨华人的智慧和力量，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

搭好桥梁　扩大侨联朋友圈

“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华侨华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是连接祖国与住在国的桥梁和纽带。国家机构改革后，党中央将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联谊职能划归侨联行使，侨联的责任更大、任务更重了。目前，广东省侨联已与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个社团建立了联系。为与分布在世界 13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76 名海外顾问、委员维系密切关系，广东省侨联将海外顾问和委员按洲分片建立了微信群，定期向他们推送各类宣传信息，畅通了与广大海外侨胞的沟通渠道和提高了沟通时效，且以点带面，进一步加强了与当地重点侨团的联系，全面拓展了省



2020年12月23日至25日，广东省侨联在茂名、阳江开展“侨爱南粤　新春送暖”慰问活动，探望困难归侨侨眷



2020年11月10日至12日，广东省侨联举行“2020华商南粤行（中山）”活动，组织100余名华商到中山展开经贸投资考察和交流

侨联的全球联络面。通过做强联谊恳亲大会，凝聚全球广东乡亲力量。2019 年，广东省侨联支持参与了第二十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第三十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第十届世界惠州（府署）同乡恳亲大会，以及在广东举行的美洲至孝笃亲总公所第三十四届恳亲大会、全美溯源堂第二十九届恳亲大会、第九届世界台山宁阳会馆（同乡会）联谊大会、世界梅氏宗亲总会第十四届恳亲大会等恳亲活动，与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 多名嘉宾交流。同时，借助“情系南粤·海外友好社团负责人研讨班”“情系南粤·海外侨胞故乡行”“情系南粤·港澳及海外青年侨领研习班”等品牌活动，在培养侨团青年骨干、推动侨团革新发展、助推侨社和谐建设、推动华人参



2020青年华商研习活动在广州举行



广东省侨联、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向省侨联定点扶贫村山乘村的山乘小学捐赠校服



2020中秋国庆期间，广东省侨联与海外侨团联合举办“风韵南粤”2020迎中秋庆国庆云联欢会

政议政、促进中外友好往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目前共邀请了来自世界 59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600 名友好社团负责人参加。

筑牢侨魂　传承中华文化

2014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华侨华人是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继承者、传播者和展播者。长期以来，广东省侨联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使命，通过各种活动与形式，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2020 年受疫情影响，广东省侨联创新工作方式，将“亲情中华”夏令营活动、慰侨文化演出等活动搬到“线上”，其中举办的第七期“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活动，共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26 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参营受益；“2020 迎中秋庆国庆云上联欢慰侨演出”借助“南方 +”平台向全球华侨华人播放，网络浏览量达 50 多万；联合中山市侨联举办“2020 中山侨界群众文化节”，线上线下共有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海内外侨界群众参加。

侨乡是海外侨胞维系与祖籍国联系的情感纽带，是他们的根和魂的所在。广东省侨联积极配合中国侨联打造“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推动广东各地侨乡涉侨单位申报，目前全省入选“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共有 18 个，成为弘扬优秀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

侨爱南粤　让侨胞感受娘家的温暖

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之时，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迅速行动，通过各种方式驰援国内疫情防控，



2020年9月14日，广东省侨联系统第三期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在江门开班

在捐赠抗疫物资上涌现出“人肉带货”“蚂蚁搬家”“与时间赛跑”“与管控赛跑”“口罩航班”等一个个动人故事，展现了海内外侨界爱国爱乡和同舟共济的深厚情怀。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侨界向国内疫情防疫工作捐款捐物的粤籍海外社团和侨胞涵盖五大洲 57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捐赠款物 4.7 亿多元，其中捐款 3.2 亿多元，捐赠抗疫防护用品及其他用品价值 1.5 亿多元。

故乡山水远，两情总相依。在海外疫情蔓延时，广东省侨联作为海外粤籍侨胞的“娘家人”，时刻挂念海外游子的安康，及时向分布在 13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76 名海外顾问、委员发出《春暖花开会有时——致广东省侨联海外顾问委员及侨胞的一封信》，并通过海外委员、顾问所在的联络群不断向海外侨胞发送各类指引、讯息共 500 多篇，开展“侨连五洲・同心抗疫新冠肺炎科普‘云讲座’暨全球连线”活动，向海（境）外 7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名侨胞、120 多个侨团寄送 4000 份“侨爱心防疫包”，联合部分地市侨联向海外 13 个国家的 18 个侨团捐赠 20 万个口罩，为他们送去“娘家”的温暖，支持他们与住在国人民共同抗疫。

同时，广东省侨联积极做好侨界帮扶工作和维护侨益，提升侨界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全省困难归侨侨眷人数共 6182 人，其中农村人口 4285 人，占 69%；城镇人口 1897 人，占 31%。全省困难归侨侨眷中有 1100 人未享受低保或医保，其中农村 618 人，城镇 482 人。惠州市从 2012 年起，对每一个 60 岁以上的归侨每月补贴 200 元，由市和县财政负责。各级侨联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和物资，专门用于慰问困难归侨侨眷、救济孤寡病残归侨、资助贫困归侨子女上学等，切实为侨界群众办好事实事。为更好地履行依法护侨的基本职能，推进侨联工作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侨联有 15 个先后成立了法律顾问委员会或法律咨询机构，建立健全侨情汇集、分析机制，畅通侨情反映渠道，加大合法维护侨益的工作力度。广东省侨联还与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方案》，推动广州、深圳、江门、肇庆等市及部分县区建立了侨联与法院涉侨纠纷化解工作机制，做到“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省侨联将继续团结引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广东奋力推进“双统筹”、夺取“双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侨界应有的贡献。



海外华裔青少年“云上”品读中国

文 祝顺祥（广东侨界作家联合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2020，新冠疫情来袭，一切都不一样了。新冠病毒就像一把利刃，轻而易举地切断了国内外的往来，也切断了海外华裔青少年回国参加夏令营寻根的路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经过五千多年的锤炼和洗礼，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海外华人新生代日益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新世纪以来，各级侨务部门积极举办各类夏令营，“中国寻根之旅”“亲情中华夏令营”已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让海外华裔青少年了解古老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感受当今中国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提高了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力，增强了同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受疫情影响，2020 年的夏令营被迫停办，然而，为了延续这份文化传承，“亲情中华夏令营”另辟蹊径，启动“云端”模式——“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适时推出一系列寓教于乐、精彩纷呈的线上活动和中文课程，让身处五湖四海、异国他乡的华裔青少年相聚“云端”，“云上”品读中国，线上习武吟诗，跟学琴棋书画，“云游”名山大川。中华文化的阳光穿透疫情的阴霾，照亮了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心灵，陪伴华裔青少年走过了一个暖心的夏天。

网上夏令营的通知发出后，华裔青少年们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第一期夏令营开班就有 4000 余名营员，后续每期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有近万人参加。网上夏令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参营成本低，参营年龄宽，参营人数不设上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少年。

有趣的夏令营

对于 8 ～ 18 岁的华裔青少年们，有趣是他们参加夏令营活动的首要条件，“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正好满足这一条件，于是乎，每期参营人数逐步增加，还有连续参加多期夏令营的营员。

亲爱的读者朋友，你还记得猪八戒娶媳妇的故事吗？你知道孙悟空是怎样捉住黑熊怪的吗？你见过胡萝卜做的汽车吗？你住过冰激凌搭建的城堡吗？会飞的青蛙是怎么回事？人行道上的斑



第五期网上夏令营

马线是从斑马身上偷来的吗？如果想知道答案，就和我们一起走进“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的日常互动平台吧！

“孙悟空是怎么救师傅的？”“猪八戒如何拜师？”“你喜欢《三国演义》里哪些英雄人物？”“《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如何火烧琵琶精？”……从《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三字经》等经典名著，到古代诗词、成语寓言、人文地理、防疫知识等知识，“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安排的课程不仅“干货”满满，而且趣味多多。华裔青少年们每天要在线上聆听经典的中华故事，还要在线下完成转述、诵读、抄写、改编演绎等作业展示、网上打卡和课外拓展任务，但数万名参营华裔青少年们乐在其中。

在加拿大玛莎老师主持下，一场“云”辩论通过视频会议软件进行，40 位营员分成正反两方，围绕“《西游记——大圣拜师》中孙悟空该不该杀强盗”展开激烈辩论。“我认为不该杀，孙悟空应该把强盗交给官府处置。”“该杀，强盗无恶不作，孙悟空是在惩恶扬善。”小营员们摆事实、讲道理，隔着屏幕亦能感受到“火药味”。

互动是夏令营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营员们在微信互动群中，用文字、绘画、复述等形式，重温了《西游记》中猪八戒拜师、孙悟空计捉黑熊怪、大败黄蜂怪等经典文学故事片段，让大家在捧腹大笑间品味中国古典文学的悠远韵味。马来西亚孔子学堂的营员们脑洞大开，通过情景创设、新闻播报、手绘故事等方式重温了孔融让梨等经典故事。如斯深度参与让营员们爱上了这有趣的夏令营。

有料的夏令营

“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不仅是有趣的，更有丰富的中文知识，蕴含中华优秀文化，让华裔青少年们在有趣的活动中学习知识，传承文化，受到营员家长们的广泛好评。

《三字经》以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文字叙述，涵盖了文史哲、忠孝义、天文地理等丰富的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家喻户晓的蒙学经典。而《西游记》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着海内外朋友。营员们通过听《三字经》和《西游记》等故事，明白了“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所阐述的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历史故事，也理解了“三才者，天地人”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体会了汉字中蕴含的无穷奥妙，收获了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勇气和智慧。

潮州的广济桥，民间称为湘子桥，位于潮州古城东门外，横跨韩江，联结东西两岸，为古代广东通向闽浙交通要津，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也是潮州八景之一。广济桥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潮人度过了悠悠岁月，成了天下潮人的精神“坐标”，是维系天下潮人的“魂”。马来西亚营员们在云端唱起潮州歌谣——《潮州八景好风流》，唱出了游子们思乡的“音符”。

澳大利亚营员易时磊说，参加夏令营让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到了垂涎三尺、毛遂自荐、望梅止渴等成语，希望有机会到中国，到故事中讨论过的地方去看看。澳大利亚营员包凯文自小就对学习中华文化很感兴趣，他家里珍藏有一套《西游记》，是他父亲童年时买的。此次，包凯文听了《西游记》中的故事后，第一时间把这套书找出来，又认真地看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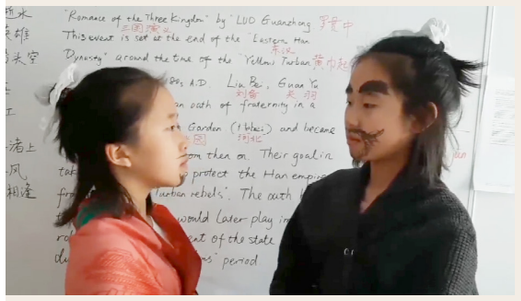
营员家长表示，网上夏令营让她看到了孩子从对三国故事的不理解到喜爱的变化，让孩子和中国文化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感受中国文化独有的魅力，感受祖国的温暖。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孩子们能早日在中国欢聚。营员宋美初的妈妈说，网上夏令营让她们重温了中华经典文学，勾起了儿时美好回忆，她将会带着孩子继续学习和了解中华经典文学。













营员在线上表演节目和展示作品

李秀梅老师说，网上夏令营让海外的孩子有机会跨越时空、距离学习到中华优秀文化，了解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真善美。这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的魅力所在。

有情的夏令营

15 天，30 个故事，上千条互动、点评信息，每个营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名营员在老师们的带领和教导下飞速进步，短短时间结下了深深的师生情、朋友情。

法国的华文学校明确地提出了办营的具体要求：以营员为中心，以爱心、耐心、责任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对许多老师而言，网上互动教学是“第一次吃螃蟹”，整个夏令营凝聚着老师们的耐心与智慧，对华裔青少年无私的爱与包容，用爱浇灌，用心鼓励和陪伴，鼓舞了营员们学好中文、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和勇气，让他们收获满满。

一开始，对不少营员来说，完成网上夏令营的作业并非易事。针对很多孩子一开始完全听不懂三国故事的难题，老师们紧急商议，决定增加三国故事角色扮演的互动环节——老师讲三国。于是，下课时，孩子们说的不是“老师再见”、而是“刘备再见”“张飞再见”！

美食是人类共同的爱好，不论身在国内还是国外，不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老师对中国传统节日饮食的介绍，让营员们徜徉于记忆长河，那些保留在味觉记忆中的中国味道和人间烟火气历历在目：那里有营员们初到祖（籍）国时的新奇和亲切，有老师的体贴和关爱，有第一次品尝中国味道时的惊奇和欣喜，有第一次动手尝试制作中华美食时的各种小插曲，有师生共度佳节时的团圆和美……

在这里，营员们提高了学习的能力，增强了学习的信心，培养了学习的好习惯，播下了中华



网上夏令营部分营员留影

文化的种子，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短短 15 天，营员们从最初的怯生到大方自信，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的认识，纷纷表示参加夏令营活动非常开心，期待疫情过后有机会在中国相聚。

“等疫情结束，我一定要回中国看看。”这是众多华裔青少年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2020 难忘的夏天，遍及五大洲 50 多个国家的 6.5 万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参加了“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活动。广东营的 3500 名营员通过听故事、看视频、动手做、云直播等方式游览了风光旖旎的南粤大地、领略了多姿多彩的岭南文化、品尝了精致可口的粤式美食，粤剧之美、禅武之韵、美食之味深深镌刻在营员心中，伴随着营员们度过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欢乐旅程。

“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为华裔青少年了解中国地大物博的地域文化和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提供了重要平台。营员们培养了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提高了中文表达能力，增进了对祖籍国、祖籍地的了解，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领略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等中华传统美德，开阔了视野，理解了日月同天、山月同在、和谐共生的理念，得到海外侨界和驻外使领馆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岁末，寒风吹起，网上夏令营却热度不减。如今，“亲情中华”网上冬令营正在继续，海外华裔青少年们继续在“云上”品读中国，通过云端饱览中国风景名胜，感受中国大好河山，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将成为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友好使者。

文化交流基地里的中国故事

文 祝顺祥（广东侨界作家联合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20 年 11 月，中国侨联确认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和珠海市容闳博物馆、台山市大江镇等 93 家机构和单位为第八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至此全国共有 363 家基地，其中广东省有 18 家。文化交流基地是中华文化的展示窗口，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讲好文化交流基地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推进中外人文交流意义重大。

侨批故事

2020 年 10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参观了具有潮汕侨乡特色的侨批文物馆。他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加强研究，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

汕头市侨批文物馆于 2004 年开馆，是全国第一个侨批文物馆，由香港知名人士庄世平先生、饶宗颐教授倡导，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建立，海内外热心人士给予大力支持。侨批文物馆总面积 200 多平方米，“潮汕侨批文化图片展”展出包括侨批的历史轨迹、华侨侨眷生命线、侨批文化的研究、筹办侨批文物馆四个部分的照片 200 幅，还陈列部分侨批原件、送批用具等文物。侨批文物馆已征集到侨批原件近 3 万封、汕头市民邹金盛收藏的侨批复印件 3 万多封、汕头市民麦保尔录制其收藏的近 4 万封侨批的 32 片光盘和泰国许茂春先生珍藏的一些曼谷侨批局老照片，还有送批用的市篮、批袋、水布、纸雨伞等文物以及有关侨批研究的文件、书刊。其中，一封 151 年前旅居泰国的父亲给在家乡的儿子寄



汕头侨批文物馆



侨批文物馆馆内雕塑“揭批”



马来西亚侨胞参观侨批文物馆

了 10 块洋元的侨批，成了迄今全国收藏年代最古远的华侨历史文物之一。

侨批，俗称“番批”“银信”，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广泛分布在广东、福建、海南等地。近代华侨先辈为生活所逼或为逃避战乱，远渡重洋，到东南亚及其他国家谋生。当时国家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因此海外侨胞捎回家乡的款项和信息，主要是经由“水客”、“客头”及海内外的侨批馆递送，这些“水客”不仅得熟悉侨居地和家乡两地的环境，还得有良好的个人信用、人脉关系，他们多以寄宿的客店作为收集侨批的据点，将华侨信款带回国内亲手交给侨眷，或是先用所托批款采购货物回乡，待出售后再将原款及批信交给侨眷，而“水客”们还必须取得收款人的回信，并将它带给汇款人才算完成整个作业。后来，随着侨批递送量不断增长，就产生了完善的侨批经营机构——批局，而现代邮局、金融机构的出现也促进了侨批业的发展，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侨批业就归入银行统一办理。

2013 年，“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此次申报的侨批包括潮汕侨批 10 万余件，五邑侨批 4 万余件、梅州侨批 1 万多件、福建侨批约 1 万件，这些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档案真实记录了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向亚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迁移历程，是华侨华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历史符号。

侨批是华侨移民史、创业史及广大侨胞对所在国和祖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做贡献的历史真实见证，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哀之父母生吾哺劳，生不能尽养，死不能尽哀，不能亲侍膝下，亲视含殓，子职有亏，罪孽深重。本想回家奔丧，皆因天涯远隔，况又身边如洗，两手空空。”这是吉隆坡华侨吴竟明 1936 年写给妻子的侨批。泰国华侨陈鸿程写给摔伤的母亲：“慈亲大人尊前启者，今天由朱锦渠邮信内云及，母于上月底不幸跌伤，势颇严重，恕儿在外未能晨昏奉侍，实深遗憾。伤势如何，祈续示知，兹付港银伍佰元，为大人留身边零用。”泰国华侨杨捷的侨批，他寄国币 5 万元，信的备注栏里只写了一句话：“见信至切赎回吾女回家。”因为中国战乱频仍，因为侨汇中断，家中侨眷不得不卖儿鬻女度日。一封封侨批，浸透着海外侨胞的血泪和汗水，蕴含着他们对祖国、故里和亲人的一片深情，昭示着他们对家乡、骨肉的责任感。

侨批展现了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情系故里的家国情怀，吃苦耐劳、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笃诚守信、讲义修睦的高尚品质，融通中外、博采众长的人文特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拓展。侨批被视为华侨历史文化的“敦煌文书”，通过侨批，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侨胞与国内眷属的“亲情”、与故里的“乡情”、近现代中国的“国情”以及国际风云变幻的“世情”，更能从这些重要历史片段中，感受到华侨精神的伟大力量。我们要认真讲好侨批中的爱国爱乡故事、拼搏奋斗故事、文化传承故事、民心相通故事，推动广大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薪火相传。

容闳故事

珠海市容闳博物馆位于香洲区南屏镇东大街，是在容闳 1871 年带头捐款建设的甄贤社学（甄贤学校原名）旧址上修缮改建而成。场馆总面积 800 多平方米、展陈面积 600 平方米，设有陈列展览区、场景复原区、研学课堂区、影像播放区以及服务设施区等五大展区，以时间为“经”，事件、人物为“纬”，利用历史文献、现存文物、图片影像资料等多种展示手段和元素，多方位展示珠海留学文化史。在陈列展览区中，200 多张珍贵的图片展示了容闳 84 年间的人生经历，着重展示作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生的容闳与 120 名孩子在海外艰苦求学的历程。在博物馆的场景复原馆，借助全息投影黑科技，现场复原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历史场景，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展体验，让参观者仿佛身临其境，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受容闳的留学报国精神。

容闳，原名光照，谱名达萌，号纯甫，1828



容闳博物馆序厅

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现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自幼年至青少年时代，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后留学于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为了使“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了祖国。他首倡、策划、促成和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的派遣，积极从事社会改革活动，向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多次建言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政治、文化，竭力倡导发展民族经济、教育事业和实业，提出了发展中国近代铁路、水运、矿业、商业，建立国家银行的美好蓝图，后来又投身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晚年又支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的一生顺乎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为西学东渐、富强国家而不懈奋斗，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容闳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一是参与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二是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成为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1868 年，容闳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1870 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获得朝廷的批准，1871 年 8 月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陈兰彬负责留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 1881 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 30 人，其中工矿负责人 9 人、工程师 6 人、铁路局局长 3 人；从事教育事业者 5 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 1 人、北洋大学校长 1 人；从事外交行政者 24 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 12 人，外交部部长 1 人、副部长 1 人，驻外大使 1 人，国务院总理 1 人；从事商业者 7 人；进入海军者 20 人，其中 14 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幼童留美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时代，它揭开了中国官派留学教育的序幕，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之外又开辟了一条高级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同时对旧式的封建教育以巨大冲击，国人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追求乃至价值观由此渐渐发生了新的转换，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的涌入中国也因留学生这个特殊媒介跨入了一个更加广阔和深入的新阶段。

大江故事

大江镇位于台山市北部，户籍人口 4.7 万人，旅居世界各地的乡亲 8 万多人。大江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先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雷洁琼女士的故乡。为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合作与交流，大江镇充分整合传统家具产业、侨乡文化、爱国主义和名人故里等地方特色文化元素，着力打造华侨历史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特色精品小镇。

雷洁琼纪念园位于大江镇河木锦龙村，以打造广东省统一战线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思想政治教育基地为发展定位，同时以古民宅、古洋楼、古牌坊、古榕树、古村道、美丽田园、荷塘小溪和山林花海为资源，打造珠三角乡村旅游点，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雷洁琼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1905 年出生在一个华侨之家，从小就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14 岁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登台演讲痛陈北洋政府卖国罪行，怒斥帝国主义强盗行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她毅然奔赴江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妇女运动。她撰写文章、举办讲座、创办刊物、发动群众、培训妇女，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深感失望，积极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以强烈的爱国热忱投身国家建设，在参政议政和科研教学的不同岗位，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



雷洁琼故居

大江公益古埠位于大江镇北部、潭江南岸，原名宁海埠，后称公益埠，意在“公共得益”。1906 年，新宁铁路开建，公益埠被选为新宁铁路一大站点，吸引了大批华侨和外地富绅落户经商，很快掀起了建设热潮，公益埠实现了从河滩到大埠的转变，成为当时台山的第二大圩镇，又是台山对外的交通门户。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新宁铁路的后勤基地，教堂、银号、学校、医馆、照相馆、电灯公司一应俱全，各类商铺林立。文学巨匠巴金先生 1933 年乘坐新宁铁路火车渡轮到公益埠访友，创作了著名散文《机器的诗》，描述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赞美这段铁路为“最美丽的工程”。公益埠由九条笔直的街道呈“井”字形分布，是归国华侨按照当时美国纽约的城市布局规划，整体呈繁体“無”字形。公益埠还率先引入预设下水道、电线的城市建设理念，历来有“纽约街”之称。公益埠每条街的功能都有规定：南华街是高级住宅街，两旁都是带花园的洋房；中兴街是海内外知名的金融街，银行、金铺、钱庄、银号聚集，当时有十多家金融业商家，包括钜丰银号等；中兴街都是商铺，除了布，什么东西都卖，和专门经营丝绸、纺织品的苏杭街是最旺的两条街。公益埠建成后，各行各业兴旺发达。公益埠是台山最早的洋楼群代表。全埠约有 130 多间洋楼，建筑兼具了传统中式与西欧风格。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宁铁路设施及高度繁荣的公益埠成了敌机狂轰滥炸的重点之一，有 67 间楼房被炸毁。1945 年 9 月 28 日，盘踞江会地区六年半的日寇在公益埠胥山纪念堂签署了投降书，正式向中国军队投降。公益埠作为抗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台山营参观伍炳亮黄花梨艺术博物馆



骨山纪念堂



江山多骄国际文旅展贸城

日战争受降地，见证了重要的历史时刻。

大江镇还有一系列具有侨乡特色的文化场所。伍炳亮黄花梨艺术博物馆是全国性黄花梨家具的艺术鉴赏、交流和研究的顶级平台。江山多骄国际文旅展贸城由上海世博中国馆设计者——何镜堂院士团队负责设计，融入了岭南地域和侨乡特色的骑楼建筑与园林建筑风格，致力于打造集传统家具展销、侨乡主题文化餐饮、休闲娱乐度假、青少年研学旅行等四大板块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认定的“中国工艺美术产业基地”。作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大江镇将继续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传承好中华优秀文化，实现华侨文化的多元化、国际化。

全省文化交流基地通过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在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凸显岭南文化神韵，提升侨胞文化自信，引导广大侨胞热爱祖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文化交流基地要进一步挖掘华侨精神，将“以侨为桥”讲好中国故事、侨乡故事，促进中外民间友好交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侨界力量。

十五载风雨兼程护侨路

文 何尚

“侨联的同志，帮帮我吧，我遇到困难了。”从侨房历史遗留问题、贫困归侨生活保障问题到侨商投资问题，当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遇到困难时，他们往往第一时间想到向“娘家”——侨联求助。

为了当好“娘家人”，更专业、高效地维护侨界群众的合法权益，2005 年 6 月 27 日，广东省侨联法顾委经广东省侨联党组批准正式成立，委员主要由政法战线领导和退居二线老同志、人大政协专门委员会和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及高校一些专家学者、律师组成。十五年来，法顾委在广东省侨联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国侨联法顾委的关怀指导以及广东省直各部门、各市县侨联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尊尚宪法、尊重法律、维护法治为准则，为维护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中国侨联的充分肯定和侨界群众的赞扬。2007 年、2012 年，广东省侨联法顾委两次被中国侨联授予“维护侨益全国先进集体”。

护侨益，暖侨心

十五年来，广东省侨联法顾委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在广东省侨联法顾委成立15周年纪念交流会上，广东省侨联主席黎静为新增聘的法顾委委员颁发聘书



2019年9月11日，由广东省侨联法顾委主办、广州南沙区侨联承办的首届“依法维权，法治沙龙”活动在广州市南沙区香江国际科创中心举行

协调案件维护侨益。在有关地市侨联及部门配合下，协办维护侨益各类案件 50 多件，挽回经济损失数亿元，收到感谢信、牌匾、锦旗 30 多面（件）；有 17 件案例被中国侨联《维护侨益案例选编》采用。近年来协办的案件聚焦几个方面：一是落实侨房政策确认产权，约占 20%；二是化解涉侨经济合同纠纷，约占 50%；三是追索知识产权被侵犯、印章被伪造造成损失；四是投资或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各占 15%。比如，美国纽约慈爱基金会主席蔡先生要求延租广州“清平饭店”经营权案；广东国际华商会常务副会长吴先生经营“新中国大厦”与小业主租赁纠纷案，原省侨联委员、南方医科大学马教授被“限高”案；侨企爵士科技公司中标广州高新区地块，得不到按时开发案，等等。广州、深圳、中山、江门、肇庆、佛山等地侨联法顾委在地方法院等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也协办了一批成功案例，依法维护侨界合法权益。

开展法治宣传。广东省侨联法顾委会同广东省法学会及广州市侨联、珠海市侨联举办了五场大型法治宣传活动。

配合侨联开展侨情调研。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7年机构改革两次重大政策调整阶段，广东省侨联法顾委开展了多次维护侨益调研：2008 年至 2009 年，法顾委对侨资企业开展在金融危机中不稳定因素调研，调研情况反映被中国侨联采用；2017 年冬至 2018 年年初，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法顾委会同广东省律师协会，对侨资企业开展法律需求及风险防范调研，调研报告入编《侨情专报》上报中央；2018 年 11 月，配合中国侨联法顾委主任张耕一行到广州、肇庆等地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示范点开展情况及侨情调研。在此基础上，抓点带面，于 2019 年 12 月，在肇庆举办了全省侨联系统维护侨益现场会暨维权干部、涉侨纠纷调解员学习活动。广州、深圳、肇庆、江门、佛山、梅州、中山、韶关等市侨联与法院建立了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广州市荔湾区实现了街道涉侨纠纷调解室全覆盖。

推动各地侨联法顾委建设。全省地级以上市侨联法顾委从 2005 年成立初期 8 个发展到目前 17 个。目前，除汕尾、肇庆、清远、阳江 4 市外，都成立了法顾委。

加强法顾委自身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维护侨益也要讲求合法合规，为此，广东省侨联法顾委制定了《法顾委章程》《法顾委工作规则》《协办案件受理登记制度》《用章制度》《法顾委主任办公会议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新时代，新任务

2018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指出，广东华侨华人众多，对外交流交往频繁，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更好开展对外合作交流。2020 年 10 月 12 日，习总书记再次视察广东，首站到侨乡潮汕，在广济桥、小公园面对热情围拢过来的群众深情感言：“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要求新时期打好“侨”牌，团结广大侨胞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共同努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侨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维护侨益工作也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

首先，侨界群众的组成结构发生新变化。华侨华人的第二、第三代等已经成为华侨华人的主体。粤籍侨胞有 3000 多万人，主要构成是新生代的华侨华人，以及近二三十年来新移居海外的一代人，新侨比重将增大。同时，近年来华侨华人的聚居地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主要聚居地在东南亚，如今北美、欧洲、日本、大洋洲、南非等地区和国家成为了华侨华人新的聚居地。

其次，侨界群众的知识能力结构发生新变化。近年侨界组织和海外归国人员参加的世界性、区域性、科技性的活动增多。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增强。他们从事的职业由餐饮服务等为主，转为高科技产业做主导。东南亚华侨企业多数已由新一代执掌，欧美国家则出现了大批由华侨华人创办的高科技、智力型企业。还有一个新趋势，就是留学人员大规模的回流，也即所谓的“海归派”。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 20 多年，国内有 40 多万学子出国留学，而目前已有约 14 万人回流，且学成归来的中国留学生仍以每年 15% 左右增幅逐年增加。

再次，侨界群众的政治、经济、法律需求发生新变化。当前，世界动荡不安，经济格局大变化。而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为广大归侨包括海归、侨眷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对法律服务、政策咨询提出了新需求。以前，对落实侨房政策和请求帮助解决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的法律咨询及服务较多，现在涉及的内容涵盖侨企投资优惠、税收、投资环境、建厂规划、从业资格认证、知识产权保护、涉侨纠纷调解、社会保险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内容越来越广泛，从原来比较单一的法律服务需求向全方位的法律服务需求转变。特别是 2018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后，侨联职能扩大，任务加重，法顾委接访的案件明显增加，涉及面更广，对法顾委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形势，广东省侨联法顾委正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爱侨护侨、业务精通、敢于担当的高素质的队伍，成为广东省侨联决策的参谋助手，依法维护侨益。



2019年12月25日至27日，广东省侨联举办全省侨联系统维护侨益现场交流会暨维权干部、涉侨纠纷调解员维护侨益工作学习活动



2019年7月3日，广东省侨联法顾委到广州市荔湾区侨联协调“新中国大厦”租赁纠纷案

庆 祝 广 东 省 侨 联 法 律 顾 问 委 员 会 成 立 十 五 周 年

15TH

维护侨益十五春秋

广东省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6月，15年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积极维护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及港澳台同胞在国内的合法权益，在提供法律咨询、开展调查研究、提供科学决策、协办案件、参与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2007年广东省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被中国侨联授予“维护侨益先进集体”。



广东侨联纪事

文 《华夏》记者 林辅毫

9月 September

9月1日至6日 广东省侨联第十二期海外友好社团负责人研讨班在中山大学举办。黎静主席为学员授课并出席结业仪式，谢惠蓉副主席出席开班式并致辞，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国亚萍出席开班式并致辞。

9月2日至4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领导同志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活动。

9月4日 邵瑾副主席赴中山出席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线上颁奖仪式。

9月7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省领导分管部门2021年预算专题研究会。

9月8日 省侨界仁爱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广州召开，选举郑楚雄为理事会理事长、林建光为理事会监事长。黎静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谢惠蓉副主席出席会议。

9月13日至14日 谢惠蓉副主席赴江苏南京出席202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研讨会——后疫情时代侨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9月14日至18日 全省侨联系统第三期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在五邑大学举行，来自全省侨联系统基层党组织书记及省侨联机关党员干部100多人参加培训。戴文威副主席出席开班和结业仪式并作辅导报告，邵瑾副主席主持开班仪式，二级巡视员曹堪宏出席开班仪式。其间，还邀请有关专家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辅导报告，组织学员到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及开平风采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廉政教育。

9月15日 黎静主席出席“美国潮商总会林辉勇主席向台山归侨文化博物馆捐款仪式”并讲话。

9月16日 省侨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江门市开平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暨廉政教育活动。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参加了活动。

9月20日 黎静主席、谢惠蓉副主席赴汕头出席潮汕星河奖第三十一届颁奖典礼仪式。

9 月 21 日　黎静主席到惠来县鳌江镇山栗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调研，并出席“爱心助学”捐赠仪式。二级巡视员曹堪宏参加了活动。

9 月 21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以视频形式出席第六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云开幕式并致辞。

9 月 22 日至 25 日　全省侨联第二期基层侨联干部培训班在广州举行，来自全省县级以下基层侨联干部、涉侨社团组织骨干、“侨胞之家”负责同志近 80 人参加。黎静主席出席结业仪式并讲话，谢惠蓉副主席出席开班和结业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9 月 24 日　邵瑾副主席赴深圳出席第三届粤港澳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论坛。

9 月 25 日至 27 日　省侨联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结合侨联工作实际，推动学习贯彻不断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组书记黎静主持学习研讨会，党组成员戴文威、谢惠蓉、邵瑾，二级巡视员庄有林、曹堪宏及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学习研讨会。与会同志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学习贯彻第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结合起来，联系自身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提出具体贯彻思路和举措。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深入学习研讨，进一步提高了政治站位、强化了理论武装、增强了过硬本领，更加坚定了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更加坚定了做好新时代广东侨联工作的信心决心。

9 月 28 日　谢惠蓉副主席赴中山出席“侨爱南粤 • 法治沙龙”活动并讲话。

9 月 28 日至 29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政协十二届十三次常委会议。

9 月 30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支持深圳开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部署推进会。

10 月 October

10 月 15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以视频形式出席 2020 江门“云上世青会”并致辞。

10 月 16 日　黎静主席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并结合侨联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10 月 16 日　邵瑾副主席赴广州增城低碳总部园调研园区建设和新侨创新创业情况。

10 月 21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10 月 23 日　省侨联在广州召开直属机关党员大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黎静主席出席大会并讲话，就我省侨联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戴文威、邵瑾副主席，庄有林、曹堪宏二级巡视员，以及机关和下属单位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了大会。

10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直属机关党员大会在广州召开，选举产生了机关第六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黎静主席出席大会并讲话，戴文威、邵瑾副主席，庄有林、曹堪宏二级巡视员，以及机关和下属单位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了大会。

10 月 26 日至 28 日　中国侨联副秘书长、经济科技部部长赵红英带队到汕头调研。黎静主席、邵瑾副主席参加调研活动。

10 月 26 日至 28 日　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长刘奇带队到江门调研文化交流工作并出席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揭牌暨恩平拉美华侨华人展馆仪式。二级巡视员曹堪宏陪同调研活动。

10 月 27 日至 28 日　谢惠蓉副主席赴浙江青田参加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侨联主办的涉侨跨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工作座谈会。

11 月 November

11 月 2 日　谢惠蓉副主席出席汕尾市“党建带侨建”工作推进会并讲话。

11 月 3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

11 月 7 日　戴文威副主席赴中山出席中山市侨界青年联合会 2020 年会并调研。

11 月 10 日　庄有林二级巡视员出席广州市侨务工作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并讲话。

11 月 10 日　庄有林二级巡视员出席 2020 年海外侨领进西关活动。

11 月 10 日至 12 日　“2020 海外华商南粤行”走进中山，共邀请组织近 100 名在粤华商开展为期 3 天的考察交流。黎静主席、邵瑾副主席参加有关活动。中山市委书记赖泽华会见了考察团一行。美国美东华人社团总会主席梁冠军、广东国际华商会会长郭泽伟、美国潮商总会主席林辉勇等参加活动。

11 月 12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 154 周年纪念仪式。

11 月 12 日至 14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11 月 13 日　黎静主席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11 月 17 日至 18 日　广东省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成立 15 周年纪念交流会暨维护侨益学习活动在广州举办。黎静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谢惠蓉副主席主持会议。

11 月 18 日至 21 日　庄有林二级巡视员赴北京参加中国侨联第二十五期干部培训班。

11 月 19 日至 21 日　戴文威、谢惠蓉、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省管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11 月 26 日至 28 日　庄有林、曹堪宏二级巡视员在广州参加省管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11 月 24 日至 25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出席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

11 月 25 日　邵瑾副主席出席第七届广州市侨文化活动日并致辞。

11 月 26 日　省侨联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党组书记黎静主持学习研讨会，党组成员戴文威、谢惠蓉、邵瑾，以及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学习研讨会。与会同志紧密联系自身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提出具体贯彻思路和举措。

11 月 26 日　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出席 2020 创交会后系列活动暨独角兽牧场三周年路演活动。

11 月 26 日至 27 日　黎静主席、邵瑾副主席赴惠来县鳌江镇山栗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11 月 27 日　谢惠蓉副主席出席第九届中国（深圳）海归创业大会并致辞。

11 月 27 日至 28 日　黎静主席、邵瑾副主席赴汕头商议筹办“创业中华 • ‘十四五’中国发展与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峰会”事宜。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　邵瑾副主席赴北京参加中国侨联第八届新侨创新创业成果交流活动和 2020 全国侨联经济科技工作会议。

12 月 December

12 月 1 日　2020 广东侨青联港澳及海外青年侨领研习班在中山大学开班。黎静主席出席开班仪式并授课，戴文威副主席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12 月 2 日　广东侨界青年联合会三届二次常委会议在广州召开。黎静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戴文威副主席主持会议，谢惠蓉副主席出席会议。

12 月 3 日　戴文威副主席赴东莞出席 2020 广东侨青联港澳及海外青年侨领研习班结业仪式并讲话。

12 月 8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由省人大侨民宗委轮值主办的 2020 年第四季度省“五侨”联席会议。

12 月 9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12 月 10 日　由中国侨联主办、潮州市委市政府承办的“亲情中华 • 战疫有侨——海内外侨界凝心聚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展”在潮州举行巡展开幕式，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副主席齐全胜出席开幕式并为展览揭幕。黎静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出席开幕式并为藏品捐赠者代表颁发证书。

12 月 11 日　由中国侨联、省侨联、汕头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创业中华 • ‘十四五’中国发展与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峰会”在汕头开幕，来自海内外知名侨领、侨界企业家、创新创业人士、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和双创联盟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主持开幕式，广东省委常委黄宁生、汕头市委书记马文田分别致辞。黎静主席、邵瑾副主席出席开幕式。

12 月 11 日　由省侨联支持指导，汕头市侨联等单位承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侨乡社会与华侨经济文化合作”学术研讨会在汕头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邵瑾副主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2 月 12 日　黎静主席赴珠海参加国际潮商经济合作年会。

12 月 13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出席省客属海外联谊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七届理事会就职仪式并讲话。

12 月 13 日至 14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

12 月 16 日至 17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政协外事侨委十二届四次全体会议。

12 月 17 日　黎静主席出席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侨联成立大会并讲话。

12 月 18 日　黎静主席赴中山出席中山市星级“侨胞之家”授牌仪式、第六届完美公益影像节活动。

12 月 18 日　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出席“2020 海汇全球 创赢未来”高峰论坛并致辞。

12 月 18 日至 20 日　戴文威副主席赴澳门参加“展望‘十四五’• 辉煌新时代”——2020 海外侨青高峰论坛。

12 月 21 日至 23 日　邵瑾副主席赴福建宁德参加“十四五”规划与侨务工作研讨会并发言。

12 月 23 日至 25 日　谢惠蓉副主席赴北京出席纪念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颁布 30 周年暨第二届“侨商杯”法律知识竞赛总结颁奖活动。

12 月 23 日至 25 日　黎静主席出席茂名市第八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并讲话，并在茂名、阳江市开展“侨爱南粤新春送暖”慰问活动。

12 月 26 日　邵瑾副主席出席中山市海外归国人员创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暨成立五周年晚会。

12 月 27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出席省潮人海外联谊会 2020 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并讲话。

12 月 28 日　戴文威副主席出席珠海市侨联七届三次全会并讲话。

12 月 28 日至 29 日　谢惠蓉副主席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公务人员文化协会成立 15 周年暨第六届理监事就职典礼活动。

12 月 30 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政协十二届十四次常委会议。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温暖前行

文 《华夏》记者 钟敏仪



美国华侨华人自发组织捐助医疗物品，支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2020 年，注定要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记忆。

新春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所有的宁静，给全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焦虑、恐慌和痛苦。长达大半年的抗疫大战，中国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效，但仍未胜利，同时海外疫情仍在蔓延，人们还在与病毒战斗中，中国经验正在帮助其他国家的抗疫行动，共克时艰。

在这场全球战“疫”中，侨界没有缺席，侨联勇于担当，凝聚起一股“侨力量”，一直在奔跑着、忙碌着，“打满全场”。

万水千山，斩不断海内外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当疫情席卷神州大地之初，国内抗疫防护物资告急，海外侨胞自发组织起来，迅速行动，以各种方式和渠道伸出援手，有的采购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祖（籍）国；有的发起抗疫募捐倡议书募集善款，筑起爱的长城；有的为奔赴一线抗疫的医务人员购买保险，送去平安……一笔笔资金、一箱箱物资、一份份爱心，如及时雨一般，涌向神州大地，填补了防疫物资的缺口，为中国抗疫工作注入了“强心针”， 奏响了海外侨胞情系桑梓的最强音，谱写了一曲海内外华侨华人众志成城，与祖（籍）国抗击疫情的壮丽凯歌。



海外侨胞向广东省侨联捐赠抗疫物资



广东省侨联向海外侨胞赠送侨爱心健康包抗疫物资



广府人联谊会向海外侨胞捐赠“粤抗1号”，支持海外抗疫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如牵挂祖（籍）国一般，海外侨胞对住在国也有着无法割舍的羁绊！在疫情向全球蔓延之时，来不及“中场休息”的海外侨胞匆匆赶赴“下半场”——投入第二故乡战“疫”中。他们与住在国民众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积极配合当地做好防疫工作，全力投入到帮助住在国采购物资的行动中，还纷纷捐款捐物，给住在国有需要的民众送去关怀，向第二故乡抗击疫情贡献华侨华人的力量，为海外疫情防控提供了助力，展现了新时代大国侨民的风采，向世界传递着温暖、信心和勇气，成就了一段中外民心相通的佳话。

奔走在与病毒搏击的道路上，海外侨胞并不孤单，侨联人也在全场奋战，架起桥梁，连接纽带，将爱传递得更远。

广东，这片历史源远流长的百越之地，是全国最大的侨乡，有 3000 多万海外侨胞分布在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也有近 3000 万归侨侨眷。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东省侨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挥侨务大省资源优势，上下联动全省各级侨联组织，广泛团结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凝聚起侨界力量，支援国内抗疫；在海外疫情告急之时，又及时给予海外侨胞“娘家”的关心与支持，叮嘱他们做好自我防护，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住在国抗疫，与他们并肩战“疫”，期待岁月静好。

再黑的夜晚也会迎来黎明。因为侨界的力量和担当，我们无惧疫情，温暖前行。待风雨过后，待雾消云散，我们一起摘下口罩，再聚首，笑看山河无恙。

加油，中国！

加油，世界！

谨以此文，向抗疫奋战中的每一位侨界英雄致敬！

梁冠军的“双向战疫”记

文 《华夏》记者 钟敏仪

“我们的根在中国，每逢祖国有灾难，海外侨胞都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这一次也不例外。”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得知“武汉封城”的消息，敏锐地觉察到国内疫情的严峻和形势的紧迫，他知道要马上行动了。

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梁冠军想起了2003年“非典”时期，海外侨胞驰援北京，同心抗击非典的事件，他也是支援祖国战胜“非典”的千千万万海外侨胞之一。有“经验”的他，放下手头所有事情，第一时间去采购防疫物资。

当住在国疫情暴发时，他又马不停蹄投入到与住在国民众并肩作战的战疫中去。

时隔十七年，再次面对人类与疫魔的战斗，梁冠军还是挺起胸膛扛起责任，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



梁冠军，广东省侨联海外顾问，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

血脉相连，驰援祖（籍）国

2020年伊始，跟大多数侨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一样，梁冠军和家人在美国正忙碌着准备年货，喜迎中国传统的农历新春佳节的到来。然而春节未至，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的消息迅速在美国华侨华人圈扩散。

梁冠军密切关注着相关的报道，一条“离汉通道关闭”的消息更让他心急如焚，“不能再等了，马上行动起来!”

梁冠军当即行动起来，联系了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荣誉总顾问邵连武先生和朱三东先生，利用各自掌握的相关资源，紧急订购口罩。

紧急分两批采购10万个医用N95口罩，立即发往武汉。美国时间1月23日，一个数量高达10万的N95口罩订单在纽约生成。第一批5万个口罩很快出货，梁冠军、邵连武和朱三东立即将货物交由空运，发往武汉，以三人的个人名义捐出，并委托湖北省侨联转交给一线医疗人员。第二批5万个口罩出货后，他们也立即从美国发往武汉，以总会的名义捐出。这是最早一批从海外运抵武汉的医疗物资，为急需防疫物资的奋战在抗疫最前线的医务工作者缓解了燃眉之急。

从1月24日开始，梁冠军的微信朋友圈也调至战“疫”模式，转发关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种信息，呼吁海外侨胞驰援祖（籍）国抗疫。

梁冠军在20世纪80年代从广州到美国闯荡，打拼出一番天地后，他积极参与当地华社工作，自1999年当选为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原名为“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至今，将总会发展为美国东部最大的侨团。随着深度参与华社工作的年岁越长，他的赤子之情也越发深沉、浓烈。“祖国有难，需要帮忙，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义不容辞。”梁冠军向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旗下的221个侨团发起抗疫捐赠倡议。很快，美东地区的侨团侨胞活动起来了，发动捐款，搜购物资。爱心捐赠源源不断，梁冠军更加忙碌了。但“经验”丰富的他，将各项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

2003年，也是一个春天，“非典”疫情暴发，中国内地是重灾区。海外侨胞自发捐款捐物，支援祖（籍）国抗击“非典”，渡过难关。当时被推选为美国纽约抗击“非典”救灾委员会主席的梁冠军，主持爱心募捐工作，亲身参与了一个个感动人心的故事，深



梁冠军亲自将口罩从美国带回来捐给广东省侨联

切感受到侨胞对祖（籍）国的情深意长。一位已退休的侨胞钟女士捐出了用退休金积攒的5000美金；侨胞李春平订购的8000只特种口罩在梁冠军的帮助下及时送达小汤山抗击“非典”一线，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也捐了约10万个N95口罩支援小汤山；数百名华侨华人冒着阴雨连绵的纽约天气赶往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捐款……十七年前的那些感动，瞬间清晰起来。

为了更高效地处理这次防疫物资捐赠工作，梁冠军吸取经验，推动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成立了紧急小组，负责联络疫情一线医院、物资报关等事务，其中最难度最大的是寻找质量可靠的防疫物资货源。“我向我的私人医生订了1000个医用N95口罩。”梁冠军说，海外侨胞各显神通，想办法向美国当地医院、向自己认识的诊所和医生订货，这里订100个、那里订几十个，积少成多。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先后捐出了五批抗疫物资，发往湖北、浙江、广东等有需要的省份。

1月31日，湖北省侨办发来感谢信：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美华总商会、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美国湖北同乡会（纽约湖北同乡会）等众多美东地区侨团侨胞、华校机构迅速组织，在短时间内就募集了400多万美元，并为湖北购买了大批的口



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向纽约市教育局、市府前线员工等捐赠2万个口罩



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向纽约市警察总局捐赠3万个口罩、300套防护服



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向长岛警察总局捐赠2万个外科医用口罩

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物资，支援湖北疫情防控阻击战。这份沉甸甸的心意，是你们情系祖（籍）国、心系家乡的一片爱心。

3 月 6 日，梁冠军再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作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专项基金，委托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转交国内相关部门。

像梁冠军一样为筹集物资奔波忙碌的华侨华人还有很多。“全球的华侨华人都在为防疫出力。”梁冠军说，他只是其中的一员。

守望相助，与住在国并肩抗疫

“遍布世界的华侨华人，不仅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而且与住在国的人民同舟共济、并肩战疫。”9 月 8 日，作为华侨华人代表的梁冠军受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抗疫斗争伟大实践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有感而发。

海外华侨华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追求者，在这场全球战“疫”中，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大国侨民的风采和大爱无疆的担当。

随着疫情席卷全球，美国也深陷疫情漩涡，而纽约成了全美疫情的“震中”。看着那每天上涨的新增确诊人数，“行动派”的梁冠军来不及从支援祖国抗疫的“上半场”缓过劲来，又奔忙起来了，赶赴支援住在国。



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向美国多家社区老人中心捐赠医用口罩

他乡故乡，对于海外侨胞来说，都是有着深刻羁绊的土地。“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需要携手同心抗疫，不分国家、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一起渡过难关。”此时，海外也如疫情初袭中国时“一罩”难求。而中国国内的疫情逐步得到有效防控，复工复产正在有序恢复，口罩产能也在不断加大。梁冠军和邵连武当机立断，在中国订购了 15 万个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分批加急运送至纽约，支援当地医护人员、警员等一线工作者，以及耆老、小孩等易感人群。

抗疫物资抵美后，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第一时间捐给有需要的人群。3 月 10 日、11 日，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纽约华人总公所率先行动回归社区，将 3 万个口罩先后分送给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的五个老人中心，以减少老人们暴露在病毒中的风险。梁冠军亲自给曼哈顿唐人街的华策会人瑞中心送上口罩，还捐了 2000 美元帮助该中心购买其他医疗物资。

3 月 18 日，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向纽约大学郎格尼医院捐赠了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缓解了一线医护人员面临的医疗物资短缺问题。

4 月 6 日，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派出志愿者，将 2 万个医用口罩送至位于纽约长岛纳苏郡 (Nassau County) 的长岛警察总局。警务人员不仅要巡逻维护治安，还要承担医院和其他部门的接警任务，感染病毒的风险极大。“因为缺少防护，现在纽约 3 万多名警察中，数千名警察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梁冠军说，警察总局很感激他们的雪中送炭。

4 月 26 日，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向纽约西奈山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捐赠了 100 个医用 N95 口罩和 200 套防护服，支援一线医务工作者加强防护。

……

陆陆续续，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及其会员单位已向纽约州立医院、纽约市教育局、老年人中心等，捐助了包括 20 万只医用口罩、5000 只 N95 口罩、3000 套防护服在内的大批防疫物资，支援纽约疫情防控工作。

多一个口罩，就多一份防护，更多一份战胜疫情的信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支援住在国民众抗疫的行动还在继续。

战“疫”仍未胜利，我们未曾离开。

余国春：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文 《华夏》记者 钟敏仪

客家人素有“忧国忧民、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余国春的家族里一代代恪守的优良传承。每当祖国有危难或需要的时候，余氏家族总是怀抱诚挚的赤子之心，或慷慨解囊，或声援力挺，或积极奔走，倾力回报那片与他们血脉相连的乡土。

2020 新年伊始打响的抗疫战争，余氏家族同样没有缺席，且活跃其中。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余国春就带领着家族成员不遗余力行动起来，主动捐款捐物，积极团结号召香港各界人士共同援手，支持香港和内地抗击疫情。

兄弟同心携手抗疫

得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荆楚大地的消息时，余国春正和家人在东南亚休假。一通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总署的紧急来电，让他焦虑万分：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抗疫前线急需大量口罩。余国春立即行动起来，发动朋友圈到处打听哪里有口罩出售。

余国春打了好多通电话给生意场上的朋友。但因在春节期间，不少朋友的工厂或公司都已放假，口罩存货不多。多方打听，才终于有好消息传来，一印尼侨商有存货 40 万个口罩。余国春马上联系这位侨商，先将这批口罩预订下来。对方把口罩规格发来，余国春传给香港特区政府核对。很快，得到香港特区政府确定的回复，在抗疫物资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余国春顺利地促成了这一大宗政府采购，带来一场及时雨。

身兼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广东省侨联荣誉主席、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香港嘉应商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梅州联会永远荣誉顾问等社会职务的余国春，更是身先士卒，响应中国侨联的抗疫捐赠倡议，带头捐款，并积极发动香港侨界社团踊跃支持抗疫。“有人捐 1000 港币，有人捐上万港币，也有人捐 100 港币的，”余国春回忆起那些捐款的感人场面，捐款人中有大老板，也有很多普通市民，“他们说悭悭地（节省些）都要出一份力。”看着那一串长长的捐款数据，余国春深刻地感受到，民族危难之际，大家的拳拳爱国爱港之情喷薄而出。满载着香港同胞深情厚谊的抗疫善款 209 万港币在几天内就转给了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支援祖国打赢疫情防控战。

余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陆续加入抗疫行列。余国春的弟弟余鹏春，是广东省政协常委、香港裕华国产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香港广东各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香港梅州联会谘议会主席，他也与兄长一起并肩战“疫”。他和兄长发动香港梅州联会筹集到 86.2 万元善款，慰问奋斗在梅州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积极回应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的倡议，和会董们共同捐出 500 万元，其中 200 万元捐予“全港社区抗疫连线”，300 万元捐予内地抗击疫情；向北京市捐赠了 10000 个口罩；多次捐款给受到冲击的中小企业和朋友，等等。余鹏春还亲力亲为，深入香港社区一线，向香港基层市民派发了 10 万个口罩，以及大米、消毒酒精、洗手液等；并和太太一起到佐敦道官立小学、少数族裔服务中心捐赠抗疫物品，向少数族裔施予援手，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

一个行程万里，由两国三地同胞接力完成的口罩驰援家乡抗疫的故事在梅州流传开来。2000 多个口罩，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印尼侨商郭桂和发动员工跑遍印尼所有药店一点一点采购积攒起来的，运输过程也历经曲折。印尼直飞广州的航班停飞，只能取道香港，于是郭桂和找到了余国春和余鹏春协助。“家乡有难，我们尽力而为。”余国春和余鹏春奔忙起来，直到口罩运抵梅州。“国春，感谢你和鹏春的帮忙。”梅州市外侨局副局长邓锐发来感谢。

抗疫尚未胜利，余国春、余鹏春仍在持续关注着疫情的发展，与祖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期待风雨后的彩虹。

家国情怀润家风

“有国才有家。”余国春深厚的家国情怀源于余氏家风的滋养。

余氏家族来自广东梅县松口（今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是从 20 世纪初走向世界的客家人。余国春的父亲余连庆先生为了生计，18 岁时随祖父过番，漂洋过海到了印尼经营百货业兼汇兑。1957 年，余连庆先生作为印尼华侨代表获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目睹祖国的欣欣向荣，



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代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接收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抗疫捐款（右四为余国春、右二为余伟杰）



余鹏春（右五）与爱心人士一起深入社区为市民派发口罩

感慨万分。两年后，余连庆先生举家迁往香港，联同侨居印尼的亲友合资创立裕华国货，推介国货。余国春仍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创办裕华国货的初衷：希望将中国优质产品经香港销往海外，同时想借此增加国家的外贸和外汇，“裕华裕华，富裕中华”。

“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里的客厅挂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松口元魁塔高高耸立，父亲常指着照片对我们说，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永远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家乡在梅县松口！”余鹏春动情地回忆起与父亲的往事。

余国春也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家里讲的是客家话，同时客家话也是公司的“官方语言”；在港英政府时代，不入英国籍就等于无国籍，出入境靠的是香港身份证明书，是受人歧视的“二等市民”，但即便如此，他们都未入英国籍。

父亲的赤子情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撒播于下一代的心田。

出生于印尼的余国春和余鹏春兄弟两人，从小便耳濡目染于这样的爱国爱乡家风中，对家乡、对祖国有着深深的眷恋与牵挂。

20 世纪 70 年代，余国春接到父亲的召唤，毅然回香港帮父亲打理裕华国货。后来弟弟余鹏春也从海外毕业返港，加入裕华国货，与兄长共同发展家族事业。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余国春、余鹏春兄弟两人从基层开始做起，逐步由副经理、副总经理到公司的管理层，将国外的新观念带入公司，树立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进了专业人才，渐渐把家族事业发展壮大。纵使历经风雨，兄弟两人仍坚守着这块生意，“以国货为本、以国货为荣”，初心不忘。如今，裕华国货已由小公司扩展为大集团，是香港国货业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成为国货销往海外的重要窗口。

事业有成，余国春和余鹏春也如父亲一样，不忘回馈乡梓，报效祖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的父亲为家乡兴学育才出钱出力，捐资 50 多万港元兴建“松口中学连庆礼堂”；以裕华公司名义捐资 18 万人民币兴建“裕华科学馆”；捐赠 13 万元支持松口中学八十周年纪念教学大楼兴建；捐赠近 2000 套学生桌凳给松口中学和官坪小学；捐资建梅县华侨中学校舍，以及修筑松口官坪河堤……

而余国春、余鹏春兄弟俩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近 20 年多来，为支援家乡建设已捐款逾 1000 多万港币。这也仅仅是他们热衷公益事业的冰山一角。

战“疫”中的青年担当

古语有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余氏家族的家风传承依旧在继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香港确诊病例渐增为社会带来恐慌时，余国春带领家族成员捐赠口罩之余，还及时安排了数百本由专业人士撰写的抗疫读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读本》派发给员工和侨界人士，并将读本的电子版扩散传播，提高大家的防护意识。

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开始陷入衰退，不少企业试图通过裁员减薪来激进自救。裕华国货却扛住压力，“公司虽面临巨大挑战，但不减薪、不裁员”，身为裕华国货公司董事长的余国春掷地有声地承诺，与员工同舟共济。

余国春的儿子余伟杰从小便熏陶于父辈的一言一行中，胸怀大爱与责任，挺起脊梁，与父辈一起撑起了沉甸甸的“家国情怀”，在战“疫”中大写青年的担当。



2020年8月26日，余鹏春（右四）向少数族裔服务中心捐赠8000个口罩和400份消毒液



余伟杰（中）带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青年委员会及时把抗疫物资送至医护前线



余伟杰（右二站立者）与侨青们分装抗疫护理包



香港医院管理局向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致送感谢状

“疫情时刻牵动着大家的心。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青年委员会和香港侨社志愿者积极响应中国侨联发出的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倡议，及时通过香港医院管理局了解到香港医护前线所需，在积极发动大家筹集善款的同时，多方与各供应商取得联络，以实际行动支援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香港医护人员和公立医院。香港侨青们齐心携手，集腋成裘，共同为抗击疫情出力，希望以微薄之力表达对香港医护工作者的敬意和谢意。”担任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副会长、贵州省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副会长兼青年委员会主任等社会职务的余伟杰，带领着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青年委员和侨社志愿者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疫，奏响青春凯歌。

2 月 14 日，余伟杰带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青年委员支援前线，筹得 40 万元善款，购置了 500 件医生袍，以及床单、床套、枕套、被套等急需物资各 500 套，捐给香港医院管理局，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援助；齐心协力将 20000 个口罩、4000 支消毒喷雾及《抗疫防护读本》分装制作成 4000 个“侨心送暖”防疫包，发放给有需要的人士；发挥创意，制作可以清洗循环利用的口罩，缓解口罩需求压力；为医护人员赠送消毒喷雾、护目镜等抗疫物资；给弱势团体捐赠口罩，同心抗疫；同时，他们还心系海外华侨，3 月 26 日，他们通过与伦敦华埠商会联系，向英国华侨捐赠了一批紧缺的口罩……

抗疫还在继续，感动仍在上演。“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余氏家族这样心中装满家国的人们，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温暖世界。

林辉勇：为战疫一线医护人员送“平安”

《华夏》记者 钟敏仪

所谓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1 月 24 日大年三十，全国各大医院接到国家关于组派医疗队支援湖北疫情防控的函，迅速反应，紧锣密鼓组织医务人员援鄂。除夕夜，广东第一支援鄂医疗队 133 名白衣战士披星戴月赶赴武汉，大年初一凌晨抵达，驰援汉口医院，成为全国最先到达武汉开展救治工作的医疗队之一。

一直关注着国内疫情发展的美国潮商总会主席、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执行会长林辉勇，被这些“负重前行”的最美逆行者感动了。“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林辉勇将这件事装进心里，认真地思考着，也立马行动了起来。



林辉勇，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美国潮商总会主席、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执行会长

发动捐款：众人拾柴火焰高

因为疫情来得令人猝不及防，国内医疗防护物资频频告急，甚至有不少一线医护人员只能套上自制简单“装备”踏上前线。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让林辉勇心急如焚，他迅速组织所在社团行动起来，驰援中国抗疫。

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林辉勇发动了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凝聚起更大的力量去打赢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斗。

1 月 28 日，美国潮商总会、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联合发出“众志成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专项募捐倡议书，倡议在美国各州潮商会馆、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九个分会等微信群中扩散。一石激起千层浪，群友们热烈响应，一场“爱心接龙”捐款活动在各大群里“炸”开了锅。短短几天时间，“爱心接龙”就出现了 300 多名爱心人士的名字。

“有的捐十元、二十元的，也有捐成千上万元的。”林辉勇说，在这次捐款中，有八九十岁的老侨，还有十多岁的华裔新生代听到父母的介绍后，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大家都是



林辉勇代表美国潮商总会、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为援鄂医护人员“送平安”

各尽心意，无论数额多少，都寄寓着海外侨胞支援祖（籍）国疫情防控的情深意长。天涯海角，隔不开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海外侨胞虽然身在异国，但时刻心系祖国、情牵家乡。祖国有难，他们总是挺身而出，拼尽全力支援。作为募捐发起人的林辉勇也率先捐出了 7 万美元，与大家一起以赤子之心担当负责、践行使命，大写殷殷家国情怀，为防控疫情贡献力量。

在支援中国抗疫的同时，美国潮商总会也与住在国民众守望相助，共同抗疫：安排志愿者在美国各州为需要的人士派送口罩，给纽约医务人员送爱心餐，等等。日前，美国潮商总会还在美国旧金山发起“关爱游民计划”，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免费派餐和送口罩，现已发送了 12 万个口罩，支援海外抗疫。

乐善好施：扬中华民族美德

都说潮汕人善商，但我觉得他们也更尚行善，林辉勇便是其中一个。对于行善，他从不吝啬，甚至出手大方，从他频频“出力”驰援国内抗疫的行动中，可见一斑。“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林辉勇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这一信念。

对家乡，林辉勇更是倾情相助。虽然他并不是出生于家乡，也没有在家乡成长，但潮汕儿女似乎天生对家乡的情感如浓稠的墨，深沉得化不开。正因为这种浓郁的乡土情结，让多少漂洋过海的潮汕游子，积极反哺家乡，回馈家乡。

十多年前，林辉勇带头资助家乡的“五保户”，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每年给村里考上大学的学生发放助学金，以帮助他们圆梦大学。后来不少从家乡走出去的企业家也跟着一起做，如今的家乡，在林辉勇等乡贤的资助下，修了新路，建了文化广场、戏台、老人活动中心、篮球场、五人足球场、儿童游乐园等，还不时有潮剧剧团来演出，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风光无限好。

在家乡遭遇灾情时，林辉勇第一时间伸出援手。2018 年 8 月 30 日，广东汕头潮南区内涝严重，一夜水城，多少人置身于水深火热中。林辉勇通过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分别向汕头市潮阳区慈善总会、潮南区慈善总会各捐赠 50 万人民币善款，用于“8·30”灾后重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林辉勇“投资”最多的一项公益慈善事业。2011 年，林辉勇捐赠了 1000 万元设立“星河辉勇师表奖”，旨在大力表彰潮汕地区忠诚于教育事业，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师，以树立典型激励广大教师为人师表、爱岗敬业，为潮汕地区培育更多更好的青年人才；同时让长年奋战在教育一线，尤其是坚守在山区和海岛教育岗位的教师得到更多的关爱。至今，“星河辉勇师表奖”已举办了十届，林辉勇为该奖项总共捐赠了 2000 万元。

作为侨界的一分子，林辉勇也积极支持侨界活动：近两年来，他先后通过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为广东省侨联定点帮扶的揭阳市惠来县鳌江镇山栗村捐赠 100 万元，向家乡惠来县靖海镇资深村捐赠 50 万元，助力脱贫攻坚战；向广东省台山市归侨文化博物馆捐款 30 万元，搭建侨界文化交流平台。2020 年 9 月 11 日，“京侨空巢陪伴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市华侨服务中心举办，林辉勇捐赠了 80 万元，关心空巢老侨的生活。

纸短情长，林辉勇行善的故事还有很多。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林辉勇在国内的公益捐赠累积达 6000 多万元。

订制保险：为一线医护送“平安”

截至 2 月 15 日，美国潮商总会和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共收到 530 个爱心单位和个人捐款，捐款总额达 350 多万人民币。这笔抗疫爱心款怎么用才更有价值呢？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林辉勇想起了那一批批自愿“请战”奔赴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能不能给在前线的医护人员送一份保险呢？大家送口罩送菜，我们可以试一下送保险啊！”

与商会同仁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购买保险。

在广东省侨联、广东省卫健委和北京市卫健委等有关部门多方协调与沟通下，商会与保险公司正式签订合约，为医护人员订制专属综合保



美国潮商总会向美国纽约的医务人员派送“爱心餐”，支援他们抗击疫情



美国潮商总会、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通过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捐赠250.8万元，向潮汕三市援鄂抗疫医护人员送上关爱金

险。“保险公司平时是没有这个险种的。且新冠肺炎作为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保险公司难以对其风险进行评估。但从为公益做善事的角度出发，我们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订制了这一特殊险种。” 林辉勇说。

这份保险除针对新冠肺炎进行保障外，又增加扩展到 40 种传染病的保障范围，依照双方合作协议及保险责任，从住院津贴、重症确诊和疾病身故三个方面进行保障。“捐赠款项已为广东省 2467 名、北京市 366 名援鄂的医护人员购买此保险，总保额超过 15 亿人民币。”林辉勇说，“我们希望这份保险能为他们送一份平安，希望所有医护人员最后都能平安回家。”

在订制这一特殊险种之时，林辉勇他们花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了保险公司扩展保障范围，希望能最大化地给予医护人员保障。然而，千算万算，终究少了一算，谁都没有想到增加交通意外险这一项，抗疫英雄王烁却不幸遇车祸因公殉职。

事情发生后，林辉勇找保险公司沟通，最终争取到了 25 万元通融险。据知情人士透露，林辉勇自己给英雄家人捐了20万，表达对英雄的敬意。

“他们的无私奉献，值得我们敬仰。”5 月 22 日，林辉勇代表美国潮商总会和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向援助抗击新冠疫情的 39 位援鄂潮汕医护人员发放关爱金，每人 3.3 万元，总额达 128.7 万元。

春暖花开，英雄归来。4 月 15 日，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正式离返京，这标志着地方支援湖北的所有医疗队全部撤离。

“他们日夜兼程，战斗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他们无私奉献，护我们周全，换山河无恙。”林辉勇还将持续关注这一群为了岁月静好而负重前行的英雄，铭记和传递他们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李君豪：与时间赛跑的战“疫”

文 《华夏》记者 钟敏仪

距离香港扩大“封关”还有 6 个小时，香港东泰集团主席李君豪匆忙抓起一包饼干和一瓶水，替换下司机，亲自开着粤港两地牌商务车从香港中环出发，赶赴内地。车上满载的 12000 个口罩，是李君豪四处寻购好不容易才筹到的一批抗疫物资，刚从孟加拉“新鲜”抵港。

2020 年 2 月 7 日 17:49，李君豪看了一下此刻的时间表，来不及跟家人打招呼，他在心里计算着香港至中山的往返时间，规划着行进路线，一定要赶在当晚 12 点前回到香港。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前两天对外宣布：2 月 8 日凌晨起，内地入港者都需要采取隔离措施 14 日。

于是，一场拳拳赤子心的驰援乡梓抗疫从香港启幕。

驰援乡梓，同舟共济赤子心

李君豪从来没有觉得回乡的路途是那么遥远。其实，自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以来，大湾区 1 小时生活圈就已开启，珠海、中山、澳门与香港四地的通勤时间因这座大桥缩短了很多很多。

“以前回一趟乡要好几个小时，路很不好走，颠簸得很。”祖籍中山市南朗镇的李君豪回想起第一次回内地的情形，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代父亲李东海拿一张支票回来，给南朗镇捐建一所幼儿园。

其实，李君豪此次赶赴家乡，一路上算是比较顺畅的，只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街上没什么车和人。”李君豪说，香港没有往昔的车水马龙，也没有熙熙攘攘的人流。疫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李君豪一心记挂着家乡人的安康，恨不得有一扇任意门，转瞬就能回到家乡将急缺的



李君豪，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市侨联副主席，香港东泰集团主席



李君豪参加“齐心抗疫送暖福袋传千家”活动



李君豪向香港社区的老人家送口罩

领了罚单，李君豪重新规矩启程。接下来的路程，平安顺利，出关、入关，晚上 8 点多，李君豪带着满车口罩进入中山。在路过老家的房子时，他也没有时间进家门，只是给管家打了电话叫他出来路边领了一点口罩，分给打理家里的工人，并告诉他们少出门，节省抗疫物资，然后就直接拉着口罩赶去中山市卫生健康局。

简短的捐赠仪式，中山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雷继敏代表接收了这批口罩。“请中山市卫生健康局转赠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李君豪道出捐赠意向，然后合影留念，就马不停蹄地“打道回府”去。

李君豪在微信朋友圈记下这特殊时刻：2020 年 2 月 7 日 20:40，12000 个口罩送到给中山市卫生健康局，马上要赶回香港过关了！

心愿达成，松懈下来的李君豪终于意识到肚子饿得咕咕叫。但他没有充裕的时间能在家乡吃上一口热饭。还有 3 个小时 20 分钟，14 日隔离措施就要生效了。疲惫饥饿，李君豪也只能独自硬撑着，因为这趟送物资他没有带司机，“当时疫情防控形势尚未明朗，风险比较大，我不能让员工去冒险。”吃下最后一块饼干，一瓶水也喝光了，将就果腹，恢复了一点精神力的他开车返回香港。

回到香港，夜已深，不少餐馆都已打烊了。李君豪在街边夜市摊档买了个盒饭，“终于可以安心坐下来喝一口热汤了。”23：29，他在朋友圈晒出了饱餐后的空饭盒，为这一天紧张的奔忙画上完美的句号。

香港往返中山，5 个多小时，李君豪“单枪匹马”与时间赛跑驰援家乡抗疫的赤子之情铭记于家乡人的心里。

子承父志，爱国爱乡写春秋

人们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疫情初发时，早已卸任公职的韩泽生女士接到李君豪打来问候电话，“君豪问我需不需要口罩。”这一情景，恍惚间，让她想起 17 年前的那通电话，忆起故人李东海先生，李君豪的父亲。那一年，全国暴发“非典”，李东海先生曾致电当年担任中山市委统战部部长的韩泽生，关心家乡的情况。

“你父亲从美国购置了一批免洗洗手液，寄回家乡，支持家乡人民抗击‘非典’。”韩泽生跟李君豪讲起了他父亲爱国爱乡的往事，还找到了他父亲在“非典”期间寄来的鼓励家乡人民积极抗击“非典”的信函。泛黄的信纸，李东海先生心系乡梓之情满溢于字里行间。如今故人已驾鹤西去，但他将自己的赤子之心传递给了下一代。“17 年后，君豪又送口罩来支援家乡抗疫，我很感动。”在李君豪的身上，韩泽生看到了家国情怀的传承。

李君豪的父亲李东海先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闯荡”香港，凭着一股韧劲和勤劳成就了一番事业。1962 年开始，他便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热心公益事业，乐此不疲。1970 年，他被推选为香港最大的民间慈善服务机构——香港东华三院的董事局主席，致力于香



李君豪（右二）驰援家乡抗疫，向中山市捐赠12000个口罩，中山市卫生健康局雷继敏局长代表接收

口罩送到他们手上，保护他们的健康。

在往港珠澳大桥方向的高速上，李君豪却被一辆警车叫停。“我以为是超速了。”李君豪说。“我们已经跟行一分多钟了，你还没回到慢车道上。”直到警察告知，他才发现，因为道路车流量少，他一不小心直奔在快车道上，“快速车道只有超车时方可进入。”

港的慈善事业。1989 年，他联合香港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发起成立“香港友好协进会”，其宗旨是团结爱护香港人士，推广与中外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同时，心怀乡梓的他积极为祖国做贡献，在北京、广东、河北、云南、海南、贵州、广西等地捐建了多所学校，尤其是对家乡的建设及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2006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授予他代表特区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

父亲的言行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李君豪。

“我 12 岁就离开香港在海外求学，在加拿大、美国、英国读书、工作很多年。”李君豪回想起与父亲的相处，“父亲是一个爱护家庭的严父，他说得很少，但他用实际行动影响了我。”

“他参与的，我也参与。”李君豪对父亲充满了尊敬，甚至兴起“模仿”的念头，延续父亲忘我无私和关怀社稷的热诚。

追随着父亲的脚步，李君豪持续支持中山市南朗镇的教育，给李东海理工学校捐资，设立李君豪奖教奖学金；连续多年支持中山市侨联举办粤港澳侨界青年创新创业沙龙和 2018 中山侨界群众文化节开幕式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音乐交流晚会，力邀香港金融、证券、科技、医疗、信息界等多位专家精英莅临中山，助推中山的发展……

回港定居后，李君豪跟随父亲参与了更多的社会活动。“父亲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副主任、政协文史委香港组的负责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他都在关心着祖国的发展。”跟着父亲深度参与各项社会活动，李君豪更加深刻认识到身为中国公民的责任与担当。

2017 年 12 月，李君豪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荣誉，更是责任。”李君豪积极履责，仅是 2019 年 1 月至今，李君豪就已提出了 17 项建议和意见，为国为港为乡，建言献策。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治理，李君豪很早就有关注。2018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成立，李君豪建议重点关注病毒暴发时的应急措施，尤其是经由空气传播的流行性致命病毒，“因为空气传播广泛而快速，一旦暴发，后果很严重，”并于同年 7 月提交了《关于国家应急管理部增加处置传染性疾病工作职责的建议》，“今年年初我整理出更详细的内容，提出《关于完善应急管理部以统一指挥、防范和处置突发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建议》，”经过进一步调研和深思熟虑，李君豪于今年年初在北京开会时，再次提议。

新冠疫情来得太猝不及防，会后回港，李君豪就投入到全球搜购抗疫物资的行列。“李君豪是第一位亲自送抗疫物资回乡的中山籍港澳同胞。”中山市一侨务工作者说，这份雪中送炭的深情，坚定着他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每次筹集到口罩等抗疫物资，李君豪都会争分夺秒捐送给有需要的群体。2020 年 2 月 22 日，他将一批辗转从泰国购买到的医用口罩捐给坚守在珠海市抗疫最前线的消毒清洁工人。香港各类社团及港区人大代表组织的“同心抗疫”活动，李君豪更是积极参与，积极捐款捐物，如：2 月 29 日香港广西社团总会、香港广西侨界同乡联谊总会联办“齐心抗疫送暖福袋传千家”向观塘区基层长者派发抗疫福袋；3 月 13 日工联会“工联抗疫连线”港区人大代表于九龙城派口罩和消毒用品；5 月 9 日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千万口罩献爱心活动”在港岛区派发口罩……李君豪深入香港社区、学校，送去抗疫物资，身体力行助力香港战胜疫情、共度时艰。

点点滴滴，李君豪承继着父亲的遗志，大写着爱国爱港爱乡的故事。

张钦伟：聚起“满天星”的抗疫力量

《华夏》记者 子言

回想起那段驰援祖国抗疫的日子，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会长张钦伟依旧心潮澎湃，“小时候，听说过很多关于华侨华人支援祖国抗日的丰功伟绩，尤其是南洋华侨义无反顾返回祖国大陆，投身到烽火燃烧的战场。他们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份爱国之情，当时的我只有敬仰之心，还没能深刻理解。”然而经过新冠疫情的洗礼，多了一个新侨身份的张钦伟与南洋华侨先辈的那份爱国之情产生了共鸣，使得心中的家国情怀变得更加浓郁：“华侨华人就像星星一样散落在世界各地。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祖国有需要时，我们就会聚起来第一时间为祖国服务。”



张钦伟，中国侨联海外委员，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会长。

众志成城的赤子情

新冠疫情在荆楚大地暴发时，张钦伟正在迪拜，通过新闻和国内亲朋得知国内的疫情蔓延迅速，口罩、防护服等抗疫物资急缺。

2020 年 1 月 26 日，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发起关于募集资金采购防疫防护用品的捐款倡议书，捐款接龙在商会微信群里不断叠加，阿联酋侨胞的爱心如涓涓细流汇成一股暖流，流向祖国。

时间就是生命，防控疫情刻不容缓。捐款、搜购抗疫物资、联络物流，张钦伟带领着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迅速行动起来，“三管齐下”，与时间赛跑。一拨人负责发动捐款，一拨人负责寻购物资，还有一拨人联系物流、通关事宜。“我们没有时间等捐款到位，所有工作都要同步进行。”张钦伟说，他们的朋友圈里几乎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医院防疫物资告急的信息霸屏。“我们的副会长许国锋、柯伟第一时间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并转发到商会的群里。”同时，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派出年轻会员在迪拜各大商店、药房搜购口罩。对照着采购清单，一旦发现口罩，立刻拍照发给相关医院确认，得到肯定回复后，大家都自觉先垫钱采购下来。



张钦伟（左五）代表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向家乡捐赠抗疫物资

“我们也借助商会里会员的生意渠道。有些会员在沙特做批发生意，尽可能透过他们的人脉和渠道与医疗生产企业联系采购。”张钦伟说，“一有物资，马上付款。大家都没有计较出了多少钱，多少力。祖国就像母亲一样，母亲生病了，需要什么，作为儿女的自当义不容辞。”

正是侨胞的这份赤子之情，阿联酋侨胞分别从 8 个国家购入的抗疫物资包括 N95 口罩、防护服、手套、护目镜等约 12 万套，汇集为阿联酋侨胞捐赠的第一批物资，以及协助国内热心乡贤采购的 20 多万套防护物资，1 月 28 日从沙特发出，于 2 月 1 日抵达广州和深圳，及时支援湖北。

一呼百应的接力跑

“第二批物资运输可谓一波三折。”张钦伟说，随着国内口罩需求日益增大，其他省份的物资采购也瞄准了迪拜这个全球知名的自由贸易之都。迪拜地处东西方交流的咽喉要道，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也是世界最主要的航空枢纽之一。

张钦伟“闯荡”迪拜是在 2001 年，那一年，恰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一次创业失败的他，打起精神在迪拜开启了第二次创业。一番调研之后，出生于汕头市潮阳区的张钦伟选择用来自家乡的“潮货”打开迪拜的市场。经过多年的打拼，张钦伟在中东闯出了一片天地，开设了服装批发城、手机批发城等国际批发市场，将“中国制造”的销售网络覆盖至中东、非洲等地。

2010 年，旅居阿联酋的广东侨胞、广东企业自发成立阿联酋广东商会，张钦伟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漂泊海外的游子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联络感情和互帮互助的温馨港湾。

想起 2003 年国内暴发“非典”时，远在迪拜的张钦伟虽然十分牵挂国内同胞的健康与平安，但只能干着急，“想表达自己的心意，却找不到组织。”这次抗疫行动，虽颇多曲折，“但有了商会，一呼百应。”张钦伟说，遇到什么问题，大家都同心协力去解决。

在商会的积极发动下，第二批 855 箱 N95 口罩也很快在沙特采购完成。2 月 1 日，物资送达沙特的吉达国际机场准备发往中国。但受疫情冲击，不少国家开始禁止口罩等医疗物资出口，同时多家航空公司停飞国际航线。第二批物资赶在沙特禁令前出关了，但转运至迪拜时，却遭遇阿联酋航空禁止托运口罩。“我们只能将货物从阿联酋航空的飞机上卸下来。”商会会员各显神通，紧急物色合适的航班，终于在 2 月 2 日装上了土耳其航空，绕道土耳其飞回广州。

但物资抵达土耳其的时候，一则消息又让张钦伟他们紧张起来了。“一架波音 737-800 客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比哈 • 格克琴国际机场冲出跑道时发生意外，机身断成两截并起火。”他们担心因为这个意外，航班会被延误或取消。庆幸的是，机场如常运转，航班准时发出。“这些医护物资，都是救命的物资，早一日送回祖国，就能帮助更多的人。”

几经周折，2 月 8 日凌晨 3 时，855 箱物资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下简称“白云机场”）。得知飞机落地的那一刻，张钦伟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接物资的“担子”，落在了恰好在国内的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副会长许国锋和杨经纬的肩上。2 月 7 日晚上，许国锋和杨经纬就到了白云机场候着。直到第二天凌晨 3 时接到物资，俩人一直忙碌于核对理顺捐赠物资，协助清关。终于在当天晚上 9 时，将第二批捐赠物资分发给湖北华润武钢总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深圳市第八人民医院、深圳市红十字会等医疗机构。有些医院等不及，直接派了救护车进入机场接收捐赠物资。所有物资派发完毕，俩人才疲惫地离开机场。



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捐赠的抗疫物资陆续抵达广州



在粤的阿联酋广东商会会员到机场清点和分发物资



抗疫物资抵达广州机场，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单位同仁在机场等了一个通宵，从凌晨3点忙到晚上9点，才将物资办理好清关手续并分发给各医疗机构

蚂蚁搬家的回国路

第三批物资的“回国之路”更加曲折。

“既然我们在这里做生意，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利用现有平台，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次搜购抗疫物资，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少医院直接开救护车到机场接收物资



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捐给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华侨医院的救护车

第三批100箱的抗疫物资好不容易又凑齐了，但运输再次成为“拦路虎”，沙特已开始限制口罩大批量出境。“我们只能将货物分散，请愿意帮忙的侨胞分批带过关。”蚂蚁搬家式的，来回花了18次，才终于将全部物资带到与沙特交界的巴林。到了巴林，没有直航广州的航班，又要转道巴黎，然后再从巴黎运回香港，物资绕了一小圈后才顺利抵达广州。

“货物的价值一次比一次贵，物流成本一次比一次贵，运输一次比一次难。”但张钦伟和阿联酋侨胞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快些、再快些将物资送回祖国，支援祖国同胞抗疫。

此时，张钦伟也回到了广州，与副会长许国锋、弟弟张钦贤赶往机场，抓紧清点第三批物资，全部安排好发往前线医院。“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这个春节阿联酋的侨胞们基本都在熬夜，以前我们的生活作息是看迪拜的时间，疫情期间我们已经‘调整’到中国时间了。”张钦伟笑着说，这下子不用倒时差了。

张钦伟还为家乡汕头带回来了商会募捐的一笔23万元善款，惦记着受2018年“8•30”洪涝灾害影响的家乡的灾后重建工作。得知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华侨医院的医疗设备多被水灾损坏后，张钦伟代表商会将这笔善款捐赠给医院用于购置救护车。

风雨过后见彩虹，历经数月，在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和海内外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抗疫情之下，国内疫情防控终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张福歌：一个赤子的担当

文 《华夏》记者 子言

年终岁末，2020年春节将至。张福歌早已带着家人回到江苏，张罗着过年事宜。然而，喜庆的鞭炮声还未燃响，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却席卷而来，扰乱了这个新春的节奏。张福歌取消了与亲友赴海外度假的计划，转而投入到紧张的全球搜购抗疫物资行列中，支援祖国抗疫，不负赤子心。

组建“全球购先锋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口罩成为健康生活的必需品，更是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保护安全的重要装备。春节期间，国内的口罩产能一时间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以致各大医院口罩等防护用品频频告急，药房、超市、便利店以及线上电商的口罩、消毒液等跟防疫相关的产品也很早就脱销并一直处于断货状态，全国陷入了“一罩难求”的焦灼时刻。

连日来，张福歌已收到不少寻购口罩等抗疫物资的求助信息。张福歌是永和发展有限公司（泰国）董事长，在东南亚国家都有工厂，路子广，也有人脉。同时，他还身兼着广东省侨联常委、广州市政协委员等诸多社会职务，所以向他求助的个人和组织都很多，希望通过他从海外渠道购买口罩。

当防控疫情的战役打响，香港广州社团总会募集了近300万港币支持抗疫一线。张福歌也是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的常务会董，在国外采购物资的任务自然落在他头上。

“福哥，我们的医生都在‘裸奔’，能否帮忙协调一批口罩?”又一个微信群里，张福歌收到一名湖南妹子的“求助”。虽然不认识这位群友，但张福歌还是答应想办法，在群里回复：“小妹，我努力帮你协调。”

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为了尽快寻购到抗疫物资，春节假期尚未结束，张福歌就将泰国和印尼的工厂停下来，把公司的高管、员工全部动员起来，组建成“全球购先锋队”，不分昼夜全球寻购疫情防控物资。

公司的高管和员工在东南亚行动起来了，坐



2020年2月4日，张福歌（左一）代表香港广州社团总会向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捐赠第三批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由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接收和分配，广东省侨联副主席谢惠蓉（左三）出席了捐赠仪式

镇在国内的张福歌也跟着忙碌起来，通过电话和微信遥控统筹着整个寻购过程，以及联系借用企业仓库暂存、安排物流、对接空运等，将一批批抗疫物资及时运送回祖国。“忙起来从早上 6 点工作到凌晨 2 点，几乎每分钟都在接电话或打电话，回复各个微信群的信息。”张福歌说，有时候起床了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也顾不上好好吃饭，连着吃了很多天的速冻水饺。他时刻守着两台手机，担心错过任何寻购抗疫物资的信息。

张福歌先后协助香港广州社团总会购买了四批抗疫物资。其中，2 月 1 日，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第一批抗疫物资——10 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从印度尼西亚发往中国深圳机场，由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完成清关手续后立即运回广州，并连夜配发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 月 2 日，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第二批 249 箱约 50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发往湖北、浙江和广东省内各医院，支援各地抗击疫情。2 月 4 日，香港广州社团总会向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捐赠了第三批疫情防控急需物资，这批价值约 70 万元的疫情防控物资从泰国曼谷抵达广州。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及时将物资捐赠给广州市政府，由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接收，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分配给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用于支持广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防疫工作需要。

此外，张福歌还协助了香港新界校长会、香港民建联采购超过 30 万个口罩；协助了北京怡海公益基金会采购超过 3 万个口罩、2 千多个护目镜与一批防护服。



张福歌（中）代表爱心人士向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管理局捐赠抗疫物资



广州地区政协香港委员联谊会捐赠抗疫物资（左二为张福歌）



张福歌（中）组织员工开展全球寻购口罩等抗疫物资行动



黄冈市中心医院接收到抗疫捐赠

争分夺秒“采购战”

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海外寻购防疫物资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海购的人多了，海外防疫物资也日益紧张，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张福歌说，最开始，他的员工通过东南亚当地工人的介绍深入到各个小岛采购，那时候口罩非常便宜，0.6 元一个，但后来就发展到 1 元多，甚至好几元一个，“5 万个口罩，这会是 5 万元，六个小时后就变成 10 万元，价格飙升得厉害，我们要做的就是争分夺秒。”

参与抗疫物资采购以来，张福歌新加了 20 多个微信群，方便采购对接。因为每个国家的口罩标准不一样，张福歌一找到口罩就赶紧拍照，把口罩的信息发到相应的微信群，向有需求的部门、医院反馈。“因为我不懂这些物资是否合乎他们的需求，所以需要密切地沟通。”得到肯定的反馈后，张福歌立马安排员工进行采购。

疫情当前，抗疫物资紧张，有时候多耽搁几分钟，交易就生变。“哪里来得及走流程、签合同，即便准备好现金，给了定金，遇到出价更高的，商家也会不卖给你了。”张福歌说，他们往往先自己垫付货款，把物资抢购下来再说。为了防止商家毁约，张福歌要求员工付款后，立马将物资运回仓库。看到物资安全进入仓库，张福歌才放心下来。

虽然一切都小心谨慎，但货不对版、坐地起价、毁约等情况也时有发生。“我记不清垫付了







张福歌组织员工在泰国寻购抗疫物资



张福歌向湛江市捐赠抗疫物资

多少，但口罩、防护服都是这场战斗的‘子弹’，孰轻孰重我们分得清楚！”在全球寻购抗疫物资的过程中，张福歌认识了许多为驰援祖（籍）国抗疫而到处奔走采购抗疫物资的华侨华人，虽然要面对各种风险，但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毫无怨言。

回首那些紧张的抢购时刻，张福歌将所有的艰难都释怀于风轻云淡的话语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对家乡始终是一片赤诚之心。疫情暴发后，他们自发行动起来，不顾辛苦劳顿，与祖（籍）国休戚与共。侨胞们这份拳拳赤子心，希望被社会上更多人理解。”

践行赤子担当

“小妹，你发个地址给我。”采购到口罩后，张福歌没有忘记及时给那位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求口罩”的湖南妹子发去 1 万个口罩。但对于亲朋好友的索要，他却是吝啬的。“这些口罩都是要捐出去的，也不是我的，我自己戴的口罩也是自己掏钱另外买回来的。”张福歌公私分明，帮别人采购的口罩，他一个都不会动。

当初低价买回来的口罩，他自己一个也没有留，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员工，所以当疫情蔓延至泰国时，他只能高价采购口罩发给员工。但他没有后悔，“我们享受着国家繁荣昌盛带给我们的荣誉与自豪，自然的，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应该团结在一起，行动起来，抗击疫情，与祖（籍）国共进退。”

物资的运输，也是一项挑战。东南亚飞中国的航班很多，张福歌首先选择空运，为的是第一时间把物资运回中国。

“海关、南方航空公司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张福歌说，南方航空公司开放了绿色通道，免费运送抗疫物资，“我们的部分手续是后来补的，我感谢他们的信任和担当。”

对接完货运，张福歌又要帮忙对接通关，并派人协助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工作人员到白云机场清关。而疫情期间，为确保相关疫情防控物资第一时间通关，广州海关及其下属白云机场海关设立了捐赠物资快速通关专门窗口，启动全天 24 小时通关，对手续不全的，实行先登记放行，后补办报关手续，确保了捐赠物资到港“零等候”，第一时间将口罩送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张福歌回忆起第一批运回国内的物资，在海关的协助和各方的接力下，顺利通关，及时发往抗疫一线。

随着一批批抗疫物资顺利抵达抗疫一线，同时国内的疫情也逐渐趋向稳定，一直处于紧绷的“战斗”状态的张福歌终于可以“功成身退”了。

除了协助他人寻购抗疫物资，张福歌自己也积极捐款捐物，其中捐赠了 12 万元给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用于购买抗疫物资，向黄冈市中心医院、湛江市红十字会、茂名市人民医院、广州市越秀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天津市海河医院等捐赠了口罩、酒精消毒剂、测温枪等抗疫物资。

天涯海角，隔不断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万水千山，斩不断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还有很多像张福歌一样的海外侨胞，心怀赤子之情，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非典到新冠，何磅礴的抗疫故事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早莺争暖树，新燕啄春泥。初春的广州一片新绿，生机盎然。然而新冠疫情的暴发，却使这座城市陷入了罕见的安静之中。大部分市民按照政府的指引，留在家中，路上车辆数量骤减，冷冷清清的气氛让人颇为不适应。

时任广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何磅礴很早就意识到一场“硬仗”即将来临。每年的 12 月份正处于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时段，而且将要迎来春运，人员流动大。每年这个时期，卫生监督所都有一些常规的防控呼吸道传染病的工作。但 2020 年与往年不同，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当年“非典”期间，最初的叫法也是用了“不明肺炎”这个称呼。何磅礴想，呼吸道传染病传播迅速，尤其在人员大量流动的春节，因此今年防控的力度一定要更强。

公共卫生领域的抗疫

17 年前的 2013 年，何磅礴曾经带领着广州市卫生监督所全体同事奋战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抗疫第一线。激战“非典”的场景时隔多年依旧历历在目，护卫人民健康的誓言时刻响彻心扉。如今，这位抗疫老兵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 1 月 10 日，他科学研判，率先谋划涵括防控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在内的春运期间卫生监督应急保障行动，全员加强戒备，提高防控级别、增强防控力度、增加应急人力，以医疗卫生机构及人流密集的地铁、车站、码头、大型商场、住宿场所等为防控重点在全市全面铺开专项检查。随着武汉疫情形势日趋严峻，他极具前瞻性地组织骨干力量开展针对肺炎疫情的专题研讨，并形成早期防控监督要点。2020 年 1 月 20 日，他当机立断，全程指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演练，补增卫生应急保障物资，做好随时迎战应战



广东省侨联常委何磅礴（中）带队到海珠区赤岗街下渡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的充足准备；靠前指挥，身先士卒在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等一线防控监督指导，组织全市卫生监督力量采取有力有效举措争分夺秒做好疫情防控监督。

1 月 23 日广东省启动一级响应，广州卫生监督防控在何磅礴和班子及全市卫生监督队伍的努力下，足足提早了 14 天开展防疫行动！时间就是生命！

接下来，何磅礴和广州市卫生监督所的同事们有条不紊地坚持依法防控。

在医疗卫生机构等场所，他们守住了传染源集中的第一阵地。广州市卫生监督所对省市定点收治医院、区级医院、专科医院的发热门诊、预检分诊、生物实验室、隔离病房、放射诊疗室等开展全方位督导；评估各级各类口腔、耳鼻喉专科医院及其他个体诊所，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指导帮扶，进一步保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站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好分级诊疗及防疫前哨的作用。



何磅礴（左）指导医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何磅礴（中）监督医院发热门诊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公共交通和酒店、宾馆等都属于人员密集、空气流通不太顺畅的地方，因此广州市卫生监督力量覆盖到广州地铁 16 条网线 271 个站点、25 个汽车客运站、2 个高铁站；对疫情发生地来穗人员定点接待酒店循环督导，对集中医学观察场所进行重点监督，至 2 月 22 日，全市已完成 3545 间旅业、332 间超市的全覆盖督导。

在疫情期间，酒精、消毒水等抗疫消毒产品一货难求，为应对、配合此次抗疫消毒产品市场需求，广州市卫生监督所不仅要加班加点审核消毒产品卫生许可申报材料，积极引导企业做好复工生产，还要对涉嫌违法违规消毒产品线索开展监督检查，规范生产行为，对查实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随着复工后“人潮”陆续返穗，广州市卫生监督队伍肩负职业卫生监督职能，主动作为，积极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指导帮助成百上千家工厂企业落实复工复产防疫措施，健全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体系。

随着疫情缓解，学校陆续复课，大批学生将要返校。广州市卫生监督所还重点加强对广州大学城高校、中小学学校的督导。应用互联网 + 技术，做好远程防疫教育、防控工作指导和培训，助力市—区—街镇三级联防联控工作，为广州市 380 万师生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除此之外，何磅礴还在疫情早期就破解“取得许可的放射诊断设备不能满足临床救治需求”等难题，促成广州市“在全国率先出台应急使用未取得许可的 CT 等诊断设备”等保障政策。



何磅礴参加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舍小家为大家

同事们不知道的是，何磅礴的父亲何悦强在疫情前已因病被送进了 ICU。每天忙碌过后，何磅礴还要继续拖着疲倦身躯到病床前陪陪老父亲，为老人擦擦身子说说话，天亮后又赶回单位参加防控。何悦强是国家海洋环境保护学创始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祖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之时，就义无反顾地携眷从马来亚归来参加祖国建设。何悦强时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受父亲的影响，何磅礴对侨的感情很深，积极参与侨界活动，被推选为广东省侨联常委。他从自身的业务角度出发，组建广东省侨青医疗服务队，为广东省内贫困地区的归侨侨眷提供义诊。2018 年，何磅礴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遗憾的是，何悦强在大年三十晚病逝，何磅礴在部署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监督工作后才匆匆赶到医院陪伴父亲最后一程。父亲毕生教导何磅礴爱党爱国爱民：国是千万家，为国舍小家！何磅礴知道，父亲一定理解和支持儿子——国家需要时就要挺身而出，人民需要时就要冲锋在前！护卫人民健康就是对爱国忠孝最好的诠释。

疫情暴发以来，广州卫生监督成效受到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第十八指导组肯定，广州市卫生监督所社区防控成效也受到越秀区委区政府致信感谢和肯定，广州卫生监督队伍向党和人民递交了一份合格的防控监督答卷。以何磅礴为代表的卫生监督战士慎终如始英勇奋斗，甘洒热血铸忠诚，奋力抗疫护民康。

天下潮人齐心抗疫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我们省潮联这次抗疫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及时!”

2020 年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当人们还在因为武汉市宣布“封城”而惊疑不定时，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以下简称“省潮联”）常务副会长、广东天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浩晖就以省潮联名义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赠 100 万人民币，紧急支援湖北省购买抗疫医疗物资，打响了省潮联助力抗疫的第一炮。

来自潮人的捐赠

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是由居住在广州地区的潮籍归侨、侨眷为主体的各界人士自愿协商组成，联络海外乡亲的民间联谊组织。1 月 28 日正月初四，会长蔡东士指示省潮联秘书处草拟并发出募捐公开倡议书，号召省潮联系统各部门、各专委会及各团体会员单位为支援抗疫积极捐款，并与第一常务副会长郑木明带头在本部捐款，此后还在下属有关专委会多次捐款。

募集善款倡议书发出后，省潮联全体成员纷纷响应，慷慨解囊。其中，名誉会长林佑钦捐款 30 万元，常务副会长张钦洲捐款 10 万元，通达电气公司捐款 10 万元，团体会员单位清远市潮汕商会捐款 8 万元，省潮联下属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张振海捐款 20 万元、名誉副主任李捍雄捐款 20 万元……

随着源源不断地接收到捐款，省潮联秘书处开始马不停蹄地四处联系购买物资。“我们做了很多‘无用功’。”省潮联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思斌无奈地说。与当时所有爱心人士想的一样，他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地通过各种途径与口罩厂商联系购货，但得到的答复要不就是缺货，要不就是口罩的规格和标准与医院急需的不相符。

“我们当时与某市的一个口罩厂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诺给我们发货。但后来该市政府要紧急统一采购，所以这批货最终直接被政府买走了，我们又没能买到。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所以后来我们觉得，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人士来做。”经省潮联主要领导研究同意，改为直接向广东省慈善总会捐款 100 万元，专门用于紧急支援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和广东中医医疗队三支奔赴武汉抗疫前线的救护队伍自行购买急需的防控医疗物资。

与此同时，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博士智库（以下简称“广东潮博智库”）的博士们也响应号召，积极参与抗疫。广东潮博智库是一个由广东地区潮籍（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市）博士专家组成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社会智库，也是一个由多学科高层次人才构成的专家人才库，其宗旨是：“促进学术、激发创新、回报家乡、服务社会”。

疫情初期，最缺的是医用 3M N95、1860 口罩，由于国内口罩厂供应不足，1860 口罩更是在多个国家售罄，广东潮博智库向海外侨团求助，最终从迪拜采购到 3M N95 和 1860 口罩。买到口罩后，广东潮博智库又先后遭遇迪拜停航广州、阿联酋禁止医疗物资出口中国等一系列突发事件。之后，广东潮博智库紧急向国家相关部委及广东省侨联求助，并动用全球多个潮汕社团的资源，最终 19360 个 3M N95 和 1860 口罩从迪拜转口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绕了半个地球才抵达广州。





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广东潮博智库向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中医院捐赠口罩

2 月 15 日上午，广东潮博智库主任谢龙汉，副秘书长洪水清、李少辉、周军伟等作为代表，将物资顺利送达广州各家医院。这批物资堪称“及时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接收次日，两名队员便带上防疫物资赶赴湖北；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马上安排现场等候的物流车，将部分口罩发往武汉前线医院；另一家定点医院的负责人喜上眉梢：“捐 1860 口罩的凤毛麟角，我们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笔的财富，我已经可以想象武汉医务人员戴上你们捐献的 1860 口罩的场景了。”

据悉，此次共有广州、汕头、梅州等市的 16 家抗疫一线的医院收到了这份绕了半个地球的情意，再通过定点医院专线物流接力送至湖北武汉、荆州和贵州毕节等地，将最紧缺的物资直接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潮籍博士勇赴抗疫一线

疫情发生后，广东省先后派出援鄂医疗人员共计 2248 人，其中，也包括了广东潮博智库的多位博士。他们是：刘王凯（中山一院）、洪澍彬（中山一院）、侯洵（中山一院）、刘斌（中山一院）、蔡跃新（中山二院）、郑海清（中山三院）、许文伟（南方医院）、赖钦涛（南方医院）、戎晓祥（南方医院）、李培武（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林立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林凯程（南方医院）、陈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谢维当（南方医院）、秦耿耿（南方医院）、许典双（暨大一院）。

刘王凯是中山一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广东揭阳人。2013 年抗击“非典”时，刘王凯正在中山一院实习，目睹并参与了抗击“非典”的工作。今年春节前，作为党员的刘王凯主动申请奔赴武汉一线抗疫。在小女儿三岁生日的第二天，刘王凯踏上了援鄂的飞机。在武汉期间，中山一院援鄂医疗总队入驻协和西院成人重症病房。刘王凯重新做起了住院医生，和队友们一起跟着上级医生查房，问病史写病历写病程，开医嘱查验单，学习深静脉穿刺，为病人做心电图，俯卧位翻身，送病人做 CT，跟病人聊天了解病人的状态和需求，等等。这些日常工作他做起来一丝不苟，且乐在其中。他说，自己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来到成人病房没法像呼吸重症医生那么专业，他们是真正救命的英雄！而他只能为这些病人做点小事，帮点小忙，起

的作用很小，但是能够做好一个住院医生的角色已经让他很开心，只要能为抗击疫情多尽一份力，再苦再累也愿意！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林立丰参与过抗击“非典”、抗洪救灾等多项任务。疫情发生后，他接连奔赴广东各地对 6 个市首发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深入病房做流调和院感防控调研等。2 月 10 日，他带领广东疾病防控专家组奔赴荆州，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使洪湖市在 24 小时内获得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资质，实现了洪湖市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零的突破。此外，他还积极协调培训当地流行病学调查队伍，搭建平台传授“广东经验”，为荆州留下一支带不走的精英团队。

南方医院放射科医生秦耿耿初到洪湖市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他和同事们一起梳理感控程序，安装设备；夜里，他会调好闹钟，凌晨 3 点起来盯着远程监控器，监督下班的医护人员脱下防护服。由于部分定点医院缺乏 CT 检测设备，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需耗费更高成本才能完成影像学检查。关键时刻，公益组织捐赠了一台应急专用 CT 机，进一步协助洪湖市控制疫情，秦耿耿这才能做回战“疫”的“侦察兵”。有时秦耿耿发现部分医生撰写检查报告不规范，就主动帮他们梳理，建立规范化的筛查报告和复查报告系统，方便与临床医生进一步交流。

疾风知劲草，行动践使命。疫情当前，广东潮博智库的博士专家们用大爱展现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而拼尽全力。

为海外抗疫解燃眉之急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疫措施，中国的疫情在 2020 年 3 月逐步得到了控制，但放眼国外，形势却不容乐观，全球的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抗疫物资短缺的问题。

天下潮人一家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潮籍人士约 5000 万人，其中旅居海外约有 2000 万人。在这紧要关头，国际潮团总会、第 21 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筹备委员会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发出了“全球潮人，同心抗疫”的倡议书，并成立“第 21 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抗疫服务志愿团”（以下简称“志愿团”），范思斌担任志愿团副团长。国际潮团总会现有会员单位 100 多个，除了潮人祖籍地广东省潮汕地区，其他海外潮团遍布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针对海外潮团防疫物资紧缺问题，志愿团决定向国际潮团总会下属的每个海外潮团赠送一万个医用口罩，并准备对防疫物资特别紧缺的潮团提供更多支持。

倡议书一经发布，得到了众多潮属社团和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截至 8 月底，收到 100 多家单位和个人的爱心捐赠约 250 万元，一次性口罩约 65 万个，以及其他类别的抗疫物资，总共金额约达 300 万元。

志愿团一线和后方工作人员同心协力，在接收各地爱心物资的同时，多方联系资质认证、防护物资和物流运输等渠道，并加班加点对物资进行打包和物流分输，每天还定时进行电话会议，了解海外最新疫情咨询，汇报每日物资情况、解决运输和海关等问题。

受海关通关、交通等因素影响，截至 8 月底，共有挪威、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瑞士、新西兰、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英国、日本、中国台湾、泰国、瑞典、荷兰、印度尼西亚、丹麦等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61 个潮属社团已陆续收到抗疫防护物资。

“这些潮团收到防疫物资都特别高兴，大家都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有些潮团会跟我们说，我这里疫情不紧张，你们把口罩捐给更需要的潮团吧！疫情面前，大家同心协力显得格外重要。”范思斌说。

乡情联四海，大爱跨五洲

——客联两会助力抗疫纪实

文 何尚

自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与广东省客联公益基金会（简称“客联两会”）经紧急协商，于 2020 年 1 月 29 日向全球客属乡亲发出联合倡议书，通过紧密合作，发动海内外客属爱心企业和人士捐赠物资，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贡献一分力量。

自联合倡议发出之后，两会会员通过两会平台直接认捐的数额已逾 20 万人民币，而两会会员通过其他渠道捐赠款物合计约 1200 万元。4 月 9 日，在武汉正式解封的次日，客联两会与广东省客家书画院又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捐赠口罩 10000 个，以实际行动继续支持战疫后续行动。此外，两会会员还以投身抗疫救护、防疫宣传、普法宣传及文创汇演等多种形式助力抗疫活动。

“硬橙”刚哥和客属白衣天使

冲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无疑是最可爱的客属白衣天使们。为数众多的客属医师与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一起，自疫情集中暴发之日，便响应党委政府的号召，主动前往最严重的湖北省相关地市参与救护工作。以中山三院附属粤东医院为例，此次共有 13 位客属医师参加广东省卫健委组织的援鄂工作，为抗击疫情做出了积极贡献。

坚守在广东肺炎定点医院的客属医师同样值得我们致敬，曾获“广东好人”称号的李刚教授就是代表之一。作为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客属医师专业委会主任，他同时还是中山三院粤东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双聘学科带头人、梅县区新冠肺炎专家组组长。年逾六旬的他家在广州，人在梅州工作。平时每周都要穗梅两地跑，颇为不易。春节以来，忙于抗疫的他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回过家。每天早上，他都要通过远程会诊系统，与在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连线。除了早上的会诊，还要 24 小时看着专家微信工作群，随时关注病人情况，指导一线医护人员。对此，李刚教授却毫无怨言。

在诊疗过程中，李刚教授专家团队发现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咽拭子核酸检测转阴性了，但大便样本核酸检测为阳性，便在国家发布的出院及解除隔离标准的基础上，对粤东医院收治的新肺炎确诊患者出院增加了大便检测阴性的选项，对防治新冠疫情起到了专业引领作用。此外，早在国家专家组发布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的前 12 天，李刚教授就对疫情作出专业预判，建议粤东医院

准备好负压病房。对此，大家都对李刚竖起大拇指，夸他是“硬橙”——在客语里是“厉害、了不起”的意思。

广东省客联客属医师专业委的其他成员也没闲着，他们经常利用客属医师联盟等微信群及时为客属乡亲宣传专业防疫知识，积极助力当地政府和群众做好抗疫工作。自疫情发生至今，广东省客联客属医师专业委先后在广东省客联官网及微信公众号上连续发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几类？每类有哪些应急反应措施》《疫情防控如何分区分级？餐饮娱乐场所等单位复业有哪些要求?》等防疫科普文章，从而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做好抗疫防疫工作。



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叶澄海担任董事长的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叶澄海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200万元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及口罩等防护用品，用于支援武汉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病毒不管时辰，疾病没有边界，说来就来。医爱没有大小，守护总在身旁，言到必到。正是这些平凡而质朴的客属医师们，与全国白衣天使一起，努力帮我们从病毒手中夺回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在日常生活中，法庭是律师们的战场，而疫情下，战“疫”成了客属律师们的另外一个战场。

客联两会联合倡议发出之后，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巡视员、广东省侨联法顾委主任、广东省客联顾问曾添贵先生除了自己主动捐款之外，还积极发动港澳汽车协会会长赖先生、邢先生向省禁毒基金会捐款 2 万元，为抗疫一线警察赠送口罩，其行为得到相关部门的一致好评。

广东省侨联常委、广东省客联执行会长、法律咨询工作委员会主任钟闻东律师响应倡议，先后向广东省客联公益基金会、广东省侨联仁爱基金会、天河区慈善总会捐赠 43999 元。在他的带动下，法律咨询工作委的其他十余位律师也纷纷解囊，共捐出善款约达 40000 元。钟闻东的行为还影响了他尚在读小学的女儿——钟艾小朋友。她除了精心创作了《科学防疫，健康生活》的宣传画之外，还主动把父母今年给的压岁钱 2020 元捐给广东省客联基金会，捐给武汉抗疫前线的白衣天使，让他们拯救更多的病人。

此次突发的重大疫情，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在捐款捐物奉献爱心的同时，广东省客联法律咨询工作委员会的客属律师们还积极响应省市司法行政机关及省市律师协会号召，发挥专长，钟闻东撰写了《新冠疫情背景下个人与单位的行为限制》、杨振锋撰写了《疫情影响下家族(企业)财富管理的再思考》、侯玫红撰写了《疫情下工资和加班费应如何支付?》、余亮撰写了《患者如在医院感染新冠肺炎，医院会有法律责任吗?》等四篇具有针对性的普法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升全社会关于疫情防控的法律意识。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法律服务团队，在线上线下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在战“疫”这个特殊“法庭”上，法律咨询工作委的律师们用自己的言行倾情演绎着“精英律师”的精彩故事。

用画作和歌声战疫的客属艺术家

广东省客联执行会长、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刘基青在疫情发生之初即捐赠医用防护服1000套，同时将自己收藏的书画作品进行拍卖，并将善款17.6 万元捐给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防疫部门。

广东客家书画院理事长、广东省客联顾问陈忠胜在得知医用物资紧张的情况下，向广东省客联公益基金会捐赠 2 万个口罩。



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青年工作委委员、客家音乐人陈善宝在2020年2月3日发起创作并组织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的歌手拍摄抗击疫情公益主题MV《民族脊梁》

“兄弟姐妹听分明，冠状病毒好惊人，疫情蔓延易感染，一旦染上难脱身；一旦染上难脱身，所以提醒大家人，勤戴口罩勤洗手，莫去出外寻开心。”疫情期间，一曲字正腔圆、清脆动听的新版客家山歌小调在客属地区广泛传唱，鼓舞了不少抗疫前线的客属人士。这是国家一级演员、有“客家山歌”皇后之称的广东省客联副会长徐秋菊最新创作的《客家抗疫山歌》。不仅如此，在广东省客联发表倡议书后，她当日即捐款 1000 元。受其影响，她的侄子徐炎辉也捐款 500 元。

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华人歌手共同心声的抗击疫情公益主题 MV《民族脊梁》，则是广东省客联青年工作委委员、客家音乐人陈善宝在 2 月 3 日发起创作并组织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的歌手，以及来自五大洲的华人歌手共 58 人倾情献唱并拍摄的。它展现出在疫情面前，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共抗疫情的信心和决心。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学习强国全国平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人民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 80 多家媒体纷纷转载。

陈善宝还带领学生何煜森创作了公益主题 MV《我为你祈祷》，以及

与梅州市新阶联成员共同演唱公益歌曲《你是光你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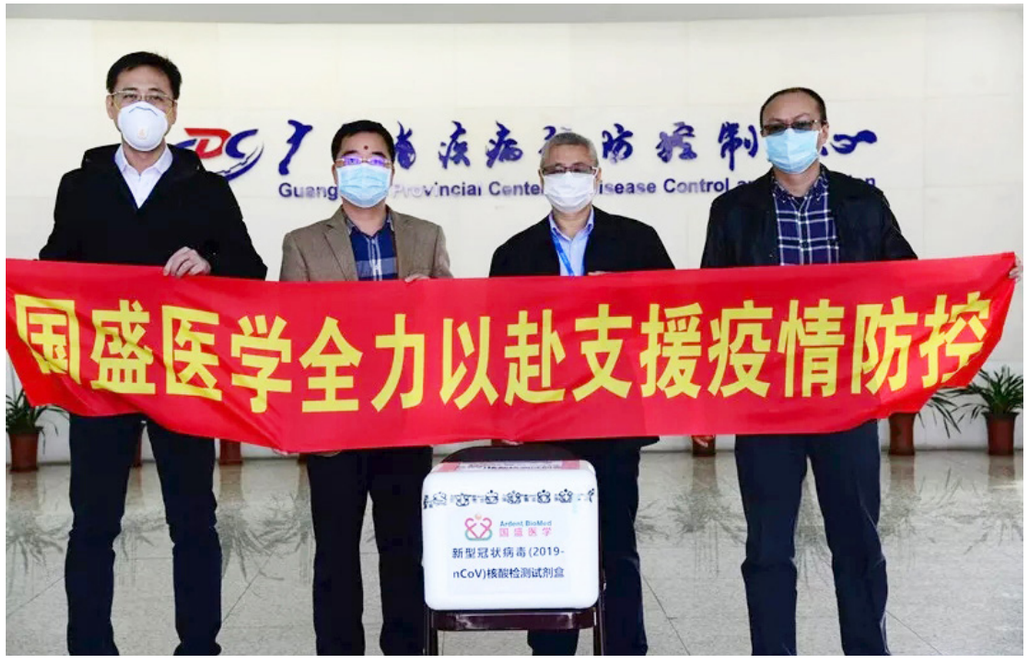
画笔与歌声也是抗疫的另一种独特的力量，客属艺术家们告诉抗疫前线的所有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抗战，每一位有情有义有善有爱的人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战疫行动里的客属企业家

战“疫”伊始，全国政协委员、金利来董事局主席、广东省客联名誉会长曾智明先生先后捐赠共 610 万元用于支援防疫第一线。同时，金利来集团向医院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累计捐助医用口罩超 20 万个，医疗手套超 6 万双，并为医院器械紧缺的武汉 15 家医院捐赠 200 台医院专用的空气消毒机。

在武汉各级医院医疗物资短缺时，由广东省客联名誉会长叶澄海担任董事长的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叶澄海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 200 万元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及口罩等防护用品，用于支援武汉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迅速蔓延之时，广东国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国盛医学”）董事长、广东省客联常务理事邓杏飞即利用过去 20 多年积累的分子基因诊断试剂盒研发经验，带领研发团队迅速开展设计、试剂反应体系优化和性能测试，紧急科技攻关之下迅速完成了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试剂盒的研发，并于 1 月 21 日成功推出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为抗击疫情注入科技力量。2 月 7 日，在广东省红十字会的见证下，由国盛医学联合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首批 3840 人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送达广东省疾控中心，余下 16160 人份的检测试剂盒于原材料到货生产完成后火速送达广东省疾控中心，两家公司联合捐赠共计 2 万人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用于疫情防控。



广东省客联常务理事邓杏飞博士的国盛医学发挥专业特长助力抗疫检测

由广东省客联副会长李秉彰担任董事长的广东珠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亚洲电器电缆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制造电线电缆的新兴民营企业。李秉彰在得知雷神山医院筹备的第一时间，当即决定捐赠价值 120 万元的电线电缆，全力支持雷神山医院于 2 月 5 日如期交付使用。除此之外，李秉彰还专门向梅州市有关单位捐赠 26000 余个医用一次性口罩和 N95 口罩。

由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省客联常务副会长陈公颜担任董事长的美之臣嘉大控股集团公司除前期捐出的 100 箱矿泉水之外，又继续捐赠 5000 箱矿泉水用以支持本次抗疫，捐赠品已按批向相关单位发出。

广东省客联顾问黄利玉女士控股的广州玉龙服饰有限公司以万怡君总经理名义向社会各界捐赠志愿者服装 3000 余件。黄利玉另捐款 300 元。

广东省客联副会长罗林辉捐赠医用口罩 1000 个。

广东省客联副会长钟伟强在 2020 年 2 月 21 日通过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捐赠 84 消毒液和 75% 酒精等物资给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康绿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裁顾惠林另外捐赠了价值 12600 元的牙膏、洗衣液给上述医院，共价值 36890 元。

除此之外，广东省客联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程琳捐款 21773 元，执行会长周强捐款 13999 元，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常务副会长捐款 52000 元，常务副会长巫金星捐款 10032 元，执行会长周强捐款 13999 元，副会长卢永胜 9999 元，常务理事卜映东捐款 20000 元……

在战“疫”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节，客属企业家们同样用他们大爱之心上演了一出出战“疫”的精彩故事。

战疫中的客属海外华人华侨

广东客属乡亲在行动，全球客属乡亲也在行动。加拿大全加客属联谊会主席、广东省客联顾问王文康和会长朱展伦也一直关注家乡疫情防控情况，在他们的倡议下，加拿大全加客属联谊会和温哥华客属商会共募得爱心款约 79.6 万人民币，定向援助湖北武汉和广东广州；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总会通过广东省客联公益基金会捐款近 30 万人民币；英国华人保守党主席、广东省客联海外荣誉会长叶谋迪积极组织旅英华人朋友捐款，第一时间购买抗疫救灾急需物资手套共 10000 副，一次性防护衣 1400 件赠送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广东梅州市人民医院；美国南加州梅州同乡会会长、广东省客联海外荣誉会长熊文胜得知家乡疫情后积极发动南加州客属乡亲奉献爱心，已筹 5 万人民币善款给梅州市；远在南美洲的广东省客联海外顾问、阿根廷广东商会会长余永辉等侨商得知家乡疫情后，捐赠了医用防护裤 44 条、医用防护帽 2000 个、医用普通口罩 13000 个、医用手套 2000 副给梅州红十字会；疫情暴发之初，香港梅州联会在广东省客联海外荣誉会长余国春、海外顾问余鹏春及罗活活等会领导的发动下，两天之内筹得 86 余万人民币善款，助力梅州抗疫；近期香港口罩紧缺，余国春向香港特区政府推介印尼供应商的渠道，供货给特区政府 40 万个口罩；广东省客联海外顾问、澳门兴宁同乡会会长何清标也在疫情暴发后捐款 2 万人民币……

疫情无情人有情，从广东客属到全球客属，从小爱到大爱，客属乡亲已与祖国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曾经凶猛可恶的疫情正在被“驯服”，抗疫胜利即将到来。

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 全球联动助力战“疫”

文 彭晓玲

“巴拿马是个小国，但好在大家都比较团结，才得以顺利购买到这批医疗物资。快递发货也是一波三折，但前段时间，我们总算成功地将这批医疗物资寄回国，真不容易。”看着这批满载着巴拿马江门五邑青年联合总会爱心的医疗物资被成功运回江门，第七届世青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温国伟总算松了一口气。

到2020年为止，世界江门青年大会（以下简称“世青会”）已走过了10多个年头，更是成为江门侨务工作中的一张闪亮名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内医疗物资紧缺的消息一经传出，墨西哥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英国江门五邑青年会等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便在第一时间积极响应。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让一批凝聚着五邑籍青年爱心的医疗物资在第一时间抵达了抗“疫”第一线。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海外侨胞行动及时，给予了有力支援，而其中，众多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常时期尽非常之责

非常时期，尽非常之责，做非常之事，显非常之担当。

当前，江门已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23个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逐步构建起世青会的全球网络架构。而这群五邑籍青年们也深知，只要凝聚在一起，就是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我在库拉索生活了30多年，但每年都会抽空回家乡看一看。如今家乡有困难，作为江门海外青年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我们更应该用行动来为家乡做点事。”库拉索江门五邑青年联合总会会长林锐兴说，自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库拉索的五邑籍青年就时刻关注着疫情动态。

当了解到国内各类医疗物资紧缺后，林锐兴等人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四处购买医疗物资，另一方面主动与江门市侨务部门联系。“正因为成立了这些世青会联络分部，我们才能及时得知该如何做好支援防疫工作。可以说，在本次医疗物资的筹集过程中，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发挥了巨大作用。”林锐兴说。

与此同时，跑遍了美国各地来筹集医疗物资的西雅图江门五邑青年会，却面临着医疗物资该如何顺利运回中国这一大难题。

运输虽难，却未能动摇这群五邑籍青年支援家乡的决心，他们以一种“蚂蚁搬家”的方式，将一批批医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回中国。“我们将这批医疗物资分为多份，然后每天去快递点邮寄回国，虽然耗时耗力，但我们觉得很值。”西雅图江门五邑青年会会长邝健成说。

合力保障物资及时送达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在此次抗“疫”中，团结协作尽显赤子之心。

“虽然目前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但大家依然愿意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家乡渡过这次难关，我觉得这就是世青会平台的魅力所在。”委内瑞拉江门五邑青年会会长李国忠说。

“疫情也牵动着每一位世青会成员的心。所以一收到江门市侨务局发出的医疗物资捐赠倡议书后，我们就立即行动了起来。”美东江门五邑青年会会长梅玮雄表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竭尽所能，守望相助，一定能释放无穷的力量。

英国江门五邑青年会副会长李剑荣表示，作为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中的一分子，他们真切地希望，能通过团结协作的方式，为家乡贡献他们的一分力量。

1月29日，当一批由墨西哥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捐赠的医疗物资顺利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时，北京海关、江门海关更是加强跨关区合作，为疫情防控物资开通绿色通道，成功做到了即到即提，实现了疫情防控物资通关“零延时”。

为尽早地协助海外侨胞将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回中国，江门市侨务局与市侨联的工作人员同样也在争分夺秒，协助海外侨胞办理物资运输和清关手续，只为及时准确地将医疗物资配送到抗



美国广东侨胞联合总会的工作人员搬运防疫医疗物资



货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将中墨友好促进会筹集的医疗物资快速包装



泰中侨商联合会正在将筹集的医疗物资进行装车



西雅图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成员们为中国加油，为武汉加油

疫第一线。

“最近我们筹集的这批医疗物资同样也遇到了运输难题，但好在江门市侨务局、市侨联等相关部门一直都在热心地帮助我们去进行协商沟通。”哥斯达黎加江门五邑青年总会会长吴海恒感叹道。

23个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正在积极行动

智利、悉尼、新西兰、伯利兹、秘鲁、多米尼加、巴西……分布在世界各地的23个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正在积极行动。积沙成塔，积水成河，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心正源源不断地汇入中国、汇入江门。

“第二批医疗物资，从墨西哥成功空运回广州后，将会加班加点地送往各大医院！”

“向祖国和家乡捐赠的本批医疗物资已经顺利到达，后续款物还将继续抵达！”

……

每当翻阅这群五邑籍青年的微信朋友圈时，关于捐款捐物的各类消息不断刷屏。经过多方筹集、日夜奔走，各个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的五邑籍青年们用汗水换来了一车车医用物资、一张张汇款单。他们捐献的物资来自世界各地，并在第一时间运回中国，昼夜兼程抵达疫情防控一线。

而这样一组组捐赠数字背后，同样也是一颗颗火热的赤子心。正如吴海恒所言：“我们在海外正享受着祖国繁荣昌盛带来的荣誉与自豪，自然的，面对本次疫情，作为炎黄子孙，作为世青会海外联络分部中的一员，我们更应互相支持，行动起来，与祖国、与家乡共进退。”

援疆归来，奔赴抗疫一线

文 陈华

2020年1月23日，广东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4日晚上，还处在休援疆假的我收到医院的紧急通知：取消所有休假，全体医务人员回院待命。我二话不说即刻结束休假返回医院。疫情就是命令，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服从医院的安排，直接投入到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按照医院的要求，我与科室全体医护人员一起腾空病区，随时准备接受任务，同时以高度的责任心认真参加了新冠肺炎防治知识学习和培训。

我接诊了病区第一批观察者，第一晚就接收10位观察者。我快速制定了科室收治流程，为后续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我是副主任医师，又是医疗组长，除了诊疗任务，还需要根据实际工作流程合理安排分配组员的工作内容、轮班时间，保证让每位医生既能出色完成任务，又能保证他们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保持自身抵抗力，才能打赢这场持久战。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毫不畏惧，冲锋在前，经常提前上班延迟下班，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仔细询问病史、做体查、开处方，希望通过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让患者快速康复。除了参加日常的病房救治外，我还坚持每周五出门诊，接诊发热患者，坚持践行自己读医时的《医学生誓言》：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同时，我也是科室（支部）的宣传人员，负责



作者简介

陈华，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副秘书长，广东省第十一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胸科医院内一科副主任医师，广东省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第五届委员会结核病专业组委员，广州市健康科普专家，广州抗癌协会（GACA）肿瘤感染专委会委员，2019年度“广州市胸科医院优秀党员”“优秀援疆人才”。





在病房改建和接收新冠筛查患者前，医务人员进行查房、评估原病房病人病情

陈华和同事穿着简陋的防护衣奋战在发热预检分诊处



疫情初期，因防护服等物资缺乏，医护人员大部分时间只能使用循环消毒的隔离衣，有必要时才穿一次性的隔离衣。图中穿粉红色鞋子的为陈华，与同事准备进入隔离区

宣传报道科室的各种先进事迹。工作之余，我认真记录科室同事们在战“疫”中的感人细节，向社会传播正能量，给予大家更多战胜疫情的信心。根据组织安排，我成为援鄂一线医务人员许柳清医生的“一对一”志愿者。接下工作后，我尽职尽责为前线的许医生保驾护航，解决各种后顾之忧，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每天了解许医生在当地的生活工作情况，与医院相关部门及卫健委紧密联系。

疫情期间，陈品儒主任医师因劳累过度病倒住院，在病区没有领导主持工作的情况下，作为科室唯一的高级职称人员，我与科室其他医生积极与医院医务科以及其他病区沟通协调，处理解决排班、流程上报等各种工作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保障。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最终的胜利还没有到来，更加需要我们的坚持。我仍然战斗在抗疫一线，坚定落实“内防反弹，外防输入”有关要求，在广州国际航班闭环防护的重要基地——广州市胸科医院继续战斗着……

博内尔岛上奏响了中国精神的“最强音”

文 恩乔（恩平市侨联）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有人开玩笑说：“疫情在中国是上半场，在海外是下半场。”在这场疫情中，居住在博内尔岛的华人以中国人自律、奉献、团结一致的精神，奏响了中国精神的“最强音”。

博内尔岛是加勒比海中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一个小岛，是荷兰的海外领地。人口大约有 2 万多，其中华人大约有 400 人，岛上的生产能力较低，生活用品完全依赖进口，主要靠旅游业带动经济。在上半场疫情中，岛内的华人自发组织捐物捐款，并想方设法与国内联系，遗憾的是由于物流不通，导致岛内华人的爱心无法运回中国。但华人们没有灰心，以各种形式私下捐物捐款，如：博内尔华侨会馆会长岑许文委托朋友给国内捐款捐物；老华侨星叔在回乡期间，不仅捐款捐物，还带领村里的亲人开展封村居家隔离，用自律降低了人际感染的可能性，为抗击新冠肺炎作出了贡献。

博内尔岛的华人还以微信等通讯形式与国内亲朋好友保持密切的联系，岑许文带头录制“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小视频，发给国内的亲朋好友，表达了岛内华人愿与祖（籍）国共克时艰，守望相助的心愿。岛内华文学校专门上了一节“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主题班会课，教育孩子做好个人防护，学习健康科普知识，做好体温监测，观看一系列有关疫情进展的报道，让孩子们知道祖（籍）国的强大，看到中国“力量”。

在下半场疫情中，由于海外疫情迅速蔓延，



博内尔岛华人向当地人捐赠“爱心包”



博内尔岛的华人为陷入困境的当地人准备的“爱心包”

中国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更发扬到海外。

虽然华人曾受到部分当地人的歧视和排挤，但在这次抗疫中，华人的中国精神令当地人另眼相看。岛内早期没有病例，但随着邻岛疫情相继暴发，政府下令封岛、停课。当地人由于生活习惯和观念等原因，没有戴口罩的意识，他们依然正常聚会喝酒。

但岛内的华人在华侨会馆的宣传和号召下，严格采取防疫措施：超市收银处拉起防护帘，每个工作人员都戴上口罩和手套，购物篮子不时消毒；饭店不开堂食，只开窗口，卖外卖；孩子们因停课开始网上学习，华文学校每周末也进行网上授课，华人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就这样，华人为当地人树立了典范，当地人也逐渐学习华人戴起口罩，做好控制措施。

在疫情面前，华人将博内尔岛的安全和利益放在个人的享乐和方便之前，用行动诠释了社会责任感。由于岛内防护物品短缺，2020 年 3 月 23 日在华侨会馆的倡议下，华人共捐款 21000 美元，想方设法从中国购买了一批防护用品如口罩、体温枪、一次性手套等给当地政府抗疫。4 月 25 日，封岛已一个多月，由于旅游业的停滞，导致不少人没有了收入，加上当地人没有存钱的习惯，因此陷入生活困境。而华人则习惯了存钱，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当地政府和教会呼吁华人伸出援助之手，华侨会馆积极响应，呼吁华人向当地人捐钱捐物。华人购买了罐头、米、面、面包、土豆、盐、油、水果、牛奶、果酱、饼干等食品，还有生活用品如厕纸、餐纸、消毒水、肥皂、洗衣粉等，26 个华人义工经过 9 小时的包装和分派，共送出 425 份“爱心包”给陷入困境的当地人。因此，很多当地人向华人投来尊重和赞许的目光，当地政府官员也在电视上公开表扬、感谢华人。

博内尔岛华人说：“在疫情面前，我们只有和当地人团结互助、共同面对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的背后有中国，虽然我们距离中国很远，但我们可以在这里展现中国精神。”

“这是华人的荣耀”

文 杨银竹

哥斯达黎加当地时间 2020 年 1 月 31 日，哥斯达黎加华侨华人紧急抗疫募捐小组成立，并第一时间对外发出募捐公告。哥斯达黎加华侨华人华裔协会会长、中山市侨联海外顾问翁翠玉主动担起募捐重任，前期援助祖国家乡，后期协助哥斯达黎加抗疫，不分国界，同心共克时艰。

一心只想把口罩寄回去

哥斯达黎加不生产口罩，筹集到资金之后，如何购买口罩成为一个难题。担心在药房或商店大量购买口罩会引起恐慌，翁翠玉便与当地华裔一起积极主动联系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最终买到 50 万个医用外科口罩。

屋漏偏逢连夜雨，物资的“回程之路”又遭遇航班取消，要如何将三吨重的物资寄回国内？翁翠玉问了很多航空公司，都说没办法。后来，一位在快递公司上班的华裔联络到快递公司，可以将物资寄回国内。“虽然运费高昂，但当时我们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只要能把口罩寄回去，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翁翠玉说。

2020 年 2 月 19 日，由哥华协会、旅哥中华总会、旅哥中山联谊会、中山协会、Puntarenas 中华会馆、Santa Crus 中华会馆、Nicoya 中华会馆捐赠的物资顺利交到中山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

有了经验，第二批物资的捐赠、运输更加顺畅。第二批寄回国的一批 N95、医用外科口罩，是由黄耀佳先生、黄耀铨先生、哥斯达黎加前总统菲格雷斯先生和翁翠玉合资购买。

“病毒无情，人间有情。疫情不分国界，只要大家同心合力，一定可以战胜疫情。”菲格雷斯在捐赠时说的话，翁翠玉至今记忆犹新。

投桃报李，助哥抗疫

2020 年 3 月初，哥斯达黎加报告境内首例



哥斯达黎加华侨华人华裔协会协助家乡捐赠给哥斯达黎加医院的防疫物资



2020年6月30日，哥斯达黎加政府为哥斯达黎加华侨华人华裔协会会长、中山市侨联海外顾问翁翠玉（右二），哥斯达黎加-中国友好协会会长、中山市侨联名誉主席邓熙平（左一）伉俪颁发荣誉证书，表达对他们带领社团助力哥斯达黎加抗疫的感谢



哥斯达黎加华侨华人华裔协会协助家乡捐赠给哥斯达黎加政府医院的防疫物资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月底，中山市委市政府启动“海外中山人疫情防控关怀支持行动”，由五桂山区红十字会捐赠的第一批医疗物资以最快速度发往哥斯达黎加。收到祖国家乡捐赠的口罩后，翁翠玉便组织乡亲把口罩送给当地的警察、医务人员和侨胞。

5月，哥华协会组织当地华人捐款，短短几天时间，就筹集到4万多美元，购买咖啡、牛奶、意大利面等食品，捐给当地近2000户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家庭。

6月，哥斯达黎加疫情出现反弹，新增确诊病例大幅攀升，而中山捐赠的第二批物资也及时运抵哥斯达黎加。6月30日，哥华协会向当地的墨西哥医院交付这批总价值约50万美元的物资。

“来自中山的无私援助，为哥战胜疫情带来了信心，也温暖了侨胞的心。”

翁翠玉在捐赠仪式上表示，中山是中国著名侨乡，也是众多旅哥侨胞的祖籍地。作为哥斯达黎加的一分子，旅哥侨胞将与哥斯达黎加政府和人民风雨同舟，用实际行动助力抗疫，共克时艰。

携手互助，期盼相聚

哥斯达黎加位于拉丁美洲，是著名的旅游圣地，每年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哥斯达黎加华侨华人采购到50万个医用外科口罩，及时寄回中国，支持祖国抗疫

“为了帮助当地机场做好体温检测、到港旅客分流等卫生防疫工作，2020年7月，中山市委市政府通过哥斯达黎加-中国友好协会向哥斯达黎加民航总局捐赠两台红外线热像仪，这是该机场首次拥有这种体温探测设备。”据哥中友好协会会长、中山市侨联名誉主席邓煦平介绍，两台红外线热像仪被安放在哥斯达黎加的胡安·圣玛丽亚国际机场。

邓煦平、翁翠玉伉俪表示，当乡亲们看到祖（籍）国家乡捐赠的这份特别的礼物的那一刻，“就是这里华人的一种荣耀。”他们期待着疫情过后与全球的中山乡亲们共聚哥斯达黎加，畅叙家乡情。

聯考中國

www.liankaochina.com

至誠、至堅、博學、篤行

联考中国华侨港澳台培训学校

▶ 学校简介

联考中国华侨港澳台培训学校，是专门致力于华侨港澳台联合招生考试的专业培训学校，培训范围覆盖全球，同时也是艺术生联考冲刺辅导基地。

自2008年成立以来，学校秉承至诚、至坚、博学、笃行的教学理念，采用线上线下联合办学的模式，培养了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归国华侨几千名学生。十几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联考教学及管理经验，多数学生分别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录取。联考中国华侨港澳台培训学校期待您的加入。我们共同努力，梦想，从这里起飞。

▶ 明星学员



郑冬阳　清华大学

在联考中国学习的时间内，我收获了许多。我喜欢上了读书，书是我最好的朋友。读书不仅能让我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使我能获得更多的智慧，而且能让我在文字里遨游，寻找到读书的快乐。我希望大家在联考中国可以考入理想的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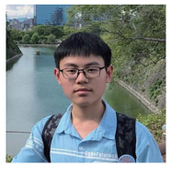


王劭轩　北京大学

对我来说，联考中国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我遇见了许多很棒的老师。老师是伴我们成长的明灯——老师!您含辛茹苦的教诲让我铭记在心，您对我的鼓励永远在我的心中荡漾。



张肇文
北京大学



颜尔汛
浙江大学



廖怡霖
上海交通大学



陈咏怡
厦门大学



董玲晶
华中科技大学



陈泓维
南开大学

北京校区

福州校区

深圳校区

联考中国官方网站：
http://www.liankaochina.com
联考在线官方网站：
http://liankao.etiantian.com

▶ 校园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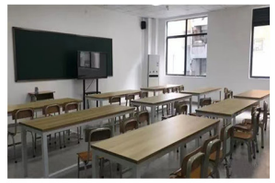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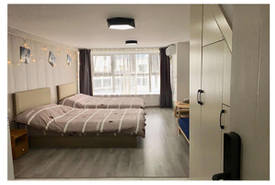






▶ 宿舍环境





录取金榜

更多请详询学校官网

张元	清华大学	林融佳	上海交通大学	周进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洪颖轩	清华大学	刘美琪	上海交通大学	刘易家	上海财经大学
黄贞华	北京大学	任孝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林家仪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高潇	北京大学	林海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吴俊锋	吉林大学
郑楒婷	北京大学	陈晓琦	同济大学	刘家瑞	吉林大学
吕蕴嘉	北京大学	杜有荣	南京大学	程子恩	中国政法大学
陈茜蒂	中国人民大学	洪梓栋	南京大学	沈尚霖	中国传媒大学
郑晨祥	中国人民大学	施为怀	北京理工大学	林淮锋	中国传媒大学
曹恒盛	中国人民大学	林晋磊	北京理工大学	郭芷琦	中国传媒大学
严蒂娜	中国人民大学	邢洪伟	武汉大学	张凌宇	中央美术学院
许鑫皓	浙江大学	廖政豪	武汉大学	戴鸿华	中央美术学院
王正豪	浙江大学	赖卓宇	中山大学	李芷昕	中央音乐学院
颜尔汛	浙江大学	张晨楠	中山大学	徐樱樱	中央音乐学院
谢孟杰	浙江大学	苏湫榕	北京师范大学	蔡仕锋	中央戏剧学院
杨丹妮	复旦大学	陈淳琳	北京师范大学	高奇佑	中央戏剧学院
刘建伟	复旦大学	林欣怡	厦门大学	廖禹沣	北京电影学院
林妍虹	复旦大学	曾凯欣	厦门大学	廖宇成	北京电影学院
侯幸代	复旦大学	陈雨煌	华中科技大学	陈亚雯	中国美术学院
廖怡霖	上海交通大学	董玲晶	华中科技大学	林雯萱	中国美术学院
严安娜	上海交通大学	陈曾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联系方式

联考中国（北京总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燕北园335号楼联考中国北京校区（近北京大学）
联系方式：李老师：13718360139 （微信同步）
王老师：18001270620

联考中国（深圳校区）
地址：深圳宝安区西乡宝田一路62号博智中心C栋2层210
联系方式：萧老师：15600687913

联考中国（福州校区）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八一七中路766号文化宫内(厦门大学MBA福州教学点)
联系方式：王老师：13067279798
马老师：18649929231

厦门办事处
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恒安国际中心20层
联系方式：马老师：18649929231

石家庄办事处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96号习三内画博物馆八楼806室
联系方式：尹老师：13303129866

吉林办事处
地址：吉林省长春商会大厦11楼1106室
联系方式：张老师：13514318999

邯郸办事处
地址：邯郸市邯山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三楼
联系方式：张老师：15128160151

廊坊办事处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盛德花园南门底商睿濛教育
联系方式：孙老师　13582785522

中山三院抗疫实录

文 周晋安 甄晓洲 叶张翔

疫情暴发以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不遗余力，在武汉、广州、梅州、荆州四线作战，且分别派出专家驻点支援汕头、东莞，参与国外撤侨、欧洲救援等行动，是战线最长的医院，是累计救治新冠肺炎患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共向湖北派出 5 批次共 175 名医护人员，是广东省派出专家人数最多的医院；智能在线服务平台“云上三院”服务患者近 800 万人次，成为提供网络服务最多的医院。

抗疫一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三院”）用扎实的行动兑现了医者诺言。

打有准备之仗

当看到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通报时，中山三院提早警惕起来。2003 年“非典”一役留下的经验，让中山三院意识到：必须提前布防！

2020 年 1 月 10 日，中山三院召集医务相关部门举行专题会议，部署、落实增强发热门诊诊疗力量；1 月 13 日，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医院新冠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及医疗救治小组，并部署落实救治防控相关工作；1 月 22 日起，医院更是先后召开 8 次院长办公会议及党委会议，制定应急预案，并对相关工作进一步周密部署，分诊、送检、运送、护理、救治、会诊等一系列工作流程进一步明确，人财物到位。与此同时，人员的培训、演练同步全面铺开，物资储备已经启动，全院职工取消休假，随时待命。

1 月 2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央视连线时就明确表示，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已有医务人员被感染。

事实证明，正是高度警惕和未雨绸缪，让中山三院始终保持院内井然的就诊秩序。

两城三院区共战“疫”

中山三院抗疫工作按照周密的三级阶梯应对方案逐项启动。广州天河院区 6 号楼两层病房和岭南院区感染性疾病科二区改造为隔离病房，原发热门诊面积扩大。这是第一阶段应对方案。

随着疫情的进展，2020 年大年初一，第二阶段方案启动，位于天河院区入口附近、位置独立的 2 号楼改造成发热门诊和隔离病区，原有患者、设备全部转出，病房连夜调整布置、改造空间、清洁消毒，所有流程达到医院感染防控要求。为避免交叉感染，经主管部门同意，医院还在 2 号楼隔离病房启用前与广州地铁协商，关闭了距离 2 号楼较近的地铁出口。



中山三院派出的第三批医疗队抵达湖北

为应对可能到来的第三阶段，岭南院区提早腾空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收治的院区，258 张标准病床布置一新。

位于梅州的粤东院区主动请缨，承担定点收治任务，第一时间腾空肝病大楼，并启用当地建设标准最高的隔离病房收治患者，为梅州地区疫情防控带来了信心。

确保医务人员“零感染”

确保医务人员“零感染”一直是和救治患者同等重要的大事。

疫情暴发以来，医院院感部门针对性地完善了个人防护、环境消毒、器械消毒、患者转运、医疗废物处理、遗体处理、消毒产品使用等全方位各环节的院感规范。接下来，制度规范的执行落实成为感控的关键。

疫情开始时，医院便增设了“感控督导员”，这些经过严格培训的鹰眼守护者，每天对一线医务人员进行现场督导，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组织改进，把职业暴露的高危行为扼杀在萌芽中。

同时，全员分层次、全覆盖的培训同步推进。2020 年春节以来，各类防护演练、培训从未间断，2200 多人次悉数接受培训，防护知识人人熟知，关键岗位考核合格方才上岗。

此外，医院统筹调配人力资源和班次安排，形成合理梯队，保障人力充足。还开展健康监测，制定本院职工发热就诊指引，租赁医院附近酒店作为密切接触医护人员集中居住场所。各职能部门高效配合，为职工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保障衣食住行，确保一线员工无后顾之忧。

医护人员的安全防护之外，病患管控是另外一个重要部分。2 月 3 日，节后门诊开诊第一天，医院入口已启动自动探热，设预检分诊，发热门诊指引明确，2 号楼集发热门诊、隔离病房、取药、CT 检查等功能于一身，发热患者可一站式完成就诊所有环节。急诊住院患者完成流行病史调查及相关检查后，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的同时入住单独病房，医护人员按照疑似患者救治流程为其诊治。

在严密的院感防控措施之下，中山三院出色

完成医疗工作的同时，至今无一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无聚集感染事件发生。广东省卫健委在省内及湖北各医疗队推广使用的“感控督导员”等做法，也大都提炼自“三院经验”。

获院士点赞同行取经

2020 年除夕夜，中山三院派出 23 名精干力量组成首批医疗队驰援武汉。年初四，第二批 13 名队员出发，两批队员均战斗在条件最艰苦、重症患者众多的汉口医院。

第三批医疗队员出发时，尽管时间仓促，医院提前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派出一支集 20 余个优势专科组成的 133 人最强战队。除感染科、危重症医学科、呼吸科等专科外，还特别派出康复医学科、精神心理科、临床营养科专家，为患者提供康复锻炼、心理干预、营养支持，也为团队的健康运转提供有效保障。

针对前线危重症患者多，且年龄大、基础疾病多的实际情况，医疗队在高效的管理下，实行“多学科、立体、个体化综合救治模式”：多学科协同配合，为患者量身打造个体化治疗方案，全面提高患者治愈率，加快康复速度，减少并发症。

甘照宇为广东首个派出武汉的精神心理专家，也随中山三院第三批医疗队出征。在他积极有效的工作之下，心理干预越发受到重视，此后，中山三院再次派出 5 名精神心理科精英支援武汉，进驻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院重症病区，1 名专家赴荆州参与广东医疗队及患者的心理援助工作。

中山三院医疗队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救治模式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教授，副院长兼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教授等人的高度肯定，诸多国家医疗队前来取经。



“感控督导员”每日出发前碰头交流有关注意事项



医院召开患者收治演练（图中患者为模拟人）



医疗队在病区开展工作

创新诊疗方式

2020 年 1 月 25 日，中山三院在广东省内最早启动免费互联网咨询平台，率先为惶恐中的群众提供“线上”服务。

重大疫情和重大疾病将对所有人产生心理冲击和影响，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将广泛存在并将在疫期后持续很长时间。中山三院第一时间凭借高科技手段“云上三院”智慧医疗平台实现了疫期精神心理诊疗的闭环服务。

中山三院脑病中心将最新研发的“云上三院”掌上智慧医疗平台提前投入抗“疫”一线，平台紧急开发了“云上三院·战‘疫’专版”，陆续上线了“新冠风险自评”“疫期心理自测”“心理远程诊室”“方舱之声”四个板块，以弥补特殊时期传统线下医疗模式的不足。

四个板块上线后迅速取得良好效果。“新冠风险自评”服务了近 20 万人群，智能筛选出 7.8% 的新冠肺炎高风险患者并提醒其及时检测和自我隔离，为缓解民众紧张情绪、避免盲目就医造成交叉感染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期心理自测”服务了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 25 万人群，智能筛选出 13.5% 的中重度焦虑 / 抑郁患者，并指引其进行免费线上咨询和治疗；为了解决特殊时期心理医生资源不足和医患无法面对面就诊的困境，平台又紧急开发了“心理远程诊室”和“方舱之声”，提供心理在线咨询和音乐治疗，实现了精神心理疾病线上一站式诊疗闭环服务。

其中，“方舱之声”作为国内首个移动端在线音乐治疗平台，可以根据不同心理障碍类型进行精准咨询和音乐治疗。多家著名音乐机构和知名音乐人大力支持平台建设，取得了良好的医疗和社会效果。

尽管抗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山三院仍将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继续全力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等工作，承担起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为人民生命健康筑起坚固的防线。



2020年2月7日，天河院区首例患者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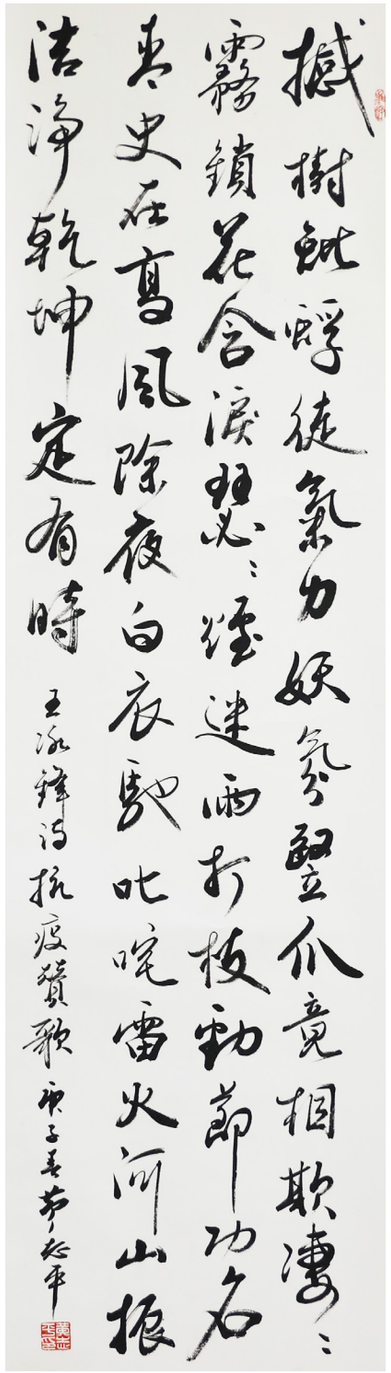


2020年3月12日，粤东医院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

抗疫赞歌

文 王冰锋　书法 黄志平

撼树蚍蜉徒气力，妖氛竖爪竟相欺。
凄凄雾锁花含泪，瑟瑟烟迷雨打枝。
劲节功名青史在，高风除夜白衣驰。
叱咤雷火河山振，洁净乾坤定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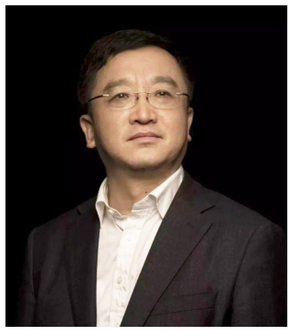
广东侨联工作 经济科技品牌

侨创南粤

汇集侨资侨才侨智，凝聚侨情侨心侨力，共享机遇，共创多赢，服务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

《红楼梦》里风景多

文 阎晶明



作者简介

阎晶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有《十年流变——新时期文学侧面观》《批评的策略》《独白与对话》《我愿小说气势如虹》《鲁迅还在》《鲁迅与陈西滢》《须仰视才见：从五四到鲁迅》《艺林观点》《千面足球》《文字的微光》《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等。主编有《鲁迅演讲集》《鲁迅箴言新编》等。

经典就是这样的作品，即使你没有读也好像读过一样，而每一次重读，又仿佛是新读。这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表达过的观点。我对此深以为然。尤其是在今天，文学经典被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甚至游戏，没有读过原著还没玩过游戏？王蒙先生曾经说过，他上网搜索《红楼梦》，打头的都是电视剧《红楼梦》的信息，输入《三国演义》，首页推出的都是游戏。这很无语，但也证明了文学经典的魅力。

一、小说家为人物赋能

通常来说，小说家是书生的一部分，社会实践能力不足。但小说家又有格外的“特权”，可以在作品中为自己的人物做各种“人事”安排，并有权“决定”他们的命运。

小说家为自己笔下的人物赋予各种奇特的非凡的能力，这也是他们在虚构前提下的权力。《西游记》为人物赋予超现实的能力自不必说，《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也是个个怀着绝技。就是《红楼梦》吧，虽然都是养尊处优的富家男女，可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却赋予了他们很多不俗的能力，比如说大观园里的女子，个个都是诗词歌赋的能手，为此还结了海棠诗社。这种情形有时候让人感觉不近真实，但是由于故事描写得精彩，我们却情愿相信他们是真的。冷静下来细想，这不过是小说家为自己笔下的人物赋能而已，真正的能力其实在于小说家自己，至少是他自己的想象。比如说大观园里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子们的诗词创作水平，其实是曹雪芹自己创作才华的表达。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贾家除夕时场面布置极尽奢华，笑语喧阗无有止境。在盛大恢宏的描写中，更添无与伦比的细节，形容有钱也难买来的品位，足见宁荣二府绝非刚见世面的暴发户，实是荣华富贵的大家族。这添彩的细节，不是别的，正是一种贾母独赏的瓔珞。说这瓔珞由一姑苏女子名慧娘者绣出，因其十八岁便香消玉殒，所以其作品传世者极少，“以贾府之荣，也只有两三件”。而且还进贡了两件，只留一件供贾母遇好日子时赏玩。话说这瓔珞的好处并不主要在材质精贵，最主要是慧娘的绣术实在非凡。不说其中花草绣得多么生动，单说那上面的题字，勾踢、转折、轻重、连断与真正上佳草书无异。曹雪芹对其评价是，绣花草“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绣题字“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更说这慧娘从不仗此技获利，所以天下知其者多，但得之者少。翰林文魔们为强调其品格之高，觉得“慧绣”之“绣”太俗，不足以命名，硬把“绣”字改为“纹”字，“慧纹”之称，超凡脱俗之喻。

《红楼梦》里，能人巧匠太多，尤其很多人的艺术造诣之高，品位之纯，艺术见地之深，实超出一般人理解水平。那为什么我们不觉得他不真实，反而增加了我们对人物的喜欢？作者之力！曹雪芹不是为一人而是为一群人赋能，让人目不暇接。

近日有幸在全国政协读书漫谈群里读到王亚民院长关于故宫宝物的介绍，惊叹之余，倒想提一个问题，未知《红楼梦》里所写的这种稀世珍宝“慧纹”“瓔珞”，在故宫里是否真有？因为按照曹雪芹的说法，贾家是把其中两件进贡了的。

二、贾母的艺术鉴赏力及其心志

《红楼梦》里，不管男人们是否干成什么大小事，只见女子们在深闺中、大观园里、厅堂上个个见出身手，却并不婆婆妈妈。年轻的如宝黛、王熙凤、史湘云个个才艺出众伶俐干练，即如贾母，一族之尊，也绝不是靠权威慑人、尊严管制，实在也有过人的艺术鉴赏力。她不作诗，也不猜谜，独对戏曲一门深深谙其道。点戏目可直唤其名，且能讲出点这一曲的时节、氛围之吻合度，讲戏文能道出大小情节，所含之理，即使是唱腔、乐器也能如数家珍，头头是道。

有两个情节最为典型。一是第五十四回，写元宵节贾府夜宴，大台戏间隙请两位“女先儿”来演一段说书，结果这说书是一段关于才子佳人的故事，贾母就评价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得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贾母这一通议论，可说是一个高等的文学批评。两位说书的“女先儿”也被她说得口服心服，不敢演了。同时，贾母身上还有她不可排除的等级观念，那就是认为，“编这些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着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不屑的语气里透着内心的鄙视。

二是第七十六回，写贾府中秋赏月，谈到音乐，贾母说：“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吹起来就够了。”一种很到位的艺术欣赏观。正是在贾母引导下，那悠扬的笛声缓缓传来，在明月清风之下，引得众人“肃然危坐，默相赏听”。众人都赞叹贾母的艺术品位，认为只有在贾母的带领下才可以听着悠扬的音乐，“开些心胸”。然而贾母却进一步说，“这还不大好，须得拣那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于是那

些柔慢的又带着悠扬和凄婉的笛声，在这月夜之下，不但让在座的人们可以享受艺术，同时也直入他们的心扉，一个个被感动和感染的难以自抑。

贾母的艺评又从来都非只谈艺术，空空炫技，实在是融着太多人情事理，且充满阶层观念，透着她骨子里的傲然贵气。就说她对才子佳人戏的批判，满满的是不屑。认为这些戏之所以虚假可恨，是因为那些编戏的“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等等。语气里透着高人一等。但她又谨慎定位自己，认为贾家不过中等人家，还比不上真正的“大家子”。她的艺评实是社会批评。她对刘姥姥的热情，事实上是对方的自贬、艳羡，大大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她送给刘姥姥的大批礼物，实是“宣传经费”，可使荣耀散播。对家中丫鬟奴才，一样在关爱中透着等级观念。比如还是五十四回，问起袭人为何不来热闹，知是其母刚刚去世，奔丧敬孝刚回，不便前来，贾母就正色道，奴才不可以在主子面前谈什么孝与不孝，要是她是我身边的，莫非也不出现了。幸亏王熙凤打了圆场方才混过去，并知贾母贴身丫鬟鸳鸯确也同是父母去世不久，贾母却未允其回家守孝。一句评语都没有，却在贾母的艺评事评中，透出温度，含着凉气。实在是高妙。

贾母的艺术品位之高，可谓是非常的专业而且老道，她在府中的地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年轻的、怀着很多才分的男男女女，从来不敢轻视这位长者、老者。而贾母在戏曲方面的熟稔，在什么情景下演什么戏，是一出折子戏还是一台大戏，非常的专业，可见其对各种戏本的烂熟于心。那更是年轻人所望尘莫及的。

三、小说里的疾病与人物命运

2020 年 8 月初，在广东珠海某著名制药公司参观。接待我们的是公司的周总，曾经也是一位文学青年，青年时代发表过诗歌和小说，对话自然就轻松、亲切许多。在公司发展陈列厅参观过程中，他向我们介绍公司的一种新药，据说是治疗女性异常出血不止的针剂，一月一针，效果明显。我随口向他说道，《红楼梦》里王熙凤大约得的就是这种病，当年要有咱这针剂，贾府里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大家一笑。

事后，我又查证了一下，我的记忆大概不差。《红楼梦》第七十二回里描写，王熙凤经期后仍出血不止，“沥沥淅淅”，已经无法也无心管理贾府政务。连丫鬟平儿等人也在私下议论“二奶奶”是得了可怕的“血山崩”。其后发生的很多悲剧，直接间接多与王熙凤这病久治不愈有关。直接引发的，是其夫贾琏在外偷娶尤二姐为妾，引起王熙凤仇恨并致尤二姐于死地。这之后，贾府上演一出接一出的悲剧，加速了贾家的衰败。

我回来后把第七十二回病情描写一页拍图发给周总，他回信说：“看文中描述，疑似子宫异位症，主要是反复出血、疼痛。应该以使用我公司亮丙瑞林微球为宜，可惜不能穿越时空，只能枉自嗟叹了。”的确如此。贾家最终走向衰落是历史必然，但就小说故事而言，如果药到病除，故事的走向就会大大不同。

想来，古今小说里，以人物疾病引发命运改变和悲剧故事的例证实在太多。《红楼梦》里，像尤三姐那样直接自刎的“突然死亡”实属特例。大多数人物之死，多是在肉体折磨、精神痛苦与身体疾病互为因果的纠缠中，逐渐走向死亡。如贾瑞、秦可卿、秦钟、柳湘莲、晴雯、司棋等等。林黛玉更是在疾病困扰与情感痛苦的纠缠、撕裂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现代小说里，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所患是“迫害狂想症”，《药》里的重要元素是华小栓的“肺痨”。此外像《明天》《白光》《伤逝》《孤独者》《弟兄》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疾病描写。以此为题研究小说，那可不是一篇大文章可解其一二，实在是一部专著也难以说尽。

四、《红楼梦》的作者到底应该怎么署

《红楼梦》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她的经典性还体现在，就像一些中外经典一样，在作品之外留下许多待解之谜。比如，红楼梦的封面就遇到一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为作者署名？谜团、争议，就这样构成作品的魅力之一。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高鹗。但无论是否读过作品，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一个红学常识，这部书不是曹、高二人合著，实是曹雪芹的泣血之作，是对其家族兴衰历程的叙说，因为未完成而只留下八十回，后来由一个叫高鹗的人续写了四十回，于是只能如此署名了。比起一般的合著和接续，这种署名并列的荣誉地位上是决不允许平等的。高鹗是“狗尾续貂”的代名词。

可是，如果我们注意的话，这种署名正在发生变化。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论，最新的署名已变成：“曹雪芹 著、无名氏 续”。但同时，20 世纪 50 年代的“曹雪芹、高鹗 著”版《红楼梦》仍然继续再版，2018 年 11 月就再版了 1957 年 10 月的版本，并特别标明“纪念版”。也就是说，同一部作品，在同一社同时出版，作者署名却并不一致。这情形这待遇，也只有《红楼梦》可以有，别的任何作品定然不可以有。

从高鹗合“著”到无名氏“续”，这中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多，红学就跟国家社会一样，发生了巨变。当然，甭管怎么署名，并不影响大众阅读。不过，这事着实有趣。近日，当我读到第七十八回时，又读到美国学者夏志清的长篇文章《〈红楼梦〉导论》，文章上来就讲版本流变并涉及著作权问题，让人大开眼界，也引人思考。夏志清的主体观点是，红楼梦无疑是曹雪芹的著作，这不但因为前八十回的伟大，而且曹雪芹未必就只写了八十回。他认为，曹雪芹写到近八十回时，离他去世还有七年时间，他还有足够时间继续写下去。而且极有可能事实也是如此。因为红楼梦的结局是家产充公，又因为红楼梦是强烈自叙传背景，为免再遭厄运，落入文字狱，曹雪芹没有出示八十回以后的部分。于是，这部分遗作的去向成谜，而程伟元、高鹗就成了寻觅者、搜求者、整理者。

夏志清反对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他认为主要在中国盛行，即红楼梦前八十回伟大，后四十回渺小。首先是，后四十回也极有可能（相当部分）出自曹雪芹，而且其中的主要人物命运结局，与曹雪芹前八十回的暗示、预设、指向，大体都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即使现在的后四十回不是出自曹雪芹之手，但也应符合他的意旨，并非那么不堪以至成指责、批判对象。

不管怎么说，高鹗不是该书作者，可能已是大部分研究者观点，连狗尾续貂者也不是了。但按照夏志清观点，后四十回都未必是或未必全部是另一人续写。在这个意义上，“无名氏续”也未必能成立。红学之显，可见一斑。

这样的学问超出我等能力。但我想说，后四十回还真的在各种段位上与前八十回有明显差距。我眼下看到第八十五回，这种印象已十分明显。即使努力克服先入为主，也无法克制如是说。

八十一回以后，故事的浅表化十分明显。人物对话直奔主题，少了意味。心理描写（曹雪芹的长项，中国古典小说本来的弱项）基本没有了。引经据典，而且是叠加、排列式地引经据典也较前明显少见。连前八十回大量的民间俚语，歇后语也少了，有几句也不过是大路货。人物语言的饱满度、立体感、深邃性落差明显。再者，一些表述前八十回似未曾有过。如八十一回后几处用简化、合并方式指出人物

的方式，前面就没见过。贾赦、贾政成了“赦政”，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合并称作“宝黛湘云”，等等。

五、《红楼梦》的“国际元素”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在读者想象中或改成影视剧、舞台剧，也无疑属于“古装戏”，近现代文明气息还没有吹进来，更不可能影响人物观念意识。但《红楼梦》里也有“国际元素”，它们尽管只是作为生活元素出现的，但也颇为有趣，也预示着大观园里的男女已知道天外还有天了。虽然作者并无此指意。有意思的是，这些国际元素集中地出现在第五十二回里。这又让人不禁联想，曹雪芹是否有意借此要为封闭的大观园打开一个缺口呢?

这一回里，先是说晴雯病了。“发烧头疼，鼻塞声重”，就是今天的感冒。然即使太医看过也不见大好。宝玉专来关心，要她嗅些鼻烟，以便通气。丫头麝月果然取来一个扁盒，宝玉于是看到，“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这样的描写“翻译”得直白，其实应该就是天使图了。有意思的是，宝玉对这裸体画并无感，倒是“晴雯只顾看画儿”。小说进一步写晴雯打过嚏喷之后，仍觉太阳穴发疼，宝玉的主意是：“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可见“西洋药”在贾府是常有的，而且至少贾宝玉相信其效用。宝玉于是命麝月去找“二奶奶”王熙凤去要“西洋贴头疼的膏子”，那药还有个名字，叫“依弗那”，且强调此物王熙凤处“常有”。晴雯贴上后，麝月却又笑说不习惯，而又认为王熙凤那是“贴惯了，倒不大显”。尽管话题速转，但这不经意的描写却可看出作者或有用意，纵然是不确定、不夸大，但也应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

这一回还特别“添加”式地写了一个外国女子写中国律诗的故事。说是薛宝琴自小随父“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曾遇一个十五岁上下的“真真国的女子”，金黄头发，打扮奢华而又时尚且酷（带着“矮刀”）。宝琴的评价是美得“实在画儿上的也没他好看”。更说这金发洋女子“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在父亲的疏通下，请一位“通事官”（翻译官）得到这位洋女子的中国诗。在大家的再三要求下，薛宝琴居然现场背诵出全诗。为了渲染这一情节，现场凑齐了大观园最有诗才的几位才女：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以及无师自通的贾宝玉。小说描写道，当宝琴念完全诗后，“众人听了，都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这句话是谁说的并未写明，却突出了是大家的“一致认为”。话题再一次就打断，却留下全书最重的一笔“国际元素”。

五十二回后面又写了一笔外国事儿。这是贾母送宝玉一件“雀金呢”“大氅衣”，并强调“这是哦啰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特别精贵。后面还又写了宝玉不小心在这件宝物上烧了个洞。与晴雯等议论，并由晴雯为其设法补上，而晴雯又为此耗尽心力，还终觉做得不好。以贾府上下挥金如土的气势，为一件衣服如此操心费力并不合常规。只能说作者是要突出它是来自“哦啰斯”的外国货。

可以说，第五十二回就是强化“国际背景”的一回，曹雪芹在既不让读者读出这种刻意，又特别想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之间，巧妙过渡，适度点染，欲罢不能，欲纵故擒，微妙铺陈，别有意味。

在一部描写封闭环境中封闭生活的小说中，加入如此国际化元素，也应是曹雪芹创作抱负的一种体现吧，尽管它远不足以影响整个故事的走向。这让人想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外星人”插曲。未必能纳入主流，却也露出创作理想的端倪，是一个插曲式的佳话。

欢迎订阅 海内与海外 杂志

2021年征订

《海内与海外》杂志是中国侨联主管主办的唯一一本综合性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11-2824/D，国际标准期刊号：ISSN1002-3801；定价每册人民币 20 元（全年定价 240 元），港澳台订阅每册港币 50 元（全年定价 600 港币），境外订阅每册美元 10 元（全年定价 120 美元）。港澳台及境外订阅均不含邮寄费用。

欢迎订阅《海内与海外》杂志。读者可随时通过银行汇款，订购全年、半年刊物，并请将联系方式及开票信息发给我社，我们收款后及时邮寄。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城区北新桥支行

户　　名：《海内与海外》杂志社

账　　号：0200004309014481454

联 系 人：李秋实

联系电话：010-64056553　13439600555

扫码订阅：

微信号 18519867795

电子发票二维码

先生吴冠中

文 钟蜀珩

2019 年 4 月 25 日，“风筝不断线——纪念吴冠中诞辰一百周年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

一踏进美术馆正厅大门，迎面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已经离世九年的恩师吴冠中先生一幅巨型肖像照，突然看到先生鲜活的面容，泪水禁不住模糊了双眼。

这是吴先生生命最后十几个月中拍摄的一帧照片，与他以前清瘦坚毅的形象不同，先生面庞饱满了一些，我知道这是先生为了治病不得已服用药物的结果。先生面带微笑，慈祥地望着前方，深含大爱、澄观万象的双眸依然清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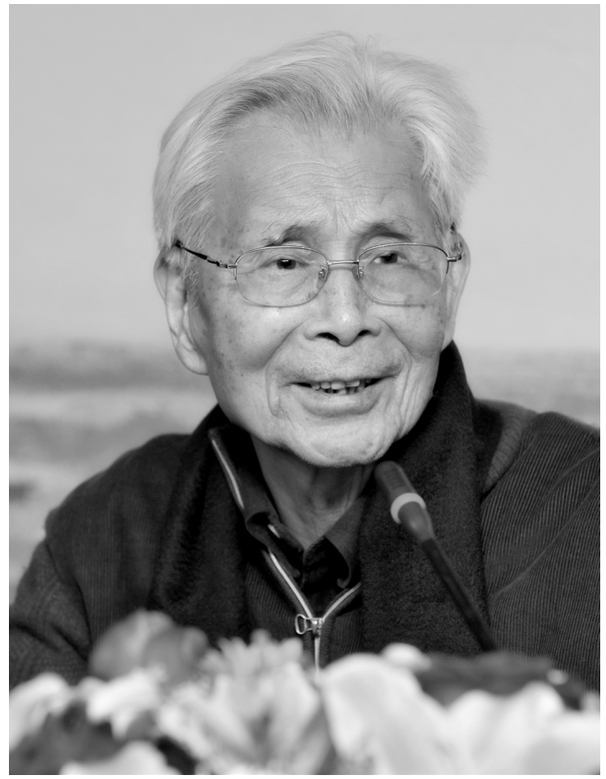
一

我与先生相识于1965年，这一年我十九岁，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美术系，在书籍装帧专业学习。正巧吴冠中、卫天霖、阿老等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部分老师头一年也刚从解散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分配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任教，吴冠中先生担任我们班一年级的色彩写生课程，从此我与先生结下了师生缘。

当时吴先生给我们班第一次上色彩人物写生课，他并没有安排我们画人物头像，而是画人物全身像。我画的是一位站立的男模特，五十来岁，留着农村老汉那种头发很少的光头。吴先生让模特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一只手臂撑在腰部，另一只手伸开握着一根木棍，看上去像是握着铁锹的农民。没想到的是，先生只让我们用不超过八开大小的纸，画站立的全身形象。他强调主要抓对象不同色块之间的关系，不要求细部刻画。明白了老师的要求，用不着用水粉颜料去刻画头部，我一下感到轻松了。我观察对象的衣着、面部和背景墙壁，看到不同层次的深灰、中灰、淡灰，不同色彩倾向的暖灰、冷灰，还有白毛巾明亮的色块，判断它们之间的对比、调和与组合结构。我很快就画完了，吴先生来到画架前，看后笑着说：“画得不错。”

现在想想，这是吴先生给我们一年级同学喂的第一口奶，含有如何观察美的基本营养。先生教学目的明确，是要培养学生的色彩美感，不抠细部不塑造，让学生把精力放在观察色彩块面美的关系上，用心良苦。

还有一次很深刻的印象。1965 年期末我们停课了，为石油工业部宣传大庆工人事迹展览画展图，同学们的任务是把一些黑白小照片资料发展创作成较大的展览彩色挂图。为抓紧时间完成任务，领导安排我们住在石油学院。忽然有一天，系领导组织装潢系老师到工作现场看望我们，主要也是来结合实践进行教学，其中也有吴冠中先生。他走到同学正画的一幅油



吴冠中，清华大学教授。1919 年出生在江苏宜兴，1936 年进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42 年毕业后任教重庆大学建筑系，1946 年公费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油画，1950 年归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1991 年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2002 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生通讯院士，2003 年荣获中国文化部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2006 年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文学荣誉博士，曾任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在有生之年，他将自己的作品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台湾历史博物馆、香港艺术馆、上海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鲁迅博物馆，以及大英博物馆、法国塞纽奇博物馆、新加坡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等，共计 360 余幅画作。他是中国 20 世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杰出艺术家，为推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0 年 6 月 25 日，吴冠中先生于北京逝世。

画前，看了一会儿后，决定在上面当场给同学们做示范。这幅画不到六十厘米大小，竖构图，记不清先生从哪部分开始接着画的，但清楚记得画面的雪地中矗立着一个钻井架，井架伸向银灰色天空，穿着深灰棉衣戴着帽子的石油工人蹬在钻井架上工作，色调以黑白灰为主。这是我第一次见吴先生作画，同学们都围着看。当他全神贯注，准备画工人脸部的时候，突然激动地说：“在冰天雪地中，石油工人的脸冻得很红很红！”我期待看这“很红很红”会是多么红，只见吴先生用一厘米左右宽的油画笔，在调色盘上很饱满地沾了未作任何调配的纯赭石色，激动地一笔按上去，非常肯定有力地点出了石油工人的面部。在大面积黑白灰的色调上，这一笔赭石色真是被对比得很红了，而且浓重沉稳，非常好看，虽只是一个小色块，却让整个画面精神了，真出乎我意料！我恍然觉悟到色彩是在色调里对比出来的。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师真不一般，把握画面和色彩非常主动自信，而且特别有艺术激情，很能吸引学生。

二

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没上多久基础课，学校开始停课搞运动了，四年当中与吴先生只有开会时见过面。直至 1970 年，全院师生员工下放到河北省获鹿县（今石家庄鹿泉区）李村 1594 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在李村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学习或开深挖会，至于画画，那是不可能的。我至今记得吴先生手握一根长长的竹竿，沉默着缓缓走在水渠边瘦瘦的身影，水渠里游着他放牧的鸭子。听说吴先生患有肝炎，还有很严重的脱肛，每天都要从肩上向下挎一条布带兜住才能行动。比起插秧、除稗草、收稻、割麦、打田埂等地里的重活，放鸭子算是照顾他的轻活。

对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在李村的经历刻骨铭心。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情况有了变化。有部分想画画的师生利用工休开始行动了。大家的心在苏醒。李村，这个古老的村庄，被富庶的土地环抱，从这里望得见远方的太行山脉，村里的老乡特别淳朴善良，总是同情和善待我们，美善在不知不觉中温润着我们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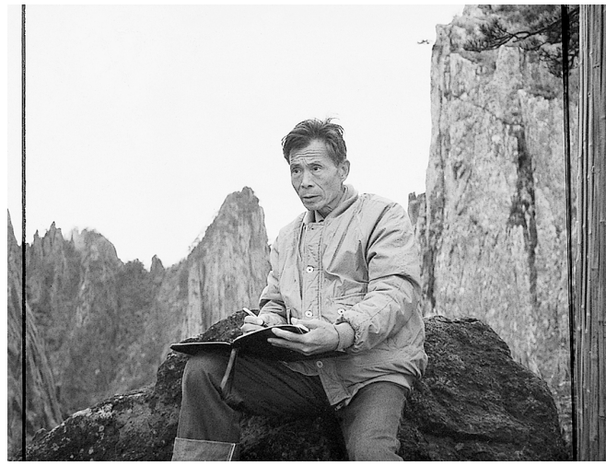
我们装潢系师生都属“学二连”一排，春天来了，我们在老乡房前开会、开饭，常常会看到燕子叽叽喳喳忙前忙后在屋檐下搭窝喂雏。一天，吴先生画的油画《房东家》吸引很多同学去他住的老乡家观看，我也去了。只见画面上一棵绿叶衬着红花的壮硕石榴树，撑开画面的主要空间，一排北房在石榴树遮挡下时隐时现延伸开来，虽然在画面中位置较低，却舒展明亮。画面最上方的天空中，左边出现了一对双燕，右边是另一只燕。在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的作品中出现燕子。它的出现完全来自生活，自然而然。李村的燕子飞进先生心中，成为画面上拨动春曲，跃动生命的精灵。后来吴先生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过燕子，它们已化作先生艺术生命中的永存。

吴先生每次提着粪筐画架画画归来，都会把画在板子上（在李村买的小黑板）的画立放在房东家的屋檐下，同学们闻讯立刻跑过来看，微型画展于是开始了，每次新作都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其中我特别喜欢的有《高粱与棉花》《瓜藤》和《房东家》。吴先生取材自然平凡，画出来却非同寻常，完全不同于以前我所学的风景或静物写生的思维。例如要按透视比例如实取景，如实比较自然光线下的色调、冷暖、受光、背光、反光等规律。而吴先生画画不是这样思考，他是走进绘画的初始状态，视眼前所见物像为平等抽象的形、色，捕捉它们形成物象特征的形式，以此为主调，通过想象、移花接木、去赘除弊，主动创造画面自身美的关系。老师面对真实景物能这样自由，颠覆了我以前在写生中被动的思维，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解放！

吴先生寻觅入画的景物首先看重感受，他选取的对象是李村最感动他的有特点的景物。从金黄色的麦田到红绿高粱地，再到结着朵朵白絮的棉田，从村景进入农家院落，从盛开火红花朵的石榴树，到挂着黄花带着绒毛，刚刚结出小小果实的碧绿瓜藤，还有饱满鲜亮、橙色白色的南瓜，甚至装着绣花鞋帮和剪刀的针线笸箩，他都热爱，都能捕捉到它们感人的美。后来当我看到梵高画的麦田、他自己那双破旧的皮靴，还有他坐的那把简陋的椅子……我感到吴先生和梵高有极为相似的地方，他们对生活都有火热的激情与真诚，对艺术发自内心狂热地爱，忘我勤奋，这是二人最突出的精神生命特征；他们艺术表现的对象都很纯朴，画出的画却超凡，不仅面貌独特，而且触动心灵；两人都有杰出的文学才华，都勤于写作，以鲜活的文字倾诉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奉献出心底深处最珍贵之魂灵。熊秉明曾说他最喜欢吴冠中先生在李村的作品。这些画一眼看去能让人感受到吴先生的心已深深扎进这片土地，他和父老乡亲所喜所爱的美已相通相融，他们看懂他的画，惊叹他画的美，这令先生十分兴奋。最可贵的是这些画是中国艺术家自己眼中发现的美，虽采用西方油画材料，含有西方现代艺术视觉科学，但却跳出了西方油画的面貌，明显带有中国绘画的意味。这些感人之作展现出他和梵高有相通的灵魂性格和艺术情怀，他们在艺术高峰真正相会了。

吴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对什么是写实有了和以往不一样的认识。我体会到艺术有自己独立美的规律，而写生最错误的状态就是抄袭对象。先生之所以能够面对平凡的自然生活场景，画出不平凡的奇特之美，就在于他用诗意的眼光幻化万物之界限，缚获万象之神韵，凝炼创造美的造型和色彩关系，所以他的作品艺境美妙，情思生动感人。

在李村，1972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由于宽松了，可以画画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师生们朝夕相处，大家就有了一起谈艺术的机会。有时是散会后的空余时间，有时是饭后的闲聊，在老乡家院子里，大家或站或蹲，抑或坐在小凳、台阶上，当大伙儿有机会在一起聊画画时，只要吴先生在场，常常会听到吴先生谈一些看法。吴先生思绪敏捷，驰骋于东方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艺术海洋中。例如他说：中国人物画当属陈老莲第一，陈老莲的人物造型有量感美，“量感”一词是西方现代艺术常用的表达美的词语；潘天寿的画了不起，他的国画构图讲究空间分割，与众不同，和蒙德里安研究的抽象造型理念不谋而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先生谈的这些内容都是我不了解或不曾认识到的，要知道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呢。对画的好坏，他善于单刀直入地讲出长处、短处之所在，令同学们印象深刻。我还从吴先生那里知道了一些以前并不熟悉的西方画家，比如波提切利、夏凡纳等，附中美术史课上仅见过波提切利作品的幻灯片，但不知道夏凡纳。吴先生喜欢用周昉所绘仕女的婀娜之美和他们做比较，他认为中国艺术美的品位一点都不比



吴冠中到户外写生



1970年，吴冠中下放农村劳动期间，与同事、学生留影于李村

西方差，而且悟得更早。在李村，无论看吴先生的画还是听他谈论艺术，都令我耳目一新，不仅对那些作品印象深刻，思维也开阔了许多。

吴先生对学生的艺术成长非常关心，空时特别愿意看看学生都在画些什么。我和吴先生的接触其实远不如男同学们多，因为女老师和女同学住在其他老乡家里，但吴先生也来看过我的画。我在李村画画，材料非常简陋，一般使用很小的一片纸，从供销社买来粘信封的胶水，刷到纸上，干了就拿来画油画了。冬天，我画过李村的老乡蹲在墙根石碾子旁晒太阳，天蒙蒙亮和女同学徐中益到村外画风景，淡玫瑰色黎明的天空，暗褐色的大地，远远的砖窑冒着一缕青烟，还有用推车运砖的农民，这幅画也就十五厘米大，我俩手都冻僵了。向吴先生学习，春天，我也画过老乡家院子里的芋头苗，画孩子们带小羊回家；夏天，画收工回来的人们在村口水渠洗脚；深秋，画一团团红色的扫把树，还画过吴劳先生的女儿在屋里读书的场景。这些简陋的小画自己从不好意思拿给老师看。没想到吴先生路过我们住处时亲自过来看了。吴先生认真看了我画的画，对画面结构提出具体意见，他说从画上能看出有我的真实感受，有美感，这比什么都重要。他最喜欢我画的李村村口，还有吴劳先生女儿在屋里读书那一幅（后来命名《知青读书》），说这幅画很有品位，又说画的好坏不在技术，不在尺幅，首先要看是不是有真情实感。

多年后，有一次看到《百雅轩》印制的仿真印刷品《高粱与棉田》，我对吴先生说我非常喜欢当时他在李村画的这幅画，构图色彩都特别好，把一垅高粱画得那么美。吴先生说：“你知道地边的一排高粱为什么能打动我？”我有些发愣。吴先生说：“你看像不像孔雀开屏。”我一看真是呀，当时明明面对的是一排普普通通的高粱，吴先生却不受物的局限，看到它不一般的抽象造型和动势特点，联想到孔雀开屏的势像，又通过想象强化了这种美的表现，所以才画出这么动人的画。

吴先生在李村的写生作品是他深藏已久的艺术激情的喷发。谁也不曾料到，在接受再教育、深挖“五一六”期间，在华北平原这片默默无闻的村庄田野上，却发生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沉甸甸的艺术故事，它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时代的变动中，纯洁美好，意义深远。吴冠中先生和工艺美院前辈艺术家们在长时间与这片土地亲密接触中，创作出中国那个时代非常珍贵感人的作品，也是艺术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师生交流史无前例地深入、广博。

三

1973 年离开李村，告别了母校和老师，我和丈夫刘巨德被分配到云南工作。我在昆明师范学院艺术系任美术教员，刘巨德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

1976 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个历史机遇的到来，使吴冠中先生的艺术生命之花怒发，让他充满睿智与激情的艺术思想得以自由释放。

1977 年，从与吴先生的通信中知道北京即将举办“法国十九世纪风景画展”的信息，我们非常兴奋。几日后，又接吴先生的信，出乎意料，他对此次画展给予尖锐的批评：

> 法国画展使人十二分失望，在赶现代化的今天，给我们看蒸汽机时代的三四流次货，此事我为法国画家丢脸而难过，为我们选画无眼力而羞耻，这，都是“四人帮”期间给人家限制的框框造成的恶果。

在艺术问题上，他眼里揉不得沙子。1978 年吴先生的另一封来信中写道：

> 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在深圳举办画展，其中展出我八件水墨，据说极为香港方面重视，他们给我看了展出版面的彩色照片及香港《广角镜》等发表的彩页，我完全没有为这些情况感到意外，而为打垮保守势力，创造新风格的美术解放战争的光明前途感到信心百倍，愿战友们勇往直前，永不退缩，解放自己，解放美术领域里的奴才。

“文化大革命”后最初几年，吴先生先后去广西、云南、新疆、湖北、湖南、浙江、江苏等地写生或举办展览。所到之地，不顾疲劳，常常应邀以极大热情在各地举办讲座，或在杂志发表文章，通过自己学贯中西的艺术经历和大量艰苦的艺术实践，宣讲艺术美的核心价值。他的观点旗帜鲜明，涉及的内容丰满宽阔，语言极富感染力。以上两封信的内容即是他当时艺术思想鲜明的体现。

1978 年，吴冠中先生在云南省文化局画家姚仲华、孙景波等的安排陪同下，先到云南圭山、西双版纳写生，而后又在我曾经的学生、刚留校的昆明师院艺术系年轻教师杨尔驹的陪同下到丽江写生。吴冠中先生对云南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由于抗战期间国立艺专曾搬迁到昆明郊区呈贡安江村，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时代背景下，他在那里度过了近两年的大学时光，此次来云南，他迫切想故地重游。在姚仲华、丁绍光等人的帮助下，他如愿来到安江村，此地唤起了他对抗战时期母校、老师和自己青春的许多回忆。

云南美术界非常珍惜吴先生来云南写生的宝贵机会，在他离开昆明之前，特别邀请他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一个临时的云南写生画展，然许多作品来不及仔细装裱，只是临时挂在墙上。同时，吴先生在里面的大厅给云南的美术工作者举办讲座，听众满满的一直挤到门外。印象最深的是，吴先生讲到自己青年时期怎样无意间被艺术之美神俘获，不顾父母的失望，放弃理工专业前程，

而改攻学艺的经历。记得他说：“我甚至想，要是父母已经不在世，就不用担心他们看到我为艺术穷困潦倒而痛苦伤心！”他还讲了在巴黎求学时的许多故事：他怎样选择学习西方现代绘画；他的导师苏弗尔皮启发式的教学；还没画完的女模特跳河自尽；在公共汽车上因是华人而受辱；面对博物馆工作人员蔑视祖国时他怎样表达愤怒；在圣诞节之夜却深深怀念故乡的春节；扑向太阳的梵高在书信集中的话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大家屏住呼吸，完全被吴先生的演讲打动，安静的气氛包裹着他们已经沸腾的热血，讲座结束，全场即刻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吴先生在昆明这么忙，还特意抽空到昆明师范学院我的仅有十四平方米的小家中看我这些年来画的画（1978 年开始恢复研究生考试，此时我的丈夫刘巨德已去北京准备参加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在昆明，我的两个孩子白天分别放在幼儿园和保姆处）。我把带学生下乡的写生，自己平时在昆明的写生，还有一些在云南的创作，都取出来请吴先生指教。吴先生看我画了不少画非常高兴，一张张认真看过后，他挑出他认为好的几张，大都是快速抢抓下来的感受鲜活的写生，他主要从画面构图和形式关系上进行肯定或批评，这与我自己的判断不太相同，他似乎并不在乎画面是否完整。吴先生鼓励我一定争取考研的机会，让我抓紧时间好好准备文化课和专业课各科考试。吴先生的关心鼓励，使我有了考研的勇气，我下决心克服种种压力和困难，报考吴先生的研究生。

记得参加吴先生研究生考试的有戴士和、齐陆、何斌和我。考试的时间在同年 6 月下旬。我对素描考试印象最深，时间是在下午，上午好像考文化课。由于天气炎热，中午打了食堂的饭大家都吃不下。考试开始了，考女人体素描，考题一公布，完全出乎意料。首先，要求每十分钟画一张全身女人体，共画五张；然后，每半小时画一张全身女人体，共画两张。大家一听都大吃一惊。我在美院附中学习时，本来四年级有石膏人体课，但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消了全身石膏像“被缚的奴隶”等素描课，一进大学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在昆明教书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人体课，也就是说从未画过人体写生。好在此前我在北京新华书店买过七角钱一本的一册希腊雕塑，像普通杂志的装订，薄薄的只有十几页的画面，我很喜欢，曾经拿着看看勾勾，算是有点体会。此刻我冷静下来去理解考题，相信吴先生出这样的考题一定是想在快速写生过程中，考验考生对人体形态美的感受能力到底如何，与平时画速写一个道理。我想一定要先把形体动态的美感特征抓住，就做这一件事，画得笨就笨点，但要画对劲，只要脑子清楚，十分钟应该可以把基本动态感觉抓住。定下心来，我不再那么紧张了。装潢系陈汉民老师负责监考。我们先把第一张对开纸大小的考卷钉在画板上，陈老师看着手表说：“开始！”大家就开始，他看着表，一分不差，说：“结束！”大家赶紧结束，取下画完的卷子，再换另一张、然后在画板上钉纸……按照陈老师的口令行动，画了七张，直到全部考完。当时的教室是没有空调设备的，考场里很热，考试当中脸上的汗水不停地滴在脚前的地板上，湿了一片。老师把卷子收走了，我们四个人却没走，都累得坐在地板上不想动了，大家还在感慨这出人意料的考题，都觉得太难了。歇了好一阵，几个人才离开考场回家。

色彩人物写生考的是女子半身像，并不是肖像，而是一个女孩散开头发在梳头。我理解，先生是让对象展示出动态中的美。不料画了一半，女孩忽然脸色苍白，坐不住了，医务室的医生马上过来量血压，听心脏，拿来水和葡萄糖让她服下，休息了一阵，见她好多了，考试才继续进行。为了把耽误的时间补回，监考的阿老先生好心，决定给我们延长一小时，我们大约多得了有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对于色彩写生来说，时间充裕了近半个小时真是好事。创作考得是风景，我画风景没有画人物头脑清楚、熟悉，构想也较慢。我曾去过石林，雨后天空很亮，山很重，我想画一个黑白对比较强的画面，觉得石林造型也有云南的特点，就画了一幅雨后石林。

专业创作可以选题，我选了封面设计，设计真是我最不熟悉的，我画的是李双双，用民间剪纸风格画了一个梳着刘海的河南妇女头像，手忙脚乱中把笔掉在了自己刚写好的美术字上，弄脏了考卷。

还有口试，我记不大清了。前两天与中央美术学院戴士和教授通了电话，他对口试却印象深刻。他说口试房间的墙面上挂了许多画家作品的图片，和明信片大小差不多，看不到作者的名字。其中，国外比较现代的作品较多，传统经典的也有，中国的也有，但不多。考题要求考生说出你喜欢那些作品，不喜欢那些作品。如果能说出画



1948年，吴冠中于巴黎凡尔赛宫前



上小学时的吴冠中

家名字及喜欢不喜欢的理由最好，说不出来也没关系。时隔四十年，戴士和教授至今觉得这个口试方法非常好，很有意思，他一直记忆犹新。后来听吴先生说我的素描和色彩考得成绩不错，风景创作并不好，分数不高。他说戴士和考得也不错，风景创作很突出。戴士和考取了吴冠中先生的研究生，同时也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最终选择了去中央美术学院学习。

1979 年暑期，昆明师院艺术系主任王汉生老师高兴地告诉我：“小钟，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接到录取通知，心情十分激动，我来到要好的女同事孙云玲老师房间，她就住在系里腾出的一间小练琴室里，她比我大十岁，从四川美院毕业来云南昆师工作，我们一起相处六年多，她知我这么多年来的不易。我把录取通知递给她看，她说：“祝贺你，小钟！”我泪水流了下来。她倒了两小杯啤酒和我碰杯以示庆贺：“你要去北京了，这回真要离开昆明走了。”她含泪对我说。

云南是我独立艺术人生的第一个站点，我在昆明安下第一个家，两个孩子先后在这里出生，也带着学生下过很多次乡去写生，和云南美术界的同道、朋友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离开云南我有难舍之情。但我知道，新的未知的历程正在前方召唤我。

我深知没有吴冠中先生多年在艺术上的引领和影响，没有他对艺术教育的无私奉献和热情，没有来自他直接的关心鼓励，我不可能成为这位卓越的艺术教育家的研究生，继续艺术的探索之路。

从昆明搬家到北京，丁绍光的侄子丁虹帮我收拾东西。我家只有刘巨德自己用旧木板打的一只木箱和一件用夹纸板打得的简陋的小柜子，还有当年来云南时母亲送给我家里的一件旧牛皮箱和一件柳条箱，这几样物件可以装下家里所有衣物、书本及所有的画、画具和各类生活用品。我去系办公室归还系里借给我用的一个很旧的木桌，系里说不用还，送给我了。我决定将它带到北京使用。帮着去火车站托运行李的司机师傅惊奇地说：“你们家怎么就这么一点儿东西啊?”

暑期，我与刘巨德和孩子们在北京重逢，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我，三十三岁重新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涯。

四

读研究生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色彩基础研究。

读研期间最重要的一次课程，是 1980 年和吴冠中一起到江南写生。

1980 年 3 月，装潢系 77 级要去苏州上课，系里派我做助教，我和 77 级张歌明同学先行一步打前站，负责联络当地单位，给教师学生安排食宿、教室等事项。系里安排先是袁迈先生的三周商美专业课，然后是吴冠中先生的四周色彩写生课。三周后，袁迈先生结束课程返京，吴冠中先生来到苏州接替色彩写生课。

色彩风景课的头一站就是苏州园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四个年头，正值春光明媚，花红柳绿的时节，园林里到处都是游客。女士们花枝招展，摆着各种姿势拍照，不少年轻人提着当时最时髦的手提录音机，很神气地游来逛去，各式流行歌曲在园林中此起彼伏四处飘荡，在这欢乐的踏春气氛中，想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讲课画画真是不容易。吴先生事先绝没有想到心目中幽静的园林之美会遭遇到这样的干扰。于是他先带着我们在园林中寻觅，尽量躲开密集的游客。在拙政园，吴先生强调了这里回廊的曲线美，他说：“园林的墙不仅是一堵墙，而是为了空间美，视觉美，讲就高低起伏的变化。”“你们要注意观察，园林中窗子、门，造型都不雷同，为的是要与周边的自然景色协调。”“园林最讲求形式美，世界独一无二！这是我们中国几百年前自己创造的美，非常了不起。”“白墙黑瓦的对比关系要显出造型身段，是主角……”同学们认真观察园林中的花窗，有人甚至去数了，结果不止上百种，有的是对称的图案，有的是自由变换的曲线或直线，外形也不一样，令大家赞叹不已。

吴先生将苏州园林的太湖石与亨利摩尔的现代雕塑相比较，让我印象深刻。我在杂志上看过亨利摩尔雕塑的照片，但并未与太湖石相联系。吴先生从抽象美的角度谈到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令我开悟。这两者都展现着自由流动伸缩的体量和空间，虚空间与实空间互生互动，散发的都是抽象的视觉效果，亨利摩尔在抽象中给予一定意象的倾向，而天工成就的太湖石是完全抽象的，可以加入观者的联想，也可在视觉中生出象的意味。在吴先生的引导下，我进一步理解太湖石文化其实是中国文化创造力的体现，体验到古人深邃、智慧、含蓄的审美品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记得吴先生带我们转到园林中一个不起眼的墙隅，角落里竖立着一个瘦高挺拔的青色天然石笋，石笋旁种着几棵优雅秀丽的翠竹，在白墙衬托下突显一种清冷高贵的气质，停住脚步，目光急促地上下打量着，突然激动地大声说出一句话：“这是园林的魂!”

在留园，一面高墙上爬满一棵巨大的爬山虎，我觉得这些密密麻麻生长的线有一种抽象的形式美，先生对我说：“如果叶子都长出来了，



渔港　1980年吴冠中作　油画木板　46×61cm



渔船 1980年吴冠中作 油画木板 46×60cm

枝条看不见，筋骨没有了，就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正好画，要抓住动势来画。”我觉得吴先生说得很对，很想画，可怎么画呢？太难了。我硬着头皮画了一张水粉画，用水粉笔耐心地把枝条由粗到细一点点画下来，心中一直想着吴先生说的动势，画完后得到吴先生的鼓励，我小有高兴。

其实我最怕画公园和建筑。园林是古人精心设计的绝美景观，进了园林真的是美不胜收，就凭我一张纸、一点水粉颜料和毛笔，怎能画出它的美呢。吴先生讲的我觉得自己能理解，但真一动手就觉得力不从心。其实我后来明白，我还是在客观和主观之间纠结着，成长是需要磨炼、需要时间的。在苏州我画了拙政园的廊亭，画了石笋，画了高墙上的爬山虎，画了狮子林，还画了蔪门桥等。虽然画得不尽人意，但自己还是感到想法有了突破，认识有了提高。

不过其间我给吴先生找了麻烦。一次由于没有注意静园的广播，被关在了狮子林，让大家担心不算，还在公园门外等了好久。还有一次在苏州城自由选点写生，规定晚上七点准时在苏州丝绸工学院集合，我独自一人在蔪门桥画写生，因记错了路（那时正修路不通公交车），走错方向走到了苏州医学院。我打听苏州丝绸工学院在哪里，人们说：“哎呀，你方向搞错了，这里修路没有车子，你只能退回原路重走。”我焦急地往回赶，又走了一小时，天黑才赶回丝绸工学院。让吴先生直着急，我非常内疚。

五

下一个写生站点是苏州乡镇甪直。从苏州到甪直先乘公共汽车，最后一段路程要走水路，谁料下了公共汽车赶上瓢泼大雨，我们把行李从汽车搬到船上，人也上了船。虽然有人撑起雨伞，但根本抵挡不住倾盆大雨的势头。到达目的地了，大家上了岸，赶紧从船上往下卸行李。当时风也不小，只见吴冠中先生站在岸边指挥大家搬行李，手里举着的黑雨伞在风雨中东摇西晃翻上翻下，衣服鞋子已经全湿了，同学们劝他躲到边上避雨，他哪里肯听，定要与同学们风雨同舟。我们拿着介绍信赶紧找到镇领导，待大家把行李搬到住处，打开行李一看，都傻眼了，虽然有塑料布包裹着行李，但雨太大了，雨水还是渗进部分行李中，很多被褥都湿了。吴先生很着急，同学们晚上睡觉怎么办，来不及晒干啊。这时当地接待我们的同志急中生智想了个办法，他说镇上的豆腐房有口特别大的铁锅，可以用柴火把湿被子放在锅里烙干。这口大铁锅是我见过的最大铁锅，锅口直径得有一米半左右，这个办法总算救了急。吴先生亲自看到被子铺在锅上烤才放心。他和同学们一样，都为这个意想不到的救急妙计兴奋不已。

我和吴先生傍晚才来到下榻的甪直旅店。我因算助教，可以报销住宿费，因此可以不带行李住旅店。旅店与南方民居的建筑材料相似，四周是二层楼板房，中间是个天井，每个房间之间只是用木板隔了一下，各个房间配一个木制的马桶。天井中央有两口巨大的水缸分别盛着热水和冷水，靠边并排砌着炉灶。我和吴先生站在炉灶旁烘烤湿透的鞋子，他双手抓住一双高帮的翻毛皮鞋，鞋底朝上在灶口处晃动着，以便热气能烤进鞋里边。

我说：“您今天淋这么大的雨会不会感冒？”他马上摇头说：“不会不会。”吴先生似乎仍处在白天与风雨拼搏的兴奋中，他看着手中的旧皮鞋，对我说：“我不管去哪里画画，都穿这双鞋，特别结实，无论爬山，还是走碎石土路，或是下雨走泥巴路，它都没问题。”“还有这件宽条灯芯绒的衣服，耐脏，可以穿很久不用洗。”吴先生还说：“一回到江南我就会激动，这里和我老家宜兴很像，让我想到小时候。”

说到吴先生小时候的乡情，我在甪直可真见到过一幕。一次在水道边的石板路上，我见吴先生边走边低头用双手摆弄着什么，我和他打招呼，他抬头看见我，像小孩子一样笑了，原来他刚在小店里买了一支糖，这糖不能说“一块糖”，是因为它是稀软黏稠的，一只糖带着两只小棒棒，先生双手各拿一支棒棒，在不停搅动着上面蚕豆大小的一坨红褐色的糖稀，说：“小时候吃过的，觉得特别好吃。”吴先生笑着告诉我，“很久没再吃过了，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才几分钱一支，买一支吃着玩。”看见老师满脸童真的喜悦，我很替六十一岁的老师高兴，这小坨甜蜜的糖稀将把他带入童年的梦幻中，一双小手拿着两支小棒棒搅动糖稀的快乐又在他心里复活了。童年珍藏的记忆，是艺术创造的种子，带着基因和血脉，含着乡情至民族情，永远浸润着艺术家的创作生命。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江南农村，它让我想起了电影《祝福》里的镜头。甪直古镇共有七十二座桥，古朴厚重，又变化丰富，农妇还穿着传统式样的服装，梳着传统的发髻，水路遍布全镇，无论运稻谷还是其他物品，都要靠摇着船走水路，白天的河道总是很繁忙。

77级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正式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本科生，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而对于吴先生来说，这次写生课也是他“文化大革命”后一次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实践机会。

带同学们外出写生，他总能从自然生活中寻

觅到美的形式。无论在苏州还是角直都是如此，哪怕一扇木窗棂、一棵小草的影子，都逃不过他敏锐的双眼。我常见他在路途中随时将这些来自生活中的例子写在小本子上。他告诉我这都是他将来讲“抽象美”时有说服力的例子。吴先生撰写过不少文章宣讲艺术的抽象美、形式美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他的教学实践。

“我是老母鸡，带着你们这群小鸡觅食，告诉你们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我记得十分清楚，这是吴先生在角直村外的路上对同学们说过的一段话。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这句话，后来在其他场合，在讲座当中他也多次提到过。今天回味这句话的深层意义，是他发自内心对美育职责的担当，也流露着他对学生深厚的情感。他真是唯恐自己的学生不懂什么是美而成“美盲”。吴先生这句生动风趣的话语，装潢 77 级同学一定不会忘记。

在角直，天蒙蒙亮人们就开始忙碌了。这里人们习惯每日吃新鲜菜蔬，所以桥上几乎每天清晨都有集市，村妇和姑娘们在这里卖刚从自家菜园摘的蔬菜或刚刚捕捉的鱼虾，河道中已有船只在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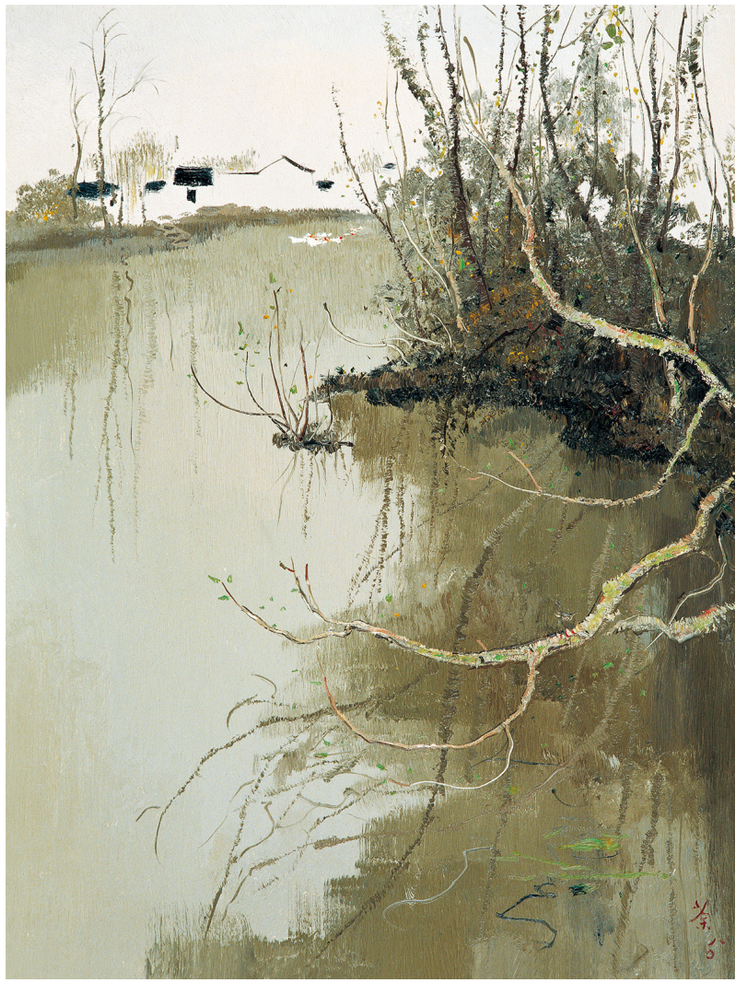
吴先生起身很早，他走遍角直的街巷桥头，又走出镇子周边的各个出口，从内到外，又从外到内地四处观察寻觅，用随身携带的小本记着画着。他经常白天作画，晚上还要到镇里的文化馆，在打满地铺，拥挤的学生住处，在昏暗的光线下，给二十多个学生的作业一张一张进行分析品评，这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吴冠中先生当时已经近六十一岁了，还如此勤奋作画，尽心尽职教学，对学生充满爱心与责任感。吴先生的言传身教深深感染着学生，他们觉得自己年轻，应该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吴先生五点就开始工作，他们起得更早。清晨，当先生漫步于村镇的街巷桥头时，有些同学已静静地坐在那里画起来了，吴先生高兴地对我说：“我以为我是最早的，他们比我还要早。”他又说，“搞艺术就要能吃苦才行，如果孩子要学艺术，要先打击他，打击不行，他还是要画，那可以考虑。”

3 月末的阴雨天，清晨很冷，加之会有毛毛细雨，坐在潮冷的街头画画也要穿上棉衣。我画古镇的老屋、小桥，河道中的渡船，打着黄色油布雨伞的过桥村民，对眼前的景色迷恋着，耳边响着先生平时讲的道理：在写生过程中如何抓住感受，概括提炼，移花接木……我在磨砺中不断体会着。

在角直半个多月的写生课中，我和同学们非常幸运有机会亲临现场看吴冠中先生画油画写生，其中有三幅我印



水上人家　1980年吴冠中作　油画木板　46×61cm



水乡　1980年吴冠中作　油画木板　61×46cm

象最深。

首先是《江南人家》。那天下午我提着画完的画回旅店，路上看见有几个同学围在一座桥头前，我猜想准是吴先生正在那里画画，过去一看，果然，吴先生正在三合板上画一幅油画，画面虽没结束，却已显现意想不到的强度，看了很是震撼。一块暖白的高墙顶天立地矗立在画面中央，石砌的河道与河水在画面底部形成错落有致的灰色的水平重块，像基石一般托举着白块，稳定了画面。正对面的石桥从这里跨过去，伸向一条巷子。白墙四周由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黑块白块包围着。它们重叠紧凑，是黑瓦、白墙、幽窗似是而非的幻影，和真实的景色比较，画面极度夸张，极其概括，目的非常清楚，强调黑白块面的构成美。除去桥面上一级级台阶的横线丰富了垂直水平主调的变化，几乎舍弃了所有对象无用的细节。我一直看着先生将这幅画画完，真是强烈、好看、痛快！既真实，又不真实。真实在于强调了甬直古镇色彩、造型形式美的特点，画家强烈的感受很真实；不真实在于白墙极度夸张，变得顶天立地，四周的黑块布阵已完全不受对象的限制，随心所欲，自由安排，分不清你我。我和同学们面对这幅画简直是在欣赏一个出奇制胜的战场，赞叹不已，舍不得离去。先生心明眼亮，自知画得成功，因此也比往日显出了兴奋。我在想，这就是抽象美的力量啊。

其他两幅油画写生是在甬直村外画的，一幅是《水乡》，另一幅是《水上人家》，这两幅画作都与水有关。如果说《江南人家》是用黑白块面打造的出奇制胜、震撼心魄的战场，这后两幅作品则是饱含乡情的柔软的诗。这两幅画也是先生反复观察体会，在心中酝酿很久后诞生的作品。水天一色的《水上人家》，以透明优雅的银灰色，衬托着池塘中间的一前一后、一近一远的两小片土地，吴先生把看似远近不同的几户人家，连接成美丽的黑白结构，在看似轻松中营造着严谨，最后他在画面中用温暖的淡灰绿色把春天刚发芽的小树和水中的倒影按照画面所需的动势生动地画下，它们紧紧拥抱着水上人家的黑白色块，小树的干与枝条在画面结构与线面对比变化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幅画也是吴先生的满意之作。

《水乡》我认为是三张画中最难画的一张。当吴先生把画架支在这个位置时，我简直想不出他要画什么，眼前只是一片水和岸边杂乱的草木，很远处可见零星的村舍，也许站在旁边的其他同学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不料吴先生最后把这幅水乡的景色在自然而然的面貌中画得这样美。追其根本原因，还是吴先生在面对自然时，用色彩和造型的抽象思维，从这些极为平常的对象中，敏感地捕捉到可以升华和扩展的抽象美形式，这幅看似轻松单纯的画面，其实有着非常好的阴阳关系，大结构抱得很紧，色彩整体到位，精致的重线亮线、重块亮块遥相呼应，锁紧画面，没有任何犹豫啰嗦的笔触，最终创造出对象如诗如画的抒情含蓄之美。这是敏锐的感觉、深刻的情感与强大的理性完美结合的果实。通过这幅画我认识到，抽象美是绘画非常内在、深刻的法则，她能够以无尽的面貌呈现出美的形式。

这件作品是对吴先生最重要的艺术思想——“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相当具体的诠释。

《水乡》与《水上人家》两幅油画，吴冠中先生已于生前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可见它们是先生深爱的写生作品。

77 级的写生课顺利结束了，同学们收获满满踏上归途，吴冠中先生与大家一起离开甬直。吴先生与我商定，让我自己留下来接着写生。他先去无锡做报告，还要在轻工学院美术系讲课，然后再去深圳忙展览。几天后吴先生从无锡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小钟：

寂寞中的劳动最见成效，愿你默默地、宁静地在无干扰中工作，像婴儿的酣睡，是真真在成长中。

吴先生沁入肺腑的叮嘱，我感觉那正是他在孤独沉静中苦苦求索的体验。此时，我一人在甬直写生，吴先生远在另一个城市仍牵挂学生的学习，他用自己的真实感悟为学生引路，字里行间充满对学生的鼓励和期待，这就是吴冠中先生的品格，他是多么好的老师啊。

我喜欢静。这些天我对甬直的感受已渐深入，我画农妇牵着牛出村去耕地，画月亮刚刚从村口老屋的上空升起，河道中渔船的渔火点亮，或许是外乡人路过甬直在此夜泊，于自家船上烧饭、夜宿。这些画都是直接写生，或是写生与记忆中的幻象重构，虽然有内容和情节，但最重要的是需踏下心来，体会吴先生的教诲，求其抽象美的形式结构，才能更好地突出画面的意境，主动表达真情实感。

我想起吴先生这次在甬直保圣寺罗汉堂画过壁塑，我当时只顾写生色彩风景，并未打算画寺庙里的罗汉。据说这些罗汉是唐代泥塑大家杨惠之所做，吴先生极为赞叹壁塑的艺术水平，建议我可以对着画一幅写生。此时我独自一人来到了保圣寺，走进罗汉堂，立刻被这座前所未见的壁塑面貌震惊了，它完全不似通常看到的寺中彩塑，此墙面积并非特别巨大，但气势恢宏，灼灼逼人，一眼望去满壁尽是突兀怪异的团块，直待静观，才看出那是上上下下高低起伏的山水云烟和在洞中静坐修行谈经论道的罗汉，这一切在流动升腾的浑茫气象中融为一体。我想，这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壁塑，创造的完全是一个意象的、非现实的自然，是变幻不定的色空之境。这需要创作者有多么强大的抽象思维和想象力啊！它的成功表现完全基于抽象形态与动势的把控，这九个罗汉作为人神的化身，无论造型还是神情都有极高超的表现，我对深邃的佛教文化知之甚微，但我有一种直感，觉得保圣寺的壁塑创作者已把艺术与宗教升华到同等高度，同样的形而上，同样为空的自由境界。我很感激先生的指引，让我走进这座殿堂，给我时间和宁静去感悟艺术中更深刻的问题。我把高丽纸铺在青砖地面上，趴在上面开始用墨线来写生，这是我不熟悉的方式，虽然画得很慢很笨，但感悟和思考较多。

还记得那时有一个性格温和、面容秀丽的甬直女孩有时会和我在一起，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忘记了她的名字，她喜欢陪着我看我画画。

又过几日，吴先生来信告诉我，他 27 日才抵达深圳，深圳的画展已于 25 日开幕。“这几天常有香港记者及同行们来访，港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等都已发了消息、作品及文章。”吴先生向我简要谈了展览的情况，通知我 5 月初在杭州会合，经宁波乘船到舟山群岛沈家门渔港，他将带我在此完成研究生写生课程。

六

我按照吴先生的安排到杭州文化局，更换了给宁波文化局的介绍信。和吴先生会合后，我们乘火车抵达宁波，通过宁波文化局，又了解了沈家门的大致情况，也准备了介绍信。

吴先生一路谢绝了所有要客气招待我们的饭局，他说时间决不能花在应酬上，我们能自己办的事就自己办，越简单越好，这会省掉很多啰唆事，也不给别人添麻烦。

乘船到了沈家门，我们没有找任何人帮忙陪同。记得小时候母亲让我办事时常说的一句话：鼻子底下有嘴，自己去问。于是我见当地人年长或面善的，就过去打听，哪里有招待所或旅店，他们都尽其所知热情回答。其中在沈家门的体育馆中有招待所，客房就在圆形体育馆墙的内侧，



渔港夜 1980年吴冠中作 水墨设色高丽纸 103×103cm

没有比赛和运动会时，空房间很多，价格便宜，且居住人员相对单纯，我们选择了在这里下榻。在各自房间放下行装后，我和吴先生就赶紧出发，去四处观察踩点，为写生做准备。我们先是走遍这里的大街小巷，然后又蹬上舟山岛的山坡，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寻觅，唯恐漏掉可以入画的景物，但结果不算理想，仅有两三处街巷和山上的景色，被列入可画的范围。

跟着吴先生写生，基本了解了先生的思路，每到一地，他一定先四处观察寻觅，无论开阔的视野还是近在眼前的景物，他都不会放过，然后选定主体形象，捕捉、概括抽象美的特点，用先生的话说就是“怀孕了”，很多情况下他会先画速写，甚至只是在小本上简单勾勒一下，经过这样认真准备，再着手油画或水墨画的写生，在角直写生的油画《江南人家》，就是先画了很具体的速写，而后再完成了形式感极强的带抽象意味的油画。

沈家门渔港是一个狭长的港湾，位于舟山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舟山岛，背后是山，对面是东海，自西向东听说有十里长，为渔船提供了最好的天然避风港，中国沿海各省，包括台湾，渔民们需要时都会把渔船停泊在这里。我们来到渔港，看到沿着海岸有成千上万的渔船伸延开来，弯弯曲曲一眼望不到头，与之相伴伸延而去的，是岸边绿色的织补渔网的长龙阵和街边无数的房屋、店铺。由于过往的船多人多，这里比较繁华，被人们称作“小上海”，港湾的景色有气势有形象，随着环境阴晴昼夜的变化，景色也呈现不同的面貌，先生认为还是这里有特点，决定以渔港作为重点写生之地。

与吴先生朝夕相处，比以前对先生有更多的认识。吴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艺术思想自由狂放，生活却从来都计划性很强，决定任何事情目标清晰、果断，做事细致有序。舟山的地理位置靠东，此时已近夏季，天亮得很早，我们每天早上四点左右就起床，带好作画工具出发，先去吃早饭。吴先生每天喜欢在街上早点铺喝一碗浓浓的红小豆粥当早餐，然后我们就去前一天定好的地点画画了。有时每人各画各的景，有时一起画相同的地点。为了集中精力，自由掌控时间，吴先生提出吃饭各吃各的，这样可以不用互相等待，浪费时间，好抓紧时间工作。事实证明这个方法非常好，都给了对方自己把控作画时间的自由。沿着渔港的大街有许多小饭馆，吴先生的安排完全不成问题。

一天，吴先生对我说：“今天我请你吃饭吧，有一个地方鱼做得很好吃。”于是我跟着吴先生来到海港边一个老大的大棚屋，里边摆放着数不清的方桌，方桌周边放着长条板凳，来吃饭的至少有上百人，我一下都看花了眼，我们在一张方桌前坐下，吴先生买了两条清蒸黄花鱼和两碗米饭，每人一份。他问我喝不喝黄酒，我说不喝，他自己要了一碗黄酒，是用吃饭的大碗盛的。吴先生说：“这里不仅鱼特别新鲜，黄酒味道也香醇，我们家乡那一带都喝黄酒，我非常喜欢喝黄酒。”

此时，我定下神来观察周围，突然发现整个大棚里都是渔民，除了我竟然没有其他女的。大棚里声音嘈杂，渔民们说话大嗓门，大多操着浙江或福建口音，我完全听不懂，还有人大声划拳。他们皮肤黑红，体格结实，骨相突出坚硬，并不很高大。这些离家出海以捕鱼为生的人，在此落座片刻休整，吃着鲜美的黄鱼，喝着大碗黄酒，尽情地喊叫，明日将驾驶他们的渔船驶向充满未知的大海。我见吴先生也是皮肤黝黑，也有着坚硬的面庞，也在那儿捧着大碗专心地品尝着黄酒和黄鱼的美味，突然觉得他和这些豪爽的渔民竟如此相似，偶尔的，犒劳一下疲惫的身体，明天将再次踏上艺海无涯的探索之路。

每天晚上回到招待所，我们先相互观看、讨论辛苦一天完成的作品。然后是清洗油画笔，准备第二天的颜料和用具。吴先生很头痛洗油画笔，但坚决不让我帮他洗笔，他见我用洗衣粉和温水浸泡油画笔，觉得是个好方法，他以前都使用肥皂洗笔，后来也用洗衣粉了。

吴先生还有一个令我十分感动的习惯。我发现他每隔一星期左右就会给师母朱碧琴写一封信。我说：“吴先生，您对师母就像年轻的恋人一样，多好啊。”吴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一定得让她了解我在外边的情况，要不她就会挂念我了。她这个人非常善良，一辈子为我作牺牲，我欠她一条命。我总是离家外出，必须这样做才能补偿一下。”我听后对先生更加敬佩了。吴先生反过来问我：“你有没有收到刘巨德的信啊?”我说：“还没有，可能他上班还要管两个孩子太忙了。”话虽这样说，可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因我给他写信他一直没回音，是不是孩子病了?

不出所料，我返京后才知道，大儿子一个多月前在幼儿园和小朋友玩时摔了一跤，把手臂的桡骨摔断了。他要应对多少事啊，既不想让我知道担心，又不能报假平安，只有先不写信。

我是个糊涂多忘事的人，不利索。我和吴先生同时走在路上，我背个不小的自制帆布口袋，里面装着刷了胶的油画纸和对开画板，又背个装满颜料画笔的油画箱，上衣兜里还装着各种零用的物件，个子又矮，走着走着口袋中的饭勺不知怎么回事当啷掉到了地上，吴先生摇着头说：“你看你，浑身披挂呀！”我听出吴先生是婉言批评我不利落，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心想一定注意改正，不能给老师添麻烦，让他操心。为了和老师同步准时行动，每天晚上我一定要把第二天用的东西备齐，可没料到，还是会出错。有一次，早上走了近半小时的路，爬上山坡，我们支起画架准备画画，不想在往调色板上挤颜料时，我发现头天晚上什么颜色都准备了，就是没带白！没有白许多亮色调不了，这可如何是好！时间这么宝贵，怎么对吴先生说呢？我心一横，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下了山坡，一路小跑回到招待所，拿了白颜料又赶紧向回跑，回到山上，至少四十分钟过去了，吴先生已经开始画好一会儿了，我什么也没说，吴先生什么也没问，我赶紧开始画自己的画。



普陀山 1980年吴冠中作 水墨设色宣纸 90×90cm

大约过去二十年以后，我说了实话。有一次，我问吴先生：“您还记得咱们在沈家门有一次画画，我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过了好半天才回来。”吴先生马上回答：“记得啊，记得。”“您知道为什么吗，我那天忘带白颜料了，怕您生气，没敢告诉您，马上跑回去取了。”吴先生惊讶地说：“哎呀呀，是这么回事啊，我以为女同学有了特殊情况了，不好说，所以不吭声就走了。所以我也什么都没问。”

这次来舟山，是吴先生专门安排的研究生课程。和吴先生近距离接触，他看出我虽然有些想法认识，但画起来还是不够主动明确。吴先生为了让我能更加具体深入了解他的艺术思想，包括观察和表现手法，给我提出一个建议。吴先生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个短暂时间画得与老师相像是允许的，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有这样的过程，甚至通过临摹，更好地研究、理解一些问题。梵高就临摹过米勒的画，对他启发很大，他画的《播种者》就受米勒的影响。”我接受了吴先生的建议，开始放松心情，和他一起画了很多张渔港的油画，有相似的角度，也有不一样的位置。向吴先生学习构图、归纳、整体形式美感的把握，以及笔法的提炼概括、细部的处理等，获益匪浅。这些写生和吴先生的画风比较接近，又必然有所不同，吴先生画得更自由肯定。现在拿出这些画来看，感到格外亲切和珍惜。

我们在蒙蒙细雨中，在夕阳照耀下，在万千桅杆林立的壮景中，在快艇穿梭汽笛鸣响的热闹海面上，画了许多张不同构图的港湾和渔船，尽管我们尽量变换构图，但在这十里长的港湾，永远只能站在它的一侧，从差不多高的视平线观察感受它；尽管画得尽量有不同的情趣，但真有些不想再画了。

可就在这时，吴先生发现了一座高塔。他兴奋了，说：“要是能爬到那上面肯定可以看到好景色！”我跑近一看，这塔下面原来是沈家门港务局的办公室，我们走进去拿出了介绍信，说明来意，没想到人家同意了。这座塔应该是港务局的瞭望塔，用来观察渔港的情况。时间久了，没有相机记录，记不清到底多高，大约有三四层楼的高度吧，从办公室旁边就可以直接爬上去，就像爬烟囱一样，要顺着钢筋做的梯子垂直着一蹬一蹬爬。我问吴先生行不行，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坐在那里办公的港务局同志回头嘱咐说：“这位老同志你要当心啊，慢一点。”到了塔顶，有个水泥平台，周围是钢筋护栏，真是相当不错的条件，从这里望沈家门渔港可就大不同了，真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我在吴先生的鼓励下，也铺开整张高丽纸，准备画下俯视渔港的浩瀚场面。我向吴先生学习，先用焦墨抽象定位主要形式结构的位置，而不是一只一只船具体推着勾画，这样能从大处着手把控画面。我们画了整整一下午，也远没结束。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奇迹出现了！船上的渔灯和烧饭的渔火，一个一个亮了起来。没过多久，成千上万渔船的灯火如繁星般闪耀在十里港湾，我们从高处望去，真是太震撼了。吴先生激动地说：“这夜景太难得！完全是意外的收获，可以画出一张好画！”不巧天下起了小雨，因为是在纸上画的，我们赶紧把画收起来装好，这时天色也已经暗得无法再画了。先生说：“下雨肯定是不能再画了，但美的形式关系已经印在脑子里，跑不掉！回去可以接着画完。”我们在雨中最后看了一会儿这通向天边的，由万点绚丽的渔火灯光幻化的神奇夜景，不舍地离开了。

吃过晚饭回到招待所，我和吴先生在各自房间里接着画起来。我觉得渲染暗部的重墨是画面大结构的关键，也是最难掌握的一步，因为近景几块船上的亮部要靠黑托出来，亮的面积虽然不大，但阴阳关系的位置重要，必须空好。在一片重墨的夜色中画万千桅杆的黑垂线，在夜晚的海水中画光的倒影的亮垂线，你中见我，我中见你，打造的全是抽象关系，打好这个基础，再画灯光大大小小的彩色亮点，就可以锦上添花了。我花了两三个晚上熬夜，差不多才算大体完成了这幅彩墨画《渔港之夜》，画得比吴先生慢多了，吴先生一个晚上就画完了。不过我这次真得很高兴，吴先生认为我这张画得抽象关系把握得不错，效果很好。应该算是这次在舟山画得最有感觉的一幅画，我真心感激吴先生给我上的这宝贵的一课，使我一步步在明显地成长。

七

我们写生的最后一站是位于舟山最东面的普陀岛，也是中国最靠东部的岛屿。普陀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1980 年这里的游客很少，离开码头，走到绿树成荫的山前，便格外清静，只零星见到路边身着灰袍的僧人，和肩挎黄蓝双色佛教图案包，前来朝拜的信徒。岛上有很多古樟树，长得枝繁叶茂，枝杈较粗有些弯曲，向四处伸展，样子真有些像章鱼，不知是否因此而得名。我在北方没见过这样的树，吴先生不喜欢樟树，一路边看边说过好几次，“造型不好看”“枝干没有美感”“个子大，但是臃肿”。

我们顺着石头阶梯登上山，来到一座庙里。我印象中这座庙不是很大，时间过久，我已记不住到底是岛上哪一座庙。我们一直走出最后的庙门，面前突然出现一望无际的大海，我猜想我们站立之处的前方再没有陆地了，若从这里驾船一直向东驶去，将离开中国海域直达太平洋。我从未在如此高度、如此遥远、什么也见不到的地方眺望大海，无边无界的空象把我的心一下击中，这与在飞机上眺望云层，鸟瞰地球山脉江河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的思维瞬间停止，只有心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无垠、强大的空和轻。我和吴先生面向大海无言地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吴先生这时在想什么。最后他说：“天海茫茫一片，等于什么都不存在，形色全无，没有可画的了，走吧。”

之后，我们又回到刚下船时的码头附近，那里可以看到岛上万千年来在风吹浪打中生得圆润奇妙的巨大礁石，它们顺势向上相依相靠地环抱着，中间围着一堵碎石垒砌的高高护坡，护坡顶上建有几处房屋。从码头上岸走过的路边向下看，可以看到几个黑瓦屋顶，其中一个屋顶特别巨大，与其他几个瓦顶形成一片大小不等、变换有序的黑块面，这些说来平凡的景物，要比名声在外的寺庙景区更有美的情趣。吴先生感慨地说：“往往听人将某一处名胜说得如何如何好，真的去了，总是失望。美在何处，只能自己踏破双脚去找啊。”

在普陀岛画画最后几天挺苦的，出来写生两个多月了，我们都晒得很黑，走到哪儿都得背着画具等物件，显得衣衫破旧不整。一天，我戴顶草帽穿着灰布上衣，蹲在地上画画，样子大概比当地人土气多了。过来几个人站在后面看了我们一会儿，其中一个男人在我身后说：“这个人是男的女的?”说完他就弯下身来向草帽低下看，辨识后说：“是个女的。”吴先生有些生气，对他说：“你不要影响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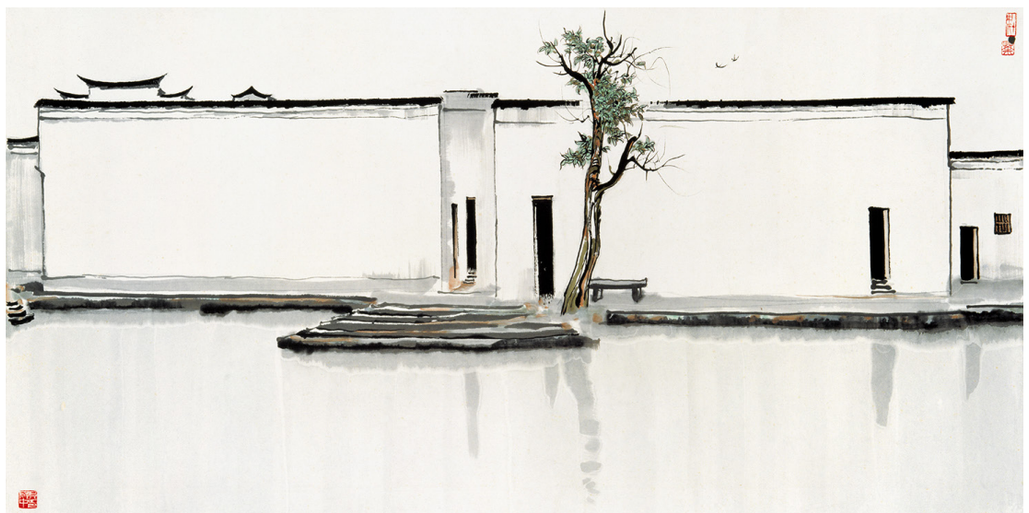
离开普陀，乘船返回沈家门，在码头下船时我又惹了麻烦，检票的人发现我给他的票是去程的票，看见我们土气，以为我们是想用旧票蒙混过关，不由分说就揪着袖子先把我和吴先生拽到一边，我赶紧解释我肯定买了回程的票，我着急地在上衣兜里找，一下掏出一把票。吴先生很生



松魂（一） 1984年吴冠中作 水墨设色宣纸 70×140cm 编入美国大学世界美术史教材



小鸟天堂（二） 1989年吴冠中作 水墨纸本设色 144×331cm 大英博物馆收藏



双燕 1981年吴冠中作 水墨设色 70×140cm

我的气，说：“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也别急，慢慢找吧！”我把回程的票找到了，赶紧递给检票员，他才让我们上了岸。吴先生接着说：“哎，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糊涂。”出门在外，我是负责后勤的，我本应照顾好吴先生，但由于我的过错，让吴先生受这样的委屈，心里很难受，我真恨我自己。

我们按照计划一共在普陀岛停留了三天。我用高丽纸勾墨线，俯视画了码头不远处一个大屋顶，又画了一幅岛上矗立的大块礁石的油画，还用毛边纸画了普陀山的线描速写等。记得后来吴先生根据在这里画的一幅速写创作了水墨画《普陀山》，是一件很好的作品，吴先生生前将其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下面是我从1981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的老师吴冠中》里，节选的一段我和老师在普陀岛写生的故事：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普陀岛写生的那一天。他从早上六点钟就开始跪在高丽纸上，面向大海作画。海风阵阵吹来，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石块来压住被吹翻的纸。到下午两点钟，我去买了几个包子给他吃，他正紧张作画，顾不上吃。往日，我是不敢打搅他的，但那天他实在太苦太累了，老人跪不住了便趴着，趴不住了又跪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脱口而出：“您看在朱先生（他的老伴）的面上把包子吃了吧，要不我就把它丢海里了！”我成功了，提到老伴，打动了他，他吃了。然后又趴下去，直画到太阳要落山了。

我们背着落日的余晖翻过山坡往回走。他已非常疲劳，走得很慢，我突然发现他额头上的皱纹是白色的。太阳晒黑了他的脸，却未能钻进他双眉紧锁的条条皱纹中。“吴先生苍老多了，您累了吧？”我问。“是啊，我从来不愿意让老伴和孩子们看到我画画时的样子。”

后来吴先生告诉我，他读这篇文章哭了。

在另一篇《唯真、唯善、唯美》的文章中，我写下了这次江南写生最后的故事：

从三月份带77级学生去苏州写生，到这时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吴老师和我都有些想家了。普陀是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踏上了归途。在宁波一下船，我们立即买了当日下午两点多钟去杭州的火车票，准备从杭州返京。在街上小店里随便吃过中饭，还有一点闲暇的时间，我们决定先把行李存在火车站，去街上走走。吴先生仍没有忘记把速写本取出来带在身上。他无时不忘带着速写本，寻到生活中的美，就用速写的形式将感受画进这本子中，这可是照相机不能代替的。万一这一个多小时中还能见到好景色呢？

宁波是我所见过的最雅静、最秀丽的小城市。街上的车少，人似乎也少，房屋和路面十分清洁，但却多垂柳、小河，河水比苏州城里要清净多了。我和吴先生沿着街道慢慢地走着，路转了，我们也随着转去。忽然，在路旁的小河对岸出现了长长的一堵白墙，在黑瓦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明净，门、窗、瓦顶与台阶，在白色的空间中有伸有缩、高低错落、间隔得当，疏朗单纯又不失变化，在静静的河面上留下美丽的倒影。吴先生被这美震撼了，激动地连声说：“这白块好看啊！真好看啊！”再来不及对我多说什么了，他捧起速写本，发抖的手握着黑色的速写钢笔画了起来。他常常把画画比作打仗，此时他的神情就像在打仗，紧张、全神贯注，周身的血液沸腾着，精神与力量全都凝聚在笔尖上。终于画下来了，一看表，还差二十分钟火车就要出发了，我们撒开腿向火车站跑去。他跑得很快，让我吃惊，几乎要跟不上他了。我害怕了，担心他心脏出问题，毕竟六十一岁了啊！

“吴先生，慢点！晚了就算了！”我边喘气，边大声劝着。

“没关系。”他毫不在乎，接着跑。

文文静静的宁波人，吃惊地看着在马路上狂奔的一老一少，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进了车厢三分钟，火车“呜——”长鸣一声开动了。

一九八一年，北海画仿斋举办了“吴冠中新作展”，展出了四尺整宣的水墨画《双燕》，是依据宁波抢下来的那张速写创作的。两个多月的外出写生，竟在归途中乘火车前的半个多小时捕捉下最美的一页，我想恐怕只有吴冠中老师能够这样做。伫立在《双燕》面前，我激动得想哭。我非常喜爱这幅作品，十一年过去了，吴先生的艺术又有了新的突破，画了许多新作，但《双燕》仍不愧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因为它的确太美了，是千真万确中国江南的美。作为水墨画，它没有抄袭古人的任何痕迹，虽然借助了西方现代艺术对视觉科学规律的剖析，使画面的块面构架具有视觉张力，但却不见模仿西洋绘画的影子。动感的树干和枝条与特意添加的一对燕子，在画面中拨动起充满春意的诗境。东西方深厚的文化素养被艺术家的激情与智慧融化了，得到的是出自艺术家坦诚心灵，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原创性作品。眼前只要一出现《双燕》的画面，似乎能感到老师脉搏的跳动，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饱含着吴冠中老师对艺术舍得身家性命的热情和始终如一的真情实感。

八

2004年7月，为庆祝整修一新的桂林美术馆重新开放，刘巨德和我应桂林市美协和桂林美术馆的邀请，前往桂林举办“刘巨德、钟蜀珩绘画作品展”。临行前几天，我们给吴先生家里打电话，不料却听到吴可雨（吴先生长子）告诉我们先生患重感冒发高烧住院的消息。我们不放心再打电话，吴乙丁（吴先生次子）讲出了实情，原来高烧引起吴先生心脏极度不适，心电图显示有严重供血不足症状，刚住进医院时医生怀疑心脏出了大问题，经过治疗目前心电图显示供血已恢复正常，但病情仍在观察中。为了让吴先生保持绝对



作者简介

钟蜀珩，1946年出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山路》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圆圆》入选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展，《精卫》获2001年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国际评委会颁发的优秀奖，《庄稼地》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三届师生作品展”金奖，2017年应中国美术馆邀请举办中国美术馆学术系列邀请展之一“寻归自然——钟蜀珩绘画作品展”。

安静，乙丁让我们暂时不要来探望，也不要告诉别人，他说除了他和哥哥，连他们母亲都不知道。我们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坏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时通过电话打听吴先生的病情。老天保佑，吴先生的心电图显示病情一直保持稳定，医生开始考虑排除心肌梗死的可能。然而吴先生持续低烧和偶发胸闷的病状仍令我们心情十分沉重。

桂林展览开幕临近，我俩忙碌两天，托运了六箱参展作品之后，在极度不安中乘飞机抵达桂林。第二天，货运公司经铁路也已将展览作品如期运抵桂林美术馆。在美术馆的大厅里，我们正汗流浃背地与工作人员一起拆箱，给作品装框。刘巨德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吴乙丁从吴先生病房打来的电话。他告诉刘巨德，吴先生早先知道我们最近可能要到桂林办画展，在医院病房中特为我们这次画展写了一篇文章，本想让我们到医院去取，不料我们已经走了。刘巨德含泪把消息立即转告给我，我像被雷电击中一般，泪水夺眶而出。刘巨德对着电话说：“钟蜀珩就在旁边，”随后将手机递给我说，“你和吴先生说两句话吧。”我把手机放到嘴边，只是流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可我听到电话那边老师哭着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还没有读到文章，读了还要难过。”吴先生挂断了电话。他写的文章立即由乙丁传真到了桂林美术馆，文章的题目为《我的两个学生——钟蜀珩和刘巨德的故事》，我和刘巨德含泪一字一句看完。整整一天，我泪流不断。我们默默工作着，互相很少说话，幸亏可以一直低着头干活。又过了几天，7月9日，吴先生在病房里用同样的纸写了一篇《后记》，以说明文章诞生的前后经过。

吴先生希望将他写的文章放在画展的前面。桂林美术馆馆长戴延兴马上安排人将此事办好。

画展开幕后，来看展览的观众，有少数认识我们的朋友，还有更多是不认识我们的人，大家都被吴冠中先生的文章深深打动了。人们并不清楚，这位著名的艺术家已近八十五岁高龄，此时重病缠身正住在医院中，这篇文章是他在病房里依靠沙发扶手，用临时找到的两张印着图画的杂志衬页，在背面的白底上，为自己学生的画展撰写出来的。吴老先生不顾重病的痛苦和危险，仍然关心已经五十八岁的学生艺术的进展，拖着重病的身体，为我们的画展撰写前言，令我们内心抑制不住地心痛。

吴冠中老师，有着怎样的一颗心啊！

2017年10月，我的“寻归自然——钟蜀珩绘画作品展”有幸成为中国美术馆学术系列邀请展之一，这是古稀之年的我首次举办个展。备展之前，在乙丁的建议下，我们把桂林展览上吴冠中先生这篇文章放到此次画展上，以示对老师深切的怀念。

在撰写展览《自序》时，我流着热泪写道：“此刻我十分怀念恩师吴冠中先生，我多么希望他来参观展览批评指导，但先生已去，再无可能。”

九

与吴冠中老师相识四十五年，看到先生在探索未知的艺术道路上拼命前行，从不回头，不停歇。他渴望在探索之路上再多前行一段路程，画出心中梦想的更感人的作品。随着吴先生年事渐高，艺术思考越加深刻，他更加为艺术坦荡发声、呐喊。吴先生美育职责之心比天高，他心中的美育对象绝不只是他的学生，而是整个社会大众。他愿中华民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审美修养的高贵民族。

在绘画探索之路上，吴冠中先生将具象与抽象完美结合，心游万象。作品无论具象、抽象，似与不似，都来自生活中的真情实感，都含有祖国人民的情思，这是他终生在自己艺术中坚持“风筝不断线”的缘由。吴冠中先生探索之路走得越长，经历的事情就越多、越复杂，他的艰难、困苦就更深重。我感到在吴先生孤独的精神深处，有两个同行的伴侣，一个是鲁迅，是他思想的引领者；另一个是梵高，是他艺术生命中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知己。虽然这两位伟大的人早已离世，甚至与吴先生不属同一个时代或同一个民族，但思想灵魂的相通，使他们始终是先生精神的支撑。他珍惜生命的每寸光阴，不敢有丝毫懈怠。先生真的很累很累。他一生完成的工作量惊人，用自己的艺术生命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宝贵的精神世界。我觉得吴冠中先生一生，是一部读不完的巨著，每当重读都会有新的启迪，犹如一棵在周而复始的光阴中不断生长变化，开花结果的精神生命之树。

看过他所有的画，读过他所有的文字，你会看到他走遍祖国大地的艰辛足迹，宛如聆听到他对祖国母亲大地无声的赞美诗。他渴望贴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投入深厚的真情于祖国和人民。他渴望走近自然深处，搜奇览胜，与自然合为一体。他的作品洋溢着美善、朴素和乐观的感动力，流露着对人生、艺术和宇宙自然生动的感悟及活泼的哲理思考。他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对艺术中的重要关切一向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可能出现偏激，但也绝不遮掩奉迎。

对绘画中西结合的探索，一直是中国美术界呼声很高的命题。吴冠中先生对此理解研究之深刻，突破创新之勇气和执着，付诸实践之艰苦勤奋，在国内外影响之广大，在中国美术界实属罕见。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把中国文化在美学上的真正价值和无尽生命力展示给世界，坚信东西方文化在高峰一定会相会。他坚持把祖国艺术的发展放到人类文化大格局中思考，以创造出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他以大智、大慧和惊人的刻苦勤奋，探索出了一条可以无限拓展、生机勃勃的中国绘画现代之路。

吴冠中先生为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燃烧生命全部热血，铸就了为美而生，为美而亡的不朽人生。

广东侨联工作 仁爱公益品牌

侨爱南粤

爱侨护侨助侨，因应侨界需求，以人为本，以爱润心，引领侨界大众，共建华夏一家。

钟国康

文 贾平凹（著名作家）

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历久乃成，其鸡望之若木鸡，盖德已全，它鸡无敢应者。

这个故事，我最先不是从《庄子》上读的，是钟国康告诉我的，他送了我一枚印：木鸡养到。

钟国康是我十余年来见到的很奇怪的人。他凹目翘鼻，胡子稀疏，头发长，卷而油腻。老是穿黑衣。似乎背有点驼，前襟显长，后襟短促，一条线绳从领口拉挂在腰间，他说有这条线绳就生动了，其实拴着一个手机。行走飘忽，有鬼气。

他是位书家，用笔在宣纸上写字，用刀在印石上刻字。

形体这般的孱弱，他应该低眉顺眼，应该寡言少语，但不，他始终不能安静，走来走去，好激动，表情丰富。不停地要说笑，边说边笑，边笑边说。我见过他在宣纸上写字，墨调得很稀，长锋笔戳过去，几乎是端着水墨，淅淅沥沥地就到了纸上，然后使很大的力和很大的动作，如武术一般，出奇的是墨是墨、水是水，有海风山骨的味道。那场面，能想象李白酒后作诗，李白可能很清高，很潇洒，他却几幅字写成，满身墨渍，尤其用卫生纸按拓，一团一团脏纸在地上丢下一层。在印石上刻字那就更疯了，眼镜往额上一推，好像让头上再多两只眼，然后拿块印石，看，看，看得印石都羞了，猛地从怀里掏出刀来，别人的刀都是一乍长的，他的刀一指粗一尺长，简直就是钢凿子！咔，咔，咔，他讲究节奏。他刻印的时候大家都围上来，不敢出声，他却好为人师，讲为什么这个字这样结构，这一刀处理有什么含义，怎么会出现这



钟国康作品《朗照六合》《老越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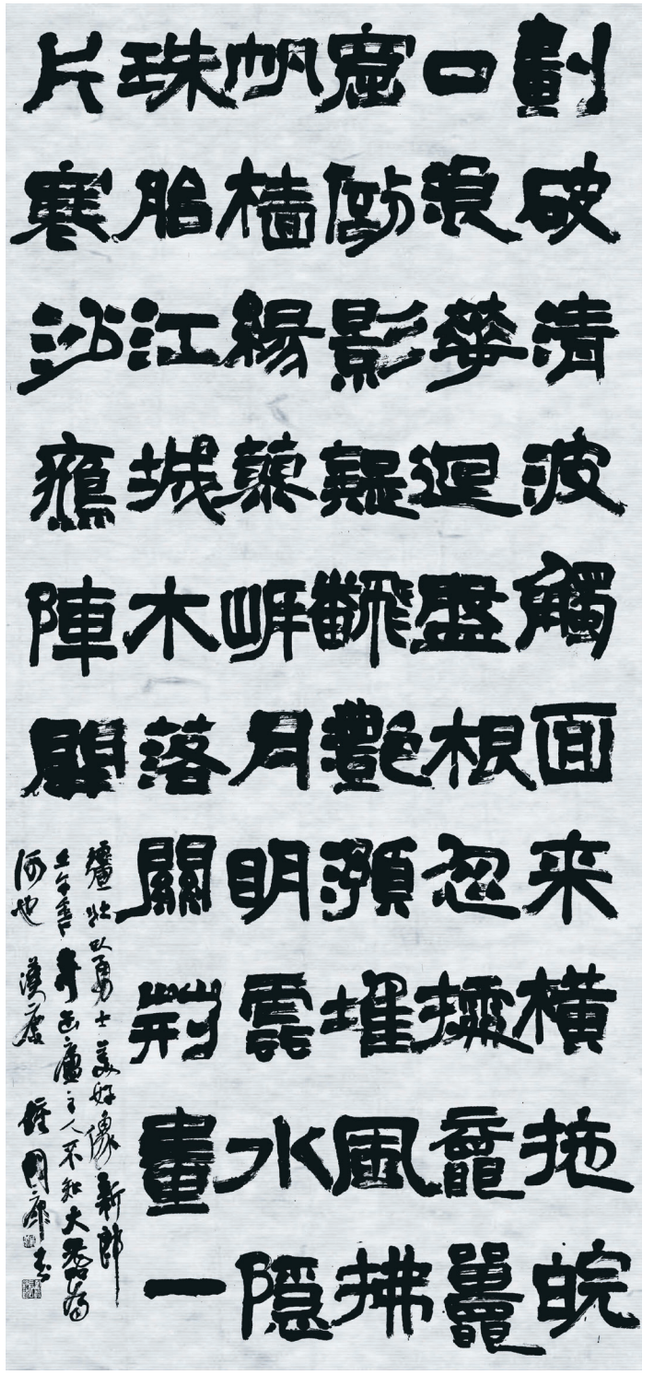
钟国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作有《钟国康书法篆刻集》《国粹》《钟国康篆刻集》《金字招牌》《珠海盛世华章》《金庸武侠小说名篆刻》《当代中国文人印谱》《印回大唐》等。

钟国康之书法、篆刻，师法吴昌硕、齐白石、王觉斯、张长公诸大师，心慕手追，得其三昧，几可乱真。行草篆隶，各体兼工，苍劲老到，气韵两善。挥笔如刀，屋漏痕中，极其碑味。挥毫泼墨，干湿浓淡，方中带圆，飞白有度，还带刀锋。篆刻尤力，操刀如笔，飞扬恣肆，莫不中规，章法井然，让就并妙，秦朱汉白，绝无匠气，但见儒雅，味厚韵长，盖非技术而为艺也。









钟国康书法作品

种效果啊，他哇哇大叫，为自己得意。

他从来都是自负的，眼里无一人无一物能碍，却同时又都为他囊括。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他正经地告诉我，他要活到九十以上，他要年年把一些东西加进他的艺术里。我不能准确地读出他有哪些突破有哪些局限，但我在他的书法里读出了金石味，在他的印刻里又读出了毛毫、水墨甚至宣纸的感觉，其宣纸上、印石上的作品雄沉豪放，感情充沛，生命蓬勃。

关于他，社会上有许多传言，说他相貌奇异，举止常出人意料。说他饭量极少，精神张狂。说他自制墨和印泥，弄得屋里臭气不散。说他外出开会，车厢就放一筐印石，三五天回来那印石全刻了，然后一筐一筐的作品就存封在那一间专门的房里。说他好色。说来求印的，一枚印二万，若讨价，就二万五，再讨价，就三万，还要讨，便起身送客了。说有许多人在社会上收集他的旧印，有收集到一百枚的，有收集到二百枚的，还在收集。说有大老板正筹划给他建艺术馆。

我看着他，总想：这是个什么人呀，可能前世是钟馗，今世才一身鬼气，又邪而正，正而大吗，或许是关公门下吧，玩的是小刀，使的却是大刀的气势？

我也送他一幅书法：木鸡养到。

我与侨领古润金的文化情缘

文 丘树宏（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市政协原主席）

在中国，知道完美公司是生产健康产品和化妆品的直销机构的人很多，但知道完美公司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慈善机构的人则很少，而知道完美公司的文化公益也做得非常棒的人就更少了。

其中，家喻户晓的“完美中国，中国完美”这句广告词与本人有着特殊的关系，且听我慢慢道来。



古润金

因“华侨”与完美结缘

完美（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3 月，1998 年 8 月被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内贸易局三个部门核准为采用店铺式经营，并雇佣推销人员的合法转型企业，成为中国首批仅有的十家转型企业之一。

经过多年的发展，完美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同类企业的翘楚，但发展壮大起来的完美公司应对的官司也逐步多了起来。2007 年年初，我担任中山市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统筹中山市的宣传文化工作，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保障是重要职责之一。那时候，完美公司面临许多恶意投诉，有的机构甚至买通媒体和记者，有计划、有部署地描黑和中伤完美公司。

完美公司当时正处于关键的成长高峰期，作为侨资企业的完美公司同时也是中山市的龙头企业，连续多年保持中山“第一纳税大户”的地位。因此，中山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完美公司的发展。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所需，更是企业所盼。我们配合完美公司，主动找到有关的媒体和记者，向他们说明和解释实际情况，让他们了解事实，消除误会。

2009 年，中山市委、市政府创设“中山杯”华侨文学奖成功获得中宣部批准。文学奖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虽然市委明确表示可以解决全部资金，但我提出市里解决一半即可，由向社会筹集另一半。筹资的过程也是推广文化的过程，我想借此机会促进社会支持中山文化事业的发展。

完美公司董事长古润金是中山籍马来西亚华侨，时任中山市侨商会会长。在一次中山市侨商会的活动上，我将“中山杯”文学奖向社会筹集资金的消息告知古先生，古先生表示很赞同，觥筹交错之间开玩笑地提出让我喝一杯酒、唱一首歌，完美公司就赞助一百万的诺言。因此，我毫不犹疑地喝下了满满的一杯酒，接着用客家话唱了一首我为大型史诗电视剧《下南洋》创作的主题歌《阿妹寻哥洗琉琅》。古润金是客家人，加上对我个人的信任，当即宣布：“给文学奖赞助一百万元!”古润金先生带了头，中山市侨商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跟进捐款，一下子就筹集了一百五十万元，开创了中山市企业支持文学活动资金量突破百万元的先河。

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填补了国内此前没有华侨文学奖的空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群体中反响极大。从此，完美公司以高起点走进文化公益的行列，而我个人与完美公司的文化情缘，则刚刚开始。



丘树宏（左）代表中山市政协向古润金颁发“2014年度政协文化公益贡献奖特别贡献奖”奖牌

以孙中山文化的名义

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为此，我创作了大型组歌《孙中山》，广东省委宣传部看到后非常重视，决定作为纪念辛亥百年的重点项目，组织专门班子创作一个大型交响组歌作品作为献礼。创作非常顺利，不到半年就完成了小样。对于排练和演出，省、市只能解决一部分资金，不足部分要我们自筹。

这个时候，又是古润金站出来了。古润金对我们说，孙中山先生是家乡走出的伟人，在马来西亚深受华侨华人崇敬，“孙中山先生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精神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和完美公司都要出钱出力。2011 年 11 月 23 日，完美公司协助我们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音乐堂演出《孙中山》，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著名指挥家谭利华执棒，歌唱家莫华伦、幺红等参加演出，中央电视台播报新闻并播出演出全场录像，影响很大。之后，完美公司又先后两次组织大型组歌《孙中山》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演出，反响空前。

到目前为止，大型组歌《孙中山》已经在广州、中山、珠海、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城市演出，填补了孙中山题材的音乐作品空白，为孙中山文化上升为广东省命题和国家命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共同的“完美之梦”

一次，完美公司的广告负责人向古润金汇报在凤凰卫视的广告安排，说到拟以“完美中国”作为主打的广告词，经常考虑公关策划的我即刻来了灵感，对他们说：“‘中国完美，完美中国’不是最



在第六届完美公益影像节现场，完美公司捐出5000万元善款，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完美吗?”没想到这竟然成为完美公司在凤凰卫视的广告词，也成为整个企业对外最核心的形象广告词。

2014 年是完美公司成立二十周年，公司拟创作一首形象主题歌。我应古润金的邀请创作了《完美之梦》这首歌词，并建议他们邀请中山乡贤、著名音乐家、《弯弯的月亮》作者李海鹰谱曲，由马来西亚著名歌手茜拉演唱。歌曲在北京发布，影响十分好。

2017 年 12 月，古润金担任主席的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总会举行隆重盛会，我也义务为活动写了会歌《我是大马，我是中华》，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金旭庚作曲，著名歌唱家唐彪演唱，受到马来西亚华侨华人高度评价。

为了传承和弘扬咸水歌事业，2018 年，我牵头主创了大型交响清唱剧《咸水歌》，完美公司又出资赞助并担当了联合出品人，为观众提供了一场精彩的咸水歌音乐舞台大餐，填补了咸水歌主题空白，给咸水歌如何守正与创新探索了一条颇有价值的路子。

我的完美文化情缘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更需要强调的是，完美公司在中国以及马来西亚所做的文化公益工作规模和影响更大。比如完美公司组织和支持的中马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完美公益映像节等，都是投资巨大、影响巨大的文化公益活动，是完美公司的文化品牌。

如今，完美公司已经是一个国际著名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让世人刮目相看。在文化公益方面，完美公司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极具自己的特色，往后，他们也会继续做下去的。

祝福中国完美走向世界完美，祝福完美中国走向完美世界！

知来处，明去处

——真维斯的激荡30年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2020 年注定是无数企业挣扎着“渡劫”的一年，不论是街边小摊，还是成立百年的知名企业，几乎无一幸免。当我们为武汉“解封”欢呼时，一个又一个“巨头企业倒闭”的消息接连不断地登上新闻，无声地记录着这场疫情对经济的深远影响。

疫情冲击之下，全球服装产业正集体经历寒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 1 月至 10 月，中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类商品零售额累计 6642 亿元，同比下降 11.2%。

2020 年 1 月 15 日，据澳大利亚《每日邮报》报道，真维斯澳大利亚公司宣布进入自愿托管程序，步入破产清算阶段。消息一出，很多 80 后、90 后都纷纷感叹：“学生时代的‘大牌’就这么没了，真是‘爷青结’！”

然而，真维斯真的“没了”吗？在哪里能买到真维斯服装？真维斯的未来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香港旭日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惠州市侨联荣誉主席杨勋，请他谈谈真维斯在中国发展 30 年背后的故事。

早期的“三来一补”工厂

1952 年，杨勋生于广东惠州一个商人家庭，家里共有 13 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杨勋一家的成分被定性为“资本家”，杨勋小学毕业后，无法升入中学，只好下乡务农。1967 年，哥哥杨钊见家里的生计实在难以维持，便冒死游泳偷渡到了香港，在香港流浪一个多月后，在乡亲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在制衣厂打杂的差事，日薪 6 港币。杨钊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不管上司是否在场监督，他都埋头拼命干活，10 天后，他就被破格升为熨衣工，日薪升为 15 港币。

“这就是我从悲苦人生中走出来的第一步，完全靠勤勤恳恳。要比别人成功，就比别人多付出。”杨钊回忆说。此后，凭借着勤学实干，杨钊很快被逐步提拔为工头、领班、厂长，甚至拿到了部分股权，他不仅学会了制衣技术，还掌握了工厂的管理方法。

1972 年，杨勋跟随哥哥的脚步偷渡到了香港，进入制衣厂成为一名工人。两年后，已是制衣行业行家里手的杨钊决定自主创业，他拿出多年积蓄，加上朋友资助的 10 多万港币，创办了一家小型制衣厂，取名为“旭日”，寓意“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旭日制衣厂成立之初，生意惨淡，危难之时，杨钊接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格子牛仔裤订单。这种裤子上面有 4 英寸见方的格子，在香港没人会做、没人敢接。杨钊心一横，接了订单，然后兄弟俩和工人们齐心协力攻克技术难关，研发出一种能将格子固定住的小模具，成功

完成了订单。格子牛仔裤成为旭日的第一个拳头产品。第一年就生产了 10 万打，创下了一个款式生产 160 万条的香港制衣纪录。一年后，旭日制衣厂的生产车间由 600 平方米迅速扩至 1 万平方米，工人由 100 人增加到 1000 人。

20 世纪 70 年代，是香港制造业的鼎盛时期。到了 1975 年，香港共有 8047 间制衣厂（占制造业工厂总数 25.9%），香港服装业出口量在香港总出口量中排名第一，并占据了欧美成衣市场的一半份额。

而香港制造业的衰落也在此时埋下了伏笔。早在 1952 年，为了保护本土纺织业，英国已经对外执行纺织品进口配额，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也制订过几次贸易配额，也就是说欧美国家对香港的出口总量封顶。

由于受到出口配额的限制，杨钊和杨勋兄弟将目光投向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当时的菲律宾和印尼不仅出口配额用不完，而且由于急需外汇，政府还对纺织品出口给予优惠补贴，于是兄弟俩率先进入这些国家投资建厂，以降低生产成本。

1977 年年底，华润公司的一位经理辗转联系上了杨钊，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建议：邀请旭日集团到中国内地开办制衣厂。华润公司的来头可不小，早在 1952 年它就被指定为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划归中央贸易部管理，1956 年华润还参与组织了首届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广交会前身）。因此这位经理的建议，值得考虑。兄弟俩反复掂量，在菲律宾和印尼办厂面临着语言不通、当地人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如果能回到熟悉的中国内地办厂，当然是件好事。

几经协商，1978 年 6 月 23 日，由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广东分公司出面，同香港大进（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钊签署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是：港方出资 400 万港币，广东顺德容奇镇腾出旧厂房和聘请工人，合办 300 人规模的制衣厂。产品由港方销售，工厂通过港商进口国外先进制衣设备，容奇镇以加工费偿还设备款，合作期 6 年。协议经广东省革委审查后上报国务院审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批了“补偿贸易（来料加工）”8 个字，同意此事。合同一签，双方就立即行动，新厂命名为“大进制衣厂”。为图吉利，选定在 1978 年 8 月 8 日开张。由于是顺德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的牛仔裤出口，海关的出口登记证是“顺德 01”。

大进制衣厂对当年的顺德影响非凡，一开始由于工人不熟悉新设备，不懂新技术，一个月才生产不到 2000 打牛仔裤，但经过系统培训和香港管理人员的科学管理后，工厂里生产流水线包括踩车（操作机械缝纫机）、打眼等十几道工序，每条线分工都很明确，工人效率大幅提高，不到半年每月产量已经涨到 8000 打牛仔裤了。投产当年，大进制衣厂代工收入就达 20 万美元，相当于给镇里每个人分了 10 斤猪肉。工人按绩效发工资，一个月甚至可拿到 60 元，比镇长的工资还高。容奇镇在办成大进制衣厂后，陆续按照大进的合作模式，又与其他港资企业开办了 4 家制衣厂，初步解决了全镇人就业问题。1984 年，全镇工业总产值超 1.1 亿元，人均收入达 1703 元。

而杨钊和杨勋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在为名牌服装贴牌加工的阶段。1972 年，AlisterNorwood 在澳大利亚珀斯开了第一家 JEANSWEST（真维斯）店，20 世纪 80 年代，旭日集团成为真维斯的代工厂，经过将近十年的摸索和发展，1990 年，雄心勃勃的杨家兄弟与澳大利亚当地进口商合作收购了真维斯。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使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居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手头有了积蓄的年轻人开始有了不同于老一辈的审美观，他们追求时尚，渴望表现自我。旭日集团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需求，恰好此时他们也因为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而犯愁，于是，真维斯顺势而为“出口转内销”。

1993 年 5 月，真维斯在上海市南京东路开设了第一家专卖店，主打休闲服。当时的定位是高端人群，一条牛仔裤标价 300 元，一件毛衣标价 400 元，那时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才 471 元。尽管价格不菲，真维斯却在短时间内迅速火爆。一方面由于这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品牌，有着来自外国设计师的欧款剪裁，比国营商店里的服装更时尚，而且它的价格比起 LV、香奈儿便宜不少，因此成为当时追求时髦者的不二之选。其火爆程度，与现在优衣库、苹果店出新品时的抢购场面相差无几。

杨勋还记得，1993 年 12 月，真维斯在青岛开第一个门店的时候，在某商场 8 楼租了约 140 平方米铺面做销售。杨勋预计这个门店每天应该能有 5000 元至 6000 元的销售额，但在门店开张的当天，销售额就达到了十几万元。“当时那些人进去不是去买衣服，而是去抢衣服。所以我们要规定这些客人进去之后，15 分钟就要出来，等于客人去拿了衣服就要结账，就要出来了。”原本预计在两个月销售的存货，在短短两天内就几近卖光。

这一现象，迅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当年，中国仍然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人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放在了周末，换煤气、洗衣服、买菜、探望老人、陪孩子上课等，“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成为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而人们对于轻松自在的“休闲”，没有真正的体会。因此，一位记者在 1993 年上海真维斯门店开张的时候，问了杨勋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休闲服?”

事实上，休闲服装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最早是以衬衣、牛仔裤和牛仔衣为主，是当时人们的工作服，由于其穿着的舒适性和牢固性，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到了 20 世



2018年9月13日，杨勋获得由国家民政部主办评选的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荣誉

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社会的高度机械化造成了紧张单调的生活方式，因而欧美都市人非常渴望一份轻松和自然，再加上美国的嬉皮士崇尚回归自然，衣服以简单舒适为追求，因此在欧美国家就形成了休闲服装热潮。如今休闲服不仅包含了牛仔装，也包括沙滩装、西服便装、不打领带的衬衣、家居服、内衣、孕妇服和童装等。1995 年 5 月 1 日，中国开始实行 5 天工作制，1999 年 10 月起开始实施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三个长假，引发了旅游和购物的井喷，“休闲”这个词才真正被人们所理解并追求。

除了给国人普及了“休闲服”的概念以外，真维斯不乏创新之举，例如：利用连锁店的方式抢占市场，扩大自身实力和规模；为顾客提供即时修补衣服的服务，裤腿长了，衣袖宽了，在以往只能拿回家自己修改，但在真维斯只需要等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拿到量体修改的衣服。这些特点使真维斯越来越受年轻人的喜爱。

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此后，真维斯在内地一路凯歌，1995 年杨



杨勋在真维斯门店指导工作

家兄弟将总部迁至老家惠州市，1996 年 9 月旭日集团旗下的旭日企业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创造了超额认购 236 倍的空前纪录。雄心勃勃的杨勋提出了“百市千店”计划，即在 100 个城市里开 1000 家门店。但销售情况却并不那么理想，因为千禧年前后，国民消费水平才刚刚开始提高，很多消费者买不起真维斯的牛仔裤，导致牛仔裤库存积压严重。反思过后，杨勋重新调整思路，提出了“名牌大众化”的理念，即保留名牌的元素，将价格降到大众可以接受的水平，让顾客感到物超所值。经过两年的调整，1999 年真维斯的销售再次迎来了飞跃式增长。

到 2001 年，国内的休闲品牌已达 200 多种，江浙一带的“美特斯•邦威”“森马”，广东的“柏仙多格”“自由鸟”，福建的“九牧王”“七匹狼”开始崛起，越来越多的商场开始开设“少淑休闲馆”“运动休闲馆”等场地销售休闲装。

紧接而来的，是服装行业总体产能过剩，由于服装市场总体采取的是期货模式，因此容易形成滞后反应，从 2013 年开始，国内休闲服品牌大多开始逐步显现这个问题，再加上同行仿款低价冲击，便会导致库存积压，使得服装企业获利能力下降。为了清库存，很多品牌不得不选择低价倾销，这样势必导致品牌形象接连受损，品牌档次每况愈下。另一方面，虽然早在 2009 年真维斯就开始进军电子商务渠道，在同行当中算得上占有先机，但它的线上销售策略却是“去库存”——协助实体店处理过季的尾货，无意之中错失电商市场。于是从 2013 年开始，真维斯的业绩开始下滑。2018 年，旭日集团发出公告：拟以 8 亿港元将连年亏损的内地服装零售业务即真维斯品牌出售给集团创始人、大股东杨钊和杨勋兄弟，预计出售事项将产生收益约 3133.3 万元。出售事项完成后，集团将不再参与任何亏损的业务，并以室内设计、装修服务以及金融服务为重点。也就是说真维斯将被杨钊和杨勋兄弟“私有化”，关于真维斯的决策都可以由他们决定。对于真维斯澳大利亚公司破产消息，杨勋表示，真维斯澳大利亚公司由于货币贬值、市场波动等因素导致经营出现问题，团队提交的经营方案并未被总部接受，所以计划委托给托管人并进入自愿托管程序。这是当地法律规定下所需的程序，以保证在托管人提出新的意见之前，企业仍能继续经营。而截至真维斯澳大利亚公司宣布消息，真维斯在澳大利亚的一切门店运作正常。他特别说明，真维斯澳大利亚公司和真维斯中国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并未对国内业务产生影响。

近几年，针对业绩下滑，杨勋也做了不少业务调整：目前，真维斯在全国范围内约有 800 多家门店，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的超市和生活区。真维斯的线上销售不仅销售过期的尾货，也销售当期的新货，当期与往期的商品各占一半，线上线下的销售各占总销售额的一半。2020 年 6 月 18 日，惠州市惠城区政府、旭日集团、京东集团三方代表签署了共建惠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战略合作协定，这将助力旭日集团抢抓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发展时代机遇。

“同时，我们鼓励员工自主创业，成为我们的加盟商。”杨勋说，相比起总部来说，加盟店的税收更低，可以降低成本，而员工也可以“借牌生财”，以相对较小的风险一圆当老板的梦想。

提升国内服装品牌的话语权

无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里，时装的话语权一直在西方。在老一辈的眼中，形容一个人的穿着“洋气”，相当于赞美他高级、优雅、时尚。随便走入一家商场，服饰类的商铺大多挂着英文名，即使其中不少是土生土长的国产品牌。很多中国服装设计师，也是以英文名做宣传。

但近十年来，“中国风”开始影响服装行业：2013 年，“丽媛 style”登上微博热搜，陪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的第一夫人彭丽媛，身着国产品牌“例外”的姣好形象风靡全球，一时间，“例外”和中国设计师马可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在国际时尚圈，中国超模杜鹃、刘雯、何穗、孙菲菲等也纷纷登上国际大牌 T 台走秀；而在我们身边，不少 90 后、00 后的姑娘们爱上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穿着含有汉服元素的服装。

而这，也是杨勋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谁在引导他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为什么年轻人会认为穿 AJ 运动鞋就是酷，穿回力鞋就是土？为什么穿一身撞色衣裤配白袜子外加一双大皮鞋就是潮流，穿衬衫加正装就是保险顾问？这些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多商家利用无数广告和舆论潜移默化形成的。因此这里就涉及中国在服装行业的话语权问题，“穿着习惯、理念和文化一样，都需要培养”。

2020 年 5 月，杨勋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第三次会议时，向大会提交的个人提案之一就是《关于推动体现中国时尚话语权的平台搭建、推广体现中国现代风貌的礼仪服装》。在他看来，每个国家的服装都以其变化多端、缤纷绚烂辉映着它的物质、文化和心理内涵。“大家以前觉得穿西装帅，但其实中山装也很有范，女孩子不穿西式晚礼服，穿旗袍也很美。现在国家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其实中国服装也要有自信，要掌握话语权。这个不仅需要企业来推动，更需要国家层面的推动与支持。”

为了提升中国服装行业的话语权，培养中国服装行业的人才，杨钊和杨勋一直在努力着。1985 年，旭日集团在惠州市创办了西纺广东服装学院（现已并入惠州学院服装系），是华南地区唯一的一所服装高等学府。1993 年，旭日集团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已成功举办 29 届，是国内同类服装赛事中历史最长的服装设计比赛。

杨钊和杨勋是信佛之人，社会责任感是他们经常提起的话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影响了他们的一生。2020 年 5 月，旭日集团向惠州 76 名援鄂医护人员捐赠慰问金人民币 228 万元；对集团物业城市花园及总部大楼的租客减租 3 个月，为租客纾困。而就真维斯来说，事实上，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旭日集团就开始多领域横向发展，在地产和金融领域做得风生水起，杨勋曾坦言：“如果按照投入产出比来看，现在已经不值得再从事服装行业。”但他始终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服装行业曾经作为龙头带动了中国经济起飞，对国家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今，服装行业仍然是一个关系民生的重要行业，作为中国人，作为一个从服装业起家的人，他应该为社会承担一部分责任，继续将真维斯经营下去。

曾经有人说，所谓成功的企业，都是踏对了时代的节拍。真维斯曾经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企业，嗅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高歌猛进，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如今面对变幻莫测的后疫情时代，真维斯是否能够转危为机，我们拭目以待。

都市侨乡：侨乡研究新命题

文 张应龙（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侨乡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迄今为止，有关侨乡研究的空间范围和研究视野一般锁定在“乡村地区”，造成侨乡研究以“乡村侨乡”研究为主的特征和结果。这不但表现在以个别乡村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研究上，也表现在以区域研究为对象的中观研究中。

侨乡研究的重点以“乡村侨乡”为主，甚至说，几乎所有的侨乡研究都集中于乡村地区，这种状况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华侨华人的祖籍地绝大多数属于乡村，他们绝大多数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因为华侨华人的地缘、血缘关系特征是与乡村文化相联系的，并受到原来祖籍地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因为侨乡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互相之间还形成了强烈的互动关系，使侨乡地区与非侨乡地区形成社会、经济、文化上的显著差别。“乡村侨乡”研究虽然是侨乡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但是“乡村侨乡”研究绝不是侨乡研究的全部。

所谓侨乡，其基本含义是华侨华人的“故乡”，与此相关的是“故乡”中有一定数量的归侨侨眷。从这一意义出发，都市只要有向外移民，有一定数量的归侨侨眷，那么它也应是侨乡。换句话说，侨乡不等于“乡村”，不只是“乡村”。

那么，都市有没有侨乡？

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是否是“侨乡”，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侨乡的概念。目前，侨乡概念的界定还没有统一、严谨的定义，例如福建认定侨乡的标准主要是按海外乡亲人口占本地总人口的比例来确定的。广东省对侨乡的认定似乎不完全以人数比例作为标准，它比较侧重华侨华人人数、归侨侨眷人数、侨汇侨资、文化教育、侨房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在划定一般侨乡与重点侨乡时，除了考虑华侨、归侨、侨眷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之外，还结合侨务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其他情况综合确定。总的来说，有关侨乡定义的判断离不开华侨华人、归侨、侨港澳台眷属在祖籍地家乡总人口中的比重，海外乡亲与祖籍地家乡各种关系的紧密程度等基本内容。据统计，截至2002年年底，广州全市在国外华侨华人总数为106.08万人，港澳同胞总数87.72万人，合计193.8万人，等于广州市总人口的26.9%；在国内归侨总数为1.68万人，侨港澳眷属总数156.87万人，合计158.55万人，占广州市总人口的22%。按照约定俗成的侨乡概念以及广州市的实际侨情，广州市自然是“侨乡”，而且是属于重点侨乡。不但广州市如此，在广东三大侨乡的中心都市，情况也大体相似。所以，都市有侨乡。

总之，完整的侨乡研究应该包括“乡村侨乡研究”和“都市侨乡研究”两个部分。

遗憾的是，“都市侨乡研究”在侨乡研究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可以说在侨乡研究的视野中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原因可能是“都市侨乡”的侨乡色彩远不如“乡村侨乡”的侨乡色彩那样浓烈，都市侨乡的华侨华人以及侨眷人数比例不如许多乡村侨乡高，都市侨乡的“海外关系”色彩在通商口岸或者中心城市往往被其他因素如“西风东渐”所带来的海外影响所掩盖等。当然，这也不等于说在实际研究中“都市侨乡”的研究完全被排斥在侨乡研究的视野之外。实际上，在有关“侨乡”的研究中，许多研究是将乡村与都市的研究采取一并处理的方式，此外，也有一些专门研究都市侨乡的成果，只不过这些研究没有有意识地将侨乡研究区分为乡村侨乡与都市侨乡两大类，专门从都市侨乡的视角来进行研究而已。随着侨乡研究的深入，这种将两者混在一起的研究习惯已经到了需要探讨和厘清的时候了。

都市侨乡的研究范围

都市的概念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中有不同的表述，不同学科所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不一样。从人们的习惯感知而言，都市往往与城市相同。本文所说的都市侨乡也可以等同于城市侨乡。

都市所包括的地理范围一般是以行政区域划分为基础。都市的行政管辖区域通常包括中心城区和郊区，因此，在都市侨乡研究中，需要区分“中心城区侨乡”和“城乡结合部侨乡”的不同情况。换句话说，都市侨乡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中心城区圈，一个是包括郊区在内的完整都市圈。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否则，过于笼统的论述可能会产生一些混乱。

从更能够体现都市侨乡主要特征的角度来说，都市侨乡的研究范围可以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中心城区一般是都市的“老区”，都市特征最明显和突出，而郊区或者新区则属于城乡结合部或者来自乡村的都市化，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乡村的特征。以广州市而言，越秀、东山（2005年5月撤销并入越秀区）、荔湾、海珠四个中心老城区无疑可以当作首先研究的对象。这四个老区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总数为19万人，港澳同胞总数14.8万人，合计占四区总人口的14.2%；归侨、侨港澳眷属总数57.3万人，占四区总人口的24%。更重要的是，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四个中心城区都更能揭示都市侨乡的特征。

但是，从完整研究都市侨乡的角度出发，以整个都市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都市中心城区与紧邻的城乡结合部或者郊区、新区在历史和现实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上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都市中心城区的居民不少就是来源于郊区的乡村居民。尤其在当今都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整个行政管辖范围为基础有利于研究都市侨乡的发展道路和都市侨乡的全貌。

都市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而且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少以前属于乡村的地区变成了区和街道，因此，在研究都市侨乡时，应该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都市圈的都市侨乡所包含的确切含义有准确的把握和明确的说明。以广州市行政区域为例，原来的中心老城区只是越秀区、东山区、荔湾区、海珠区，后来增加了白云区、芳村区、天河区、黄埔区，再后来又增加了

番禺区、花都区，此外还有从化区、增城区。研究广州都市侨乡会发现，越秀、东山、荔湾、海珠四个老城区的历史与特点，显然与番禺、白云、花都、从化、增城等区有较大的不同。

都市有大有小，都市侨乡的研究范围一般以延伸到地级市一级的都市为宜，因为县级的城镇掺杂了较多的乡村色彩，城市化水平较低。就广东省而言，广州市、汕头市、江门市、佛山市都是值得研究的“都市侨乡”，因为这几个城市都处于广东重点侨乡的“中枢”，它们在历史上是这几个侨乡区域的出入国中心，是侨乡人民出入国的集散地和辐射地。近代以来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中，这些都市往往是华侨华人回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

都市侨乡的特点

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从一般历史发展背景来说，广州都市侨乡的形成道路与乡村侨乡的形成道路基本相同。广州长期作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对外联系状态，在此过程中广州市民因各种原因出国定居的现象经常发生。广州作为华南一个中心港口，也是该区域人民出入国的主要口岸。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在中国掀起掠夺苦力的浪潮，广州又成为一个重要的苦力贩运口岸。总的来说，在近代中国人向外移民浪潮中，广州人民也卷入其中，其向外移民的原因、过程、形式与乡村地区基本相似，只不过因为广州是对外贸易口岸和商业中心，所以向外移民的有不少是商人和某些特殊身份的人物。19 世纪末以后，随着海外华侨人数的增加和华侨经济实力的提升，海外华侨开始形成与侨乡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一些华侨在广州市进行投资活动、兴办实业、建造房屋等。作为都市侨乡的广州市在政治方面，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一直是华侨回国活动的主要地点；在经济方面，从清末以来华侨回国投资活动历程中一直是华侨投资国内活动的重要地区；在居住环境上，因为具有比乡村大得多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许多原籍为其他地方的华侨将广州作为回国居住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作为省会和华南重要的口岸城市，又成为归侨、难侨、海外华侨华人青年学生等群体的主要落脚地。改革开放后，以家庭团聚、留学等形式出国的新移民，广州市也为数不少。近几年来，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又使广州成为海归派回流的重点城市。因此，广州市这个都市侨乡无论从一般侨乡的形成发展道路还是从近 30 年中国都市新侨乡的生成过程来看，都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

但是，广州作为都市侨乡具有不同于乡村侨乡的特点。

第一，在移民方面，广州既有原发性的向外移民，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再移民”——定居者，其成分构成远比乡村复杂得多。广州除了有乡村侨乡的原发性向外移民之外，还有不少是源于其他地方但最后定居广州的归侨。从 20 世纪开始，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和华侨经济实力的增强，不少出身于乡村的华侨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之后离开原来的家乡，或定居在附近的乡镇，或定居在县城，或定居在大城市，都市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其中广州市以其优越的环境和条件成为外地籍华侨的主要居住地。因此在区域侨乡内的都市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非原籍归侨，而在乡村侨乡，基本上没有外地籍贯的华侨到那里定居。外地籍华侨以及归侨、侨港澳眷属定居在广州的原因，一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为了使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二是因为经商的需要，像广州老城区中的孝友街、昌兴街、盘福路、胜龙新街、先施二街等地名都是外地华侨在广州经商留下的历史印记。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人后来因各种原因离开广州，使得广州都市侨乡具有鲜明的人口流动性。由于有了外地归侨的移入，广州的侨情成分显得比较多样化，即除了本地的原发性移民外，还包含了定居在广州的非广州籍移民以及关联的眷属和海外关系。

就广州市而言，近代以来有三次外地华侨华人落脚广州的过程：第一次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珠江三角洲华侨在广州购置房产、投资产业并定居广州，他们多数是美洲华侨；第二次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原籍各地的华侨在广州购置房产，他们多数来自东南亚，主要居住在东山区华侨新村等；第三次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一些境外乡亲在广州购房，他们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港澳同胞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还先后接受回国升学的海外学子，排华回国的华侨华人，因工作需要从外地调入的归侨、侨港澳眷属等，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最后定居在广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般乡村侨乡的归国华侨基本上很少，但在都市，由于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容纳能力，却先后接受了不少归侨、难侨，这是都市侨乡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广州市东山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 20 世纪初以前，东山区还是广州城外一个荒凉的丘陵地带。自从 20 世纪初海外华侨在东山区投资修路盖房子之后，东山区的城区规模逐步发展起来，出现了成片的西洋风格小洋楼。据 1959 年的调查，约有 921 座侨房（除华侨新村外）。占全区房屋总数的 17.7%。值得指出的是，在东山区投资置业的华侨大多数来自江门四邑地区，尤以台山华侨为主，他们大多住在东湖街道一带，东山区最大的花园洋楼——彩园就是原籍台山端芬的美国华侨梅彩遒所建。与此相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山区名校培正学校的学生有 50% 是台山和新会籍的学生，东山区仿佛是四邑华侨和侨眷的家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山区先后兴建了华侨新村和东湖新村，又吸引了一批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回来置业和居住。东山区是政府机关集中的城区，所以居住在东山的归侨不少是各界名流。



广州市东山口西洋风格建筑

第二，广州作为省会具有较强的政治吸引力。在民国时期有案可查的设立在广州的各种华侨团体有 46 个，如美洲同盟会、南洋同侨实业俱乐部、古巴同志俱乐部、海外华侨实业团、华侨互助社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由侨联会取代原先的各种团体。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才出现众多的校友会、侨友会、联谊会，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的全省性校友会、侨友会、联谊会就有 36 个。广州市所拥有的华侨华人、归侨团体的数量虽然比广东其他城市要多，地位也显得更为重要，但在其他具有“政治地位”的城市里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一般乡村侨乡所没有或者所缺乏的。

第三，广州市作为区域中心具有较强的经济引力。近代以来，广州市成为华侨华人回国投资的重点地区。在 1949 年以前，广州的华侨投资总额占同期广东省华侨投资总额的 37.74%，占全国华侨投资总额的 20.73%，是近代中国和广东省华侨投资最多的城市。在广州投资的华侨华人很多原籍不是广州市，他们之所以选择广州作为投资的风水宝地是因为看中广州的都市中心优

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广州市也是广东省华侨投资的中心地，广东仅有的几个大的华侨投资公司均设在广州市，它们以广州为中心，在广东其他地方进行投资活动，也包括在广州的投资活动。改革开放后，与海外乡亲在乡村侨乡的大规模投资活动相比，广州的投资优势似乎减弱了。据笔者在老中心城区东山区和荔湾区的调查，这种情况主要是城市管理限制、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等所造成的。早期进入珠江三角洲乡村侨乡投资的境外华商，大多数是开设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加工企业，乡村侨乡的引资也主要是以土地换发展的模式，此类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显然不适合在大都市生存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广州都市经济中心优势的丧失。广州市境外华商投资活动的基本特点是以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以及公司总部这类形式为主，许多境外公司将广州当作在广东或者在中国开展经济活动的中心，将公司总部设在广州，因此，在广州有一个名称叫“总部经济”。

第四，都市侨乡与乡村侨乡存在历史文化认同的差别。都市侨乡的流动性比乡村侨乡大，都市移民对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认同比较薄弱。在海外，华侨华人社团通常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但在华侨华人地缘性社团中，有以省为名的社团，也有以府州、县、乡为名的会馆，但基本上没有以城市命名的地缘性社团如广州会馆、上海会馆（但也有个别例外，如厦门，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县改市、地改市所造成的城市化现象另当别论）。论历史，广州这个城市的历史要比广东许多乡村的历史要久远得多；论影响，广州更是比乡村或者许多城市要大得多，即使广州市本身随着都市化的进程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本身也有相当多的“原住民”，可是，他们移民到海外后却没有建立什么广州会馆，而是加入以乡土为特征的“县”“府”地缘组织内，即使原籍广州中心市区的华侨华人也是参加到他们若干代以前的“原籍”地缘性会馆之中，例如番禺会馆、增城会馆、南海会馆甚至更大范围的广肇会馆，等等。换句话说，他们的“政治”认同是所迁出的城市，但其历史文化认同依然是以前的“祖家”。也许因为如此，缺乏乡土味的都市很容易被忽略在侨乡研究视野之外。

与移民对都市侨乡历史文化认同较弱相联系的是境外乡亲对都市侨乡社会公益事业的“个人感情”不深。改革开放以来，境外乡亲在侨乡掀起一轮新的捐资浪潮，乡村侨乡由境外乡亲捐资兴办的学校、医院等社会公益设施到处可见，但在广州市中心城区，接受境外乡亲的捐资数量不多，人数也不多。首先，在捐赠数量上，1978年至1996年广州全市经批准的境外乡亲捐资总额是人民币11.6214亿元。其中，番禺市占了5.8667亿港元，而东山区才人民币1000多万，占大头的是中心城区以外的番禺、白云、花都等区。其次，在捐赠动机和形式上，都市侨乡接受境外乡亲的捐赠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企业的公关行为，不是基于对“家乡”的情感，其表现形式是捐赠行为发生在政府组织的公开募捐活动中，不像在乡村侨乡境外乡亲是在没有预设“场景”的情况下自动捐赠的。对于都市侨乡与乡村侨乡在接受境外侨乡捐赠活动中的区别，目前尚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这不利于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夜幕降临的汕头小公园，游人如织　摄影/子言

第五，都市侨乡居民与乡村侨乡居民在社会心理、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都市社区是人口密度、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及组织制度比较复杂的社区类型，具有异质性等特点。而乡村社区的特点是具有共同文化和社会价值、社会组织和制度比较简单、有共同的归属感等等。以移民活动为例，尽管乡村在信息方面比都市要少得多，但一旦信息被接纳，便会引起“从众现象”，成规模的“连锁移民”随之产生，而在都市的表现则显得较有“个性”，你是你，我是我。又如在乡村，血缘、地缘纽带相当坚韧和富有张力，“老乡”关系可以从村、乡扩大到县、地区、省，但都市的“老乡”关系则显得比较脆弱和无力。又如，成功范例在乡村具有“典型”效应，常常同一村子有个成功人士捐建一所学校后，尽管学校已经超过需要，但还是有人不甘人后坚持要捐建新学校。可是“典型”在都市就不那么具有示范意义，许多人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毫不知情。又如，改革开放后乡村侨乡的宗亲势力重新崛起，修庙和祭祖活动在乡村侨乡往往是一项重大集体行为，这种行为通常得到海外乡亲的参与，它成为加强海外乡亲与乡村侨乡文化联系的一种主要形式，而都市侨乡则缺乏这种“慎终追远”式的文化资本。

总之，乡村侨乡与都市侨乡存在着许多差别，这是促进我们分别研究乡村侨乡与都市侨乡的动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将都市侨乡这个侨乡研究的新命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都市侨乡研究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探索。

都市侨乡研究的若干问题

都市侨乡研究的内容除了具有与乡村侨乡相同的一般内容之外，如移民活动、投资活动、捐资活动、国内外互动关系等，还应该着眼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都市侨乡地位研究。在一般意义上，中国侨乡的结构层次分为广东、福建、浙江、广西、海南、山东等几大侨乡，其中又分为若干个区域性侨乡，如广东分为潮汕、客家、广府三大侨乡。区域侨乡之下可分为若干次区域性侨乡，如广府侨乡分为广州侨乡、佛山侨乡、江门侨乡、中山侨乡、肇庆侨乡、东莞侨乡等。在江门侨乡之下又可分为台山侨乡、开平侨乡、新会侨乡、恩平侨乡、鹤山侨乡。台山侨乡之下还可以乡镇、村划分。将侨乡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切块，它实际上反映了区域侨乡的客观存在，在实践上有利于我们建立中国侨乡研究的整体框架，有利于建立侨乡研究的“基因结构图”。

在传统侨乡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中，不同区域的侨乡基本形成以某一个都市为中心的区域格局，尤其在重点侨乡区域，都市一般是该区域侨乡的中心。例如，闽南地区以厦门为中心，闽北地区以福州为中心，潮汕侨乡甚至粤东侨乡（包括梅州地区）以汕头为中心，珠江三角洲侨乡以广州和江门为中心，海南侨乡以海口为中心，等等。这种格局的形成，与该区域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的形成是相一致的。上述重点侨乡中心都市在中国移民史和侨乡形成史上既是该区域侨乡人民的出入国中心口岸，也是该区域侨乡的经济中心，是连接海内外关系的节点。以近代侨汇问题为例，在重点侨乡区域的都市都设立了许多侨批局，海外侨汇通过这些设在都市的侨批局将侨汇送达穷乡僻壤，然后又将来自乡村侨属的信息反馈到海外。在侨汇这个跨国网络中，广州、汕头、厦门等都市无疑占了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都市侨乡在该区域侨乡的地位和作用，对区域侨乡的整体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都市新侨乡研究。都市侨乡不一定都

有一个区域侨乡作为依托，它可以“孤岛”形式存在。没有区域侨乡作为依托的都市侨乡之所以成为侨乡，主要是由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优势使然，其归侨侨眷主要来自其他地方的转移以及新移民眷属。改革开放以来，以留学生移民为代表的新移民和海归派在都市的定居，使得一些过去缺乏甚至没有侨色彩的都市成为侨乡，即都市新侨乡。新移民造成内地一大批侨眷的诞生，过去没有海外关系、与侨毫不沾边的人现在成为侨眷，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一大侨情变化。都市新侨乡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也是部分来自本土，部分来自他乡。当前侨务工作中的“大侨务”概念其实就反映了这种特点。因此，进行都市新侨乡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第三，都市侨乡变迁研究。以经济问题为例，近代华侨在中国的投资是以都市为主，原因是当时的广州、汕头、江门、厦门等正处于都市的发育期，正处于市政建设的发展期，因而为华侨的投资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这一方面体现在房地产上，一方面也体现在金融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上。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华侨的投资除了都市之外，在侨乡的乡镇也有不少投资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侨华人的投资基本集中到都市里面了。改革开放后，情况又发生重大变化，在几个重点侨乡区域里，境外乡亲对乡村侨乡的投资飞速发展，工厂成片，乡村侨乡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但在都市里，由于土地空间和价格问题、城市规划控制问题等因素的影响，都市中心城区里的工业投资比乡村侨乡少得多。在这一轮新的投资浪潮中，都市侨乡似乎落伍了。但是，从另一角度讲，都市的优势还是十分突出，在发展经济当中，纷纷建立技术开发区、留学生创业园等载体，大力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并已经产生了成效。大都市所拥有的地利、财力、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是一般小城市和乡村所不能比拟的。到都市尤其是大都市投资的外资，除了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之外，不少是外国公司。因此，研究都市的优势以及变化，研究都市侨乡与乡村侨乡在吸引外资方面的角色转换是十分有意义的。



江门市开平赤坎古镇

第四，都市侨乡优势问题。研究侨乡问题常常被赋予“现实意义”的期望，即其经济发展“优势”。几乎在所有的侨乡研究当中，当论述到侨乡的发展时，都会突出侨乡在外华侨华人的总数优势，都会突出在归侨、侨港澳眷属总数的优势，总之，将人数多少当作“优势”来表述。事实上，人数的多少与所谓的“优势”是不能画等号的，也不是成正比的。各个侨乡的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有关此类“论断”似乎已经成为“思维定势”，还不断出现在各种论著当中。可是，我们也发现，有的重点侨乡的发展不如一般侨乡发展好，有的侨乡不如非侨乡发展好，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常说的侨乡人缘优势是否必定会自然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归侨、侨港澳眷属占本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海外乡亲总人口占荔湾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照理说应该有不少“优势”，但在荔湾区，发挥侨乡优势引进的资金、技术还是比较少。归侨侨眷群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个人与海外亲友的联系，很少能转化为公共关系的作用。这似乎有点出乎意外，其实是正常的表现。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到底有多少投资和捐资是个人发挥人缘关系的结果？境外乡亲到侨乡的投资和捐资到底是其私人的亲属关系在起作用还是故土情怀、投资回报率在起作用？侨乡的优势除了经济之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揭开侨乡优势的真实内涵。

第五，都市归侨侨眷群体的研究。在都市中，有老归侨侨眷、新归侨侨眷（指本地向外新移民所产生的群体）和“新移民”归侨侨眷（这里所说的“新移民”是原籍他乡的新移民）三种主要类型的群体。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体的具体状况如何？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作为都市里的“新移民”——非本土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他们如何面对适应、融入、发展的问题？他们与海外亲属的关系以及原籍地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与当地“土著”归侨侨眷群体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到来到底对所在的都市侨乡产生什么影响，等等，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六，都市化进程中乡村侨乡变迁研究。都市侨乡与乡村侨乡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重视都市化浪潮下由乡村变为城市的侨乡所发生的变化，这对当代侨乡研究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达的侨乡，都市化进程非常迅速，都市化对传统乡村侨乡无论在生活水平、社会交往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极大改变了原来乡村侨乡的面貌。都市化不但导致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也导致农民的市民化，从而改变了原来乡村侨乡的实际内涵。对都市化浪潮下乡村侨乡变迁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都市侨乡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改革开放后侨乡的历史变迁。否则，我们对 20 多年来侨乡变迁的认识就还仅仅是停留在侨乡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水平”这种“形式上”的认识，不能对侨乡内涵的“实质上”变化有准确的理解和掌握。

第六，侨乡文化研究。都市侨乡有没有文化？它的文化特征是什么？都市侨乡文化与乡村侨乡文化是否存在互动关系？这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侨乡文化其实是乡村侨乡文化，而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乡村侨乡文化。其实，侨乡文化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变化性。可是，在目前的侨乡文化研究中，存在着将侨乡文化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乡村侨乡文化的倾向，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乡村侨乡文化所发生的变化，忽视都市侨乡文化在整体侨乡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加以纠正。

首先，从侨乡历史来说，一百多年来的侨乡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时期是侨乡文化成型的重要时期；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是侨乡文化从物质特征到思想特征全面衰退的时期，其表现是过去体现侨乡风貌的繁华市镇被废弃，过去深具侨乡文化色彩的习俗被当作“资产阶级香风臭气”予以批判，过去体现侨乡优势的海外关系被当作“反动关系”加以取消和限制，

等等；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是侨乡发生重大变化和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不同时期侨乡文化的不同特点，这是我们在研究侨乡文化时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也是我们正确讨论侨乡文化的前提。

其次，从侨乡对外文化交流史来说，改革开放前侨乡对外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单向交流，即侨乡基本只是与海外华侨社会发生关系，与中国内地的关系相当薄弱。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大批内地人口以各种方式流入侨乡，流动人口成为影响侨乡文化的载体，结果，一方面他们将在侨乡受到的影响带回自己的祖籍地，将侨乡文化辐射到内陆广大地区；另一方面他们又将自己家乡的文化如语言、饮食习惯、行为方式等带进侨乡，因此，现在广东侨乡夹杂着许多内地的文化，侨乡文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是本土文化与海外文化的结合了，而是还含有内地其他省份的多元文化，侨乡对外交流既面对海外也面对中国内地，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后侨乡的对外交流呈现双向交流的态势。

所以，我们应该正视不同历史时期侨乡文化的不同表征，区分不同历史时期侨乡文化的内涵，把握不同时期侨乡对外交流的特点，否则，仍是笼统地论述侨乡文化是不能准确掌握和理解侨乡文化的实际内涵及其变化的，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是在一个“虚拟”的平台上进行，不能有效地提升侨乡文化的研究水平。

都市侨乡研究的意义

第一，在学理层面上，在一般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历史学、社会学，还是人类学等——“乡村”与“都市”（城市）从来都是被当作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侨乡研究也不能例外，我们不应该被侨乡的“乡”字所迷惑，将都市侨乡研究排除在侨乡研究的视野之外，侨乡研究中那种只见乡村不见都市的做法应该得到改正。只有既研究乡村侨乡也研究都市侨乡，侨乡研究才能有完整的研究，才能恢复侨乡研究的本来面目。

第二，在历史层面上，中国传统区域侨乡的中心口岸都市历来是该区域侨乡民众出入国的转运中心和归侨居住地，这些中心都市本身也有不少民众出国，拥有人数较多的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本身就是侨乡。进行都市侨乡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侨乡内涵的差别，有助于客观研究侨乡历史发展道路的全貌。

第三，在时代层面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新移民的增多，造成中国侨乡在空间布局上的变化和实际内涵上的嬗变。像北京、上海以及内地一些省会等大中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侨乡化”的历史进程，这些城市的华侨华人以及归侨侨眷数量都比过去有了显著的增加。以留学生移民为代表的新移民以及“海归派”在都市的定居，深刻改变了都市的侨情结构和面貌，所以，进行都市侨乡研究，有助于客观反映中国侨乡在新时期所发生的变化。

第四，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行政区域的划分和整合如地改市、县改市等在形式上揭示了中国都市化的发展，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化进程更是明显。都市规模的扩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扩大，它也带动了实际内涵的变化，都市化的进程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原来传统乡镇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面貌，原来乡村侨乡的特点在都市化浪潮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如果我们还是以传统的眼光看待都市化了的乡镇侨乡的话，便很难准确分析这类都市化后侨乡的特点和变化。因此，进行都市侨乡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宏观上和微观上认识在都市化浪潮影响下传统侨乡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故人入我梦

文 陈锡忠（花城出版社原副社长）

回忆起过去与广东省新华书店（以下简称“新华书店”）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刻骨铭心，感慨万千。回忆，蕴藏许多瑰丽的理性情感，积淀成深厚情谊，让人难忘，让人感动，让人振奋……杜甫诗云：“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花城出版社（以下简称“花城”）成立于1981年，花城以开拓精神先后办了六七个刊物。当时文化编辑室要创办《影视世界》杂志。资深办报人、室主任谭子艺见我常为报刊热心撰稿，便向社领导王曼、袁宝泉推荐我到他的编辑室。调动工作好事多磨，终于在1982年年初调到花城任编辑。

自小喜欢书的我如鱼得水，一干就是20多年，直至退休。这20多年除当编辑、总编室主任、副社长外，还分管过花城版的图书宣传推介工作，所以除了与报刊编辑记者联络外，常与新华书店的领导和有关业务同行打交道。出版社是出书，新华书店是卖书，情同手足矣。

风起风落都是缘。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欢乐、走过艰辛……经历不少风风雨雨，尤其难忘1986年，中国出版发行面临三十多年来从未遇到的极大困难：订数萎缩，一再萎缩。以粤版书为例，1986年1月至6月比上年同期竟然下降78.5%……当时，花城办了一份内刊《花城之春》，1月号我首选了时任新华书店经理孙洪武采访。

我对孙经理说：“书店与出版社唇齿相依，情同手足，十分感谢书店一向以来对出版社的支持，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在困难时刻，我们首先想到你们。”孙经理笑着说：“只有你们多出好书、畅销书，我们书店才有好日子过，你们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呢。”我说：“彼此支持，守望相助，在困难中砥砺奋起。因为我们是在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啊！”

孙经理十分详尽地向我介绍了新华书店如何重视发行粤版书：1983年便成立了“本版科”专管发行粤版书，人数增至15人，主要抓征订、宣传信息和进、发、销、存图书等工作。每年召开一次进货员会议，让广东各个出版社派人向进货员介绍出书情况。还定期出版《广东新书目》，由5位同志专职编发，10天一期向全国书店征订粤版书。为加强宣传，新华书店还编印了《图书市场信息》《粤版书进销提示》《广东各出版社简介》，赠发全国各销货店，以扩大影响，这些



20世纪90年代初，陈锡忠（左）与编辑商量书稿出版事宜

均已产生良好效果了。

孙经理还专门谈到新华书店以极大热忱去宣传、推销花城版图书，专门由一位同志负责征订。1985 年发行花城版书已达 285 种共 2978 万册的新纪录。采访中，孙经理还坦诚地对我谈了新华书店面临的不少困难，如缺乏流动资金、贷款难、积压书多等，深中肯綮。我和孙经理还认真探讨了解决“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的根本出路……采访后，我写了一篇题为《加强合作共渡难关——省新华书店经理孙洪武答本报记者问》的长篇采访记发在《花城之春》头版头条。

好酒也怕巷子深，为此，我们曾多次和新华书店一起筹划推介本版书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是 1986 年 1 月 19 日星期日，花城与广州市北京路新华书店一起举行“作家编辑签名售书活动”，我们请了数十位名家。当天，人群爆满，气氛热烈，争购花城版书刊者几乎挤垮了柜台。经理兴奋地对我说：“搞唔掂！搞唔掂！“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搞这样的签名售书活动，真是别开生面呀！”

不少粉丝冲着《青春之歌》《自白——我的日记》的作者杨沫和《大林莽》作者孔捷生等名作家而来。杨沫签名签到手发麻，孔捷生连想点火抽支烟也腾不出手来。



1992年1月18日花城出版社社庆（右起：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陈俊年、陈锡忠，花城出版社社长范汉生）

这次签名售书活动，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获得了双赢！

新华书店在我心目中占重要一席，所以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我都会用心做好。1993 年 7 月是新华书店内刊《广东图书发行》复刊三百期志庆，约我以副社长身份撰文，我欣然动笔，撰写了题为《唇齿相依共图兴旺——贺〈广东图书发行〉三百期》一文，提了不少建议，更衷心祝愿它奇葩茁壮，香飘四方。文章发在头版。

有一年，新华书店组织了全省各地新华书店有关负责人和通讯员数十人开大会，邀我主讲《如何写消息和书评》，我抱着能有机会多认识各地新华书店同行的心态欣然赴会，会后还和一些同行保持联系，互相帮忙。风风雨雨的交叠告诉我：友情无价，良朋比兰蕙。

20 年来，为推介花城版图书，为支持新华书店内刊工作，我撰写了近百篇书评、书介，有的还受到新华书店鼓励，如 1988 年《特殊战场上的铮铮铁骨——评价长篇小说〈死亡之岛〉》、1989 年《追踪思想文化发展的最新态势——评“八方丛书”》、1991 年《情透纸背颖悟人生——评“人生文丛”》等几篇分别被评为当年度优秀书评。

帮助永远是相互的。新华书店的内刊也给编辑们很多帮助，比如 1987 年，新华书店别出心裁，向全国发出“议一议粤版书”的征文活动，从书的封面、内容、编辑水平、装帧设计一一加以评论，找出畅销或滞销的原因。不少中肯的意见都给编辑们很大启发，有的还从中激发策划新选题的灵感和冲动。我在 1987 年 7 月 11 日《南方日报》撰文大赞新华书店这次征文活动：因为信息就是生意、点子就是财富！

从 1980 年至 2000 年，全国先后举办了十一届全国书市，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深圳、长春、西安、长沙、南京等地，我大多都参加了，常和新华书店同志们一起为推介粤版书而风尘仆仆。



1993年全国第五届书市在广州隆重举行，陈锡忠为刚出版的随笔集《向人生问路》签售，为该书画插画的著名漫画家方唐也到场助阵

最令我难忘的是 199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1 日第四届全国书市在广州举行，参展出版社已达 500 多家，展销图书 4 万多种，销售码洋 1200 万元，订货码洋 4000 万元。这届书市改革了过去以销为主的单一形式，实行展、销、订、批相结合，变单一功能为多种功能，体现了“全国书市全国办”和书店、出版社合作共办书市精神。作为地主的新华书店和广东各出版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书市前不久，有一天我们偶然听到发行科科长朱讯一句话：“当前读者喜欢看民国时代的散文。”新华书店的好友也向我通风报信“散文书开始热销”。

时任文化编辑室主任的我马上与大家商量，赶编一些散文图书赶迎书市，并拍板：要编就编五种。由博览群书、擅长编书的高手林贤治主编，又特许他暂时不用坐班，由细针密缕的余红梅任责任编辑。

林贤治不负众望很快就编出了第一辑：胡适《实用人生》、周作人《恬适人生》、林语堂《幽默人生》、梁实秋《雅致人生》、丰子恺《艺术人生》。我负责写书评，和羊城晚报组织座谈会，向全国媒体做推介。我写的《情透纸背颖悟人生——评〈人生文丛〉》获《南方日报》粤版书征文优秀奖。《人生文丛》在书市十分抢手，运来一车，销售一空；再运来一车，又抢购一空……《人生文丛》被第四届全国书市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而粤版书仅此一种。新华书店为推介它也做了不少工作，令我感动。

《人生文丛》轰动一时，有的出版社也跟风出“×× 人生”。就在此时意想不到掀起一场风波：广东一位文坛权威在北京一份中央级报纸发表署名文章，盛气凌人责问：“为什么出版周作人这些资产阶级作家的文集?”“要把青年引向何处?”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天，时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刘斯奋要我到其办公室，商量如何写一份报上级的“检查报告”。我是始作俑者之一，难推其责。但见刘斯奋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有，反而与我逐句商量如何修改。其实我心里一直学习前任领导苏晨、李士非、王曼、范汉生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献身出版事业，也不怕写这种“检查”。二来，我看刘斯奋也心里明白出版这些大师熔抒情、叙事、议论于一炉的美文又有何“罪”。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当时知道我要写“检查”的人极少。有次碰到新华书店一位科长，他以打抱不平的口气对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生文丛》我们照卖!”

后来，林贤治又编了 3 辑，共 20 本，此时我已离开编辑室调至社长室。由于此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领导班子破例“重奖”了林贤治 2 万元，当时两万元是个不小数字了，在全国出版界罕见，羊城晚报为此也发了消息，不少报刊转载。现在单位重奖个人 100 万元大概也不会登报吧。

岁月如歌，辉煌永存，蓦然回首 20 年，我与新华书店的手足情谊长记心间。

邱镇城：让潮汕菜香飘四海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说起潮汕美食你能想到什么？非潮汕人可能会想起“打工人”最爱的隆江猪脚饭，夜宵档里最能抚慰肠胃的潮汕砂锅粥，把一头牛不同部位研究得透透彻彻的潮汕牛肉火锅，以及贵得令人咋舌的卤水老鹅头。而潮汕本地人的回忆，则更为丰富多彩，从被称为潮汕“毒药”的生腌血蚶，超级下饭的金不换炒薄壳，经典主食炒粿条，到记忆里妈妈炒的那一碟鲜香滑口的麻叶……潮汕美食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国家高级烹饪技师、中国烹饪大师、广东省侨青联委员、深圳嘉美轩饮食集团行政总厨兼运营管理部总经理邱镇城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初中毕业后就进入著名的汕头市新兴餐室成为一名后厨学徒，至今已在餐饮行业从业31年了，谈起后厨生涯和潮汕美食，他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后厨就是一个小世界。“后厨大概有十几个岗位，大致可分为炒锅、切菜、打荷、卤水、烧腊、水台、上杂等不同工种，而按照后厨人员的多少，炒锅又可分为头锅、二锅、三锅、尾锅等。头锅厨师做大菜、名菜，比如鲍参翅肚，尾锅厨师就只是负责炒青菜等比较简单的菜品。另外，切菜也可以分为头砧、二砧、三砧，上杂也可以分为上杂头、上杂二等，以此类推。”1990年，刚刚当上学徒的他从水台做起，每天早上七点半



邱镇城

上班，挖煤渣、拖地板、擦玻璃窗、踩三轮车拉冰块、宰杀及清洗各种海鲜……每月工资60元，其中40元要寄回家。做了三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师父把刀递给他，说：“弟啊，磨刀去。”业内老规矩，让你磨刀，就是要正式收你为徒。从那以后，邱镇城开始切菜、打荷。打荷也可以视为打杂，负责准备盛器、准备小料（葱、姜、蒜、辣椒段，大师傅用的各种调料，都要按照大师傅的习惯摆好），给砧板做帮工，负责砧板跟大师傅之间的衔接，以及帮大师傅摆盘、擦盘边儿、递各种工具以及其他杂活。打荷的好处是可以观摩师父炒菜，一道菜里放了什么配料，放了多少调料，如何掌握火候，等等，只有看熟了，记住了，自己上手炒菜时才不至于慌慌张张。几个月后，邱镇城开始在尾锅炒“员工菜”，然后一步步从尾锅做到头锅。

此后数十年，邱镇城数次跳槽，历经数个知名餐厅，从主厨、出品总监，到行政总厨，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当学徒的时候我只想着要把工作做好，把技术学到手。”后来，他意识到做菜不仅仅需要技术，也需要文化。有的厨师下班后就打扑克、打麻将，而他则在休息时间大量阅读烹饪书刊，钻研菜式，更钻研潮汕地区的饮食文化。

“潮汕菜最大的特点是追求原汁原味，以清淡为主，讲究健康、营养。”1996年5月31日，国际足联理事会全票通过决定由日本、韩国共同举办200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根据世界杯比赛规则，日本和韩国作为东道主可以直接入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不用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这对于中国足球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1997年10月9日，云南红塔足球俱乐部在昆明国贸中心宣告成立，此后，中国国家足球队决定在云南昆明红塔训练基



邱镇城正在制作老鹅头

地进行集训，备战2020年世界杯。经过反复考量，潮汕菜因为调味科学、清淡巧雅、注重养生被列入运动员的营养餐，而手艺精湛的邱镇城则被选中成为昆明红塔山集团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厨师（头锅）。据邱镇城回忆，在集训期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专门派了营养师在后厨帮助运动员们做膳食管理。“我们每道菜放多少克盐都有具体规定，营养师要求我们不能放味精，所以我们都是用牛骨汤、鸡汤、排骨汤来调味。我们做出来的潮汕菜，大家都很喜欢吃。”说起当时情景，邱镇城颇为自豪。

“有些地域性的菜品，比如湖南菜和客家菜，很难做成人均3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而潮州菜既能做街边的大排档，又能做人均3000元以上的高档菜，这是潮州菜的一大特点，这背后就是因为潮州菜的食材丰富多样。”众所周知，一个地方的饮食跟当地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潮汕地区东北、西北多高山，东南临海，区域内有韩江、榕江、练江三大主干河流。绵长的海岸线、密布的水网、广袤的平原加上林立的山地给予了潮汕地区丰富多样的食材，这是潮汕菜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从历史角度来说，潮汕人有



邱镇城制作的三十六月老鹅头

两种来源：本地的土著居民与来自北方的中州移民，其中包含了水上民族蜑家、南方游耕民族畲族以及俚族、汉族等不同民族。民族的融合带来了不同的饮食习惯，也使得潮汕地区的饮食文化更加丰满和完善。比如，历史上蜑家人是陆地上无家无产业，以海为生的海上族群。在古时，渔民出海捕捞后，就将鱼用海水直接煮熟，以便保存，同时也可以当干粮，也即“以鱼当饭”，这就是后来潮汕家常美食——鱼饭的由来。

时至今日，鱼饭等一系列潮汕平民美食在香港仍然大受欢迎。有一种说法是，多年前，在潮汕地区有一种平民食店专门售卖潮州风味的乡土菜式，例如鱼饭、卤鹅、卤猪脚、卤豆干、腌蟹、咸菜等，这些菜式一煮好就以明档的形式摆放出来卖，食客站在摆满美食的摊前，看中了就用手指一指食材，就可以点菜上桌吃了，类似于今天的快餐。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种潮州饮食文化由潮州人带到香港，在皇后街开了许多潮州小食店。当时香港时局混乱，经常有吃“霸王餐”的客人，潮州人非常团结，如果遇上“霸王客”，各店之间就会很快联合起来揍这些客人。于是香港人有意无意间就把“打冷”（潮州话“打人”的音译）与潮菜馆联系起来，最终香港人就把“吃潮汕菜”称为“打冷”。

而除了家常菜，“高大上”的潮汕私房菜也拥有不少忠实的拥趸。邱镇城举了个例子：“婆参，是海参的一种。一般厨师做婆参的时候会选择扣、炒、焖等做法。我做的时候是先将婆参泡发好之后，用高汤把它煨入味，拿出来切成小块，裹上粉去炸。炸的时候要用猛火，这样婆参的外表就会比较脆，里面比较有弹性。”如此一来，婆参脆脆的外皮和软糯的内里形成了很好的咀嚼对比，吃起来满满的胶汁但又不腻。而清蒸石榴鸡，这道曾让邱镇城在深圳首届星耀名厨创意大赛中斩获金奖的传统潮菜，则卖相十分清雅。据介绍，这道菜是以鸡肉、香菇为主料，用少许的芝麻油和胡椒调味，蒸熟后用蛋白做皮包裹，如香囊一般扎起，外形如一朵朵开花的石榴，一个个晶莹饱满的立于盘中。此外，还有邱镇城用古法烹制的老鹅头——这种老鹅头用的是三十六个月足月的狮头鹅的鹅头，肉质细嫩，脑髓鲜香，经过数小时精心卤制，厚重的鹅胶脆而不散，鹅肉酥而不烂，当然，价格也不菲。

现在，邱镇城不仅仅是名厨，还是韩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著有《吃遍广东之潮汕的原味时光》一书。无论是什么身份，邱镇城的目标都只有一个——推广潮汕的美食，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厨师将潮汕菜发扬光大。在很多人眼里，厨师是没文化、干体力活的职业。但邱镇城并不这么认为：“我经常跟学生们讲，行行出状元，厨师也可以出状元，别人是凭文化知识当教授，我凭多年经验，也可以当教授。我选择当厨师，31 年来我没有想过要换行，因为这既是我的谋生方式，也是我的爱好，我要把它做大做精，把潮汕美食推广到全国各地去。”

土家山歌的传播者王志凌

文 赵晏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

芭茅花是重庆市黔江区的特色植物，我每次来黔江都会去河边欣赏那一簇簇芭茅花绽放的娇姿。那晚的月亮格外圆，也分外的明。饭后，我步出濯水风雨廊桥的芭茅岛酒店想去河边走走。刚走上廊桥，忽然一阵歌声从不远处的桥头方向飘来，是原汁原味的山歌。我去寻找芭茅花的兴致瞬间被这纯朴的歌声攫去了。

只见在桥头的一角，在红灯笼的映衬下，游客们正围着一位拉着手风琴的中年汉子，在他的周围有几位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妇女跟着琴声唱着当地的民歌：“阿哥住在石板街，幺妹住在风雨桥，石板街上哥不在，风雨桥上呃，妹心焦。啊啦哩咿，阿蓬哥，啊啦哩咿，我的娇……”

掌声、欢呼声掺杂着“唱一个六口茶”的喊声，犹如演唱会一般热闹。我站在人群的后面，欣赏着他们唱歌，让我惊奇的是，无论游客点什么歌，那位手风琴师都能让游客满意，特别是那首《我的祖国》，居然大合唱起来，震得桥板回声荡荡。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扶贫先进村——著名的“土家十三寨”。一支民歌队唱起了山歌《土家迎客歌》，欢迎我们的到来，这让我想起昨晚那位拉手风琴的汉子。

黔江区文联主席阮泽鸿告诉我：“他是廊桥之恋民歌队的发起人，叫王志凌，从小喜欢唱山歌。他走南闯北一圈后，来到了黔江收集民歌，一边创作民歌，一边教大家唱民歌，后来组建了廊桥之恋民歌队，天天在廊桥这里无偿给游客唱



重庆市黔江区晚霞中的濯水古镇



笔者（中）与王志凌（左一）以歌会友

歌，宣传土家民歌，成为黔江的一道风景。”

“他还是个诗人。”黔江区作协主席笑崇钟给我吟诵了王志凌的一首诗：“在封城封路的流年里，春天赐我以孤独，独享一座廊桥，民歌赐予我以热情，把我的殷切，燃烧成一团芬芳的火。”

诗人、民歌传播人，王志凌不正是黔江文化旅游的一个典型人物吗？黔江的余晖真美，我来到了风雨廊桥的桥头，跟王志凌攀谈起来。

王志凌是苗族人，从小生活的重庆武陵山区酉阳县，流传着很多优美的山歌民歌。他是听着山歌长大的。他离开家乡 20 多年了，行走过成都、广东、辽宁和新疆等地，也从来没有忘记过民歌。2015 年回到家乡，他听到一首源自黑水镇的民歌阿拉调（市级非遗），被深深打动，之后，他萌生了为民歌的挖掘开发与保护尽一份绵薄之力的想法。他到了黔江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民歌队，因为土家族音乐的传承不仅在于挖掘发现，更艰难的工作是推广与传承，推广才是最有效的保护。

黔江是渝东南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早年的黔江地区曾经下辖酉阳、秀山、彭水、黔江和石柱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黔江的文化环境相对于其他几个县要优越得多。黔江文化一直以来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象，更乐意接受周边的甚至更远地区的文化因素。“2017 年我考察了周边的秀山、彭水和黔江以后，决定在黔江住下来。我找到黔江负责濯水景区的领导——旅投集团副总经理徐东，他听了我关于组建民歌队的想法以后，当即表示欢迎。于是我就挑选了现在风雨廊桥的桥头作为我落脚的地方，楼上作为民歌队活动的场所。”

2018 年 3 月，濯水古镇廊桥之恋民歌队成立了，黔江区领导和镇领导非常重视，有重要接待和演出都让民歌队参加。

“现在挖掘民歌是不是有难度?”我们正在聊得起劲，又来了几位民歌队员。

“当时他走街串户，劝说周边邻里加入，但是多数人都拒绝了。”一位歌手说道。

“当时他叫我加入的时候，我是不想来的。我觉得那些调儿很难找，唱出来也怪怪的，因为年轻人喜欢唱那些流行歌曲。”一位叫冉琳的队员说，“王老师当时也灰心过，甚至想过放弃。后来，他决定在风雨廊桥的桥头唱山歌吸引当地人的注意，但还是没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还有队员说：“我们当时以为王老师神经不正常。他一个人坐在楼上拉着琴唱着歌，有很多人就站在楼下看，包括我们这些后来的民歌队队员。”大家的自我调侃中透着一股辛酸。

“但还是有人被王老师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打动了。慢慢地，前来找他学唱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个人。”队员罗小琴说。

“当初有一半的人五音不全，但他们都很努力地学。平时我只教他们最基础的知识，比如说怎么用气，发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识简谱、练习简单的声乐。而我教得更多的是用感情唱，唱山歌没有感情是感染不了人的。为了让队员们唱出真情实感，我给他们讲解山歌背后的故事。现在，民歌队的队员们已经会唱十几首山歌了，这些山歌都是我长期深入武陵山各区县搜集、加工而成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王志凌欣慰地说。

王志凌是热爱民歌近乎痴狂的人。他每周给队员上三次课，晚 7 点到 9 点，有生意他也不做了，他说教学员们唱歌最重要，而且没收一分钱报酬。只要景区有活动，他都会带着民歌队无偿演出。

为了发掘民歌，王志凌经常开车几十公里去收集素材，找会唱民歌的老人学习。“我还发现了民国时期的民歌手抄本。”王志凌兴奋地说，去年深秋，他去太极乡看望一位民歌爱好者，大家一边聊一边唱起山歌《濯水情歌》。后来这位爱好者的老父亲也翻出自己多年没有拉的二胡加入进来，还找出了一本写着“抄于民国初年”的毛笔手抄的线装民歌集。

民歌在民间。有一天在黔江濯水景区广场，王志凌偶然听见一个老妇人唱山歌，曲调很优美。但等他忙完了去找人的时候，老妇人已经走了。历经半年时间，他终于打听到那个唱歌的老人家是犁湾人。他两次驱车前往犁湾寻人未果，但在第二次寻访时意外见到一位 90 高龄的老人家，“她是非遗传承人。“老人家记性特别好，可以把她年轻时候从自己婆婆那儿学来的民歌山歌和小调完完整整地唱出来。”第一次见面，她唱了 6 首完整的民歌，如《十把扇子》《双叹妹》《十想》等。每次去拜访老人家，王志凌都有收获。有一回，老人家一口气把 12 段的采茶歌完完整整地唱给他听，他认真记录，连夜将这首歌改编出来。前不久，湖北一位专门搞民歌创作的创作人，听了他改编的采茶歌，表达了合作的意向。

黔江民歌是多年文化积淀和传承的集大成者和留给后人的财富，是在通讯和交通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顽强生长起来的文化奇葩。四省边区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且其表现内容和形式基本相似，这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首歌，可以穿越千山万水在不同省份几乎以一样的旋律和歌词出现，比如土家民歌《六口茶》，湖北、湖南、黔江都在唱，只是歌词略有改动，可见优秀文化的生命力就像这里的芭茅草一样顽强坚韧。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黔江区对民歌挖掘给予了重视，还有王志凌等一批民歌爱好者的坚守，民歌，人民之歌，越唱越响亮。

人：一撇一捺，站立为人

文 顾作义（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会长）

古希腊有一个神话故事叫“斯芬克斯之谜”，说的是：有一个狮身人面的怪兽，名叫斯芬克斯。它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让过路人猜一个谜语，谜面是：“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如果答不出来，就会被吃掉，它吃掉了很多人，直到俄狄浦斯给出谜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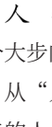
俄狄浦斯的谜底是“人”。他解释说：“在生命的早晨，人是一个娇懒的婴儿，用四肢爬行；到了中午，也就是人的青年时期，用两只脚走路；到了晚年，年迈无力，不得不借助拐杖行走，拐杖成为第三只脚。”斯芬克斯听到了答案，大叫一声，跳崖而死——俄狄浦斯猜中了斯芬克斯之谜，就是人的谜，人的生命之谜。

其实，人到底是什么？说法五花八门，观察汉字的“人”，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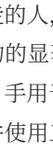
人（rén），象形字。



甲骨文的文字像侧面站立的人形。



金文与甲骨文相同。



篆书则像一个跪拜的人形。

人 楷书变成了一撇一捺，简单明了，像是一个大步向前的人。

从“人”的字形看，甲骨文、金文均为侧立行走的人，这从人类学的角度形象地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动物用四肢爬行；人有手足分工，手用于干活，脚用于行。因此，人是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又能用语言进行思维和交际的高等动物。

《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意思是说，天地之间，人是最可宝贵的。

由于人不但有思想，而且有情感，故有“人非草木”“人情冷暖”之说；由于人心复杂，又有“人心莫测”“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之说。

《礼记·礼运》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人是天地之“心”，是五行（金、木、水、火、土）之端（起始和终极目的），人能明白宇宙时空之道，能理解掌握自然的规律，是万物运行的主导者，所以是最为高贵的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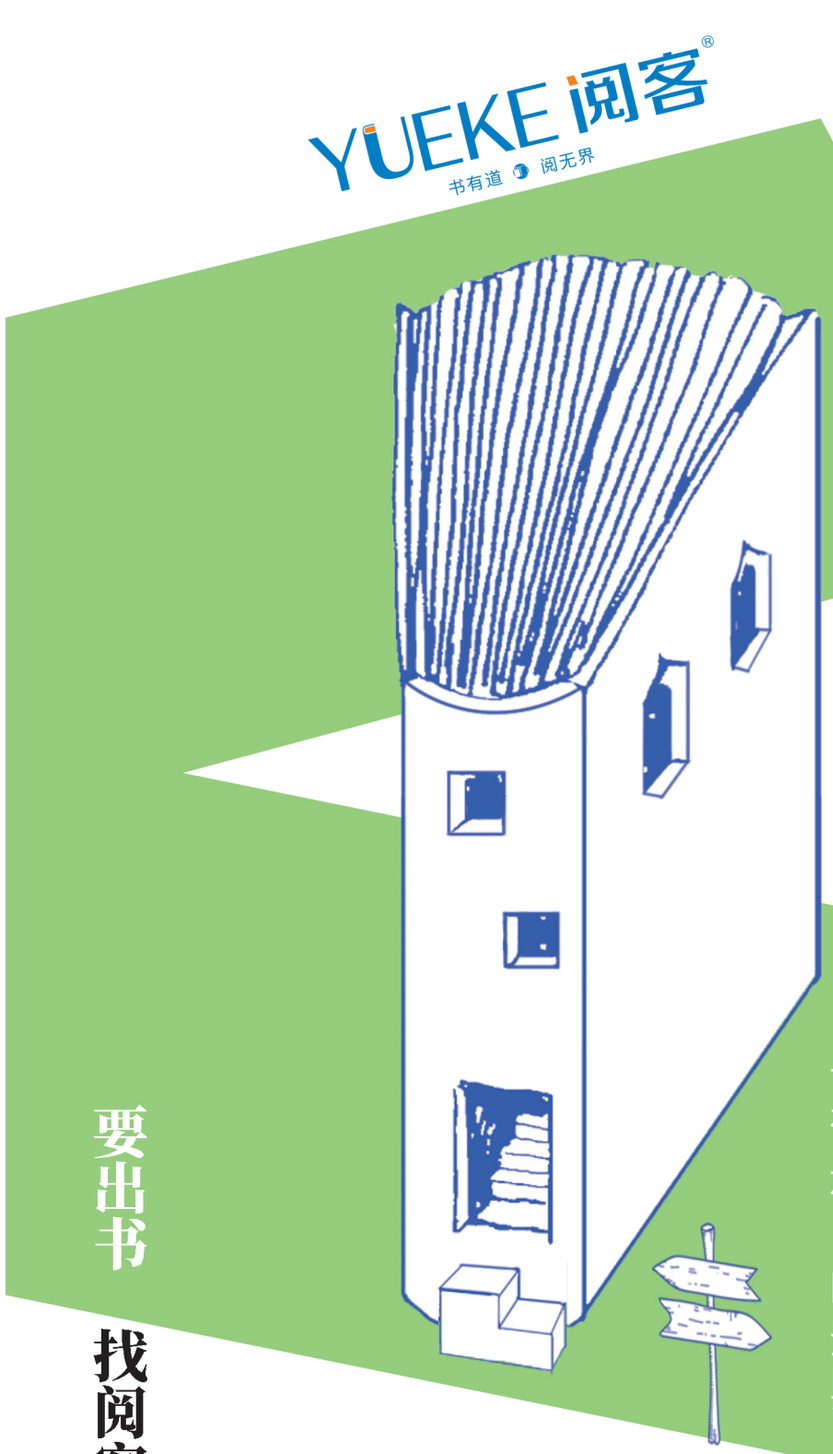
“人”字的字形逐步从侧立转变为正面直立，象征着人挺拔、端庄地站立着，寓意堂堂正正、正直做人。处世之道讲究随和通达、内方外圆，不但仪表堂堂，也要人品端正。上达于天，下立于地，顶天立地，光明磊落。

“人”字的字形也表示在人类社会中男女是互相支撑的。丿（piě 音“撇”）表示轻柔，代表女性；乀（fú 音“拂”）表示沉稳，代表男性。人类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组成的。男女平衡、阴阳平衡则社会和谐共存。

“人”字的结构也说明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依存，才能撑起一片天。“人”字缺少任何一笔，不但不能成为人，而且会倒下来，因此做人必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人”字也很形象地描述了人生的旅程。人生既有上坡路，也有下坡路，有低点也有顶点。升降进退，应顺应时势，顺应规律，进退有度，宠辱不惊，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得失、荣辱、升降。

“人”字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仁”。“人”，字音通“仁”，即仁义为本。《说卦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做人的根本就在于讲“仁义”。不仁不义，则与禽兽无异。

YUEKE 阅客®
书有道 阅无界

书有道·阅无界
要出书
找阅客
阅客

大国医梁颂名

文 钟瑶（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

从中医世家走来

梁颂名，生于 1935 年，是著名中医方剂学学家，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教授。

来自著名中医世家的他，一生的从医执教思想及理念受其祖父和父亲影响颇多。其祖父梁翰芬在岭南、港澳乃至全国中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位清末的监生起初在乡间教书为主，许是受到同乡中医治病救人的感召，于是拜当地名中医为师，走上了中医的道路。清末民初，梁翰芬在广东省医生考试中一举夺魁，受聘于广州市方便医院，之后曾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光汉中医学校、华南国医学院、广州和香港保元中医学校、广州汉兴中医学校等医学院校任教。他精于诊断，尤重视脉诊、舌诊，著有《诊断学讲义》《眼科讲义》《辨舌疏证》《痛症案疏》《脏腑药式》等。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废除中医药，国人群情激愤。在 1931 年南京中央国医馆成立之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陈任枚率领梁翰芬等 11 名广东知名中医出席大会，在会上抨击当局的政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梁翰芬凭借自己的医术挽救了不少重病患者的生命，也培养了很多学生，比如杜明昭、杜蔚文、罗元恺、邓铁涛等著名中医大家。



梁颂名，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历任广州中医学院中药系主任、中药研究所所长、中医方剂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享受者、国家暨广东省新药审评专家、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麻醉品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广东中药学会会长等职务，从事中医药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近 50 余载，是全国著名中医方剂学学家。

梁颂名的父亲梁具天自幼跟随梁翰芬学医，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后，进入广州方便医院工作。后来越南的一家华侨医院来广东招聘医生，梁具天以粤港澳中医师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在越南工作期间因医术精湛，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梁具天从越南回国后，一直在广州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被评为广州市名老中医，并被时任院长梁毅文称为“再世华佗”。

在其祖父和父亲的直接影响之下，梁颂名也走上了中医药的道路。幼年时，祖父要求他背药方剂方歌，说不懂也要先背。祖父说：“我在广东省医生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不是偶然的，一是我平时看病多，有经验；二是因为我平时看书很多。”因此，梁颂名从小熟背药性赋、汤头歌诀，阅读中医四大经典著作，并利用课余时间跟随祖父、父亲临证，积累治疗经验。

梁颂名高中毕业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时期的中医处于低潮，在医学界地位较低。故梁颂名听从祖父的意见，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药理学系，以期先修读西医课程以求一技傍身。这段经历促使梁颂名对中西医协同治疗持开放态度，做到兼收并蓄。

1954 年，毛泽东曾对中医药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医药被高度重视起来，全国上下也掀起了学习中医的热潮。为响应国家号召，梁颂名毕业后回到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工作。后为了更好的进行中医研究，他前往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研究班进行为期 3 年的学习深造。从北京深造回来，梁颂名回到了广州中医学院中药方剂教研室工作。当时的广州中医学院名师荟萃，特别是朱敬修、周子容、关济民几位名老中医德艺双馨，名望极高，梁颂名主动跟随他们学习，同时博览群书，慢慢地提高自己的医术水平。

中医药方剂大家

梁颂名先后师承其祖父梁翰芬、父亲梁具天以及朱敬修、周子容、关济民等名老中医，做到寻求古训，博采众方之长。梁颂名注重调理脾胃，尤其小儿脾胃常不足，易为乳食积滞、生冷水湿及不正之气所伤，故更应从脾胃入手；对肝炎的治疗，强调要遵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训，以健脾消导为主，辅以清肝泄热之法，每收到较好的疗效；善于运用理气活血药配伍虫类药治疗远年胃气痛，疗效满意，重用百部治疗久咳，重用香附治妇女不孕症等，每每收到满意的效果。20 世纪 60 年代，梁颂名创建了广州中医学院第一个中药方剂试验室，旨在开展单味中药和复方的药理试验研究，在《广东中医》上发表了《黄芪、甘草、大枣对脾胃功能的实验研究》《消肝扶脾丸对中毒性肝炎的实验研究》等论文，同时指导方剂学的研究生开展一系列中药复方的药理与临床研究；参与指导多项省级、国家级中标课题的研究工作，如“中医治疗糖尿病单方验方的筛选研究”“五子衍宗丸药理研究”等，为药物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他编写了《中医方药学》《中药方剂学》《中医方药学基础》《中国药酒》《中医脏腑概要》《中药学发凡》《梁颂名方剂学讲义》《食疗养生》等十五本书籍，还发表论文《三冬茶治疗急性咽炎 400 例临床疗效总结》《梁翰芬老中医治疗经验琐谈》《启膈散的运用》《自由基与糖尿病》《消肝扶脾丸对中毒性肝炎的实验研究》等 30 多篇。

梁颂名经常开玩笑说：“我喜欢老师这个职业，和学生们在一起，感到自己永远年轻有活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工作期间，他一

直在教学第一线，主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及中医基础理论等中医学专业的主干课。因为授课生动有趣，他每年都被评为“深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差不多历届学生都以满分评核他的教学效果，其中第九届研究生班学子们写了一副对联给他：“四年寒窗苦读，幸遇一代良师，迷图引路；半生杏林施教，誉满八方省市，医圣齐名。”

教学之外，梁颂名还坚持每周不少于三次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医院门诊出诊。他认为教学与临床有着紧密联系，“学生们为什么喜欢我的课，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实例结合，而不是照本宣科。”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所主任胡志远教授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在香港某医院，一名 7 岁的小男孩呈休克状态躺在病床上，仅靠仪器维持最后的一点生命表征，站在病床前的医生替男孩详细检查后，无奈摇头叹息。这时一名中医师走了进来，为小男孩把脉望诊后，把一瓶带有浓烈药材味道的液体经过胃喉管倾入小男孩体内，不久，男孩原本静止的血压竟然慢慢上升，在场啧啧称奇的西医迅速展开一轮急救，终于将小男孩从鬼门关里抢救回来”。这位中医师正是梁颂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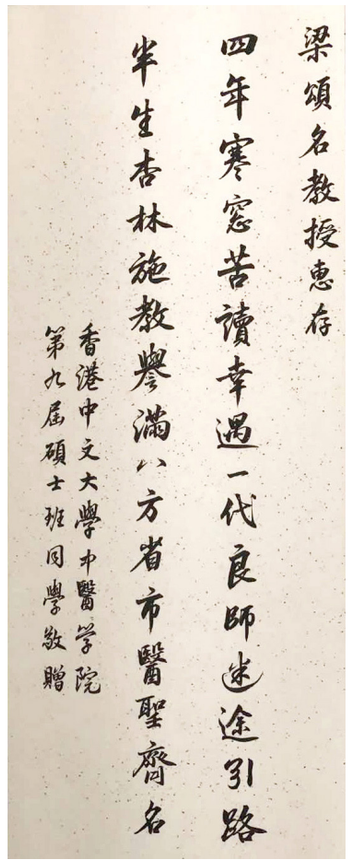
梁颂名带徒

当代南药奠基人

除了老师和医生两个角色，梁颂名还有一个外号——“岭南药王”。

作为当代岭南中药奠基人，梁颂名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新创办的中药系系主任这一重要职务。他带领全系同仁不辞辛劳地挺过了创办初期最艰苦的岁月，引进培养师资、建立中药苗圃园区、争取各类经费壮大中药系实力。而后他又在中药系基础上推动成立了中药学院。如今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实力强大、成绩斐然，“中药学专业”“制药工程（中药）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中药学院为粤港澳地区乃至其他国家或地区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对振兴国家中医药事业及产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同时，他还曾长期担任广东省新药审评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医药管理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新药评审委员，国家中药品保护评审委员，国家麻醉品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维护广东中成药的声誉和扶植其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 1985 年，国家对中成药市场进行整顿，要求不允许含有西药成分，所有的中成药需要重新进行审批。广州中药一厂的消渴丸和原佛山中药二厂的鼻炎康这两种畅销药面临淘汰，两个药厂都面临倒闭。梁颂名便向评委提出了“把这两种药砍掉的话，这两个药厂都要关门，能不能这样：我们把药里的西药成分拿掉，做成另一种中成药，对其成效出一份分析报告，纯粹的西药怎么起作用也出一个分析报告，将三个放在一起比较，看哪一种最有效，不要搞一刀切。”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结果显示还是中西药结合的最有效。于是在梁颂名的极力争取之下，两个药被保护了下来。后来，梁颂名还帮助药厂撰写新药申报所需的方解，促使新药的顺利审批，并为药厂职工做教育培训，提升中成药水平。



梁颂名的学生对老师的感恩

大湾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推动者

对于粤港澳三地的中医药事业发展，梁颂名起到了带头和推动作用。1998 年，香港中文大学筹办中医学院，年逾花甲的梁颂名在校方的真挚邀请下，经国家相关部门的推荐和批准，奔赴香港开启新的教学科研生涯。

梁颂名说，筹办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不是一件易事，涉及到人财物等，每件事都要办好很难。早期因课室少，作为创院教授的梁颂名只能在院长办公室门口摆一张工作台处理日常事务，

有时为办某一事往往要跑好几天，加班更是常态。中医学院整个构架、课程编排、教学提纲、教材先定、教学大纲、临床实践等都需要由他设定或审定。最初几年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梁颂名不得不承担了大部分中医基础课的讲课任务，同时负责学生的见习安排，不定期检查见习情况，以便及时改进和完善。



梁颂名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右）留影于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



梁颂名诚邀卫生部前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佘靖（右）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顾问

梁颂名教授说：“我是个教书匠，也是个中医迷，尽管年龄大些，外人看来工作辛苦，事实上我心里是很快乐的。”如今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已是规模初具，学院已培育出逾千名中医毕业生，为香港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出一分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梁颂名一直在努力：“我的目标是将来中医学院能独立设院，而不是附属于医学院之下。”

回顾香港中医药的历史发展，从不认可中医，中医没有合法地位，民众认为中医只是保健手段，到如今重视中医药发展，在大学成立中医学院，是重大转变。梁颂名十分开心，但心中犹觉不足，因为香港的中医与西医薪资水平差异较大，且中医没有进入医保也影响了居民看病的选择倾向。他希望日后能做到中医与西医平起平坐，将中医纳入香港公立医疗制度，这样才能彻底改变中医在香港的地位。“这需要不断地去争取。中医学院教育管理方面亦要力求改进，学生要争气，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相信中医的前途会更美好。”梁颂名说。

梁颂名与澳门中医药业的渊源要追溯到 1994 年。当年中国卫生部受澳门卫生司邀请，组织代表团访问澳门，梁颂名是成员之一。访问结束后，澳门卫生司请求梁颂名留下协助澳门药物厅检查各中药店的药物质量及中医诊所有无兼用西药的情况，同时协助卫生司修订中医药条例。“以前由于缺乏监管，有不良商家会以次充好，甚至将发霉的药材卖给病人，要打击这种现象，把市场规范起来。”梁颂名解释。经过这些合作，澳门卫生司对梁颂名赞不绝口。之后，梁颂名往来澳门便渐渐多了起来。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陈伟仪（左）、中医学院院长梁挺雄（右）共同为梁颂名颁发“杰出贡献奖”

1995 年，由澳门卫生司资助，澳门中药业公会组织举办中药技术员（中药士）进修班，委托梁颂名教授编写教材并负责讲授，以提高澳门中药业人员中药、方剂知识水平。进修班一连办了 5 届，受到学员们的热烈好评。在澳门官也街经营中药房的彭月娟女士是第一届进修班的学员，她的丈夫则参加了第二届。梁颂名每次来澳门参加公会会庆，彭月娟都会到他下榻的酒店迎接，也会邀请他到中药房坐坐。“因为梁教授值得尊敬。”彭月娟说。

富有家国情怀的大国医

梁颂名常说，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一个人要有情怀，作为中医人，必须有爱中医药的情怀，更要有家国情怀，否则会一事无成。”家国情怀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主线主脉，绵延几千年而不断，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结构到民间心理等方面。



作者简介

钟瑶，硕士，现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中医学专业）。师从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中医肿瘤学家、国医大师周岱翰教授；师从著名中医方剂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梁颂名教授。参与编著《杏林问道：肿瘤临证耕耘录》《中医肿瘤学》，发表了《黄帝内经中有关肿瘤论述》等多篇学术论文。

1988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派梁颂名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留学期间，梁颂名重点研究糖尿病与自由基的关系，发表了题为《自由基与糖尿病》的论文，证实糖尿病综合并发症与体内“反应性氧—自由基”活动失控有密切关系，建议以体内自由基活动为指标筛选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受到医学界广泛重视。访问研究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力邀梁颂名留在加拿大工作，并允以高薪，但他不为所动，坚定回国。梁颂名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心中必须要有祖国，不管其他国家给我多好的条件、多高的报酬，必须按时回国的，涵养家国情怀要知行合一。”

如今，近 90 高龄的梁颂名依旧坚持奋斗在一线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梁颂名笑道：“至今中医学院讲课最多的老师还是我，年纪最大的也是我。”他说：“我国的卫生方针和政策层面对中医药行业的支持、鼓励和‘放开’力度、频度令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充满希望，也是最好时机。”

2015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的贺信中指出：“要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应用好，在建设健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2016 年 2 月，国务院颁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为未来十五年中国中医药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作出了战略布置。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医药的地位和扶持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就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这更是奠定了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地位。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他认为，只有祖国才是中医师成长和发展的沃土。知责尽责是家国情怀的内核，是为党为国为人民的力量之基，梁颂名心中有责，行中尽责，方能超越“小我”，完成“大我”。

“心血培桃李，粉笔写春秋”是对梁颂名教授一生最恰当的写照。

最后的古巴唐魂

文 朱颂瑜

2016 年岁末，对于很多古巴华裔来说都有着特别难忘的深刻记忆。因为那一年，古巴的革命之父卡斯特罗在掌权 49 年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于 11 月 25 日与世长辞。未几，不到两个月时间，哈瓦那中华会馆传出侨领周卓明书记仙逝的噩耗，让人震惊，使人伤怀。

卡斯特罗走了，带走了一个充满传奇的时代；周卓明也走了，带走了那个传奇时代下尚未能尽然记录的漫长古巴华侨史，为曲折跌宕的历史翻过了特别沉重的一页。

周卓明是古巴籍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华裔，得益于儿时常能跟随在当地华侨电影院工作的母亲去电影院，长期耳濡目染的熏陶下，汉语说得很好。他自 1966 年开始在中华会馆担任侨务工作，一做就是半个世纪。我第一次见到周书记是 2015 年在古巴。那本来是我在古巴一个平常的暑假假期，出于友人托付寻觅先人遗迹的愿望，就这样，我握着一个古巴广东籍先侨的名字走进了哈瓦那的中国城，无意中走进了一段不平常的古巴华侨史。

一

古巴的中华总会馆主要是开展侨务工作和联结华人友谊的地方，馆内的信息资料大多



作者简介

朱颂瑜，祖籍广州，现为瑞士华语作家，瑞士官方新闻记者，华人头条瑞士站社长，曾任教于日内瓦大学东亚语言系。作品曾获瑞士国家媒体中文频道征文大赛首奖、全球华文散文大赛最高奖、澳门基金会散文奖等文学奖。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学》《文艺报》等报刊，著有散文精选集《把草木染进岁月》等。

是由周卓明在过去半个世纪的馆里工作中亲手记录下来的。除了资料信息外，有关古巴的华侨史其实更多的则是他心中述之不尽的历史场景以及这些场景交替下他所亲历过的悲欢离合。我经常想，在古巴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巨变下，如果所有这些鲜活的生命故事都能被完整地记载下来，那么，古巴的华侨史必定是中华儿女与世界历史胶着中最为不同寻常的一章。

古巴华侨史与古巴在过去半个世纪所经历的巨变及其与美国的对垒密不可分。美国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逾半个世纪，直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访问古巴，释放出对古巴政权立场软化的信号，自此，两国敌对了数十年的关系才终于得到了缓和，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时间上溯回到1960年，受美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古巴在大国的政治利益牵扯中遭受牵连，美古两国关系陷入了紧张。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终止美古关系，关闭了驻古大使馆。雪上加霜的是，吉隆滩一战虽然让古巴在政治与军事上占了上风，但却惹来了美国政府对古巴更为深刻的敌视。次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古巴政府也施行社会主义制度，整个社会因此拉开了巨变的序幕。

时局不靖，国乱民悲。

回想起往事，周卓明依然眼角含泪，心有戚戚。就这样，“1961年”既成了古巴近代史上的分界线，也成了中华总会馆一个转折性的标记。原因是，中华总会馆在古巴革命前本隶属于国民党管理，自1961年始改由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华侨接手。由于政体的改变和不断恶化的时局，国民党人在离开会馆时又带走了很多资料，“1961年”因此也成了会馆华侨登记本上的一个分界线。这意味着对于像我一样来馆寻找华侨先人下落的人来说，只有晚于1961年在古巴逝世的华侨才确保有资料被馆里记录入册。

讲述起这些历史的那个上午，从美国肯尼迪机场50多年来飞往古巴的第一班航班正在跑道上徐徐启动，整装待发，准备飞往那个近在对岸又异常陌生的哈瓦那。和半个世纪前那个盛世般的古巴相比，此时的哈瓦那显然是落魄的。纵然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五彩斑斓地分布在整个城市里，保留了鲜明的资产阶级情调；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老城也大致上保持得尚且完好，但纵横内巷中的断垣颓壁依然随处可见，藏不住长期失修的迹象。

而在哈瓦那市中心的中国城内，气氛照旧沉寂如常，破落的街道，青苔满墙，随处可见。在中国城里头的中华总会馆内，几位在等用午膳的老侨民读报的读报，打牌的打牌，形单影只，各自消磨时间。偶尔，也会不经意抬起头来含思远目。天海湛蓝，飞鸟窗前自穿梭，凄然目光中，有锁不住的怅然从眉宇间轻轻涌起。



朱颂瑜和古巴哈瓦那中华总会馆周卓明书记合照

回首历史禁不住无限伤怀。20世纪初期到50年代，古巴经济蓬勃，曾一度是世界闻名遐迩的商业乐土。在喜人的经济鼎盛时期，随着墨西哥、加拿大以及美国排华政策的兴起，大批携带着资产的华人移民到古巴，重塑了哈瓦那华人街多元的阶层结构，使古巴一度成为拉丁美洲华侨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人数曾多达好几万，哈瓦那唐人街也因此被誉为“拉丁美洲最大最重要的华人街”。

据说曼哈顿的纽约唐人街和三藩市的唐人街都是亚洲以外最大的唐人街，它们占地面积有两平方英里，居住着大概十几万华人。而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中国城完全不逊色于那两地，据资料记述，哈瓦那的中国城在20世纪50年代末最昌盛之时是一个集结在44个街段的大型华人社区，桑哈（Zanja）区上除有不计其数的中国餐馆，还一路发展出包罗完备的配套服务机构，如中文学校、大型中医诊所、养老院、戏院、旅社、电影院和麻将馆等。为了让同乡弟兄姐妹永远在一起，死也不分离，古巴侨团甚至在哈瓦那的哥伦布国家公墓旁买下了属于华人自己的墓地——中华总义山。昔日华人社会在古巴的蓬勃景象，可见一斑。

二

有句话说，地球上只要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这是早期华人先侨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充当劳工的真实写照。在19世纪殖民地劳动力需求以及国内政治动荡和经济凋敝的背景下，大量沿海青年以“契约劳工”形式集中在南部沿海一带，由一艘艘轮船送抵南美诸国，其中也包括当时被西班牙统治的中美洲殖民地古巴。

翻开古巴华侨史，随着1847年6月第一批华工合计571人在古巴登陆以来，仅仅在六年当中，被运往到古巴的华工就达到135000多人。在1848年—1888年间，据统计至少有大约142000名中国人签署了在古巴工作的劳工契约。

然而，在运送途中，这些华工却是如牲口一样被密密麻麻地关押在贩运出洋的舱底里，不但不见天日，还要一路忍饥受饿，在海上饱尝连续几十天的风浪和颠簸，毒打与折磨，死亡率相当惊人。据古巴华侨史史料记载，在六年运送华工的船上，途中死亡逾15000人，换句话说，每十位前往古巴的华工当中就有一位在途中被生生折磨至死。贩卖劳工的船只也因此被称为“浮动地狱”。今天，在哈瓦那附近的格雷拉小镇仍有一座坟墓，专门安葬那些未抵达彼岸却抵达了黄泉的华工。

奴役之苦，命如草芥。早年的古巴华工大多来自珠三角等南部沿海地区，为了从补充古巴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中趟出一条生路，他们初抵埗时都在古巴的甘蔗园与黑人奴隶一起被充当苦力，饱受屈辱，牛马不如。

所幸的是，古巴气候炎热，是这些来自岭南一带的华工们较容易适应的环境。在八年劳工契约期满后，因为能充分发挥中国人骨子里吃苦耐劳的生存品格，大部分的华工都会自力更生，互相帮助，通过经营例如杂货、洗衣、水果铺或中餐厅等一类小本生意而在当地顺利立足，扎根，且逐渐成了有一定积蓄的“小资本家”。

然而，古巴国有化政策的施行改变了这些华侨涉足的商业和服务业，使私人工厂和商铺统统变成了国有化。随着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在古巴取得胜利，政府实施社会主义改革以后，外国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如此一来，就导致了包括古巴华侨在内的私营者，那些通过多年苦

心经营的小本生意人一时损失甚巨，且生存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处境十分艰难。

乱世浮生，人如蝼蚁，纷乱的时局迫使那些希望寻找出路的华人不得不含泪暂别家人，或拜别同乡兄弟，再次从第二故乡的土壤连根拔起，纷纷投奔美国以及其他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华人社会倏然解体，迅速陷进萎缩的形态，盛世景象因此戛然而止，俨然星散。而那些继续留守在古巴的华侨就不得不和当地时局的惊涛骇浪捆绑在一起，依靠帮政府打工和一份微薄的收入继续维持生计，或者投靠老人院，命如江河浮萍，随它浪荡沉浮。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古巴社会的施行和实践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大锅饭制度直接抵消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导致了古巴生产力的急速倒退，致使大片良田荒芜，经济萎缩，粮食供给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国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劳动者同样工作疲惰，生产效率无法提高，昔日经济的繁华气象被迅速击溃。

自 1962 年起，古巴就对基本生活用品和副食品均实行了限量供应，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大米、糖、肉类、食油、面包、鸡蛋、香皂、食盐、卫生纸等都在限制之列，人民的生活形态与半个世纪前凭票供应时期的中国民生极为相似，物质的紧张气氛渗进整个国家每一个细节，人民生活十分窘迫。

漂洋过海，人生如寄。早期离乡背井来到古巴的契约华工大多数识字不多，年龄大部分都在 20 到 30 岁之间，是清一色靠在甘蔗园出卖苦力谋生的人。初到异邦，他们人生地不熟，更不懂当地语言，为了更好地在他国生存下来，同乡之间常会相互照应，胜似兄弟。一旦摆脱了八年劳工的契约束缚，华工们更乐于聚集而居，凡事一起斟酌商酌，守望相助。世态浇漓，人情却并不凉薄，这种抱团的意识形态和血浓于水的乡里亲情在早期华人移民的身上尤为突出。

只是，经济形势的江河日下导致古巴侨民的生活越见拮据。且因国事不稳，连华侨汇款回国的额度限制也常有不同，变化朝夕可见。时局的动荡就这样日渐加深了侨民对安居乐业的向往，对重返家国的渴望。遥遥乡思海天长，他乡纵有金银满地、美味珍饶，在游子的心中，也无法取代父母之邦的一声呼唤，故乡大地的一口井水。何况此时的古巴已是繁华消散，茫茫黪黩，让大多数侨民更是心急重返故土，不必衣锦还乡，也无须荣归故里，只愿叶落归根，不至于客死他乡。

三

但乡愁之海，却不易横渡。

20 世纪 60 年代，华侨从古巴回中国可以搭乘从中国载货去古巴后返航的船只，因偶有位置空余，侨民可以轮侯申请获得。眼看古巴不是久留之地，华人社会人心惶惶，侨民离意既决，大都归心似箭。但由于申请回国者众，而 60 年代中后期，中古关系又陷入敏感状态，贸易往来缩减，来古载糖的货船也随之减少，让大部分侨民想尽办法回国亦无果。乡归遥遥无期，不少侨民不得不在等待中继续蹉跎岁月，一晃见白头。

体会过分离的悲痛，会更明白团圆之可贵。只是，关山相隔，相爱的手一旦松开，温度就容易流失。早年去古巴谋生的华工有部分是已婚男性，离乡前大都已有家室儿女。苦于家世贫素，不得不在青壮之年撇下亲情，远走他乡谋求出路。根据广东不少侨乡的记载，有的村子里海外人口比乡里的人口还多，百年前的乡村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属侨眷是常见之事。夫妻不能长相厮守，无法享受天伦之乐，多半的婚姻关系一辈子就仅靠每年的几封家书去艰难维系。

只是，天长地久有时尽。

横亘在时间之上的苍茫往往会生出一种强大的无力感，它不仅能阻隔肌肤之爱，还会无情地把所有的山盟海誓碾压得支离破碎。在道德上，尽管这些华工并非有抛妻弃子和背信大义的初衷，然而，身体的感受却是最诚实的。寂寂流年，思念成殇。寄居异乡的华工都是孤苦伶仃，随着环境的改变，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渐渐与当地女子互生情愫，且慢慢地形成了长久固定的关系，或者干脆在古巴另组家庭，以慰相思之苦。

现世安稳之年，每一个鲜活的青春都有各自华丽的演绎。然而抚今追昔，回望故乡大地，那些过去的侨妇，在她们身上，青春的况味却是一种咽泪装欢、心死梦碎的苦涩味。翻看她们青春的册页，与子偕臧初为人妇的封面刚刚揭开，扉页已是夫妻儿女的村头离别。到后面的插图，第一图当是明月盈亏下的独守空楼，第二图就是午夜梦回时的泪浸孤枕。戚戚相思，悠悠夜长。寂寞的苦雨敲打在她们的青春里，下得淅淅沥沥，无以复加。而最令人痛切心扉的是，不少离家的华工最后根本无法回去。“村头一别成诀别，空等一场到白头”，当是不少侨乡妇女鸳梦不续泪断琴弦的终结。

可见，侨乡的现世繁荣无不是以先辈骨肉分离的凄苦和伤痛、侨眷妇女不为人知的无奈与悲怆换来的。

离离乱世，历史千回百转，时局倏忽阴晴。政治的烽火狼烟隔断了两岸的灯火，荒谬同样无处不在。

美古两国一依带水，首都哈瓦与美国迈阿密隔海相望，最近之处，仅有 90 海里。在古巴革命后的动荡之年，尽管有大批古巴人不惜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在茫茫的加勒比海上展开生死赌博而成功逃离古巴，且抵达美国上岸一年后就能获得美国绿卡，然而，两国最终却因为政治纷争而走向了彻底断交。1961 年，美国政府突然无情地抛出禁令，坚决限制古裔美国人返回古巴探亲。禁令延续了半个世纪，直到 2009 年才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撤销。


光華報
Kwong Wah Po
Año de la Revolución Energética en Cuba.
EN LA DIRECCION NACIONAL DE CORREOS, TELEGRAFOS Y PRENSA.
主辦：古巴中華總會館
—PERMISO: 920024 / 321
中國國慶
大使向媒
【工人週報十月一
導】中國慶祝一九四
月一號，成立五十七
念，趙榮憲大使向媒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社會經濟進步，提
生活水準，國民經濟
五年增長到二千二百
元，平均每人七千元
以一九七三年相比，
百十六點五兆元，平
二十六元，他強調
國際竟爭中

古巴中华总会馆办的《光华报》

如此禁令，阻隔了半个世纪的亲情往来，自然而然地，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婚姻或家庭，乃至整个人生的轨迹。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原来生活在古巴的华人，在对岸古巴或许有着等待团聚的家眷。然而，岁月无情时是冷若冰霜长河，苦如落花丁零，就这样把无数家庭又生生拆开了将近五十年。

可见，大国之间的政治游戏，人世的风烟，投影在这些先侨的宿命里，是又一次的骨肉分离，伤感无央。

而留守在古巴的华人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望在逆境中把手握得更紧，大家紧紧抱团，并竭尽全力把昔日在古巴社团有过的盛世唐风保存下来。因为习惯聚居的缘故，古巴在华人社会昌盛之时就有过众多华侨组织，其中，周卓明书记所服务的中华总会馆始建于 1893 年，长期为华侨的各类慈善、福利、文化和教育事业开展服务。不仅在古巴，甚至在拉美国家当中它都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侨社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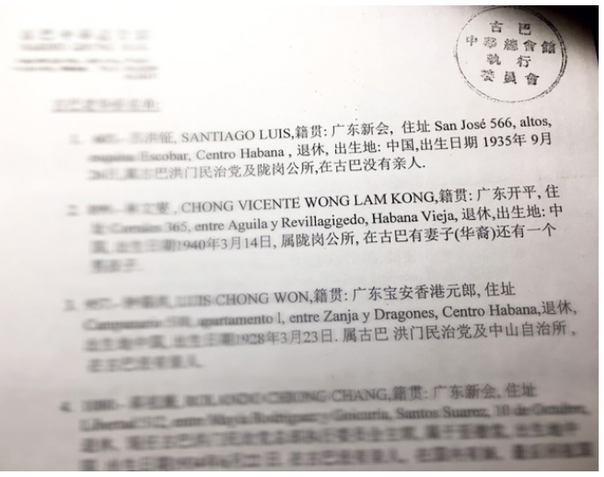
除了中华总会馆，古巴还有以政见组织的侨社例如古巴洪门民治党（第二大侨团）、古巴社

会主义同盟（第三大侨团），或按姓氏组成的侨团例如黄姓的黄江夏堂和李姓的李陇西公所等共计 13 个侨社。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旨，有的致力于维护华侨的公益福利事业和合法权益，有的注重中国文化在古巴的传承。其中大部分侨团靠经营的中餐馆作为社团运作的经济来源，以开展公益慈善服务，例如老人食堂，为经济困难的老华侨提供免费膳食，等等。

四

古巴曾有三家华文报业，分别为由商人办的《华文商报》、中国国民党办的《民生日报》及民治党办的《开明公报》，都是日报。还有一份是中华总会管发行的《光华报》。《光华报》创刊于 1928 年，原名叫《工农呼声报》，1944 年改名为《光华报》。1959 年前，《光华报》属于地下出版物，暗中发行，古巴革命后才变成公开。古巴革命后由于纸张和人才都缺乏，《开明公报》和《光华报》因此合并出版。1960 年，董必武先生曾亲自为其题写报名，以资鼓励。

《光华报》一直沿用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是古巴华人社会的一面镜子，古巴唐魂的历史缩影。曾经，在颠沛流离的风云岁月，它是华人华侨获得古巴社会以及境外资讯最重要的中文信息来源之一，也是古巴侨民与祖国最紧密相连的纽带。透过层层纸页，离家的游子可以沿着那条用汉字铺成的路返回梦里家国，恒常深情地回眸故乡大地，在惦念中与祖国和亲人的兴衰荣辱共同进退。



2016年古巴老华侨名单

然而，世事往往都不在人的掌握之内。随着古巴经济的倒退，华侨数量的急速退潮，而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后期之间的二十年里，古巴社会又存在过对华人华侨不同程度的歧视。在完全没有新移民补充的情况下，华人社会日渐消亡，致使《光华报》的经营也越发艰难。在早十年间，报社里尚有两位年事已高的老报人在苦苦支撑。即便在重重逆境中把日报改成了周报，再由周报改成每两三周才发行一次的华媒孤品，他们也临难不苟，为华侨尽心尽力服务到底，再艰难也不舍得把中华文化的火种轻易熄灭。

这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上一代华人对多舛命运努力抵抗的精神品质以及他们用生命的余光对龙族华魂的挽留之情。

只是，飞鸟尽了良弓藏。

随着最后一批留古高龄华侨的日渐减少，华语读者已是寥若星辰。而且，在华文报业再无年轻的新血接续，报社设备陈旧落后和经济紧张的重重困境包围下，《光华报》的老报业人也终于走到了年力日衰、惮耗心力的境地。2012 年，《光华报》再也无法延续，在老侨民的沉沉叹息里走到了尽头，为一段冗长的古巴华媒史写上了沉重的句号。

我曾在 2016 年回国探亲之际与同期从古巴回乡探亲的周卓明书记在他祖籍地斗门一聚。那一次，周会长就特别赠予我一份昔日的《光华报》以作收藏和纪念。这份报纸，年代虽然并不久远，但发黄的纸页之上却分明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内容。

比报纸的资历与内容更厚重和久远的，还有一份古巴在世老华侨的名单。周书记自 24 岁加入哈瓦那中华总会馆工作后，翻译、整理、记录和存档了大量的华侨资料，尽管后来年岁已高，但仍尽心尽力对古巴华侨的史料给予了最好的保护。他把这份自己亲手记录下的古巴华人华侨名单复印好后，亲自交予我，祈愿日后在祖籍地这里，依然会有民间的热心人士能为古巴老侨投入关注，送去慰藉。

这份名单时至今日依然完好地保留在我的书架里，上面整齐地罗列有整整 150 位老一辈华侨的名字。他们的祖籍地多在珠三角沿岸尤以四邑（台山、开平、新会、恩平）为主，大多是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华人，平均年龄大约在 70 岁左右，毫无疑问，他们在古巴成长和生活的几十年漫长岁月里，曾亲历与见证过父辈在那片土地上的扎根、融入、离去以及消逝。

我曾经在阿尔卑斯山下一个深冬的雨夜，烤着火，蓄着泪，一页一页把名单细致地浏览一遍。这些高龄华侨当中以男性单身、独身居多，因此，不少孤寡老华侨的名字最后皆有一句话特别标注着：“在古巴没有亲人。”



在古巴街头卖艺的音乐人

根据 2020 年年初中华总会馆（CasinoChungWah）的数据统计显示，眼下古巴华侨的记录数字已经继续缩减至 102 人。而后来我在翻阅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雷竞璇教授的书面记录时又发现，在 2010 年，他所记录的古巴华人社会尚有老华侨约 300 人。

在我走访古巴的 2015 年，在哈瓦那中国城清冷的大街上，《光华报》报社的大门经已尘封，一起尘封的，是古巴华侨一段百年沉浮的沧桑史。紧闭的大门内，一部使用了逾八十年的印刷老机器俨然是一位耄耋长者，在自己的风烛残年中独自回味往事。而那些曾经星星一般活跃闪烁的字模也静卧在报馆的空气里渐渐黯然、褪色、生锈。它



哈瓦那街头的流动果蔬摊贩，果蔬品种很有限



古巴的固定食品档摊，品种基本大同小异



小商贩在路上兜售类似黄皮的水果

们在沉寂中欲言又止，却依旧心事重重。

长街远望，人影茫茫。透过疏影横窗看红尘中的微凉夜色，刹那时光，同样是沧海桑田。随着古巴社会在半个世纪中的戏剧式巨变，昔日曾经承载过数万华人、车水马龙般的哈瓦那中国城，如今除了零零星星的几家中餐馆、华人店铺以及一些汉字牌匾外，其他的楼宇和建筑，要么长年大门深锁，要么早已人去楼空。它们一起辐辏成一泊繁华落尽的气象，如同华侨历史长河中一段行将干涸的支流，将被滤干最后的一滴眼泪。

乡音日渐式微，再无回响。华人后续无人，辉煌难现。那些盛世时有过的繁华，交织过的悲喜，在中国城空荡荡的街道上益发映衬出一种沧桑的厚重感，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耆宿，对自己毕生的苦难守口如瓶。

五

如今，古巴大地上的昔日唐风已经逐渐消散，行之将末。随着老一辈华人的离世或者离开，华人社区的持续凋零，这片土地上曾有过的灿烂华族文化正步向消亡。除了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尚有汉语教育，由中华总会馆开设的汉语班早已停办。尽管华人与古巴女性生下的混血儿据说曾高达几十万，但由于民族间的高度混合性已形成了古巴民族强大的民族特征和社会文化，这里的第二代华裔大多不谙汉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相当局限。

物是人非，容易触景生情。思古窥今，更是摧心伤怀。走在中国城的大街上，当黄江夏堂的第二代华人黄先生对我讲述起中国城的这段百年历史时，他突然指着路边的走道说，古巴长年天气炎热，记得小时候，每到傍晚时分，整条街上都会坐满纳凉的华人叔辈，跟眼前的境况完全不同。

那一刻，我感觉喉咙哽咽，心口有一股巨大的悲怆涌起。作为同样长年离乡背井的我，能深深体会到黄先生在这种对比背后所怀揣的深重感伤。尤其对于那些一路走来年岁已高的老侨来说，经历过繁华和衰颓，热闹和清冷，高潮和低谷，如此种种，一肚子的话真不知由何说起，跟谁去说。

时到今天，古巴政府依然遵循社会主义原则实施传统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大部分生产资料由国家控制，大部分劳动力也为国家所雇佣，整体经济状况依然滞后。由于经济结构相当简单，当遇到自然灾害的威胁或者国际环境的冲击时，经济情况依然相当脆弱。

尽管物价低廉，但国营商店里的货柜很空，商品奇缺，百货供应严重不足。哪怕近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略有改善，但市面上除了偶见流动的小贩零星散卖木瓜、杧果、香蕉、鳄梨等有限的农产品外，整个社会几乎看不到多少商品流通的气息，连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都十分紧张，人均月收入仅徘徊在二十美元左右的水平。

内忧外患，面对强国的要挟与凶恶的挑衅，铁骨铮铮的卡斯特罗曾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革命者般的坚毅与毫不退缩，带领古巴人民向世界展示：古巴尽管是个小国，但不能让自己的命运任人主宰。这种特殊的革命氛围造就了古巴人民刻苦乐观的民族性格，使他们拥有着面对困难绝不认输的精神。对于克服物质奇缺的困境，处处显示出惊人的勇气与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巴在卡斯特罗政府坚持人类尊严和福祉的崇高意念下，一直坚持全民免费教育和医疗免费的社会福利，这使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极高水平，实现了真正的全民免费医疗和全民免费教育。

虽然经济落后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古巴的教育水平不仅位居世界前列，拥有整体素质非常高的国民，其中高水准的绘画和音乐艺术家众多，欢动的音乐长年绵绵不绝地唱响于街头。而且，古巴的人均医生拥有量极高，古巴的多项医疗指标都比对岸的美国好，如预期寿命高于美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指标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即使外界对卡斯特罗的执政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作为古巴传奇般的领袖人物，不可否定的是，卡斯特罗是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决拥护者和践行者，他一生清廉，以身作则，坚决反对特权。借用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聪先生的话说，卡斯特罗的子女们不仅无权无势，而且默默无闻，就连卡斯特罗的妻子，不仅没有一官半职，没有各种头衔、光环，而且做人十分低调，极少抛头露面。

卡斯特罗对古巴人民自始至终怀有诚挚的爱，因为能为老百姓办实事，所以卡斯特罗政府深受古巴群众的拥护，人民对卡斯特罗充满了深厚、持久的情感。由此可见，古巴的经济尽管滞后于世界，但它的问题不是政府与民众间的矛盾，这种境况会不时让我陷入一种更深刻的思考，试图了解在理想信念和现实挑战的对垒夹缝中，究竟存不存在一条更易走和通达的道路。

美国对古巴实行长达几十年的封锁和制裁，严重制约了古巴在经济上的发展。最艰难还要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十年时间，由于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终结，让长期以出口蔗糖与苏联交换石油、食物、医药而赖以民生的古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强大的支柱，国际贸易进一步萎缩，国际盟国少得可怜。

1992 年美国又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这使古巴的石油进口量由每年的 1400 万吨减至 4 吨，以致全国交通运输顿时瘫痪、钢铁用尽、工厂关门，百业萧条，四面楚歌。另一方面，价值 7 亿 5 千万的食物和医药输入受阻，这场叫作“特殊时期”的经济危机令整个古巴迅速陷入粮食短缺的状态和饥民遍野的困境，几乎连畜牧业和农业也无法持续运作，粮食最缺乏的那些年月，在古巴一些地方，政府只能为每人每天配备一根香蕉和两片面包。由于石油能源的缺乏，市民为等一辆公交车要等上 3 个小时，致使大部分国民开始转用马匹或者自行车出行，或者干脆走路；没有石油产电，大多数家庭压根就没有电灯，于是常年把家门打开着，让光线得以透进屋内（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哪怕对于备有电器的家庭来说，一天内持续十多个小时断电也是常事，食物既无法冷藏，人也不能使用冷气和电风扇，让地处热带的古巴人民生活十分煎熬。

在如此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逐步而有限度地开放了市场，允许一些零售业和轻工业出现私营业者，以缓解食品、日用品和公共设施的严重短缺，并开放旅游业以增加国民收入，渡过难关。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开放固然为慕名前来古巴的观光客提供了可能性，但只要走出旅游热点，游客依然会不时遇见上前讨要糖果、浴液和旧衣服的普通百姓，会遇见因缺钱而长期失修的民居，会发现更多平民生活的真实细节。这跟半个世纪前在物阜民丰时期把对岸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称为乡下的古巴有着巨大的落差。

在这种大形势的乌云笼罩下，不难想象，留古华侨同样是生活艰苦，百事甚哀。尤其是生活在岛上已经大半辈子，经历了古巴社会的繁荣、变革、发展和衰退的华侨独身老人，更是让人担忧。周卓明书记曾告诉我，由中华总会馆为体恤老侨健康保健而开设的医疗室一直缺少基本的药品和医疗设备，难以为继，医疗室只能尽其所能为老侨们配备一点清凉油顶用。华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如酱油、味精等早已断货。

六

可幸世道的越见艰难，老侨民握着的手就越是不舍得松开。他们紧密相依彼此相助的历史图



朱颂瑜在中华总义山拜祭古巴先侨

景，在岁月洗礼与古巴社会的变革中留下了无数属于海外中华儿女的感人故事。时下，尽管留古华侨已日渐稀少，多个侨团的负责人也多是年过古稀之人，但他们依然竭尽余力为侨胞办好各种福利事业，勉力让侨民安度晚年。

比如岛上的第一个华人养老院“龙岗老人之家”，始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位于哈瓦那老城的腹地位置，附属于“龙岗总会所”。“龙岗老人之家”是老一辈华人的主要聚居会所，它的建立和存在，不仅为那些挣扎在自理边缘的华裔长者提供免费的食宿，还为年老体衰或者无后可依的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度晚年的环境，使鬓发成霜却从历史的烟云与身份的挣扎下获得和解的他们能一直聚居于此，说自己的母语，过自己的传统节日，继续安享中华文化的抚慰与根系亲情的温暖。

大凡举目无亲的老侨在古巴亡故，所属侨团甚至会自觉担起安葬之责，打点好其身后事以及通知其家属。这种由先侨遗传下来的社稷情怀和百姓情结也符合古巴社会的友爱传统，饱含着一种超越血缘和亲情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在日趋冷漠的物质社会中所无法抵达的情感高度，哪怕挂在焦墨一般的暗夜里，依然精灿夺目，自成漠漠星河。

故人已去，天涯咫尺。情之所至，超越生死。在我所拜访的哈瓦那中国城黄江夏堂里，时至今日，会所中的两幅墙上仍然悬挂着一众先侨的纪念头像以及会所在过往节日庆典时拍过的黑白相片。这些都是历史的善本珍籍，即使华族文化不再在此继续繁盛绽放，但盛世唐风已经明明从这片大地上吹拂而过，那些颤颤的回响至今仍然绵绵不绝，如风中的烛光，依旧在混沌的岁月里绽放光明。这让我们不仅在历史气势磅礴的冲刷中看到了真挚不渝的家国情感，还见到了遗民心志里头的沧桑与历史，怀念与哀思。

在古巴侨领的指引下，我带着沉郁的思绪离开了哈瓦那中国城，独自前往中华总义山去瞻仰历史，拜谒亡故的先侨。

中华总义山坐落在哈瓦那市区内，与安葬人数超过百万的哥伦布国家公墓紧紧相邻，分明已经是古巴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墓园的门前，“中华总义山”牌匾的下方，有一栋牌楼静静矗立，上面用苍劲的行书写有：“虚横马融笛 / 再读徐孺碑 / 英雄一去豪华尽；鹤嶠断来宾 / 桃源惊往客 / 云水长和岛屿青”的集句，古风流云，情极悲婉，读来既有天地苍茫的壮美，也有山河泣泪之哀思，如感念断肠人在天涯。



古巴哈瓦那中华总义山

落花成殇，情断异邦。或许，离家远走的时候这些故乡的游子都以为远方不过是一个梦想的驿站，一段青春的过程。而不想最后，岁月竟混合着伤感的记忆和苦难的经历一起长眠于此，成了自己生命的终点。故国载梦，梦里的家国情思，那个鱼米丰饶让人一生都梦魂缠绕的故乡呢？曾经以为她是那么熟悉那么贴近，而渺渺乡归路，山一程，水一程，原来竟是那么遥远，远得再也回不去了。

金黄的阳光洒在墓园里，给每个墓碑都镀上了一层金边，使临街的墓园在飞舞的光尘中更别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温柔，一种秋叶静羌般漠然的宁静。萋萋芳草之上，还有疏朗的凤凰树与天地默然对望，自成一景。它们开出和故乡珠江两岸一模一样的赤色凤凰花。花尽花飞，随风散落，让人错愕，让人恍惚。都说乡音是一剂良药，能用于抚平哀思，治疗乡愁。我就一一捡拾起这些红尽而落的凤凰花瓣，轻轻地铺在墓碑的汉字上，用沉默与先侨对语。

碑面上的汉字姓名和生卒年月有的笔画涣散，有的字迹漫漶，如同岁月的风尘，历史的刻度，从这里一一镌刻着古巴华侨史的沧桑进程。不过，人类精神世界最高的相互交融应该是不设界限，且不囿于地域、语言、宗教、血缘和民族而形成的。海明威一生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哈瓦那度过，他就曾经说：“我热爱这个国家，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一个使人感觉像家一样的地方，除了出生的故乡，就是命运归宿的地方。”

也许，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故乡的先侨与这片大地同样有着如此深深的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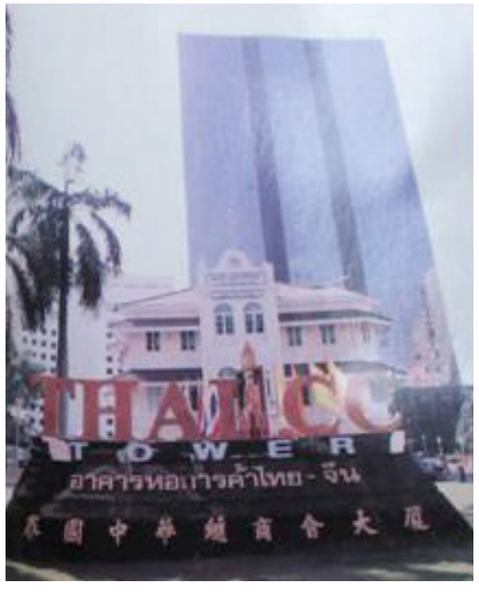
据说向日葵是太阳之子，阳光一旦从葵盘出发，就会远行，散落大地，涌向远方，再也无法返回太阳。面对墓园里浩瀚的碑群，原谅我无法在每一位故乡先侨的墓碑上都逐一敬上一支金黄的葵花。那就把哀思和祝福都别在襟上吧，请哈瓦那永恒的阳光渡我先侨在这块大地上的长眠，抚平他们大半生流寓他乡的悒怏，再许他们一个没有凄苦孤零和离散之苦的来生！

泰国中华总商会的创立简史

文 曾伟富（泰国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研究所）

大清王朝在公元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步入统治末期，内有太平天国运动裂土而治，外有西方列强觊觎环视强迫通商开埠，内忧外困的清王朝被迫放弃延续百余年的封疆禁海政策。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开启了大规模合法的海外迁徙，其中大部分海外迁徙的目的地是东南亚地区，这一段可歌可泣的迁徙历史被后世称为“下南洋”。虽然清王朝迫于经济的衰退以及对西方战败的巨额赔款，要利用海外华侨的侨汇作为缓解清王朝经济困境的重要部分，然而这些被迫抛妻弃子远走海外谋生的人却被封建保守的中原王朝儒家士大夫直陈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遣”，且称其为“海寇”“蛮夷”，若有海外华侨被害则定义为“孽由自作”。

但进入近代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居民被中央政府鼓励赴海外劳务，为了保护这些外出的劳工和当地的华侨，清政府在海外建立数十处领事馆。到 19 世纪晚期，在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扶持下，海外各华埠陆续筹备成立中华总商会，作为华侨之间相互联系和互保的最高民间组织。这一时期泰国华侨各届有识之士自发成立了“暹罗国中华商会俱乐部”。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华侨华人族群一样，华人很早就移居到泰国，这些早期华人主要来自中国的潮汕地区，也就是以前的潮州八邑地区，还有一些来自广东、福建等地区的闽南人和客家人。中国人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并不是政府支持的殖民行为，而是自发的民间活动。在此活动过程中既得不到所在国的保护，也得不到祖（籍）国的保护，为了谋求生存与自保，只能抱团取暖。旅泰各个族群人士分别在血缘、亲缘、业缘、神缘、文缘的基础上组建小社群，把本族群紧紧团结在一起。20 世纪前的泰国华人社会可按照语言体系分为五个华人语系，分别为广府人、闽南人、潮州人、客家人和海南人，这些以地缘组建的社团因为利益时常发生争执甚至械斗。为了平息各华人族群的内斗，平衡各方利益以及联络中国政府，作为泰国最高华人社团的泰国中华总商会应运而生。



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厦

笔者翻译了大量史料，尝试剖析泰国中华总商会从无到有，从一个小规模的社团发展到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的演变过程。

详见《暹罗国华人商会俱乐部选举委员会的报告》翻译件（原文为泰文，阿纳却克 • 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8 月 29 日为公元 1909 年）：

暹罗国华人商会俱乐部选举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申请选举商会委员会已经告知泰国政府，并且得到了泰国政府的同意；现在需要根据需要的人数选举各个岗位职责负责人，是为了更好地估算成立商会的具体时间；因此需要通知让每个会员知道，需要会员根据商会条例第六条：让多人参与选举，选出委员会主席 1 人，名誉主席 1 人，助理 10 人，委员会成员 40 人，一共 52 人。让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的成员选择管理员来管理商会。这次选举请允许我加以说明，任意品牌的负责人，在加入会员满一年后，应该参与到商会的管理事务中来。在委员会任期一年后，需要让会员重新选举新的负责人。但是福建、广府、海南、客家籍人，即使人数比较少，也有资格加入到委员会中，以便于更好地商业沟通。因此规定，让福建籍、广府籍、海南籍和客家籍会员加入委员会，各两人。如果某个籍会员没有选举得分，就让该籍加入按照选举得分最多的群体，以它为委员会成员。但是这个方法，先执行，直到该籍会员数增加到可以选举代表人员加入委员会中。委员会主席和名誉主席必须是很有声望的人。至于助理和委员会成员根据选举结果来担任，如果分数足够，就有资格胜任。现在附有以下会员的名字和品牌名称，为了让各位选举出合适的委员会成员。需要各位填写选举表格，选够人数。如果选举的人数不到规定要求的 52 人，根据实际情况，也应当记录下来。选举时间从中国农历宣统二年 7 月 18 号（阿纳却克 • 拉达那哥欣年 129 年 8 月 23 号）直到 8 月 2 号（9 月 5 号）截止。中国时间 3 号早上 4 点（9 月 6 号）公布选举结果，在规定的时间内需要各位成员递交已经填好的选举人员放在信封里，密封，并在信封上写上序号，签名和盖章。不要在表格中填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盖章，以便选举的公平性。

现在第一次登记的已报名的会员名字及品牌名称如下：

1. 郭辉杰　品牌　万户兴　（潮汕籍）
2. 贾金善　品牌　金信合　（潮汕籍）
3. 唐霍三　品牌　环理　（潮汕籍）
4. 洛斌甘　品牌　板红　（潮汕籍）
5. 沈卫兰　品牌　老板祥　（潮汕籍）
6. 高兰颠　品牌　欢理　（客家籍）
7. 唐延武　品牌　颁信仙　（潮汕籍）
8. 唐海秋　品牌　海先　（潮汕籍）
9. 梁先生　品牌　永恒　（潮汕籍）
10. 张栋凯　品牌　旺建兴　（潮汕籍）
11. 吴作南　品牌　光旺隆　（客家籍）
12. 棒依丙　品牌　光体隆　（广府籍）

等 410 人

以上的名单整理来自各个会员签到的签到表。对于有意向的会员但是没有来签到的，表示歉意，这次不能补签，这次以实际签到表为准。根据签到表的签到结果，除了有备注的户籍外，都是潮汕籍人。暹罗国华人商会在宣统二年 7 月 18 日报告这件事，相当于阿纳却克 • 拉达那哥欣年 129 年 8 月 22 日。

从资料上可以看到虽然潮汕籍华人在总商会占多数，但是总商会是以各个语系的华人族群平等为基础创立的，它代表了在泰国所有华人的利益。

成立泰国中华总商会的过程颇为曲折，法国领事馆在其中为了巩固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利益

以及在泰国对中国商人贸易中的优先权，意外地成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创立的外部重要推动力量。由于法国方面的多方干预以及对总商会设置章程过程中的各种限制性要求反而促成了泰国中华总商会的组织章程构建不断完善，并且使之成为同期最为先进和完善的海外中华总商会之一，详见法国驻暹罗国总领事馆写给泰国外交部信函翻译件（原文为英文）：

法兰西驻暹罗国总领事馆

部长先生：

您的精湛经验表明，这种合法化以及在法国保护下的中国商人在过去一直渴望使法国批发商与上述产品之间存在的商业联系更加紧密。

如果尚未成立中法商贸联谊会，这是因为当时的皇家政府发现，在当时的时代注定是不利的。当时，政治动乱在他的首都，是些华人中出现本身的问题，这可能导致被推翻的机构被视为一种非法的组织。

由于他们以一种冷静的精神赢得了我们中国人的欢迎，因此经常重申他们的要求，同时，从商业角度来看，剥夺他们如此有利的行动手段对贸易是不利的，因为法国的贸易同样如此作为中国贸易商对建立这样的商会感兴趣。我不能反对进一步拒绝我们的产品需求。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成功地建议耐心通知他们，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我才决定进行活动干预他们的错误，我应该已获得以下保证：

1. 中法商会在任何程度上和任何机构都不能承认一个纯粹的商业协会外，它随时都存在。

2. 王国政府说服他们这样做是有意的，并说服法国使馆在所有情况下都将看到对结社工人们的努力观察，这将考虑以仁慈的眼光来创建商会，他将根据《商法》建立该商会。

现在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将不会感到焦虑，在任何情况下，在一群商人的协助下，如果在无理由的情况下自愿在暹罗国法律的控制下自行逃离，就会给您造成极大的不便。该授权机构的责任是不要担心，通过反对那里的合法愿望，商人会试图建立秘密的协会，而所有的对侧交易都将变得更加困难。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同时也令人信服的是，皇家政府意识到，这一使团在同一个手法中看到了陌生人之间交往的严肃问题，我恳求你们做到这一点。谨检查有关方面提议按照法国《暹罗法》结社通过的法国中国商会的预计章程。

请部长先生接受我对您崇高敬意的保证。

意见

问题是在佛历 2457 年的减少下该协会是否有权注册。

在进行注册之前，法律要求提供有关协会名称的详细信息：

1. 协会的名称。

2. 它的对象。

3. 它的位置。

4. 协会名称，地址和管理人员的职业。以应对协会的铭牌。铭牌必须阐明：（1）协会的名称；（2）其对象；（3）办公室的所在地；（4）选举成员的方式以及成员离开协会的方式；（5）协会如何由负责人管理申请者必须在其提议的协会成员中的总裁或经理。

申请必须至少由三名成员签名。

在批准注册之前，有必要查看申请者的命令协会的铭牌是否将使协会能够开展及其活动现在是关于申请是否妥当的问题。在提交的文件中，没有正式的注册申请仅在文件的末尾进行注册登记，以列出协会的铭牌，这是不正确的。申请人必须是单独的文件，并且必须附有铭牌的三份副本。

申请必须至少由三名成员签名并且必须给所有面对法律第 8 条的要求。重要的是，协会的经理应经批准法律第 9 条提出动议，如果注册官员



第11届会长黄庆修先生
นายหวง ชิ่งซิว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1
Mr. Huang Qingxiu
the 11th President



第12届主席马立群先生
นายหม่า ลี่จุน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2
Mr. Ma Liqun
the 12th President



第13-14,18-19届主席
陈守明先生
นายเฉิน โส่วหมิง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3-14 และ 18-19
Mr. Chen Shouming
the 13th-14th,18th-19th President



第9届会长廖葆珊先生
นายเลี่ยว เป้าซาน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9
Mr.Liao Baoshan
the 9th President



第9届会长伍佐南先生
นายอู่ จั่วหนาน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9
Mr. Wu Zuonan
the 9th President



第10会长周焯辉先生
นายโจว จั่วฮุย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0
Mr. Zhou Zhuohui
the 10th President



新第11-20届主席
郑明如博士
ดร.บุญทรง ศรีเฟื่องฟุ้ง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1-20 ตามข้อกำหนดใหม่
Dr.Boonsong Srifuengfung
New 11-20th President



新第21-22届主席
吴宏丰博士
ดร. สุธี มีนชัยนันท์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21-22 ตามข้อกำหนดใหม่
Dr.Suthee Meanchainun
New 21-22th President



新第23-24届主席
刘锦庭先生
นายยง สุขสุดประเสริฐ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23-24 ตามข้อกำหนดใหม่
Mr.Yong Suksudprasert
New 23-24th President



第15-16届主席
蛟光炎先生
นายอี๋ กวงเหยียน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5-16
Mr. Yi Guangyan
the 15th-16th President



第16、20届主席
冯尔和先生
นายเฝิง เอ่อเหอ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6,20
Mr.Feng Erhe
the 16th,20th President



第19届主席
云竹亭先生
นายหยุน จู้ถิง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9
Mr. Yun Zhuting
The 19th President



第20届主席
林伯岐先生
นายหลิน ป๋อฉี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20
Mr.Lin Boqi
The 20th President



第17、20-27届主席
张兰臣先生
นายสหัส มหาคุณ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7 และ 20-27
Mr. Zhang Lanchen
The 17th,20th-27th President



第28-30、新1-10届主席
黄作明先生
นายอัมพร บูลภักดิ์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28-30 และ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 – 10
Mr. Huang Zuoming
The 28th-30th,New 1st -10th President



第1-3,6-8届会长高学修先生
นายเกา เสวียซิว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1-3 และ 6-8
Mr. Gao Xuexiu,
the 1st-3rd,6th-8th President



第4届会长陈抡魁先生
นายเฉิน ลุนขุย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4
Mr.Chen Lunkui
the 4th President



第5届会长陈澄波先生
นายเฉิน เฉิงป๋า
ประธานสมัยที่ 5
Mr. Chen Chenbo
the 5th President

泰国中国总商会第一届至第二十四届会长（主席）名录

认为他拒绝了注册，则可以拒绝注册，这些人不适合管理协会。

接下来，必须考虑协会的铭牌是否合法。

1. 给出协会的名称。

2. 声称协会的目标是法国和法国殖民地与暹罗之间的商业关系的发展，如第 1 至第 3 节所述，这不违反法律。

但是，我必须反对这些铭牌的法律第 4 条，标题为：违反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职能。该节的作用是建立结社协会。应将其作为仲裁的主题，而将其他事项（例如犯罪）作为仲裁的主题，它们不是可复合的含义，因此赋予结社权力解决其成员之间的分歧的一般权力可能会导致该王国设立的法院的权力被篡夺。

而且，当成员在协会成员的铭牌中看到像这样的部分时，他会感到有义务在协会之前有所作为，一旦他提交协会成员的决定以供其决定，即使决定不符合他的意见，他也有义务遵守其业务方式进行调查。公共政策应赋予个人自由诉诸法院的权利，以及任何可能与该权利相联系的权利。

3. 铭牌必须说明协会办公室的位置，这是想要的。

4. 选举成员和作出解释是合法的。

5. 铭牌标题下第 5 条规定了协会的管理权，该法令第 24 条第二条规定，如果将其放下，则应在事件发生时解散该铭牌。

铭牌第 9 条在“工作”一词用英文的标题下精简版说则 F.C.C.C.S.S. 应予解散，如果法国使馆认为有必要撤回其赞助，则应予解散，因为这是对原始法国草案的翻译，效果看似有效。但是，提交给注册的相关翻译如下。该翻译说，该协会只有在法国使馆撤回其庇护权不正确并搁置时才能解散，很容易猜出人的其他意外情况将需要解散，例如也可以在有效的理由下通过命令或暹罗政府破产。也注意到在暹罗语翻译中，patronage 一词是反义词。我同意 Mr. Paya Boriraks Chaturong 的观点，认为这是错误的，并且是该词的正确翻译。在同一节（例如标题下的工作）出现如下。在所有解散 F.C.C.C.S.S 的情况下，资金应转移出去。这是一件遗漏，必须在批准注册前填写（见法律第 29 条和第 30 条）。

泰国政府对泰国华商要求成立的总商会的请求一直采取比较保守的政策，即担心华商成立总商会的目的不单纯，又质疑泰国华商对泰王国的忠诚度。期间泰王和外交部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对此事的态度相对谨慎，详见泰王和各部门之间的来往信件翻译件（原文为泰文）：

外交部

阿纳却可 • 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8 月 29 日

编号：4563 文件

复印件编号：39/872

写于：佩布里府皇宫　阿纳却可 • 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8 月 25 日

写给：昭帕亚勇玛拉公爵

我已收到这个月 24 号呈递的编号为 33/5445 号信件，关于中国人想要成立商会的事情。我认为，想要成立商会的目的已经很明显，就是只是关于商业活动。但是据我所知，中国人的商会不仅指的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还包括政治活动。这次中国人想要申请成立商会，我不知道成立商会的法律法规是什么；之前有中国人来申请成立商会，我没有批准；所以这次的申请，我不确定意图是直接的关于商业的还是有别的意图。阁隆栾丹荣公爵怀疑这次的申请请求是个人意愿，是为了个人的某些利益，从而着急地来申请。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有可能作为次要的目的发生在这次的申请中。但是想要成立商会的事情，之前就存在了。不管怎样，昭帕亚勇玛拉公爵你去找相关的资料，了解清楚事情的真相。不管怎样，关于俱乐部的注册还是不注册的问题，涉及法律，是法律程序中重要的部分；需要参考巴杜先生起草的法律条款。我认为应该让阁隆栾贴哇翁公爵、扎隆先生和昭帕亚勇玛拉公爵在一起商讨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需要歪萨丁先生参与，你们可以去邀请他参与商讨。商讨以后，如果有什么结果和新的内容再通知我，阁隆栾纳涅公爵和阁隆栾丹荣公爵现在和我在一起，这样方便大家一起商讨做决定。

签名：萨亚闽达

外交部

阿纳却可 • 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8 月 29 日

编号：24/5660

萨拉瓦甘纳空班内政部

阿纳却可 • 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8 月 29 日

尊敬的外交部部长阁隆栾贴哇翁公爵，

根据我收到的国王的信件，编号：39/872 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8 月 25 日，国王信件复印件已附在本信件的附件部分。

中国和法国商人都在请求成立商会。因此我已经让帕拉亚音嗒拉替波低 • 斯哈拉隆蒙阁下带和该件事相关的复印件去给您批阅了，为了得到您慎重考虑后的建议。国王认为要成立暹罗国华人商会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没有触犯法律，但是没必要注册。当这个商会成立后，如果行为规范触犯了法律，同样会受到法律相关的法律惩罚。

如下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法规中的第二条例中“商号”和“作坊”没有涉及以下定义中的各种类型的“公司”定义，

1. 公司的成立只为了商业活动的进行。

2. 任意公司和任意商号，只要得到国王的允许，并且符合法律程序要求都可以成立。



泰国中华总商会成立八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3. 任意公司和任意商号或是任意股东团体，加入人员不超过 10 人，需要依据法律的要求来组织和举行各种活动。参与到任意公司和任意商号或是任意股东团体的人，没必要发誓要保守公司或者商号或者股东团体的隐私；最后，公司、商号或者股东团体，将没有任何隐私或做出违法的事情。

因此认为，中国和法国商人申请成立这样的商会，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应该可以允许成立，但是没必要注册。成立了以后，如果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这些信息已经让国王知道了。国王知道后，认为这样的想法正确，比直接请求拥有更好的权利。

4 月 28 日的时候，法国大使馆来找我，我告诉法国大使馆我的观点，与此之前，有些法国和中国商人，已经成立了这样的商会。在曼谷，法律并没有阻止这样的事情。除了需要小心不要出现触犯法律的行为，像俱乐部群体一样就好。

当我回复了法国大使馆以后，我回来想到说，需要让之前也递交过申请的这个人也知道这样的要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来申请的法国大使馆及随员会去向中国人炫耀说，他们来申请很久了但是没成功。他们在法国大使馆的权利的照顾下，后来申请都能得到批准。这样会导致信息

的互相传达，引起不良后果。因此经常打电话让中国人来解释真相，如果他们想要成立商会，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小心不要触犯法律。中国人知道消息以后，回去商讨情况。

今年 8 月 22 号，中国人王华新拿着写有暹罗中华商会的名义的信件，信件内容是汇报选举该商会委员会会议的间；我拿着这个信件内容去给国王御览，国王回复说，让我来与您商讨。我已经把该俱乐部送到纳空班内政部的汇报书的复印件和这封信件一起给您了，希望您给予考虑。这件事我希望能尽快得到您的回复，以便于我呈报国王。

签名：帕亚勇玛拉

外交部

阿纳却可·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8 月 31 号

编号：4632 号文件

萨拉瓦甘纳空班

阿纳却可·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8 月 31 号

尊敬的至高无上的外交部部长：

我收到了尊敬的国王亲笔回复的信件，关于中国人申请成立商会的事情。我想召集扎隆阁下、歪斯丁嘎先生、帕拉亚音嗒拉替波低阁下和您一起在外交部开会，时间是下个月 1 号也就是明天。因此，请问您什么时间方便参加会议呢？我才好根据您的时间来约其他人一起参加会议。

签名：勇玛拉

外交部

阿纳却可·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9 月 4 号

编号：4720 文件

阿纳却可 . 拉达那哥欣王朝 129 年 9 月 3 号

尊敬的昭帕亚勇玛拉公爵，

您给的您起草的信件我读了以后，觉得内容详细，需求表达也明确，信中要求没有会造成损失的地方，应该给予批准，修改过的文件和该信件一起寄回给你。

签名：贴哇翁萨洛布拉甘

历经各种波折之后，公元 1910 年 9 月，泰国中华总商会推选出潮州巨贾高学修为总商会首届会长（之后蝉联第二届及第三届会长）、陈伦魁为副会长。同月泰国中华总商会致电南洋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宣告泰国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同时托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转北京清政府总理衙门批准备案。1911 年 3 月 27 日，清政府总理衙门正式批准设立泰国中华总商会。

百余年来，“团结侨众，互相协助，为广大华人华侨谋取福祉，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成为泰国中华总商会的最高宗旨。泰国中华总商会自创立之日起，便在泰华社会担负着不可替代的社会职能。在泰中两国尚未建交时，两国的许多重大问题，大都通过泰国中华总商会协助处理，担负着使领馆的部分职能，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泰中两国建交后，泰国中华总商会在服务会员、构建社会和谐、繁荣国家经济、深化泰中友谊、社会慈善公益、培养华文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深获泰中两国政府之器重，在泰国华人界享有崇高地位。每逢泰中两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商会皆率先回应，凭着在泰华社会的重要地位，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同时，泰国中华总商会是世界华商大会三大召集人组织之一，为推动世界华商团结合作和健康发展，竭诚奉献力量。

时至今日，泰国中华总商会规模庞大，会员众多，涉及泰国工商界的各个领域，为泰中的经贸做出了非凡的贡献。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泰国中华总商会在泰华社会中的作用将更加重要，同时，它贯彻服务侨众、效力国家、促进经济繁荣、增进泰中友谊的大政方针，永不改变。

寻找美国筑路华工的足迹

文 李柏达（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2020 年 5 月 10 日是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与中央太平洋铁路接轨 151 周年的纪念日。早期铁路华工留下的文物极其罕见。十数年前，耄耋之年的父亲将一个铁皮箱交给我，说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要好好地保管它。近年来，我对祖辈的历史颇感兴趣，打开那个尘封锈黑的铁皮箱，发现里面有新宁铁路股份簿、清光绪三十三年金山正埠李陇西堂百子会执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钱局光绪元宝成元拾元和账簿等文物。这批文物，经过多年反复研究，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也找到了与太平洋铁路相关的史料。

这是一本清光绪六年高祖父手迹《李俊衍书柬》账簿，记录了他当年在旧金山的足迹：

光绪五六年时秀广叔做烟行问取金钱艮（银）拾大元。

二十六年十月廿四日代付归贰佰元，除来另代支长二元四毛五。

二共欠金钱艮（银）一十二元四毛五。照回唐时价四五 /[1]，伸七二艮（银）二十七元。

二十九年兆鸿数

四月初五日代付归七二艮（银）拾元，四二二五 /，伸金艮（银）四元二毛五，另信资艮（银）一毛。共支得艮（银）四元三毛五。

十一月廿七日付来艮（银）贰元，谓做猪会，时不及，故转代付，时十二月十八日代付归艮（银）五元，交煜衍收妥，时四四七五 /，伸金艮（银）二元二毛五。除支长艮（银）二毛五。

二共尚欠艮银四元六毛，四五 /, 伸七二艮（银）一十元二毛五。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林举邦兄欠福食美金艮（银）六元二，面结。

同日李锦年兄欠福食美金二元六角五，亦面算。

三十二年李长华四月初二借美金艮（银）叁拾大元，至五月十四日又借美金拾大元。又至五

① 银元与美元的汇率，即 1 银元 =0.45 美元，下同。

月十五日借美金艮（银）贰拾大元。

以上共该美金艮（银）陆拾大元，至回唐时价汇四五八，伸七二艮（银）兑壹佰叁拾叁元叁毛，每月每元壹分算，此系港纸艮（银），应收。

宣统贰（二）年十月廿二日清广叔欠过关金艮（银）七十八元九毛五。伸回唐时价四五八，伸港纸艮（银）一百七十五元五毛。此系应收港纸艮（银）。是五月初四日收回双毫子艮（银）一百八十五元。收完。

云宏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到巴梳埠

三十二年正月十四付巴梳埠艮（银）十元，又闰四月月初六日付艮（银）四十元，闰四月十七日付过亚湾城交美金壹佰元，同日又付巴梳埠艮（银）三十五元。

以上合共付艮（银）一百八十五元金钱银。

新宁铁路股份部：

宁字第万五千贰百壹拾肆号，李俊衍认股肆拾份贰佰大元。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广婶借艮（银）贰十元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旺广婶借艮（银）卅元，三年三月初六日旺广婶又借艮（银）贰十元。

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来荣母借十元，东昌十元，三西婶十元。

宣统三年二月廿八日来荣母又借二元。

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佐衍借艮（银）壹佰元。

以上资料可知，清光绪五年至宣统二年之间，我的高祖父李俊衍在美国借给旅外兄弟亲朋的钱共 164.85 美元。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付给云宏去古巴的费用 185 美元。宣统元年购买新宁铁路股份 200 元，折 90 美元。另外宣统年间回乡建了一间新屋，时值约 500 元，折 225 美元。宣统二年到三年间，他在家乡借给兄弟亲友的钱有 202 元，折 90.9 美元，辛亥年购买了一张“广东钱局光绪元宝成元拾元”，从 1880 年至 1911 年 30 年间，高祖父积累了 760.4 美元，在那个年代，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那么，高祖父为何积累了那么多的钱呢?

小时候，我父亲曾讲过祖辈去金山修铁路，但没有详细的资料。综合上述资料以及父亲生前的留言，可以大概描绘出高祖父去金山的经过：

高祖父李俊衍，名福英，是台山李氏栋祖伯公廿三世孙，生于清道光廿九年（1849）己酉九月廿二日，籍贯广东新宁县温边村。其父亲李业广是一位农民，生有四子，分别为俊衍、佐衍、杰衍、信衍。清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李业广祖居新宁县城东的温边村，该村前不近海，后无靠山，发展农业的空间受到严重的制约。虽说是多子多福，但对于地少屋少人多的农民来说，也带来了不少的烦恼。李业广眼看四个儿子一天天地长大，常为儿子们的未来所困扰。



高祖父李俊衍像（民国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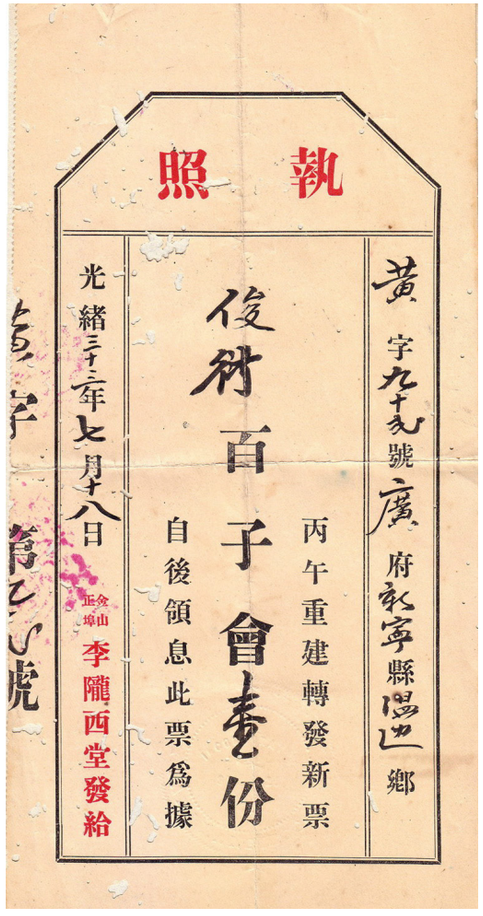
1865 年，在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工头、台山李氏宗亲李天沛回乡招募华工去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正在犯愁的李业广听到消息后喜出望外，决定让 16 岁的大儿子跟随其五叔父秀广一起去美国掘金，期望儿子闯出一片新天地。1869 年 5 月 10 日，被誉为世界铁路史上一大奇迹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动脉建成。太平洋铁路建成后，俊衍在美国留下来，将积累多年的血汗之钱在旧金山唐人街开了一间杂货店。1879 年到 1880 年间，五叔父秀广见侄子的生意不错，也萌生了做小商贩的念头，但资金不足，于是向侄子借了 10 美元，在旧金山唐人街开办了一间烟行。

经过在美国 15 年的奋斗，俊衍积攒了一笔小钱。1880 年，他年届 31 岁，首次从美国回乡省亲，并于当年年底与高祖母雷氏举行婚礼。1881 年 10 月 17 日，高祖父喜得长子云宏，随后返回美国；1885 年至 1886 年间他第二次回乡省亲，1886 年又生下了二儿子云宽，此后又返回美国；此后又多次返回唐山，诞下了三子云昌和四子云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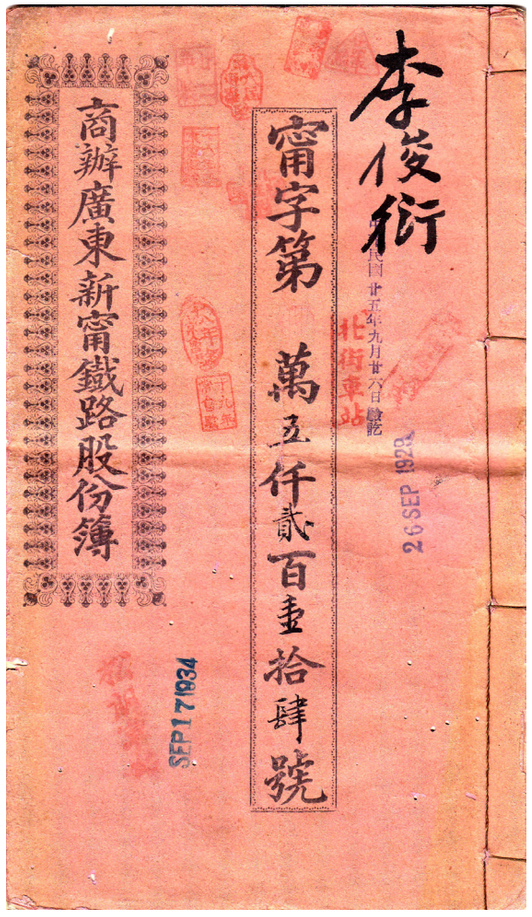
1896 年（清光绪廿二年）四月十六日，林



华工在美国修太平洋铁路



清光绪三十三年金山正埠李陇西堂百子会执照



李俊衍购买新宁铁路股份簿

举邦兄弟在俊衍的小店欠下伙食银 6.2 美元。同日李锦年兄也在俊衍小店欠下伙食银 2.65 美元。

1900 年（清光绪廿六年）十月廿四日，五叔秀广委托俊衍代寄银信 200 大元回乡。

1903 年（清光绪廿九年）四月初五日，兆鸿委托俊衍代寄信银 10 元，用去美金 4.25 元，另付寄信邮资 1 毛；同年十一月廿七日，兆鸿交来美金 2 元，用来寄回唐山做猪肉会经费，因不能及时汇款，俊衍于十二月十八日将此笔银转寄给堂兄弟煜衍收，用去美金 2.25 元，超支 0.25 美元。

20 世纪初，正是美国排华高峰期，俊衍不是美国土生公民，无法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办理移民去美国。从 1880 年以后的 25 年间，他多次来往中国、美国之间，自己也从美国掘到第一桶金，眼看几个儿子一天天地长大，长子云宏已经成家立室，而且又生了两个孙子（礽润、维亮），但他在家乡的物业只有半间祖屋，怎么办？1902 年，与美国相邻的古巴独立，中古两国随即建立了外交关系，古巴经济在美国的控制下迅速发展，城乡经济持续繁荣，就业机会很多，古巴成为美洲华侨华人聚集的中心。在去美国之路行不通的情况下，选择将儿子移民古巴算是当年的上策了。1905 年年末至 1906 年年初，高祖父为长子云宏办理移民古巴商务护照，共花了 185 美元。

1906 年 4 月 18 日清晨 5 时 12 分，美国旧金山发生 8.3 级大地震，随后又出现了人为的大火灾，一条条街道和一片片居民区房屋被大火吞噬，全市 520 个街区的近 3 万栋楼房化为灰烬。拥有 40 万人口的旧金山，丧失 3000 多条生命，25 万人无家可归。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自然灾难之一。三生有幸，俊衍平安无事，但海外李氏宗亲活动的会所——“金山正埠李陇西堂”倒塌了，旅美李氏宗亲发动海外华侨重建李陇西堂，俊衍当年以购买“百子会”的形式入股一份，为重建金山大埠李陇西堂出力。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八日，金山正埠李陇西堂发给李俊衍“金山正埠李陇西堂百子会”执照一份。

1909 年，俊衍在美国旧金山。此时，由旅美华侨陈宜禧先生倡办的新宁铁路建设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陈宜禧先生提出“不用洋人，不招洋股，不借洋债”及“勉图公益，振兴利权”等口号，激发了海外华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正因为俊衍早年去美国修建太平洋铁路缔结的铁道情结，他决定购买新宁铁路股份 40 股共 200 大元（相当于 90 美元），支援家乡建设铁路。

1910 年（清宣统二年）十月廿二日，温边村宗亲李清广叔父去金山，俊衍为他代办过关手续，代付过关费用 78.95 美元。这一年，高祖父俊衍 61 岁，他在美国拼搏了 45 年，金银就手，



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钱局光绪元宝成元拾元

于是告老还乡，与高祖母雷氏及儿子、孙子等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回乡后在温边村建了一间新屋，分给云宽、云昌、云宾各一份，因云昌早年夭折，后由云宾的儿子国份过继，而长子云宏一家则住在温边村的半间祖屋。

辛亥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起义军政府在准备印制发行新纸币之前，在部分广东官银局 “光绪元宝成元” 纸币上加盖关防，票背加盖“粤都督经验盖印之图章”“粤省军政府财政部经验”“此票改作毫子银用两不贴水”三枚印章，暂时流通，以满足金融商业的需要。俊衍长期旅居海外，目睹腐败的满清政府给国人带来的灾难，为了表示自己对革命的支持，决定购买一张 10 元的成元票。此票他舍不得使用，一直珍藏在家里，成为传家宝。据清光绪三十一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告谕：“照得粤省市面银钱缺乏，现饬司道借拨库款壹百万元设立官银钱局，通行官银圆票，使其与现银相济为用。”仿照湖北省发行银圆票，共分三版，其中第三版银圆票是委托日本帝国政府印刷局印制的，该票正面左右两边框内直书“成元”，右下角横书“通用成元出入一律”，此票就是在钱币收藏界一直享有盛誉的广东“成元票”，又叫“大元”。广东省独立后，原有的广东钱局银圆票由都督胡汉民发出通告，照常使用。此票流通于清代、民国时期，又经广东革命起义军政府加盖作临时代用货币流通使用，存世量稀少，为广东纸币中最为珍贵的品种之一。

此后，俊衍又为二子云宽娶了媳妇。1915 年，他又为二子云宽借钱办理移民古巴。后来又敦促云宏将四子云宾办理移民古巴。1920 年庚申三月初九，高祖父李俊衍在家乡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 71 岁。一代太平洋铁路的开拓者，在海外拼搏近半个世纪后，终于魂归天国，实现了老一辈华侨落叶归根的夙愿。

像我高祖父一样，许多台山华侨在美国漂泊，虽然积攒下一点小钱，但毕竟并不富有，在那个“揾食”艰难的清朝末年，他毅然拿出大笔金银购买新宁铁路的股份，何故？

翻开以下这份银信，或者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这是一封辛亥年三月廿五日台山华侨梁芳联寄给旅美华侨梁芳荣的银信，信内写道：

芳荣尊兄大人如见，敬禀者……现下闻得汝做车路股份银 500 元，云云，如此尽谅（量），且车路股份之银，犹如捐款一样，日久或者有好处不定也，现下光景不甚好也，且我唐人每凡做大事，不照则例宜行……

梁芳荣当时旅居美国旧金山，芳联对他说买铁路股份“犹如捐款一样”，近期内前景不看好，他依然购买新宁铁路股份 100 股 500 元。我的高祖父当时购买 40 股 200 元，都抱有同样的心态。这是因为，早期旅美华侨，多数人参与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目睹太平洋铁路建成后，美国东西两岸连成一体，经济发展非常快，成为世界经济一大强国。而当时的中国，正是千疮百孔，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时期，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家乡也有一条铁路，家乡的发展就会更快，祖国也会强大起来。特别是 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后，华侨华人在美国没有公平的地位，寄人篱下，长期受西人排斥和欺凌，家乡才是温暖的家园，根的情结特别重，当他们听说家乡要建铁路后，根本不考虑投资入股是否有回报，就像捐款支持家乡建设一样，积极购买铁路股份。因此，陈宜禧能在短短的几年内，筹集 360 万多元兴建新宁铁路第一期工程，1909 年三月初一，公益到斗山全线通车；此后又兴建第二期工程公益至北街段、第三期工程台城至白沙线，1920 年 3 月 20 日白沙支线通车，铁路全线 133 公里，总投资 739 多万元。

新宁铁路建成通车，是以陈宜禧为代表的一代铁路华工践行强国之梦的体现，是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精神的体现。铁路华工的足迹，透视着海外华侨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铭记。

近代侨批行业运营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文 杨雅丽（南京师范大学）

近代以来侨批行业沿着“水客—批局”的发展脉络，创新收付方式、投递过程，构建体系化的侨批运营网络。随着侨批网络运营的建立和侨批业经营群体的发展壮大，侨批公会应运而生，促进侨批管理的制度化。

一、早期侨批业运营系统化的形成和发展

侨批业是历史的产物，是基于海外华侨市场需求产生的服务产业。在海外谋生的华侨往往托熟人乡亲于返国之便带些银钱回家，有些人因其有利可图，便以汇寄银钱为职业。他们在为旅外侨商寄钱回国的同时赚取手续费，并把国货运往南洋去卖，或把南洋土货运回国内销售，这些人被称为“水客”或者“南洋客”。这种递带既具有服务性质又带有异地贸易的商业性。水客业是侨批业发展的萌芽阶段。

水客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运行机制。早期水客主要依靠信誉为担保来进行侨批运送，依靠熟人介绍居多。他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大多依靠小店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为乡亲服务。由于侨批运送有利可图，水客行业逐渐兴旺，随着商业竞争的加剧，水客或深入到工矿、企业等地去招揽生意，或贴广告约定在某固定店铺收取侨批。为了方便侨批的运送及记账，水客还对所携带的侨批进行分类，在每枚实寄封上编号登记。后来由于侨批数量的增加，需要对侨批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便将运输航船作为区分“批次”的坐标，于是就产生了“帮号”。为了方便运送，有部分水客还制作了相关的地图。水客采取“收批—承转—解付”这种从头到尾的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因而周期较长，次数较少。在年节时期回来所带侨批钱物较多，叫“走大帮”，平时侨批较少，称为“走小帮”。有些业务较多的水客还在国内搭班请同伙帮忙解送侨批，潮人称这种搭伙解批者为“吃淡水”，称过洋来回的水客为“溜粗水”。

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与华侨数量的不断增多，这种周期长、次数少的传递方式已经适应不了日益增加的侨批业务的需求。一些富裕的水客、华商进而组织民信局经营侨批的递送业务，将水客的运输方式系统化，主要是在侨居地设置商栈收取侨批，由水客带回国，交给国内相关的商栈或民营信局派专人分发。而后产生了批信局（批馆），将之前的“收—递—发”的模式转换为“收—发”，成为专为出国华侨与国内闽粤一带“侨乡”之间办理通信、汇款的特种民信局。



侨批

而递送环节则由专门机构（部门）负责，同时改进之前的“帮号”制度，把每枚实寄封编的“〇字×帮××号”和收寄批人的姓名、地址、汇款数目一一记载，然后进行交接，大大提高侨批的递送效率，到后来发展成为“总包制”。侨批局开设之初以兼营为主，基本保持着水客的经营模式。侨批局以办理侨汇为主，附带办理信函业务。20 世纪上半叶，批信局迅猛发展，逐渐形成更为完整的系统运行网络，具有较为完备的组织制度。

首先是收付方式的变化，之前一般是通过南洋华侨商行等来收汇，再委托国内民信局、侨栈等代收，但是兼营仅限于城郊和大乡镇，偏远及侨眷散居之地仍须层层转委，稽延时日，加上兼营信差常向侨眷任意勒索小费，致使侨眷不满，因而南洋收汇局应运而生，在国内设承转局及介付机构，雇请固定信差，制定一整套制度，使批信局渐趋正规和专业化，与此同时大清邮局的开办和万国联邮提供了有利条件。1932 年，邮政总局规定厦门民营信局经营国外信件者不得兼收国内信件的指令，更促进了兼营信局向专营信局的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批信业告别了水客时代，向着专业化方向迈进。

其次，在具体投递过程上，也进行了规范化，分为投递信款、总包邮寄、分发信款、回信寄回南洋四个过程。

再者，整个侨批运营网络系统化、制度化，从外部形成了三盘制相交叉的侨批运营网络——直接在海外收汇独立经营的批信局（头盘局）、接受海外各信局委托办理传驳内地信款的批信局（二盘局）、专营派送内地信款的批信局（三盘局）。就内部说，每一局里的职工分工明确，经理、会计、走街、门市、工人、厨夫等各司其职，明确汇价及收解手续、职工福利等规章制度。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当时以中国为据点在南洋广泛设立分店的只有天一、悦仁、再和成三家侨批局，而以东南亚为据点的侨批局大部分是代理合作关系。因此，侨批局经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联号”，形成层层委托代理的运营网络制度。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委托局可以有效迅捷地将侨批顺利送达，降低了设分局增加的成本。由此可见，侨批局的经营网络自身有了进化，“分工、合作”等理念深入到了侨批的输送中。

二、侨批管理制度化——侨批公会的产生和发展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制度化的过程需要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制定规范和建立机构。

侨批局开办的经营宗旨，现在能看到的较早登于新加坡 1887 年《叻报》的广惠肇文信局创设时的告白，开头是这样写的：“窃以关山难越，谁传天雁之书：萍梗徒飘，空系河鱼之帛。矧复乡园廖廓，道路纷歧。纵驿使不惮传口，而洪乔几虞误事。又况锱铢匪易，付托良艰。此本号所以创兴，庶游子得而方便者也。”由于路途艰险、地理环境复杂，且常常遇到盗匪，因此创办广惠肇文信局，使在外游子与家乡方便联系。

侨批网络建立依靠社会关系为媒介进行延伸，普遍建立在传统社会的乡族关系上，根据《潮州志》，“批业在外洋采代收方法，或专顾碧伴——登门收寄，抵国内后，又有熟习可靠批脚逐户按址送交，即收取回批寄返外洋，仍一一登门交还，减少华侨为寄款而虚耗工作时间。”可见，侨批局此时已经做到了上门服务。另外，批局为吸引顾客常常采用定期汇款或者预先汇款，这些行为都需要批局与华侨间相互信任保证。这说明，建立在乡族关系上的侨批局已经初步显示出其服务客户的经营网络，并推行相关政





位于福建漳州龙海流传村的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策。乡族关系限制了侨批局的服务范围，使其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尽管每一家侨批局的服务范围有限，但是数以千计的侨批局使其形成了互相交织的侨批网络。

但是侨批网络的有效运作不能仅仅依靠侨批局间的松散联系，而是需要制度化保障。侨批网络的制度化是指侨批网络的构成单位为维护侨批经营网络的有效运转，制订某种规范并逐渐遵从这种规范进行程序化运作的过程，侨批组织的成立是侨批网络制度化的重要体现。侨批网络的制度化对侨批网络内部的整合与协调，以及对外的维护上有着重要意义。

侨批工会成立的首要目的是保护侨批业务的安全，促进其经营网络内部的和谐统一。由于国内侨眷多居于偏僻之所，分发批款时常遇到抢劫等问题，“有需集合同业力量以维护，故清光绪中期汕头已有南侨批业公所成立”。到 1926 年该公所改为汕头华侨批业公会，1931 年又改为汕头市侨批同业公会。汕头市侨批同业公会的章程第一章说明：“本公会以联络同业感情、保障公会侨胞银信及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之弊为宗旨。”第二章“会员”中详细规定了会员的资格，即“以商号为单位，凡在汕头市区域内经营外洋各港银信之商号，均得依照入会手续，加入本公会位会员”，又对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作详细的规定，如“受不法侵害时，经查确后，有请求本会保障及援助之权利”。第三章详细规定了会务的进行：“本公会一切会务概取公开制度，由全体会员共同负责办理，每月轮流一会员为值月司事。”1929 年在新加坡成立了新加坡潮侨汇兑公会。

侨批公会对分批过程中可能出现情况的处理方式提出了相关规定。例如侨批公会告示中有关惩罚的规定有：“批款出发分送，遇有盗匪抢劫，附近乡村不行尽力救护，即由本会呈请官厅，就该乡村究追，治其庇众之咎，若在追究而未破获期间，该乡再有劫批事件发生，又仍旧不予救获，则除加紧究处外，并通知外洋批局停止收寄该乡批款，以至劫案皆行破获为止。”可见，随着侨批业的发展，侨批公会力量也逐渐壮大，成为维护侨批业利益以及约束行业内违法乱纪行为的一个集交流、监督于一体的行业公会。

有独无偶，厦门也成立了自己的行业工会。1923 年，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致思明一等邮局的信中写道：

> 贵局致会员美南民局公甬一案，福建邮政管理局第 1018 号节开查厦门美南捷顺安顺记三家在石狮地方均设有分号，该分号之包封一律不叫邮局寄递，均自行走私。虽经石狮局警告，犹不悔改，殊属不合，本应时该民局执照予以注销，兹特知该局仰即迳向，该民局严重交涉务着石狮分号按包封提邮，否则照章核办。究竟该民局如何决定仍应详具报告等，因奉此合亟甬达，查照希即转令石狮分局应将有包按章交由石狮局投递，勿得再行走漏，否则如经发觉定予转请省局注销执照，停止民局业务……美南民局呈称敝局所营银信皆为吕宋方面寄来，均贴有国际邮资前，经本会向中央交通部请愿，蒙批如贴有国际邮资无论何处准予自由携带往内地分发，有案可稽，今突接本埠邮局及石狮分局公甬署，谓所有客批须再经过该局检验方可分发，以此方法实违背当时交通部许可之原则，请求本会达本部邮局及石狮分局声明，以免妨碍民局营业等，由查美南民局所称各节尚属实情，该局所营银信既为岷里脵方面（按顺安顺记亦系经营岷埠方面银信）贴有国际邮资照章自可自由携带惟回文包封，当令其依照邮章经过石狮投递除分甬石狮分局相应甬达。贵局查照应据情呈报福建邮政管理局解释避免误会，实级公谊此致思明一等邮局。

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向思明一等邮局解释厦门美南捷顺安顺记批局私自携带侨批并分发的美南民局公甬一案，它声称会暂时制止这一行为，以免发生误会。面对冲突，它竭力为批局申辩：经国民党交通部允许，贴国际邮资可以自己带侨批分发。但是福建政府并没有通过这项决议，因此，福建地方政策与国民党交通部政策相矛盾。总的来说，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向思明一等邮局致信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声称会对相关批局进行调查，查明情况；二是说明即使相关批局私自将侨批分发，但是不违反交通部法律规定，希望通过思明一等邮局上报福建邮局解释这件事情，维护相关批局的利益。由此信可以看出同业公会充当民（批）局与邮政之间的调解者，为民（批）局发声，与此同时，它还有对内部成员的一定的管控作用，如果发现其违法乱纪行为，也不包庇，听从邮局的决定。侨批公会的产生，使侨批网络进入制度化管理阶段，这种管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集合侨批业内批局的力量在维护侨批业利益的同时也起着内部监督的作用。

侨批业运营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离不开从业人员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变化和创新，是集体智慧和时代因素的结晶，总结侨批业运营系统化和制度化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继承性、集成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侨批业运营机制的发展具有继承性。简而言之，民（批）局是对水客业的继承与发展，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提高送批的效率，水客等对此进行创新，简化送批的流程，标准化运输过程以提高送批的效率，加强分工协作，创立了“帮号”制度与三盘制等。

侨批业运营机制还具有集成性。由于侨批业的特殊性——既具有邮政功能（信），又具有金融功能（银），因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分为“送信”和“汇兑”两个方面，并在体系中巧妙将两个系统相融合，形成独特的投递收付制度。

侨批业运营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侨批行业由零散水客变化发展而形成，而侨批行业的系统化发展，使其内部力量不断壮大，侨批公会是为解决侨批业群体发展壮大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而形成的，它在设立之初便针对一些常见的问题制定了规章制度，其设立也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

侨批及侨批业作为体现华侨华人智慧的移民金融产物，是一种曾经影响全球移民、贸易和金融网络的特殊经济形态，在百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几度沉浮与跌宕。回首侨批业发展的历程，从历史中得知推动行业发展的缘由，形成一整套合理的运营机制，也许能对今日之邮政业、快递业以及银行业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张爱玲：从上海到洛杉矶

文 叶周（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

1995 年 9 月 8 日，作家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的公寓里被发现已经离世，时值中秋。根据法医的鉴定，她逝世的日期应该是六七天以前，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最后所住的公寓离我上班的电视台不远，在她逝世整整 15 年后的一个午后，我特地去附近走了走。那是一幢非常普通的公寓，格局简陋，在洛杉矶西木区这类公寓很多，但张爱玲最后居住的那一幢实在不起眼。

在十分窄小的公寓入口，街道的坡度有些陡，我想象着年迈的张爱玲每天走过那条道路，步履蹒跚。我读了一下呼叫对讲机上住户的姓名，在原先张爱玲住过的 206 室，现在的住户姓 Pai，看上去不像是中国人的姓氏。恐怕现在这位新住客并不知道曾经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这间屋子里长眠了。

在上海，走过静安寺附近的常德路（原名赫德路）和南京路交界的地方，会看见一幢 7 层高的常德公寓（原名爱丁顿公寓），张爱玲也曾经是那里的住户（195 号，六楼 65 室）。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租房时登记的职业是穆伟均律师事务所打字员。那是一幢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式公寓，出资建造者是意大利人，公寓外形雍容大度，有宽敞的钢窗，还有环形的大阳台。张爱玲当时的丈夫胡兰成曾在文章里写道：“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靄靄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张爱玲认识年长她 14 岁已婚的胡兰成就是在爱丁顿公寓里。一天胡兰成主动到爱丁顿公寓里来拜访她，吃了闭门羹，只能在门缝里留下一张条子。后来张爱玲就从那儿出去，顺着静安寺路，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路走去胡兰成住的美丽园回访他。这一趟走过去并不远，也就 20 多分钟。后来他们交往后，也就时常“步行去美丽园，去静安寺街上买菜”。



张爱玲







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的住处

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张爱玲穿了一件桃红单旗袍，胡兰成按捺不住说好看，张爱玲不免有些沾沾自喜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

相比起爱丁顿公寓，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住的公寓就简陋得多。五层高的楼房，设计上没有任何特色可言。在那个街区里，附近的几座公寓都更为亮丽。

我从上海到美国，时常有这样的感受，在上海进出过的好房子远多于美国。与父母住的枕流公寓，是英国式的公寓，李鸿章儿子的产业；后来在电影杂志社和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时的办公室，也都是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建造的欧式花园别墅里。记得谢晋导演拍摄白先勇的《最后的贵族》，其中女主角上海家中的景，就是在文学部的大厅里拍摄的。而美国除了富人区的豪华住宅，或是如同纽约第五大道上的高级公寓，平日所见的建筑也都稀疏平常得可以。这也就难怪张爱玲在美国的居住环境远不如上海的了。

20 世纪 80 年代，张爱玲在洛杉矶写了她生命中最后的著作《小团圆》，可是我发现她书中的很多事却都是关于上海爱丁顿公寓中的旧事。

其中就有很多是与胡兰成的事，那也应该是40多年前的记忆了，可她就是记得那么深刻。包括她写到的其他人，不论是作家编辑荀桦，导演燕山，都有真人可寻。这些人都对她的创作和生活有过深刻的影响。

住在上海爱丁顿公寓时，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也为此，胡兰成曾表示：“所以我政治上诸般作为，亦终不想要移动她。”不过这也是他的一种托词。抗战胜利后，曾为汪伪政权效劳的胡兰成避走乡下，张爱玲还是住在爱丁顿公寓，一直到1947年才搬走。而一生桃花无数的胡兰成，等到仍然有着名分的胡太太张爱玲到乡下去探望他时，却发现他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位。张爱玲也没有做什么激烈的表示，只是默默接受了。似乎张爱玲就十分习惯了与胡兰成及其新伴侣的三者同行。为了避免当地人对胡兰成身份的猜测，胡兰成在人前都介绍张爱玲是他的表妹。张爱玲也都默默接受。

抗战胜利时，张爱玲27岁。她和胡兰成的婚姻也走到尽头。离婚后，她搬出了爱丁顿公寓。离婚前张爱玲去温州看望避难中的胡兰成，胡兰成还记得，一天“两人在小巷里走，要我选择她与小周，而我不肯。我且又想起她曾几次涕泣，……”

一个半月后，张爱玲就从上海写来了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可是用胡兰成的话就更绝情：“其实我并不觉得爱玲与我决绝了有何两样，而且我亦并不一定要想再见她，我与她如花开水流两无情，我这相思只是志气不坠。”

这也就难怪40多年后张爱玲在美国想起上海的旧事，在《小团圆》里描写九莉（即张爱玲）对之雍（即胡兰成）的感受道：“她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那是怎样痛苦的感觉？唯有张爱玲能以她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是命运弄人，在胡兰成的记忆中，张爱玲曾对他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如果真像张爱玲说过的“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那么她就会一辈子终老在上海。即便有些舆论对她并不有利。可是，1950年后，她最终选择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最后又去了美国，走上了不归路。



上海常德公寓，原名爱丁顿公寓，张爱玲出国前曾居住于此

1982年，北大著名学者乐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偶然看到张爱玲的作品，大为赞赏，于是辗转托人，想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张爱玲回信致谢，但表示并不想回国：“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过的地方太少，有机会也想到别处去……”而她所说的“别处”，就是欧洲。张爱玲平生所憾“去过的地方太少”，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欧洲看看。

张爱玲行为做事十分决绝，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张爱玲的作品已经“重获”内地读者的喜爱，而且大陆读者对张爱玲“迟来的爱”也汹涌而至。可是她面对时代发展带来的改变视而不见。她再次选择了幽居避世，不论在美国，或是来自中国的客人，她都拒绝见面。

曾经有一次例外，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到洛杉矶，想去看望张爱玲，托熟人向她联系。张爱玲知道冯亦代过去也在上海，表示同意见面。可是，张爱玲的答复总是“迟复为歉”，待冯先生得到通知时，人已经离开洛衫矶了。后来，冯亦代提到此事，感到万分惋惜。

张爱玲晚年的生活状况十分艰难，有几个原因导致了她生活之不易。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稍有能力者，都要买部汽车代步；搭公车的，十有八九是新移民，或是生活艰难的穷人。可以想见，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混迹其中，该是何等狼狈！又是怎样的不方便。

据熟悉张爱玲的人回忆，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跳蚤”，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按这样算的话，张爱玲搬家次数竟高达一百八十多次，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她去看医生，反反复复申诉美国跳蚤的可恶，医生也难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其实，她患的应该是一种难以痊愈的皮肤瘙痒症。

她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描述她日常的生活：“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里：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张爱玲所去的医院是政府指定的公立医院，路途很远，要搭公车去，排队看病还要等候大半天，十分不便。

晚年的张爱玲几乎已经与中餐无缘。我在她住地附近走了一圈，几乎找不到一家出售中国食品的超市，更不可能有中国餐馆。据说她平时不愿自己动手烹饪，也不愿到外面去吃，仅以罐头蔬菜、盒装鲜奶、鸡丁派、胡桃派、苏格兰松饼等作为饭食。可以想象，长年累月吃那样的食品，有一个中国胃的人怎么受得了？从口感上没有什么快感可言，营养也一定跟不上。

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出奇地瘦，神态安详。她躺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她身穿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身下垫着一张灰蓝色的毯子，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她头发很短，手脚自然平放着，走得平静，有尊严……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功成名就、子孙满堂才称得上“大团圆”。可是，张爱玲最后到了美国，孤独终老，没有头衔和功名，一直租房子住，没有购买房产、更没有后代。这样的人生结局，就连一般人的“圆满”也没达到。显然与传统观念中的“大团圆”相去甚远。恐怕这也是她在洛杉矶西木区那幢她生命中的最后居所里，修改着她人生最后的著作时所念念不忘的。九莉曾经在梦中看见“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可是梦醒了，一切都回到她孤独宁静的小屋里。《小团圆》似乎是她对于自己人生的总结，遗憾之意溢于言表。

我在加拿大当“无冕之王”

文 黄学昆

2020 年 9 月底，收到海外华文述著奖评选委员会从中国台湾发来的通知，说我的专著《心归何方：媒体人眼中的加拿大华人社会》经评审，获得社会人文科学类第三名。那一刻，我是感慨万千！

这本约 28 万字、26 章的书，2018 年 6 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原中国国务院侨办司长、华侨大学校长丘进教授作序。书中集案例、历史、资料、法律于一身，我以媒体人立场，根据现场采访和新闻追踪，对加拿大华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婚姻、社团、心理、家庭、子女教育、社会融入、老人赡养、与祖籍国关系等专题逐一进行分析。出书的初衷，如前言中所讲：一是对自己在加拿大近 20 年记者生涯的总结回顾，算是立个“传”吧；最重要的，是对加拿大这个国度是好是坏，以亲身所见所闻给中国准移民提个醒，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并为读者奉献一个真实的加拿大及华人社会。如丘进教授在序中所说：“这是一本介绍加拿大华社主要情况的综合性读物，对于国内涉侨涉外人员来说，是一部了解加拿大国情和侨情的好教材，而且从中可以引发对当前海外侨情和侨务工作的思考。即使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相信读了这部书，也一定能获得很多有益的启发。”该书以全面介绍加拿大华人生存现状见长，出版后立即被中、加诸多大学和图书馆收藏，侨乡广东新会的景堂图书馆馆长赞许该书填补了该馆百年来华人历史和生活典藏的一个空白，实为难得。我想，凝集了自己大量心血的这本书，其价值应已体现出来了！但一直未想过要参加评选。



作者简介

黄学昆，《加拿大商报》副总编辑。曾先后供职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驻香港澳门中资公司等。发表论文 20 多篇，参与出版《广州工业 40 年》《广东外向型工业发展研究》等书；著有《海外粤籍华人社团发展报告》（合著）、《心归何方：媒体人眼中的加拿大华人社会》（专著）等。



黄学昆向加拿大小型企业及出口促进部部长、华裔国会议议员伍凤仪（Mary Ng）赠书

直到加拿大华侨史学家贾葆蘅看过后极力主张我参加评选，好让更多人分享给更多人，我才鼓起勇气将拙书送去参评。从根本上讲，《心归何方》是成之于“媒体”，得益于自己在加拿大媒体业的不懈耕耘。

中文媒体、中文学校、华人团体，被人们誉为撑起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做中文媒体，除具备新闻专业修养、职业操守，有“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神仙肚”外，还得有颗坚韧的传承中华文化的初心，耐得住清贫。加拿大统计局曾有个统计：在各行业平均收入中，电视广播报刊媒体业垫底，族裔媒体的中文报业收入就更低。幸好，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媒体记者”是清贫但受人尊敬的“无冕之王”，但凡政府、议员要向华人传递点什么信息，首先找的是我们；华人社团要搞点什么活动，千叮万瞩希望我们到场；同胞有大小事情、遇到不公，更会找上门来倾诉一番，希望做个报道、帮助讨个公道。就这样，我就拥有“特权”去近距离观察华人社区。参与得多了，就会见得多、听得多、想得多，可以“第三只眼睛”全方位、多角度看加拿大社会和华人。看到的，既不完全是移民顾问描绘的“人间天堂”，也不全是网络上描绘的移民后的失落惨状，而是一个充满喜怒哀乐，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碰撞，中西文化互相排斥和渗透交融，人生奋斗中成功与挫折相伴的多彩世界。这就是《心归何方》成书的基石。

近 20 年来，我笔下的新闻、时评、移民故事、人物访谈，已经洋洋 200 多万字，不少还被中国主流媒体如新华社、中新社、中国侨网等转载，2005 年还以加拿大总理马田访华系列报道获得了加拿大主流新闻奖“韦伯斯特奖”。笔耕虽然艰辛，但能够为华人社会留下闪亮的印记，也是值得的：

在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否认侵略中国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采写了一篇关于多伦多老侨王华莹家中发现收藏的日本“军事秘密”地图的新闻报道，为日本侵华史提供了一份铁

证，并被《中国日报》第一时间转载，随后加、中主要媒体网站大量转载，引起了海内外关注。

2016 年南海主权归属争执日趋激烈之时， 70 多岁的香港移民麦励浓联系上我，给我展示了 60 年前在英国驻港军营买到的 1945 年版美国海军用菲律宾地图复制件，再次印证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菲律宾对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毗连区并无领海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我对他的独家专访，很快被中国主要媒体和世界中文媒体转载，而这也是加拿大中文媒体中最早关于发现黄岩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地图证物报道。

中国政府宣布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后，我对定居加拿大的 90 岁的原中国远征军少校翻译官范孟襄做了一次专访，并将老人希望能够获邀回中国参加阅兵式、重走当年缅甸印度之路，与中国远征军在世老兵共同拜祭中国英烈的心愿，写成《远征军老兵期盼参加中国阅兵式》，并转请人民日报驻加拿大分社原社长李学江帮助转载《内部参考》报送有关部门和领导。因范孟襄年事已高而不宜远赴北京参加阅兵式，中国有关部门特在加拿大多伦多向他颁发了纪念章，为老人实现了数十年的心愿。

随着国内学术界对加拿大研究的拓展深化，拥有信息源优势的加拿大中文媒体关于加拿大政策法令、新闻事件和华人社区的报道，也日渐成为学者的关注点和资料来源。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 2012 年 9 月刊上，万晓宏博士的学术论文《当代加拿大华人精英参政模型分析》，就引用了我一份关于华人参选的报道。而对希望了解华人生活的加拿大人而言，中文媒体无疑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桥梁”。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曾告诉我：肯尼（Jason Kenney）担任联邦移民部部长时，我主编的两份报纸是他办公室收集的报纸之一，肯尼让中文助理先编译每期的主要标题，再挑出感兴趣的报道去翻译阅读，以了解



《心归何方：媒体人眼中的加拿大华人社会》

作　者：黄学昆

华人社区的动态；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也收藏着我主编的报刊。

中文媒体人要担当文化交流的“桥梁”，以个人的理解，最大难点是在中国叙事报道的“反向交流”上。这些年，我们与《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新会侨刊》《深圳特区报》《大公报》等合作开辟专版，将“中国声音”引进加拿大。但两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存在差异，受众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各国华裔移民，生活背景和政治观点不一，要让“中国故事”为大多数读者所愿意接受，我们媒体客观、中立的立场就显得极为重要。我们在稿件选题上，侧重历史文化、乡土民俗、经济社会、侨务政策、乡音乡情等新老移民关心的话题；涉及加、中争议和不友好事件的报道，就坚持“平衡报道”原则，既报道加方观点，又展示中方立场，让读者获得事件全貌，引导舆论消除种族偏见，增加对华友好；对中国突发事件的新闻，坚持客观报道，只叙事、不评论，让“ 中国声音”抓住海外华人的心。我曾在广东《侨时代》杂志的一个访谈中指出，中国话题特别是负面新闻，比如转型过程中的国内矛盾等，是海外媒体不能完全回避的。怎样专业、准确、客观地做出报道，在复杂社会环境中“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华文媒体的一个难题。但我想：坚持下去，风雨过后，定有彩虹！

● 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

华夏 双月刊

广东省优秀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7373



《华夏》杂志创刊于1985年，
由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围绕“拥抱世界的港湾，连接天下的彩虹”的办刊宗旨，
通过“侨”为中心坐标与纽带桥梁，
借由“侨”的眼界和语境，
以“人文”为主线，
承载家国情怀、弘扬中华文化、记录侨海风云，
以及探索东西方文明交融。

社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广东侨联大厦6楼
邮编：510620
电话：020-38879808
邮箱：gdqlhx@163.com

广东侨联工作

联谊联络品牌

情系南粤

拓展内外朋友圈，画好最大同心圆，以侨为桥，以情聚谊，共促中外人文交流，增进中外友好合作。

